



序篇：人·历史·梦幻

本文系作者大著《光荣的荆棘路—改革家们》序篇。

该书目录：

序篇：《历史·人·梦幻》（1.5万字）

第一篇：《掀开铁幕——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2.5万字）

第二篇：《走向绞刑架改革家——纳吉与匈牙利事件》；（3.5万字）

第三篇：《毁于领袖权力的波兰改革——哥穆尔卡的悲剧》；（2万字）

第四篇：《被勃列日涅夫扼杀的春天——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7万字）

第五篇：《华沙，社会主义新曙光——瓦文萨和他的团结工会》；（14万字）

作者：假如19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如马克思预料的那样，是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取得胜利，你会接受这个事实吗？

历史：至少我会少索讨一些代价。

作者：俄国人怎么得罪了您？

历史：他们竟然无视我的存在，而急于主宰世界。

作者：他们对您并无恶意，只是他们太苦了，不能再等下去。

历史：我专门惩罚性急的人。

作者：可您让半个世界的人付出了代价。

历史：为了让人们记住，惩罚不能不是无情的。

作者：我们愿意尊重您的权威。可是……恕我冒昧，难道我们不可以向您身上的惰性挑战？

历史：……（沉默）

—

疲惫而困惑的历史向列宁屈服了，它顺从地给了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1917年11月8日，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在俄国获得胜利的第二天晚上。列宁走上讲台，面对着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列宁耐心地等待着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停息下来。他用细小的、闪闪发光的眼睛扫射着人群，注视着历史。

此刻，人是激昂的；历史却萎靡不振——它被二月革命以来短短数月的巨变搞得疲惫而困惑。

列宁感到了人的力量——历史是可以被超越和战胜的。

他等待着，他终于可以向历史宣布了！他的第一句话是：

“现在，我们就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制度。”

列宁没能继续讲下去，他又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了。但已经够了，这一句话已经震撼了世界——近乎于狂热的欢呼和近乎于狂热的诅咒在世界各个角落发出。人类还从来没有如此地震撼过世界、震撼过历史。

列宁使世界和历史黯然无色。这是人对历史的一次空前胜利。历史屈服了，它顺从地给了人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奴隶们解放了，庆贺自己在一夜之间成了历史的主人。

或许我们会责备这种庆贺过于匆忙了，但如果想想他们在压迫和绝望中已经生活了几千年，他们当然有权为初次的胜利而欢笑、庆贺。然而，我们却不能不为他们的疏忽

遗憾。

他们从历史手中接过来的只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和社会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在国家长期站立着的地方，社会便难以挺立起来。

被驯服了的历史在这儿耍了一个小小的手腕，潜藏着一个东山再起的杀机。历史会妥协，会让步，却绝不投降。

几位杰出的人，在这次人与历史空前激烈的交锋之前，就对历史的让步有过不祥的预言，警告人们在与历史的角斗中，不要过于轻信轻易取得的胜利。

恩格斯在1850年这样预言：“一个领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时机还未成熟，为了这个阶级统治必须贯彻一些措施的时机还未成熟，而这个领袖在这种时期被迫出来掌握政权，这是最糟不过的事了……他所能做的事是和他一向的整个主张，他的原则，他的党的直接利益不相容的；他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实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七卷468-469页）

革命领袖的警告并未遏制住历史的报复。

二

列宁利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进行战斗，以制止半个世界的悲剧发生。

1922年12月23日夜晩，在与历史的搏斗中耗尽了精力的列宁第三次严重中风，他的右手和右腿都瘫痪了。列宁随时都可能离开人间，但他不愿离去，他的战斗尚未结束。

列宁要求允许他以口授的方式进行工作，要求每天给他5分钟。他的要求被拒绝了。

列宁提出最后通牒：如果不允许他每天口授5分钟，他将完全拒绝同医生合作！

于是政治局召开了一次包括医生在内的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列宁的要求。

到底什么迫切的事情驱使着列宁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要求这可怜的5分钟？列宁看到了历史隐藏着的杀机——苏维埃政权中暴虐的官僚制，以及将会利用官僚制实行专横统治的斯大林。

列宁要利用他所剩下的以分钟计算的生命，来完成他的最后斗争：改造官僚制；撤换斯大林！

列宁在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出那句想震撼世界的诺言已经5年了，可社会主义理想并未成为苏维埃社会的现实；相反，官僚制却深深地侵入，并牢牢地成为苏维埃社会的一部分，以至列宁在最后时刻谈到国家机关的官僚化问题时，认为“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

由于这种状况，列宁在临近安息的时刻而不能安息。

从1922年12月到1923年2月，列宁以口授的形式完成了《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五篇批评官僚制的文章。只有与数亿人命运相关的大事，才能使一个人产生如此巨大的意志力。

1923年1月4日，列宁着手处理他生前的另一件大事——在“遗嘱”中建议撤换斯大林。

列宁在遗嘱中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同志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

这确实是一件大事，它的严重性在列宁逝世后的几十年中表露得更加清楚——它改变了半个世界的命运。这些，列宁早就看到了，然而他却没能利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制止住半个世界的悲剧。

1923年3月10日，列宁最后一次中风，完全丧失了讲话能力，完全停止了战斗。此时，他年仅52岁，距1924年2月21日逝世，还有整整十个月。

列宁退出了与历史的角斗，把位置让给了他的继承者。

1924年5月21日，苏共在十三大代表会议前夕召开了中央全会特别会议宣读列宁遗嘱，并确立党的领导。

这次全会将决定斯大林的命运、俄国的命运、半个世界的命运；还有——历史的命运。

列宁的继承人里面，托洛茨基是最有威信、最强有力的人物。为了对抗托洛茨基的力量，斯大林与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加米涅夫和兼任共产国际领袖的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结成了同盟。

加米涅夫宣布开会，并宣读了列宁遗嘱。会场一片沉寂。

斯大林绷着脸，面色阴暗。接着，季诺维也夫发言，他庆幸列宁所担心的事没有发生——党的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都没有分裂。因此，他建议，仍然由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

斯大林一直皱着眉头，绷着脸，两眼直视着窗外，等待者决定他命运的时刻。

托洛茨基派的人反对这项提案。然而他们不是多数；更主要的是，作为这一派的首领托洛茨基本人，却以顽强的沉默表示出对这场喜剧的蔑视。他那有名的自信、自尊使他不屑于采用相同的手段去争夺权力。这等于放弃了战斗。

斯大林获胜了，保住了总书记的位置；然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胜利，换来的却是1926年斯大林对他们的死刑判决！

1926年，当斯大林解除他们的权力时，季诺维也夫曾经痛苦地回忆起这次拯救了斯大林免于毁灭的中央全会，共质问斯大林：“你知道什么叫感恩吗？”

斯大林回答：“我当然知道。那是一种狗的病症。”

到此时，历史与人的较量可以暂时休战了。历史和人都可以按照各自的轨迹和惯性，行进着……

三

赫鲁晓夫的报告震撼了人。1917年是对历史的胜利，1956年是历史对人的报复。顷刻之间人就失去了用整整两代人的生命去奋斗的目标……

1956年2月24日，在列宁对历史宣战39年之后，也是在苏联，也是在夜晚，我们看到了人与历史的又一次搏斗。

这一天，刚刚从苏共“二十大”选出的135名中央委员，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一中全会，代表们则准备收拾行李回家，因为“二十大”的闭幕式已经在当天举行过了。

可是临近午夜，所有的中央委员和代表又突然被召集到克里姆林宫。

作为党的代表大会，它的所有程序都是事先规划好的——它的大会报告、它的候选人，甚至它的选举结果——那么现在，这个严密的“计划政治”到底出了什么故障？

代表们紧张地期待着，预感到将有非同寻常的事件发生。

他们等来了一个身围肥宽的人，此人跨着无节奏的步子走上讲台。他两腿粗短，双肩壮实，显得矮胖笨拙。但他有一双和列宁一样细小而敏锐的眼睛，这是一个有着巨大生命力的人。

此人正是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

然而，他的战斗方式却与列宁毫不相同——列宁面对着世界、面对着历史，用他那慷慨而宏亮的声音，发出了对历史的挑战；而现在，在这深夜的密会上，这位厚嘴唇、狮子鼻、高颧骨的人，却是诡秘而胆怯的。他悄悄地告诫与会者，他现要作的报告，“不能拿到党外去宣传，更不能到报刊上去发表，应当知道分寸，不应当向敌人提供弹药，不要向敌人宣扬我们的家丑。”

赫鲁晓夫开始了长达7小时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的题目是《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内容是谴责被他称为“历史上最凶暴残忍的罪犯”斯大林。

默默听着的苏共代表们惊呆了，因为十天以前，也就是2月14日“二十大”开幕式上，全体代表和来宾还肃立默哀，悼念他们的“父亲和导师”斯大林。

赫鲁晓夫有一双非常小的手。然而这位喜欢挥舞着小手的政治家却有着异乎寻常的力量，他居然掀动了历史的铁幕，让代表们看到了幕后的世界。

那真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世界——那个人类第一次从历史手中争取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个作为共产主义世界当然领袖的国家，原是一个靠个人独裁和政治恐怖进行统治的国家！

那是一个世界上中央集权程度最高的国家，这个两亿人的国家只有一个脑子——斯大林的脑子！

在那里，保安力量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秘密警察成为独裁者斯大林的主要支柱和权力工具，他利用这个权力工具犯下了使历史上任何一个暴君都相形见绌的罪行！

赫鲁晓夫在公布一系列血腥的数字：“苏共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98人，即70%在1937—1938年被逮捕和处决了。”那次党代会的1996名代表，有1108名，因“反革命活动”而遭逮捕枪决。

这次大清洗也没有放过军队。5个元帅被处决3个；全部军区司令员被清洗；海军和空军首脑被枪决；所有的舰队司令员只有一人得以生还……到1938年，红军师以上的干部只剩下39%保留住原职。

被镇压的还包括列宁时代的几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李可夫。政治局中得以幸免的，只有斯大林的亲信米·加里宁和维·莫洛托夫。然而斯大林却下令逮捕了他们的夫人。

在列宁建立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人民委员中，竟有9人死于斯大林的大屠杀，而幸免的6人中，除列宁和斯大林自己，其余4人都是在大清洗之前去世的；因此，可以说，斯大林枪毙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全部人民委员。

那么，清洗只局限于上层，只涉及到斯大林的政敌吗？不，政治恐怖从来是针对全体被统治者的。

在30年代，斯大林为了强行推行他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竟使150万农民被枪毙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斯大林为了使农民屈服，接连两个春季不给富农和未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民发放种子。农民无法播种，被迫流入城市，沿路乞讨，饿死街头。农民屈服了，加入了集体农庄。

这是一个领袖对自己的人民所发动的战争，人们第一次因为自己的出身而遭到杀戮，被杀户全家被迫迁出，其子女不许在高年级学习。

被斯大林直接戕害的共产党人有70万——且不说被枪杀、流放的成百万其他的人——这个数字比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问世以来，各国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人加起来还要多。

与会者惊呆了，世界惊呆了，只有历史在暗中窃笑。

如果说列宁在1917年的宣言震撼了历史的话，赫鲁晓夫这一次的报告却震撼了人；1917年是对历史的胜利，1956年是历史对人的报复。顷刻之间，人们就失去了理想、希望和用整整两代人的生命去奋斗的目标，只剩下人的疲惫和困惑——就像1917年历史曾经疲惫和困惑过一样。

这一次历史是清醒的，它迫不及待地宣告自己的胜利——赫鲁晓夫作完报告的当天（已经是25日凌晨了）国外就报道了苏共秘密会议举行的消息；几个星期后，美国国务院放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全文的英文文本。

共产主义面临着它有生以来最深刻的危机——全世界所有的敌对阶级和敌对国家都猛烈地攻击共产暴政。

共产党人在这意想不到的打击下沉默了——因为打击来自内部，来自事实。

四

西欧的共产党垂下了头，共产党的东欧面临着灾难性的风暴。1956年是共产党人的灾年；同时，1956年又是人对历史的又一次挑战——艰难而漫长的社会主义改革就要开始了……

当西欧各共产党在秘密会议上传达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共产党人被其中许多惊人的情节而惊呆了。

一位西德的年轻共产党员曾经描写过当时的情景：

我们在莱比锡市议会的地下室感受到最初的震惊。我们十几个人蹲在一起，为刚才听到的本情而目瞪口呆。一切话都是压着嗓子窃窃私语的，似乎有点难以置信不可捉摸，如果大声重复这些话，那就难以使人忍受——多么矛盾啊！

有人在宣读秘密报告中那些绝望的共产党人从监狱里寄出来的信，是斯大林把他们投入监狱的。人民在极权统治下生活了20年多年！这一切果真是真的吗？不可能这样！斯大林是我们力量的体现者，是力量的象征，是朋友、卫士、远方的父亲、是革命的化身，他无所不知，慈祥而正直；而现在的斯大林，难道是一个暴力狂、迫害狂、偏执狂？难道他嗜好虚荣、个性恶毒，是一个卑鄙的独裁者？不可能！我们站起来去街头漫步。我们仿佛在梦幻中，神容憔悴……

西欧共产党人曾经把斯大林当成革命的象征。现在，一切都动摇了、失去了，他们恍恍惚惚、若有所失。他们低着头，躲避着资产阶级政客们咄咄逼人的攻击。

东欧共产党人的处境更加尴尬。

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贝鲁特曾被邀请参加了2月24日晚上的会议。赫鲁晓夫作完秘密报告后，要贝鲁特表态。

贝鲁特不知所措，无可奈何地说：“我们怀着悲伤的心情得知斯大林做坏事的消息。波兰人民那么感谢斯大林，感谢他的智慧和援助。”

这种在赫鲁晓夫突然袭击下的惊惶失措、无可奈何，是整个共产党国家的普遍情绪。

东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竭力挡住这股冲击波，他们不公开刊登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他们只是改换了几个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街道，撤换了几个特别受牵连干部。

东欧沉默而紧张，因为在那个地区，斯大林式的政权还继续着它的统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与斯大林、斯大林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这种沉默形成对比的是人民的骚乱。人民从西方广播中听到了全部事实真相后，他们愤怒了——西欧共产党人失去的仅仅是理想，东欧人民失去的却是现实、是几代人的代价——

神话被破灭了，

他们向我们大嚷大叫：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咬破手指是不疼的。

人们咬破了手指，

人们感到疼痛。

人们失去了信仰……

它是靠空话过活，

纵然有说教，生活却越来越野蛮。

这首充分表现了人民觉醒的诗，是波兰诗人瓦齐克写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瓦齐克曾经是斯大林主义桂冠诗人。当然，最早的觉醒者，付出的代价总是最大，瓦齐克因为这首诗而被波兰作家协会开除了。

人民愤怒了：他们把斯大林的巨型塑像推倒。斯大林的塑像被人们吐上唾沫，被砸成碎块。人们开始公开讨论斯大林的专制独裁，讨论斯大林主义的全部标志——党内生活泛化；国家政权日益成为奴役社会的力量，政府机构变成恐怖主义的独裁机关。

西欧的共产党低下了头，共产党的东欧却面临着灾难性的风暴。1956年是共产世界的灾年。

1956年，即使顽固的斯大林主义者，也很少有人敢于为斯大林的极权统治辩护。人们为赫鲁晓夫披露出来的个人迷信、专制、政治恐怖所痛苦、愤怒，并且不自觉地把这一切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

在资产阶级看来，赫鲁晓夫是给了社会主义当头一棒的英雄；在执政的共产党人看来，赫鲁晓夫是制造混乱和灾难的祸首；对经历了极权统治的人民来说，赫鲁晓夫无疑是争取法制、民主的先锋战士；对历史来说，赫鲁晓夫是它的胜利宣告人……

然而，他们都没有从赫鲁晓夫的行为中看到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另一面——

资产阶级没有看到，这次揭露给重建社会主义所带来的一线希望；

执政的共产党人没有看到，如果没有这种检讨和揭露，在共产世界潜伏的危机将会加深而造成更加难以控制的局面；

经历了极权统治的人民没有看到，比揭露和打倒斯大林及其在半个世界的追随者更加艰难的，是对体制的批判和改革；

最后，因为取得了胜利而洋洋自得的历史没有想到，赫鲁晓夫的这一举动将在半个世界的范围内发起对历史的又一次挑战——艰难而漫长的改革就要开始了……

当然，这些都是若干年以后才有的认识；1956年，有的只是盲目的欢呼和盲目的消沉。人没有明白，历史也没有明白；那时，很少有人思考过这一问题：产生这一悲剧的原因是什么？这些罪行到底是社会主义犯下的，还是一个蜕变了的政权非社会主义化的结果？

人们没有冷静思考，却匆匆接受了这样的答案——斯大体和苏联的官僚制是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合法继承者；斯大体现象是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注定的结果。

这是资产阶级的答案，他们企图使革命和社会主义威风扫地。

这个答案使许多人对社会主义产生绝望。

在1956年，尽管在共产党内，少数最优秀的人士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已经被斯大

林的政治恐怖和官僚制所埋葬，必须以最彻底的改革精神重建社会主义，但他们面对的是对社会主义抱有怀疑和绝望情绪的人民，以及对斯大林现象仅仅进行个人谴责的上层保守势力……

改革家的困难可想而知。

然而，既然铁幕已经掀开，人们便不可能面对那种触目惊心的罪恶而无动于衷——这就是人之所以是人，人之所以能进步的原动力。

人在与历史惯性的对抗中，尽管并不是每次都以胜利告终，但却从未放弃过斗争。

在这场战斗中，冲在最前面的，成功的希望最小，因为他们必须孤军奋战，必须带着历史对他的束缚去攻打历史……

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失败才有更深的意义和更大的价值；

正因为如此，我们同样把改革家的称号送给那些失败了改革家……



赵启强——光荣的荆棘路

- 序篇：人·历史·梦幻
- 掀开铁幕——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 走向绞刑架的改革家——纳吉与匈牙利事件
- 毁于领袖权力的波兰改革——哥穆尔卡的悲剧
- 被霸权扼杀的春天——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一）
- 被霸权扼杀的春天——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二）
- 被霸权扼杀的春天——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三）
- 被霸权扼杀的春天——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四）
- 被霸权扼杀的春天——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五）
- 来自底层的改革浪潮——瓦文萨与波兰团结工会（一）
- 来自底层的改革浪潮——瓦文萨与波兰团结工会（二）
- 来自底层的改革浪潮——瓦文萨与波兰团结工会（三）
- 来自底层的改革浪潮——瓦文萨与波兰团结工会（四）
- 来自底层的改革浪潮——瓦文萨与波兰团结工会（五）
- 来自底层的改革浪潮——瓦文萨与波兰团结工会（六）
- ② [附1：广传真相平台（敏感资料）](#)
- ② [附2：华夏新闻平台（被禁新闻）](#)
- ② [附3：华夏视频在线（被禁视频）](#)
- ② [附4：中国禁闻百科全书（禁书禁片）](#)

禁书网网友制作

翻墙去禁书网 www.bannedbook.org 可下载更多禁书



掀开铁幕——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作者：假如您在1956年没有采取那次极端的、今人措手不及的方式对斯大林发起突然袭击，那么，社会主义理想是否能免于一次致命的伤害？

赫鲁晓夫：社会主义被斯大林所埋葬已是事实，我只不过宣布了这个事实。

作者：可您的宣告却是那么彻底地破坏了共产世界的秩序，给半个世界造成了至今还未消除的信仰危机。

赫鲁晓夫：必须动摇对斯大林的迷信，必须动摇对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信仰，这正是我后半生所致力的事业。为此，我才敢于正视和承认那种对我们每个共产党人来说都是痛苦的，难以承认的罪行。

作者：您是一位有魄力的政治家，自从您用自己的皮鞋敲打过联合国的讲台之后，就没有人怀疑过这一点。我只是想问，面对着历史的挑战，面对着整个制度的反抗，您有没有感到过个人的魄力是那样的软弱无力？

赫鲁晓夫：可我将做下去——我枪毙了警察统治的象征贝利亚，我揭露了斯大林对人民和社会主义所犯下的罪行，我将斯大林的水晶棺搬出了列宁墓……

作者：是的，你把苏维埃社会从政治恐怖下解放出来，历史将记住您的壮举。然而，您用水泥浆覆盖了斯大林的水晶棺，却未能覆灭斯大林的官僚制；您结束了个人迷信和政治恐怖在俄国的统治，却未能结束斯大林时代。因此，西方把您掌权的时期称为“没有恐怖和过激行为的斯大林主义时代”。

赫鲁晓夫：我做过了——以一个政治家的责任和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良心去做了。这就够了，我不在乎人们怎么看，何况是西方的看法。

作者：东方也说过，说您是一个失败的改革家，说您只会破坏而不会建立一种新的

民主社会主义来取代您谴责过的制度。这是遗憾，历史只承认能建设的人。

赫鲁晓夫：我建立了重建社会主义的希望。

作者：.....

—

赫鲁晓夫必须对斯大林的传统政治结构进行反叛才能获得权力；而只有获得了权力才能进行反叛。

把赫鲁晓夫列入改革家的行列，肯定会有争议，何况把他放在第一位。这会激怒舆论的。人们会提出最早的铁托和最近的邓小平，然而，我们并不按成就大小和时间顺序排列，无论如何，在林鲁晓夫成功与不成功、有意或无意的改革实践中，毕竟有许多我们不应忘记的东西。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没有一位世界领袖人物的成败能象赫鲁晓夫的成败如此急剧地和决定性地改变历史的进程。”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面临的问题还不是如何整顿和改革斯大林所遗留下来的庞大帝国，他首先需要的是权力。他必须对斯大林的传统政治结构进行反叛才能获得权力；而只有获得了权力他才能进行反叛。

赫鲁晓夫无法以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继承人的身份取得权力，因为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在以上两种资格上都是超过他的。

在上述几位元老中，贝利亚危险最大——他长期担任内政部和安全部负责人，控制着情报机关和秘密警察；他的情报人员渗透并控制着相当一部分军队.....他是斯大林进行极权统治的头号工具；西方甚至把贝利亚称为“斯大林的另一个我”。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贝利亚是扶灵人之一。

对贝利亚的处决很富有戏剧性。它表明在那个时代，凌驾于法律和党章之上的最高领导人，在秘密警察的权力面前，是显得多么的软弱和无可奈何。

在涉及到对一位部长会议副主席的撤职和枪决这样的大事，法律和组织手段竟然完全无效。

赫鲁晓夫同他的临时盟友布尔加宁、朱可夫、马林科夫决定先发制人，向贝利亚发动突然袭击。

克里姆林宫内有一支庞大的、效忠于贝利亚的武装警卫，而莫斯科军区中又没有可以信赖的集团。于是他们从乌拉尔调来两个近卫师，并把扣压贝利亚的任务交给朱可夫元帅和空军司令莫斯卡连科。这个反贝利亚的政治联盟，居然有11个元帅和将军。

贝利亚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被逮捕的。

开会了，马林科夫突然宣布“我们现在讨论贝利亚的问题”。贝利亚当时坐在赫鲁晓夫右边，听到这话后吃了一惊，抓住赫鲁晓夫的手，以一种受惊的表情问道：“尼基塔，这是怎么回事呀？你们在嘀咕些什么呀？”

赫鲁晓夫说，“注意听吧，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接着，赫鲁晓夫首先发言，谴责贝利亚利用保安机构，企图为自己夺取政权，反对主席团的其他成员。

会议按事先的安排一个接一个发言，不让贝利亚有喘息的机会。可是到了需要形成决议时，问题出现了。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描写了这个场面：

最后一个发言后，会议出现了悬而未决的情况，会议有长时间的停顿。我看情况不妙，就向马林科夫要求发言，以便提一项建议。我建议中央主席团解除贝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及内政部长以及他担任的一切其他政府职务。马林科夫仍处于一种惊慌状态。据我回忆，他当时甚至没有将我的提议付诸表决，就按了一下秘密按钮。这就是对等候在隔壁房间里的将军们发出了信号。朱可夫第一个走进会场，然后是莫斯卡连科及其他人。

马林科夫以一种微弱的声音向朱可夫说：“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要求你们把贝利亚关进监牢，以待调查对他的控诉。”

朱可夫说：“举起手来！”并拔出手枪以防贝利亚反抗。贝利亚的确伸手去拿公文包，我抓住了他的手臂。

据说贝利亚是立即被处决的。而对他审判处决的消息则在半年后的1953年12月27日宣布的。公布的罪行主要是“将内政部置于党和政府之上”以及是“祖国的叛徒和帝国主义

间谍特务”，根据特别法律，不准被告出席辩护，不准要求延期执行死刑，经缺席审判后，立即处死。

贝利亚的6个同党也被枪决。

赫鲁晓夫以处决贝利亚拉开了向斯大林帝国斗争的序幕。

赫鲁晓夫反对以暴力进行政治清洗，谴责斯大林违反社会主义法制、诛伐政治异己，他自己却以同样的手段开始了他的改革家生涯；或许，我们难以责备赫鲁晓夫，因为在法制已经荡然无存的情况下，他无法依靠社会主义法制来消除违反法制的罪行；而贝利亚这个人确实该杀。在当时的苏联，人们无论提到谁的名字，都不会象提到贝利亚的名字那样怀着刻骨仇恨和无比憎恶。

苏联人将他与希特勒的秘密警察头子、刽子手希姆莱相提并论，把他俩描写成阴险毒辣、残酷无耻的化身，并从他们的鹰钩鼻上的夹鼻眼镜，看到了这两个人在相貌上的相似。

斯大林的女儿继·阿利卢耶娃曾经说贝利亚是巧言令色的侍臣中一个杰出的现代标本（这个比方，实质上是把她父亲放到了帝王的位置上）。说在贝利亚身上“体现了东方到的背信弃义、谄媚逢迎和弄虚作假”。

当阿利卢耶娃被马林科夫召到斯大林身边，向父亲临终告别时，她看到房间里有许多人都踮着脚走来走去，大气都不敢出，人人都被即将发生的事吓坏了，而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存在。这时，她看到了贝利亚。

斯大林女儿写道：

只有一个人举止是很失态的，那就是贝利亚。他非常激动，他那张即使在最好时刻也使人厌恶的脸，此时被强烈的情欲——野心、残暴、狡猾、对权力无止境的贪婪——扭曲了。在这灾难时刻，他竭力保持应有的平衡——狡猾但又不是太狡猾。一切都明明白白地写在他脸上。他走向病榻，久久注视着垂死者的脸。我父亲时时睁开眼睛，到了这种时候，他还在急于使我父亲相信他是一切人中最忠心耿耿的，一如他曾不遗余力地扮成忠诚的样子。不幸的是，他过去很成功，而且他的成功为时太久了。

二

用克里姆林宫的大脑代替斯大林的大脑来对2亿人进行统治，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它的结果是数百万囚徒重返了家园，人民开始过另一种生活，开始呼吸得比较自由一些

了。

除掉贝利亚后，赫鲁晓夫和他的临时盟友可以舒一口气了。他们暂时不用担心在他们中间会又出现一个新的斯大林。他们达成了集体领导的协议，希望用集体智慧代替个人迷信，用克里姆林宫的脑子代替斯大林的脑子来对2亿人的命运进行思考。

就象15世纪，历史上以荒淫残暴著称的教皇、亚力山大六世博尔贾死后，他的红衣主教们聚集一堂，直布他们为“集体教皇”。那种令人颤栗的、陪伴暴君的余悸使他们胆怯。

然而，他们害怕的只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会成为新的暴君，却并不拒绝权力；相反，经过了专制统治的人，都明白权力意味着什么，他们已经不相信除了个人的绝对权力外，还有什么其他手段可以用来达到目的——无论是谋取个人特权，还是为了改善对人民的统治。

这种对权力既恐怖又迷恋的心理，在当时的赫鲁晓夫身上肯定是存在的。我们难以肯定的只是他到底是要取得权力去进行改革呢，还是仅仅以非斯大林化为途径而获取至高无上的权力？

不过，至少在客观上，这两者是互为目的的：赫鲁晓夫登上了教皇之一的宝座；同时也为斯大林式的极权统治敲响了丧钟，为几十年来艰难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拉开了序幕。

赫鲁晓夫要向斯大林留下的帝国挑战了。他的第一个战役，便是我们开始提到的1956年2月24日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紧接着，大规模的平反开始了。释放了几乎全部政治犯，为1935—1955年死于集中营和监狱的绝大多数人恢复了名誉。

赫鲁晓夫亲自下达指示，成立了近百个特别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包括一名检察院代表、一名中央委员会代表和一个早一些获得释放和平反的党员。这些拥有充分权力的委员会，从莫斯科直达所有的集中营。他们仔细地审查各个案件并迅速予以解决：看申诉书，和犯人谈话，然后宣布释放。

到1956年8月，全苏有几百万人获得了自由。

大恐怖时期的受害者死后得到了平反，数百万囚犯重返了家园。这是赫鲁晓夫全面改革的前奏，它对国内的影响，不亚于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

赫鲁晓夫是共产世界的一位有争议的伟大人物，对他的是非功过的评价十分困难。但没有人能否认他在控诉专制暴行和医治历史创伤方面的成绩。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却没有清除历史的罪恶。除了对斯大林的谴责和贝利亚的处决，赫鲁晓夫没有进一步追究政治责任，更没有从制度中寻找造成这种政治恐怖的根源。他未能认识到斯大林的真正权力是通过秘密警察行使的。几十年来，警察恐怖已经在政治上粉碎了无产阶级、消灭了它的先进骨干；最后，秘密警察控制着党、政府、军队直至社会各领域，甚至连最高领导人的政治生涯和家庭生活都摆脱不了秘密警察的控制。

在苏联，从30年代起，政府主要官员以及他们的所有家属的生活费都是由国家支付的，而且标准早已远远超出了列宁当年所规定的、苏维埃政权的官员的收入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工资的规定——他们的家庭开支、汽车、别墅和大量的服务人员都是无限制地由国家资金开销。

问题就出在大量的家庭服务员身上。

按斯大林亲自批准的制度，领导人家里的工作人员必须是国家公安部雇员。斯大林的女儿说这些工作人员给他们家造成一种“官式的、甚至是准军事的气氛”，使他的家庭生活“受到秘密警察命令的支配”。她说，这种情况在政府的主要成员、至少是政治局成员的家里都存在着。

这些家庭由政府官员来经管，而“这些人员夜以继日地严密监视着他们的主人”。这些属于警察部队的工作人员，在各个领导人周围形成一个特殊品种的“宫廷”，无形中成为凌驾于他们主人之上的主宰力量。

从1919年就跟在场大林身边的一个警卫员尼可拉·符拉西克，目不识丁，粗鲁不文，最后竟然成了一个在幕后操作大权的人——没有他的批准，苏联大剧团的盛大演出居然得不到允许；他甚至向文艺界的著名人士发出关于电影、歌剧、小说，甚至正在建筑中的一些建筑造型的“忠告”或指令。

赫鲁晓夫没有从制度上消除控制了社会的、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机构，但至少除掉贝利亚之后，秘密警察对党和军队的控制削弱了，而在大规模的平反运动中看到了野蛮的政治恐怖后，赫鲁晓夫已经意识到使秘密警察不敢越轨是何等重要的大事；同样，在处决贝利亚和大规模平反之后，“人们才开始过另一种生活，才开始呼吸得比较自由一些了。”

对普通老百姓是如此，对政府委员也是如此。”

专制统治需要秘密警察，而警察力量最终将成为社会的统治力量，连统治者自身也难以逃脱秘密警察的控制。这是被所有专制国家的历史证明了的。

三

1957年6月，党章地一次战胜了长官意志，100多人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战胜了11人的主席团……

1956年，对个人迷信及大规模政治恐怖的清算，在苏联国内和东欧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匈牙利、波兰，甚至因为对斯大林及其在东欧的追随者的清算，而造成重大的社会动乱。

这些，都给赫鲁晓夫的政敌——苏联最上层的斯大林分子以攻击的借口。他们把东欧动乱的责任推到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政策的执行上，认为给了人民太多的民主才产生了来自下层的政治压力。

赫鲁晓夫的地位变得虚弱了。在“匈牙利事件”前后半年的时间内，鲁晓夫保持着沉默。在一些公开场合，他都一再宣称，表明自己是一个比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还要坚定的斯大林分子。

对于一位政治家，我们或许应该原谅他的这种战略性撤退。

到1957年，赫鲁晓夫打破了沉默，从防御转入进攻。

几个月前，赫鲁晓夫曾提出对经济管理实行权力下放的计划。这是赫鲁晓夫最早的改革设计之一。这项改革措施为赫鲁晓夫在上层官僚中树立了新的反对者，因为对经济实行权力下放威胁到他们的利益。

马林科夫、莫格托夫联盟利用了这些反对情绪，决定给赫鲁晓夫一个决定性打击。

这场斗争同样是戏剧性的。

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的几次关键时刻——1953年处决贝利亚，1956年“二十大”的秘密报告；这一次，1957年6月与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的斗争都充满了戏剧性。

赫鲁晓夫身上很少循规蹈矩、因循守旧、不露声色、老谋深算的官僚特征，他更象一位个性鲜明，善于即兴发挥的艺术家。所以，在他政治生涯的几次生死攸关的时刻，

留下的往往不是枯燥乏味的历史思考，而是趣味盎然的戏剧情节。

1957年6月17日中午，布尔加宁从克里姆林宫往赫鲁晓夫家里打电话，说要紧急召开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说应该与往常一样，预定主席团会议时间，他看不出为什么要在现在召开……

两人争执起来。

布尔加宁：“我们要求召开。”

赫鲁晓夫：“‘我们’是谁？”

布尔加宁：“在这里吃午饭的一些人。”

赫鲁晓夫：“根据党章和主席团惯例，不存在任何‘中央委员会进午餐集团’！”

然而，布尔加宁的要求仍很坚决，于是赫鲁晓夫来到了克里姆林宫。

在那里，赫鲁晓夫遇到了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和米高扬。

除了苏斯洛夫、萨布洛夫、基里钦科等三人不在莫斯科，这是整个主席团。

赫鲁晓夫仍然坚持刚才在电话里的态度。冲突立即就尖锐起来。

赫鲁晓夫坚持，这天不能开会，因为他要在今天接见一个匈牙利记者代表团，然后接见一名日本记者，这是事先已经安排好了的。

于是所有的人便质问赫鲁晓夫：为什么他一个人接见匈牙利人，要去大家也可以去。

赫鲁晓夫回答说：“可以，大家都去，如果主席团这么决定的话。只是整个主席团接见一个记者代表团是不正常的。”

赫鲁晓夫的意见没有起到作用。主席团果然作出决定：全都去，包括主席团候补委员在内。

可以想象得出匈牙利记者们被这种超规格的待遇弄得目瞪口呆、受宠若惊的样子。

6月18日，主席团会议召开了，由布尔加宁主持。会议谴责赫鲁晓夫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全国各地走动，插手对外政策；指责他发起在“牛奶、肉类和黄油的人均产量上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运动。说这是冒进，是为了在国内外出风头。

马林科夫一派现在占了绝对优势，他们提议莫洛托夫为党的第一书记、马林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而赫鲁晓夫应该辞职。赫鲁晓夫方面只有米高扬一人支持，处于2对6的劣势。

后来，最初缺席的苏斯洛夫等3人赶到，形成4比7，情况并未根本逆转。

赫鲁晓夫的策略是，竭力干扰主席团作出决议，以便争取时间，动员中央委员会。

赫鲁晓夫的策略成功了。会议继续进行，赫鲁晓夫的几个支持者——没有表决权却有发言权的主席团候补委员——朱可夫、勃列日涅夫、福尔采娃纷纷发言支持赫鲁晓夫。

后来当了赫鲁晓夫的文化部长的福尔采娃作了一篇长达6小时的发言，以拖延时间；同时，赫鲁晓夫动员了以科涅夫元帅为首的20名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前来要求出席主席团会议。

这批人在主席团会议室等着，而主席团里的斯大林主义多数派则攻击赫鲁晓夫，说这是施加压力，是分裂党。

当时，老资格的伏罗希洛夫激动起来，他咆哮说：“你们还可把坦克调来！”

赫鲁晓夫以布尔什维克早期的传统来回答：那时，每一位中央委员都有权出席政治局会议。他质问：“你们为什么害怕中央委员？”

朱可夫元帅的回答更干脆，他说：“坦克是听我朱可夫的命令调动的，可现在在门外的是中央委员，而不是坦克！”

朱可夫没有调动坦克，可他却调动了国防部的喷气式飞机将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空运到莫斯科。

朱可夫元帅又一次证明了他祖国的救星，证明了军队在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又来了30名中央委员。但马林科夫等人仍然反对让这些中央委员列席政治局会议。他们决定由布尔加宁出去向中央委员解释；赫鲁晓夫不同意，他要求与布尔加宁一起去。

布尔加宁没有让中央委员们满意。接着赫鲁晓夫讲了话，他讲的主要内容是：中央委员会唯一有资格做出重大决定的机构，是最高权力机关！

事情拖延下来，变得对赫鲁晓夫有利了。

在以后继续进行的4天会议中，主席团收到了83名中央委员发出的一项书面要求——他们要求的不再是主席团接见他们，而是要求主席团到他们那里去报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事到如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联盟只好同意召开中央全会，并准备为在全会上争得多数而斗争。

这次全会一直开到6月29日。会上有60人发言，150人送条子要求发言，这是一次真正的中央全会。

这次全会的结果是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被宣布为“反党集团”。

1957年6月29日，斯大林时代在莫斯科无可挽回地结束了。党章第一次战胜了长官意志，130人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战胜了11人的党中央主席团。

赫鲁晓夫越过主席团直接向100多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求援，强化了这一组织的参政意识和权威性。这毕竟是斯大林之后苏联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这种从下面谋求理解和支持的做法能扩大到全体党员和全社会，那对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将具有决定性意义。

当然，在1957年，党的领导人从下面获取支持的行为也仅仅到中央委员会为止，在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全党和人民这个因素是不存在的。

这是历史的限度。谁如果试图跨越这个界限，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将受到惩罚。这一点被朱可夫元帅的免职证明了。

尽管朱可夫是赫鲁晓夫的盟友，尽管他在1953年处决贝利亚和1957年6月除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因他具有超越上述界限的可能而被解职了。

这是离6月胜利仅仅4个月后的1957年10月，朱可夫被撤职了——撤职的理由是，在六月事件时期，他曾对一些人说，必要时，他朱可夫要号召军队和人民同“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算账！

他可以利用军队和人民反对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也同样可以利用军队和人民反对赫鲁晓夫，问题就出在这儿！

赫鲁晓夫兼任了部长会议主席，集党政大权于一身，成为斯大林逝世后，第一个握有对党和国家绝对权力的统治者。

很少有人指责赫鲁晓夫竟然成了他所反对过的独裁者，那时，无论在党的上层，还是在人民中都没有考虑过运用民主政治来进行统治、或进行改革。用好的暴力反对恶的暴力；用为人民的极权来反对为个人的极权；甚至用清洗镇压来反对清洗镇压。那时，人们尚把斯大林现象看成个人问题，还不能对他们所看到的罪恶进行历史和制度的批判。

托洛茨基在1904年曾经预见到的那种情况，“党的组织取代了党本身，中央委员会又取代了党组织；最后，独裁者取代了中央委员会……”在斯大林时代已成为事实，所以在5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斯大林的去世和他的继承人下台便意味着制度的改变。

在六月事件之后，失败了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集团的成员卡冈诺维奇曾从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室打电话给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哭泣着对赫鲁晓夫说，他希望赫鲁晓夫曾大力谴责过的清洗、镇压、蹲监狱、枪毙不致于重演。

赫鲁晓夫回答冈诺维奇，之所以把他们清洗出中央委员会，正是为了避免重演这样的历史。

撤换了人便可以避免过去的灾难。赫鲁晓夫也是这么认识的。

当然，手段毕竟是有变化的——斯大林把不同意官方政策的人从肉体上消灭，这种做法除了对贝利亚，再没有使用过；1957年6月，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集团进行了整整12天的辩论，并且还把他们留在了党内。这毕竟是赫鲁晓夫对党的上层民主改革方面做出的一点贡献。

四

赫鲁晓夫总算将人为了革命，还原为革命为了人——尽管革命为人提供的还仅仅

是“土豆烧牛肉”……

在1956年，人民对赫鲁晓夫充满了敬意，因为他掀开了历史的铁幕，声讨了隐藏于其中的罪恶，并以令人敬佩的魄力医治了历史留下的创伤。现在，1957年，对他的敬意变成了希望——希望他能用已经获用的权力，给他们营造一个没有秘密警察、没有集中营、没有消费品极度匮乏的理想社会。

因为这些希望，人们不责备赫鲁晓夫又把集体领导还原为个人统治；相反，人民祝愿这位谴责过暴君专制的君主，能有更多的权力来进行改革。

人民的希望，是对政治家最大的支持，它可以在一瞬间把一位政治家推到事业的顶峰。所以，很少有政治家能面对着这股力量而不动心；然而它也是最危险的武器，它伤害和覆灭了许多使用它的政治家。

1957年，赫鲁晓夫就有同样的机会和危险。

赫鲁晓夫不愿意让人民失望，他要用幸福的许诺来偿还人民的希望和支持。

政治许诺象是政治家与人民签订的一份合同：人民给予政治支持；政治家给予幸福和富裕。但如果政治家不能在短期内实现合同、迅速交货，那么这份合同书极可能变成一把两边有刃的刀子。

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原动力，但这些美好的未来，遥远得犹如宗教里的天堂、来世。而现在赫鲁晓夫却许诺要在短期内实现。他想迅速交货——

赫鲁晓夫首先宣布要7年内超过美国的生产水平，然后他开始用最绚丽的色彩给他的人民绘制共产主义图景。

以下是赫鲁晓夫当政的50年代末期的设计：

在即将来临这个社会里，分工将被取消，人们可以自由发展个人才能并根据爱好选择职业；

按需分配原则将实现——从1975年起免费供应午餐，1980年起一日三餐免费吃饭；

一年四季免费供应衣服；

那时将实行社会自治，国家从而失去存在的必要性；

最令人头痛的住房问题将得到解决，人们将住进“公社宫”。每座“公社宫”的面积达4万平方米，居住2000到2500人。“公社宫”是人间天堂。它的底层是各种服务行业。由于那时已不需要货币，供求双方不再存在买卖关系。所谓服务行业，只是将人们需要的一切物品放在一楼，供楼上的居民任意挑选取用而已。二楼一部分做儿童室，一部分居住老人，三楼是已婚者住宅，四楼是青年和独身者的单身宿舍；

共产主义社会将改变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唯独家庭将得到持久性的稳固，一夫一妻将进入永恒不变的时期，那时，将不再有离婚，不再有私通，不再有那种今天同这个拥抱，明天同那个接吻的朝三暮四的人。

总之，那时的苏联社会将不会有不人道、不正义、不文明，将不会有愚昧无知、自私自利，更不会有暴力和犯罪。

一切都是美好的，令人惊讶的；然而，更加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切都不仅仅是远景、是规划、是在书本上谈论的马托邦。赫鲁晓夫要给他的人民一个“可以享受到的社会主义”！

1960年初，一位印度政治家问赫鲁晓夫，苏联何时才可以进入这种天堂般的共产主义时，赫鲁晓夫又一次显示了他的政治家魄力。

赫鲁晓夫回答：“我们有一切理由希望在1975年和1980年达到我们的目标。”

今天，当我们读到这种描绘和许诺时，惊讶肯定会变成嘲笑。但希望这种嘲笑是善意的、宽厚的——尽管时间已经证明赫鲁晓夫的许诺是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然而他毕竟建立了希望，毕竟将被颠倒了的目的又颠倒过来。

多少年来，革命为了人，已颠倒为人为了革命。人是革命的工具、螺丝钉。为了革命，人们流血、流汗、牺牲；还有无休止的斗争，无止境的奉献。革命成了目的，而人成为手段。

赫鲁晓夫给超过美国定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内容：“要在按人均计算的奶类和肉类生产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赫鲁晓夫没有笼统地讲总产值，因为产值的上升与人民的富裕并不必然成正比。高国民产值可以用来扩军，用来建立庞大的官僚警察统治，可以为特权阶层产生更多的特权。

人们曾经把挖苦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并把赫鲁晓夫的这个奋斗目标

作为修正主义的根据——因为他居然将世俗的牛肉与伟大的社会主义等同起来。这简直是对革命的亵渎。

然而，无论是“土豆烧牛肉”还是“公社官”都是以人为目的的。这至少比那种以崇高的政治目标，来掩盖对人民现实需要进行剥夺的欺骗值得称道；更主要的是，赫鲁晓夫曾经为这些许诺有过一番艰难的奋斗。

五

生产水平低下，农庄基层官僚腐败是赫鲁晓夫面对的农业现状。为了收拾这个烂摊子，赫鲁晓夫在6年内撤换了4个农业部长……

赫鲁晓夫从斯大林手中接过的经济遗产是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农业经济。

斯大林时代，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对农民实行强迫的集体化，农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农业问题成了社会不稳定和政治紧张情绪永久存在的根源。

农民是在流放和处决的压力下，被迫参加集体农庄的。因此，农民以拒绝努力生产的方式，对这种错误的政策实行报复。这种报复简直可以说是几十年来苏联历的一种灾难。

斯大林仅仅是靠非经济的手段、即以警察为依靠的专制政治，才使农业方面的错误政策长期保持下去。

到1953年，苏联人口比1913年的沙俄增加了20%，可粮食总产量和牲畜存栏数却与1913年相当。那就是说，50年代的苏联人比1913年的俄国人吃到的面包和肉要少20%。

这就是50年代初期的苏联农业现状。用赫鲁晓夫本人的话来说，“在农业方面，我们已经面临一个死胡同”。

赫鲁晓夫农业改革的动作是很大的——

发动了一个开发荒地的巨大运动：他动员了100多万人，增加了几十万台拖拉机，在亚洲的处女地上建造巨大的“粮食工厂”，使播种面积扩大了3500公顷；

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以增加农民收入；

允许并帮助发展私人畜牧业，以增加肉类产量；

降低农民私人所得税，以刺激个体经济的发展；

赫鲁晓夫农村经济改革的另一重大措施是将大型农业机械直接交给农民使用。

以前，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归国营的机器站所有，这些机器站为集体农庄工作，并得到实物报酬，它为国家取得相当一部分农产品；同时机器站也是国家对农村进行统治的工具，它代表官僚主义集团而与农民处于敌对的地位。国营拖拉机站成了架运转不灵的官僚机器，它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失，并提高了农业产品的成本。

因为这一系列的农业改革，西方新闻界称这个时期为“赫鲁晓夫与农民一起度过的蜜月”。

然而，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并没有获得成功。

数字是枯燥的，然而只有数字才能那么无情地说明问题。

1960年是苏联第6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它并没有完成计划所规定的指标；农业产量竟低于计划的25%；在1960年，集体农庄向国家提供的谷物竟比1953年还要少。

粮食减产，饲料不足，到1962年，由于没有饲料而大量宰杀生猪，结果使生猪头数降到1957年的水平之下，随之而来的是猪肉供应紧张。

“1963年赫鲁晓夫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急剧提高生猪的收购价格，肉价当然当然也随之上涨。”它的连锁反应是肉类、黄油、牛奶、蔬菜等副食品短缺，而且价格上涨。

没有什么能比这件事更能让赫鲁晓夫成为社会所指责的目标了。

这真是一个至今都有现实意义的思考题——这些很有意义的改革措施，得到的竟是相反的结果？

赫鲁晓夫曾经把国家对农庄的控制放松，给农庄以更大的自主权。强而，这只不过是把中央的官僚主义下放到各个农庄——下放了的自主权并没有交到生产者、即农民手里，反而进一步扩大了作为国家代理人——农庄负责人的特权。

在1958年，一些农庄的非生产开支，竟比生产开支还大；一些农庄主席的收入高出一个农民五六倍之多。集体农庄的干部已成为一个特权阶层，处处维护着他们的特殊利益。

官僚主义的腐败、弄虚作假也是农业改革的主要障碍。

1961年，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召开农业会议，对下级机构的某些官僚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无情地揭露：虚报成绩、虚造统计，大量屠杀小牛和奶牛来“完成”肉类生产计划，在市场上购买黄油、牛奶用来“完成”生产指标。

在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一位州委会的第一书记，居然号召各区的主席和集体农庄主席向店铺购买黄油转卖给国家，借以表明完成了生产。而正是这位第一书记，竟被提升为共和国内政部长。

直至赫鲁晓夫在给吉尔吉斯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中对这种犯罪行为予以揭露后，这个新任内政部长才被撤职，并被开除出党。然而在赫鲁晓夫干预之前呢？党纪和法律在官僚主义的犯罪面前起过作用吗？

下面是赫非鲁晓夫与吉尔吉斯第一书记拉扎科夫的对话——

赫鲁晓夫：你们所了解的情况只限于我的公开信里所提到的吗？

拉扎科夫：有些党员已经在会上提出过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在那以前，你们对这件事根本不知道吗？

拉扎科夫：我们知道，可是我们没有十分严厉的对待他的问题。

赫鲁晓夫：可是你们又任命他当了内政部长！难道你们竟认为对于犯罪的人最好的惩罚是委派他当部长吗？

赫鲁晓夫揭露官僚主义的犯罪，批评了包庇官僚主义犯罪的上级官僚主义；然而，他没法铲除官僚主义。

就如他把政治恐怖的罪恶归结到斯大林个人品质的残忍一样，他把官僚主义的腐败也归结为某些领导人的堕落和犯罪；

就如他谴责了斯大林、处决了贝利亚而并没有以民主和法律来取代警察对社会的统治一样，赫鲁国夫批评和开除了上述官僚主义者，却始终没有将官僚主义作为一个政治体制问题，而提到改革的议程上来。

他只是在处分人，撤换人，而没有从所有制方面进行改革，没有将生产资料——土地，从国家所有，还原为生产者所有。

赫鲁晓夫一定是接受了国家所有即社会主义的戒律，而没有认识到农民直接占有土地，才真正体现了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原则。

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既没有对所有制进行改变，也没有对官僚政治结构进行改革。

他改换的只是人。他当政6年，竟撤换了4位农业部长，最后让一个农场场长来当他的最后一任农业部长。

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六

赫鲁晓夫几乎将上下左右的人全得罪了——官僚阶层恨他是因为他的改革使他们失去他们正在过的生活；人民群众不满，却因为他的改革软弱无力，而无法使他们结束正在过的生活……

农业不是赫鲁晓夫进行改革的唯一部门。赫鲁晓夫也曾对官僚主义的、集中制的经济体制进行过改革。

集中制是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它要求企业和社会无条件地服从最大限度集中的统制制度。它决定生产和产品分配，因此它实际上也决定着生产者的命运，成为社会独一无二的调节者和主宰。

在这种集中制的统治下，一个人的职业、单位和报酬都由上级有关部门事先规定好了；甚至一个人小时候上哪一个幼儿团，老死后进哪一个火葬场，也都是由集中的统一计划所决定。

赫鲁晓夫的措施是实行广泛的分散制，扩大企业的自治和独立。

这是一个艰难而又无效的举动——

艰难的是，最上层的中央各部委不愿意放弃对企业的控制——那将意味着失去权力和权力所带来的许多特殊利益；

无效的是，下放了的企业的自治权根本没有交到生产者即工人手里，工人无论是给国

家干活，还是给“一长制”下的厂长卖力，都未能改变他们雇佣劳动的性质。

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由于这种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劳动者与劳动成果普遍分离的原因，而根本不可能对生产产生主人翁的责任感。

为了克服这个矛盾，取得了自主权的厂长、经理只能依靠强化劳动纪律、强化监督统计的手段来促进工业生产。这结果是进一步加强了“公仆”对主人的控制并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

因此，赫鲁晓夫的工业改革措施同样未能激发工人的创造性和劳动热情而改变苏联工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状况。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赫鲁晓夫更无建树。

他把执政期间的主要精力都投入经济改革之中。他以为消除了政治恐怖之后，只要有了面包和黄油，人便可以幸福了。他一定没有认识到人类的进步和解放，除了生存需要的满足外，尚有自由、尊严、创造等精神需要要求得到满足。

吃得再饱的奴隶也还是奴隶。

我们很少在赫鲁晓夫的改革词汇中找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字眼；我们根本没有在赫鲁晓夫的政治许诺中找到民主权利的条款。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依靠民主和法制来改造官僚政治。

这是赫鲁晓夫的局限，也是造成他的经济改革成效甚微，最后夭折的根本原因。

赫鲁晓夫只是在清除官僚主义现象和限制官僚特权方面有所行动：压缩部队开支，减少军官的薪金待遇；精简臃肿的官僚机构，批评官僚主义作风、制裁官僚主义犯罪。

对赫鲁晓夫式的改革，值得一提的是，他也对党的官僚化趋势作过开争，力图使党非理论化和非政治化——

1962年秋天，赫鲁晓夫把整个党分为两个组织：一个管工业、一个管农业。赫鲁晓夫的这一措施使苏联逐步变成一个技术专家党，并为政治官僚向技术官僚过渡做了准备，尽管都是官僚，但毕竟是一个进步。

赫鲁晓夫所有的这些改革措施尽管是有意义的，却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官僚政治结构，反而得罪了整个官僚特权阶层。

赫鲁晓夫精力充沛，总是不断地四处巡游，寻找他的下级的毛病。他生性活跃，总想进行新的改革，什么都想变个样。他的敌手得到地方保守的土皇帝的支持，他却受到那些苦于频繁变动的官僚们的压力，受到一心想保持常规部队地位的各军区司令的警告，因为他居然裁减军队，并让将军们去当农场场长；他竟然说“一辆坦克花钱太多。砰！砰！两声，坦克就毁了，钱和那些好样的小伙子们也全都报销了！”

这话让将军们和国防工业的领导人听了会是什么滋味？

所有的这些人——党的、政府的、军队的领导们都希望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希望保持常规和秩序，不要变动，不要轻举妄动。他们已经在动荡不安的斯大林时代生活了几十年，他们已经辛辛苦苦地革命了几十年，他们好不容易才得到今天的安稳和地位，为什么要来折腾呢？谁敢来折腾呢？

想到这一点，他们要眼红的，要拼命的。

赫鲁晓夫自然也感到了这些人的压力。（还是人的问题！）他愤怒过、反击过，然而这一次，这位体格粗壮，精力充沛的人，这位除掉了贝利亚又打败了马林科夫集团的最高主宰的反抗，却是那样的软弱无力。

赫鲁晓夫用新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来摧毁莫斯科的中央官僚机构，并把这些机构中的官员流放到边远省份。

斯大林在大清洗中几乎消灭了他所有的助手，赫鲁晓夫却将80%的经济管理人员调往外省。这些官员的家属也跟着他们到荒凉的外省去度过余生，为此，他们把赫鲁晓夫和他的改革变动恨得咬牙切齿。这样一来，当然不能指望这些人去加强地方的经济技术工作。

赫鲁晓夫对官僚机构所作的这点唐·吉柯德式的攻击，纯粹是白费力气。所有这些被赶到外省去的官僚，只要没有在改革之年给折腾死，最后都毫无例外地回到莫斯科，官复原职。这些措施只是加倍地激怒了整个官僚阶层，使赫鲁晓夫几乎跟所有的人都闹翻了——

他跟党的最高领导的成员闹翻了，因为他分掉了他们的权力；

他跟经济、技术大员闹翻了，因为他不断地改组机构，使他们失去了位置，失去了在首都的安逸生活。一个官员最不能容忍的使是不断地有新的工作和新的环境要他们去适应；

他跟将军们闹翻了，因为地缩减了他们的部队和薪金：

他跟基层官僚闹翻了，因为他老是窜来审去，去视察、去挑剔、去批评、去发火、去骂人——而斯大林从1928年起就没有视察过他的帝国。只要能躲过他的清洗和流放，官僚们便可平平安安的欺骗国家。想到这一点，斯大林时代毕竟还有值得怀念的地方。

赫鲁晓夫却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们什么都能容忍，就是一样受不了——那就是没完没了地巡视、检查。

所有的这些不满、干扰，反映在经济上是苏联社会的旧病重犯：消费品供应不足，食物短缺和持续的物价上涨，反映在政治上是赫鲁晓夫面临着失去各阶层支持的危险。

官僚保守势力反对是因为他要改革；人民群众不满却因为他的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的体制。他几乎将左派右派、上层下层全得罪了。

赫鲁晓夫的下台只是时间问题了。

七

这是赫鲁晓夫的最后斗争——他用水泥浆覆盖了斯大林的遗体；然而，赫鲁晓夫却未能覆灭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最终从无人看管的坟墓中走出来给他和他的改革敲响了丧钟。

1961年，赫鲁晓夫已经深深地感到了自己周围的危机。作为一位坚强的政治家，他决不战而退，他要再一次搏击，他的武器仍然是“非斯大林化”，他想以此来遏制日益复活的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势力，重新赢得他的黄金时代。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了。由会议主席团事先安排的会议议程决定，这次大会不涉及斯大林、也不提“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然而，当赫鲁晓夫于10月17日登上讲台时，他又一次以闪电般的突然袭击向全世界证明，他是一位多么善于制造伟大历史时刻的政治家——他重新提出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问题，而且更不留情面、揭露的规模也更进了一步。不仅斯大林，他那些亲密助手也被公开点名。

赫鲁晓夫发言的临时变动，在大会引起震动，几乎所有要发言的代表都赶忙改写已经准备好的发言稿，揭露斯大林及其同伙所犯下的罪行。

在这次大会上，列宁格勒、莫斯科、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代表团联合提议：将装有斯

大林遗体的水晶棺材搬出列宁墓，因为把它放在那里将是对列宁的亵渎、对革命的亵渎。

苏共二十二大闭幕前，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

“鉴于斯大林严重违背了列宁的遗嘱，滥用职权，对忠诚正直的苏联公民进行镇压，再将水晶棺保存在列宁墓是不合适的；斯大林在个人迷信时期的这些和许多行为已使得自己的棺木继续存放在列宁墓成为不可能。”

这个决议第二天就执行了。

1961年10月31日，当赫鲁晓夫宣布二十二大结束时，列宁墓已不再有斯大林的遗体。

斯大林的水晶棺被运到离列宁墓不远的地方。在那儿挖了一个很深的坑，水晶棺放进去后，又浇灌了好几大卡车水泥浆。幕上立了一块花岗岩石碑，上面只写着“J·V·斯大林1879—1953”。

搬掉斯大林水晶棺对世界的震惊不低于“二十大”的秘密报告。

水晶棺是那个时代的明证。斯大林时代比任何时代留给人们的敬意和畏惧都多。水晶棺象一张虎皮，即使挥挥这张虎皮也可驱散狗群，使他们只敢站在远远的地方怯生生地吠叫几声。

现在，人们可以放心地、公开地谈论斯大林和那个时代的罪行了。

“二十二大”结束后的几个星期之内，人们每天争相读报，因为二十二大所有的发言都公开见报了。

人们为每一件新的揭露所吸引，相比之下，这次大会新通过的党纲反而显得不重要了。

“二十二大”反对个人迷信及专制统治的公开化，给文学带来了繁荣：几百人以回忆录的形式，写下自己在专制统治下的悲惨经历，“集中营主题”的文学创作成为文坛主流。

这些都在政治上给了赫鲁晓夫支持，并给了他获得建立第二次丰功伟绩的机会。

然而赫鲁晓夫没有利用这个时机。就象这一次的文学繁荣再一次证明，文学拯救不

了社会一样，“二十二大”以后的事实又一次证明“非斯大林化”不能拯救改革、不能拯救赫鲁晓夫的失败命运。

“非斯大林化”仅仅是一面旗帜，它给予赫鲁晓夫的，是动员更大政治力量的可能，而不是力量本身；是挑战的机会，而不是胜利本身。赫鲁晓夫将“非斯大林化”当作唯一武器几番使用，甚至当作他的政治斗争目标，他没有以“非斯大林化”为武器，去达到“非官僚政治化”的目的。这是他的局限和致命弱点。

赫鲁晓夫的最后斗争必败无疑。

赫鲁晓夫是一个失败的改革家，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罗伯特·康奎斯特认为，赫鲁晓夫的失败，在于他没有采取足够的恐怖手段对改革的反对者进行惩处。

这是西方普遍的看法，即赫鲁晓夫一个致命的失误在于他没有象斯大林那样，对反对自己政策的人彻底加以消灭。官僚主义者在赫鲁晓夫时代最多会丢官，却很少掉脑袋。

这是事实。1937年，乌克兰党的政治局全体成员曾通过一项反对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政策的决议。几天后，斯大林发来了一封邀请书，请乌克兰政治局全体委员去克里姆林宫，对这项政策进行讨论。政治局接受了邀请，并一起前往莫斯科。

委员们一走进克里姆林宫，就被内务部一网打尽。后来全体政治局委员被枪毙了。

赫鲁晓夫没有这么做。这是时代的进步。斯大林将数百万他的真正的、和想象的敌人处以死刑，赫鲁晓夫只能把他的政敌开除出党或发配到边远省份，而勃列日涅夫却只能将赫鲁晓夫送到莫斯科郊区。

然而，这些事实并不能说明赫鲁晓夫的失败在于他没有采取恐怖——用暴力反对暴力不能消除暴力，用专制反对专制不能消除专制，用官僚反对官僚不能消除官僚。这个道理甚至在2000年前就被政治家所理解。

在意大利，当斯巴达克斯的起义队伍俘获了罗马贵族时，斯巴达克斯曾把两把匕首交给两位罗马将军，要他们脱光衣服为起义的奴隶表演角斗。

他说：“当初我们怎样，你们也要怎样。开始吧，至死为止的角斗！”

无论以道义还是以战争条律讲，这都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斯巴达克斯最得力的助手大卫却对此保持着深深的沉默。

斯巴达克斯走过去问：“难道让他们这样做没有道理吗？”

大卫忧虑地说：“对他们有理，对我们却有害。你可以采用他们的方式去惩罚他们，可受害的却是我们自己。别忘了，我们拿起武器正是要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除这种残酷的角斗。”

赫鲁晓夫犯的正是这样的错误。

也有人从赫鲁晓夫的性格中去寻找他失败的原因，说他在改革中表现得喜怒无常，反复无常，很少有精心设计和贯穿始终的改革措施。

这类指责从来是保守派对革新者进行攻击的惯用手段。改革策略只能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逐渐成熟。改革就是以多变的斗争方式去冲击简化了的社会结构、陈腐了的条文、章程以及保守的历史情性。

一项改革措施，如果真达到了成熟和一成不变的正确，那离僵化已经不远了。

赫鲁晓夫的改革之所以失败，在于他没有认识到一个腐败的政权要比一个堕落的统治者有更大的危害性；他没有认识到，真正能体现一个制度的，是那千千万万个中下层官员——即金字塔式的中央集权国家最底层的那个官僚阶层，而不仅仅是实行集权统治的最高领导人。

问题就在这儿。对最高统治者可能推翻、也可以批判——就象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加米涅夫，象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对最高层领导人可以撤职，可以开除——象赫鲁晓夫对“马林科夫反党集团”。

但谁也不能对几百万下层官僚进行清洗、开除和监督，赫鲁晓夫不能，斯大林也不能。

但人民可以、法律可以！答案就在这儿。

赫鲁晓夫没有找到这个答案。他把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作为他的主要任务；他以新的官僚制——即使是进了一步的技术官僚——而不是民主政治来改造官僚政治，他的失败，是一开始便注定了的。

赫鲁晓夫犯这个错误，是出于历史和阶级的限制——他始终未能与斯大林主义真正决裂。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评价赫鲁晓夫的改革时曾说过：“在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体系的同时，却完整无缺地保留了斯大林的体系。尽管他从民族的心灵上消除了这个恶魔，但他从未消除掉自己身上的斯大林主义。”

赫鲁晓夫用水泥浆覆盖了斯大林的遗体，却未能覆灭斯大林时代所形成的官僚体制。

60年代，曾有过一些优秀的苏联公民对此表示过担忧。如今还健在的、被称为“进步领袖”的俄罗斯诗人叶甫盖尼·叶甫图申科，在“二十二大”后曾以一首轰动一时的诗《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发出过警告：

大理石不会说话，

水晶棺在无言中闪光。

默立的哨兵、脸色晒得红黑。

当他们把他抬出列宁墓的大门，

几缕青烟在棺木上环绕，

一丝气息从裂缝中漏出。

棺材慢慢地擦过哨兵的刺刀。

他也不会说话，他也不会！

——他沉默长眠，

紧紧地握着他那经过防腐的拳头。

他只不过装死，

实际却在里面注视着……

他只不过是打个盹，他在筹划。

.....

诗人表示了这样的怀疑：

也许在他棺材里还有一部电话，

他还和各式各样的人用电话交谈？

诗人发出了呼吁：

我呼吁我们的政府，我请求他们，

派二倍、三倍的哨兵来看守这个棺材，

不要让他东山再起。

除了怀疑、呼吁、还有深深的忧虑：

我们已经把斯大林搬出了陵墓，

但我们又怎么才能

从他继承者的心里把他搬走？

不幸的是，诗人的忧虑不是没有根据的。“二十二大”后不过两三年的时间，斯大林一步步从无人看守的坟墓里走出来，给赫鲁晓夫敲响了丧钟，给改革也挖了一个和他在3年前得到的一样的坟坑——“到1964年，赫鲁晓夫的许多改革——不论好坏——全都废除了”。

八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政治家，当他告别了政治舞台，告别了人世时，谁也不能给他一个盖棺论定——连历史也只能保持着沉默.....

1964年10月1日，苏联3人宇宙飞船《上升号》在拜库诺尔宇宙中心发射前，赫鲁晓夫与3个宇航员通了电话，祝他们宇航顺利，并许诺在返航时，为他们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

赫鲁晓夫通完电话，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也给机组挂了一个同样的、属于最高祝福的电话。

这在等级森严的苏联来说，是一个异乎寻常的行动，一个微妙的、不祥的暗示。

“上升号”在飞行途中，赫鲁晓夫又一次用无线电话与宇航员通了话。结束时，他说了一句奇怪的、预言性的话“我要将麦克风交给米高扬同志了。他干脆是从我手中抢走的。我想我不能制止他。”

宇航员安慰他：“没有关系，尼基塔·赫鲁晓夫同志，您在地球上等着我们，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然而，当“上升号”用7天时间完成了绕地球17圈的航行返回地球时，赫鲁晓夫没有出席欢迎仪式——这次引起全世界注目的缺席，表明赫鲁晓夫已不再是苏共领导人了。

赫鲁晓夫选择这么一个时刻和场合，作为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并告别政治生涯，似乎是为了证明，飞船上天而改革失败；科技发达而政治落后的苏联社会，仅仅靠经济改革是无法进步的。

历史的画笔从1957年6月到1964年10月给赫鲁晓夫的统治者生涯画出了一个句号。1964年10月事件是这个圈的衔接点。这次事件表明，争夺个人权力的斗争在政治生活中形成了怎样的恶性循环。

1964年10月是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的终点。他的下台与他的上台非常相似，几乎是历史的重复。只是结局完全不一样。

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和克格勃头子谢列平利用主席团会议中的多数地位，与1957年一样向赫鲁晓夫发起进攻。

在这次秘密召开的主席团会议上，苏斯洛夫激烈地批评赫鲁晓夫的改革，陈述他的改革给苏联社会造成的政治、经济困难。

赫鲁晓夫故技重演，他用长达4个小时的发言为自己辩护，反对主席团会议作出决定；同时，他又一次象1957年6月一样，提出了召开中央全会的要求。

第二天，召开了中央全会，170名中央委员，居然有100名投了他的反对票。赫鲁晓夫再没有别的力量可以指望了。

10月16日，苏联塔斯社正式发表苏共中央1964年10月14日中央全会的决定——

“满足尼·谢·赫鲁晓夫同志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的要求。”

这位矿工出身的政治家退出了政治舞台。

西方为他们失去了一个争强好斗、浑身是劲而又捉摸不定的对手而松了口气。

共产世界的反应要复杂一些：有人为一个头号修正主义的下台而欢呼；有人为那场不彻底的改革突然断送而陷入深深的迷惘。

当然，这些都是60年代的反应。历史的评价要晚得多，一直到1987年，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才表示要重新评价赫鲁晓夫！

这当然也不是历史的最后发言；我们现在可以说的是——

这是位历史巨人，因为面对着历史，他敢于正视，敢于挑战，他让人看到了历史帷幕后面的罪行，而让半个世界产生了深深的迷惘和绝望。但他毕竟使血腥镇压的政治恐怖时代在苏联结束了；

他举起了理想和改革的旗帜，唤醒了半个世界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和希望；但他却辜负了这些信任，使人们再一次陷入绝望之中。

我们说他是历史巨人还因为他的许多行为都对历史的进程发生过影响；世界曾多次被他震撼过。

当然，这些影响和震撼并非全是积极的。

我们并不以成败来评说一个人的历史功过，成功的并不一定是伟人，失败的并非一定是罪人。如果从客观后果论，哪一个政治家不是功过多半？哪一个政治家在迫不得已的历史关头不是矛盾的、被动的？

只有一个政客才能在虚伪的帷幕后，扮演一个始终如一的伟人形象。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不能，赫鲁晓夫也不能！

所以，我们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看到的赫鲁晓夫完全是另一种形象。

1956年，当赫鲁晓夫从秘密报告中释放出来的政治力量，在东欧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反斯大林式的官僚专制，要民主改革的浪潮在波兰激起了工人的政治热情后，赫鲁晓夫竟然调动了3个纵队的坦克部队包围了华沙城。

他带领着华沙条约国司令科涅夫元帅、苏军总参谋长和十几位陆军上将、气势汹汹地赶到波兰首都华沙，干预波兰内政，干预民主化进程大有希望的波兰改革事业。

这次军事讹诈是在新上任的波兰领导入哥穆尔卡的强硬抗议下才退却的。因为哥穆尔卡坚持认为工人上街游行，不是反对社会主义！

哥穆尔卡说：“他们抗议的是我们社会制度普遍存在的、并且也是他们痛苦地感到的弊病，抗议的是对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歪曲。”

同一年，在匈牙利，赫鲁晓夫走得更远，他两次出兵匈牙利，并依靠苏联坦克给匈牙利建立了一个新政府。这是斯大林想做都没敢做的事……

1948年，南斯拉夫与苏联决裂，并公开宣布选择与苏联完全不同的道路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这曾激怒了斯大林，使他萌发过用武力惩罚共产世界叛逆者的念头。然而斯大林没敢采取的行动，被赫鲁晓夫开了先河，并给1968年勃列日涅夫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树立了榜样。

即使在赫鲁晓夫的支持者里，也没有人敢为他1956年在匈牙利的霸权行为辩护。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政治家，一个矛盾的历史巨人。所以，在1971年9月11日，当这位矮胖、笨拙、却具有牛的倔劲、野兽的意志的政治家，这位半个世界的领袖，这位给半个世界带来希望、也造成混乱的改革家，这位用自己的皮鞋敲打过联合国讲台的大人物，在失去政治生命10年之后郁郁地告别人世时，谁也不能给他一个盖棺论定——连历史也只能保持着沉默，而只在他的讣告中留下与他留给斯大林的墓碑一样简单的一句话：

“苏联领取特别养老金者尼·谢·赫鲁晓夫逝世。”



序篇：人·历史·梦幻

本文系作者大著《光荣的荆棘路—改革家们》序篇。

该书目录：

序篇：《历史·人·梦幻》（1.5万字）

第一篇：《掀开铁幕——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2.5万字）

第二篇：《走向绞刑架改革家——纳吉与匈牙利事件》；（3.5万字）

第三篇：《毁于领袖权力的波兰改革——哥穆尔卡的悲剧》；（2万字）

第四篇：《被勃列日涅夫扼杀的春天——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7万字）

第五篇：《华沙，社会主义新曙光——瓦文萨和他的团结工会》；（14万字）

作者：假如19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如马克思预料的那样，是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取得胜利，你会接受这个事实吗？

历史：至少我会少索讨一些代价。

作者：俄国人怎么得罪了您？

历史：他们竟然无视我的存在，而急于主宰世界。

作者：他们对您并无恶意，只是他们太苦了，不能再等下去。

历史：我专门惩罚性急的人。

作者：可您让半个世界的人付出了代价。

历史：为了让人们记住，惩罚不能不是无情的。

作者：我们愿意尊重您的权威。可是……恕我冒昧，难道我们不可以向您身上的惰性挑战？

历史：……（沉默）

—

疲惫而困惑的历史向列宁屈服了，它顺从地给了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1917年11月8日，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在俄国获得胜利的第二天晚上。列宁走上讲台，面对着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列宁耐心地等待着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停息下来。他用细小的、闪闪发光的眼睛扫射着人群，注视着历史。

此刻，人是激昂的；历史却萎靡不振——它被二月革命以来短短数月的巨变搞得疲惫而困惑。

列宁感到了人的力量——历史是可以被超越和战胜的。

他等待着，他终于可以向历史宣布了！他的第一句话是：

“现在，我们就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制度。”

列宁没能继续讲下去，他又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了。但已经够了，这一句话已经震撼了世界——近乎于狂热的欢呼和近乎于狂热的诅咒在世界各个角落发出。人类还从来没有如此地震撼过世界、震撼过历史。

列宁使世界和历史黯然无色。这是人对历史的一次空前胜利。历史屈服了，它顺从地给了人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奴隶们解放了，庆贺自己在一夜之间成了历史的主人。

或许我们会责备这种庆贺过于匆忙了，但如果想想他们在压迫和绝望中已经生活了几千年，他们当然有权为初次的胜利而欢笑、庆贺。然而，我们却不能不为他们的疏忽

遗憾。

他们从历史手中接过来的只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和社会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在国家长期站立着的地方，社会便难以挺立起来。

被驯服了的历史在这儿耍了一个小小的手腕，潜藏着一个东山再起的杀机。历史会妥协，会让步，却绝不投降。

几位杰出的人，在这次人与历史空前激烈的交锋之前，就对历史的让步有过不祥的预言，警告人们在与历史的角斗中，不要过于轻信轻易取得的胜利。

恩格斯在1850年这样预言：“一个领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时机还未成熟，为了这个阶级统治必须贯彻一些措施的时机还未成熟，而这个领袖在这种时期被迫出来掌握政权，这是最糟不过的事了……他所能做的事是和他一向的整个主张，他的原则，他的党的直接利益不相容的；他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实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七卷468-469页）

革命领袖的警告并未遏制住历史的报复。

二

列宁利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进行战斗，以制止半个世界的悲剧发生。

1922年12月23日夜晩，在与历史的搏斗中耗尽了精力的列宁第三次严重中风，他的右手和右腿都瘫痪了。列宁随时都可能离开人间，但他不愿离去，他的战斗尚未结束。

列宁要求允许他以口授的方式进行工作，要求每天给他5分钟。他的要求被拒绝了。

列宁提出最后通牒：如果不允许他每天口授5分钟，他将完全拒绝同医生合作！

于是政治局召开了一次包括医生在内的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列宁的要求。

到底什么迫切的事情驱使着列宁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要求这可怜的5分钟？列宁看到了历史隐藏着的杀机——苏维埃政权中暴虐的官僚制，以及将会利用官僚制实行专横统治的斯大林。

列宁要利用他所剩下的以分钟计算的生命，来完成他的最后斗争：改造官僚制；撤换斯大林！

列宁在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出那句想震撼世界的诺言已经5年了，可社会主义理想并未成为苏维埃社会的现实；相反，官僚制却深深地侵入，并牢牢地成为苏维埃社会的一部分，以至列宁在最后时刻谈到国家机关的官僚化问题时，认为“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

由于这种状况，列宁在临近安息的时刻而不能安息。

从1922年12月到1923年2月，列宁以口授的形式完成了《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五篇批评官僚制的文章。只有与数亿人命运相关的大事，才能使一个人产生如此巨大的意志力。

1923年1月4日，列宁着手处理他生前的另一件大事——在“遗嘱”中建议撤换斯大林。

列宁在遗嘱中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同志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

这确实是一件大事，它的严重性在列宁逝世后的几十年中表露得更加清楚——它改变了半个世界的命运。这些，列宁早就看到了，然而他却没能利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制止住半个世界的悲剧。

1923年3月10日，列宁最后一次中风，完全丧失了讲话能力，完全停止了他的战斗。此时，他年仅52岁，距1924年2月21日逝世，还有整整十个月。

列宁退出了与历史的角斗，把位置让给了他的继承者。

1924年5月21日，苏共在十三大代表会议前夕召开了中央全会特别会议宣读列宁遗嘱，并确立党的领导。

这次全会将决定斯大林的命运、俄国的命运、半个世界的命运；还有——历史的命运。

列宁的继承人里面，托洛茨基是最有威信、最强有力的人物。为了对抗托洛茨基的力量，斯大林与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加米涅夫和兼任共产国际领袖的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结成了同盟。

加米涅夫宣布开会，并宣读了列宁遗嘱。会场一片沉寂。

斯大林绷着脸，面色阴暗。接着，季诺维也夫发言，他庆幸列宁所担心的事没有发生——党的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都没有分裂。因此，他建议，仍然由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

斯大林一直皱着眉头，绷着脸，两眼直视着窗外，等待者决定他命运的时刻。

托洛茨基派的人反对这项提案。然而他们不是多数；更主要的是，作为这一派的首领托洛茨基本人，却以顽强的沉默表示出对这场喜剧的蔑视。他那有名的自信、自尊使他不屑于采用相同的手段去争夺权力。这等于放弃了战斗。

斯大林获胜了，保住了总书记的位置；然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胜利，换来的却是1926年斯大林对他们的死刑判决！

1926年，当斯大林解除他们的权力时，季诺维也夫曾经痛苦地回忆起这次拯救了斯大林免于毁灭的中央全会，共质问斯大林：“你知道什么叫感恩吗？”

斯大林回答：“我当然知道。那是一种狗的病症。”

到此时，历史与人的较量可以暂时休战了。历史和人都可以按照各自的轨迹和惯性，行进着……

三

赫鲁晓夫的报告震撼了人。1917年是对历史的胜利，1956年是历史对人的报复。顷刻之间人就失去了用整整两代人的生命去奋斗的目标……

1956年2月24日，在列宁对历史宣战39年之后，也是在苏联，也是在夜晚，我们看到了人与历史的又一次搏斗。

这一天，刚刚从苏共“二十大”选出的135名中央委员，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一中全会，代表们则准备收拾行李回家，因为“二十大”的闭幕式已经在当天举行过了。

可是临近午夜，所有的中央委员和代表又突然被召集到克里姆林宫。

作为党的代表大会，它的所有程序都是事先规划好的——它的大会报告、它的候选人，甚至它的选举结果——那么现在，这个严密的“计划政治”到底出了什么故障？

代表们紧张地期待着，预感到将有非同寻常的事件发生。

他们等来了一个身围肥宽的人，此人跨着无节奏的步子走上讲台。他两腿粗短，双肩壮实，显得矮胖笨拙。但他有一双和列宁一样细小而敏锐的眼睛，这是一个有着巨大生命力的人。

此人正是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

然而，他的战斗方式却与列宁毫不相同——列宁面对着世界、面对着历史，用他那慷慨而宏亮的声音，发出了对历史的挑战；而现在，在这深夜的密会上，这位厚嘴唇、狮子鼻、高颧骨的人，却是诡秘而胆怯的。他悄悄地告诫与会者，他现要作的报告，“不能拿到党外去宣传，更不能到报刊上去发表，应当知道分寸，不应当向敌人提供弹药，不要向敌人宣扬我们的家丑。”

赫鲁晓夫开始了长达7小时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的题目是《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内容是谴责被他称为“历史上最凶暴残忍的罪犯”斯大林。

默默听着的苏共代表们惊呆了，因为十天以前，也就是2月14日“二十大”开幕式上，全体代表和来宾还肃立默哀，悼念他们的“父亲和导师”斯大林。

赫鲁晓夫有一双非常小的手。然而这位喜欢挥舞着小手的政治家却有着异乎寻常的力量，他居然掀动了历史的铁幕，让代表们看到了幕后的世界。

那真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世界——那个人类第一次从历史手中争取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个作为共产主义世界当然领袖的国家，原是一个靠个人独裁和政治恐怖进行统治的国家！

那是一个世界上中央集权程度最高的国家，这个两亿人的国家只有一个脑子——斯大林的脑子！

在那里，保安力量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秘密警察成为独裁者斯大林的主要支柱和权力工具，他利用这个权力工具犯下了使历史上任何一个暴君都相形见绌的罪行！

赫鲁晓夫在公布一系列血腥的数字：“苏共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98人，即70%在1937—1938年被逮捕和处决了。”那次党代会的1996名代表，有1108名，因“反革命活动”而遭逮捕枪决。

这次大清洗也没有放过军队。5个元帅被处决3个；全部军区司令员被清洗；海军和空军首脑被枪决；所有的舰队司令员只有一人得以生还……到1938年，红军师以上的干部只剩下39%保留住原职。

被镇压的还包括列宁时代的几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李可夫。政治局中得以幸免的，只有斯大林的亲信米·加里宁和维·莫洛托夫。然而斯大林却下令逮捕了他们的夫人。

在列宁建立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人民委员中，竟有9人死于斯大林的大屠杀，而幸免的6人中，除列宁和斯大林自己，其余4人都是在大清洗之前去世的；因此，可以说，斯大林枪毙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全部人民委员。

那么，清洗只局限于上层，只涉及到斯大林的政敌吗？不，政治恐怖从来是针对全体被统治者的。

在30年代，斯大林为了强行推行他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竟使150万农民被枪毙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斯大林为了使农民屈服，接连两个春季不给富农和未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民发放种子。农民无法播种，被迫流入城市，沿路乞讨，饿死街头。农民屈服了，加入了集体农庄。

这是一个领袖对自己的人民所发动的战争，人们第一次因为自己的出身而遭到杀戮，被杀户全家被迫迁出，其子女不许在高年级学习。

被斯大林直接戕害的共产党人有70万——且不说被枪杀、流放的成百万其他的人——这个数字比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问世以来，各国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人加起来还要多。

与会者惊呆了，世界惊呆了，只有历史在暗中窃笑。

如果说列宁在1917年的宣言震撼了历史的话，赫鲁晓夫这一次的报告却震撼了人；1917年是对历史的胜利，1956年是历史对人的报复。顷刻之间，人们就失去了理想、希望和用整整两代人的生命去奋斗的目标，只剩下人的疲惫和困惑——就像1917年历史曾经疲惫和困惑过一样。

这一次历史是清醒的，它迫不及待地宣告自己的胜利——赫鲁晓夫作完报告的当天（已经是25日凌晨了）国外就报道了苏共秘密会议举行的消息；几个星期后，美国国务院放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全文的英文文本。

共产主义面临着它有生以来最深刻的危机——全世界所有的敌对阶级和敌对国家都猛烈地攻击共产暴政。

共产党人在这意想不到的打击下沉默了——因为打击来自内部，来自事实。

四

西欧的共产党垂下了头，共产党的东欧面临着灾难性的风暴。1956年是共产党人的灾年；同时，1956年又是人对历史的又一次挑战——艰难而漫长的社会主义改革就要开始了……

当西欧各共产党在秘密会议上传达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共产党人被其中许多惊人的情节而惊呆了。

一位西德的年轻共产党员曾经描写过当时的情景：

我们在莱比锡市议会的地下室感受到最初的震惊。我们十几个人蹲在一起，为刚才听到的本情而目瞪口呆。一切话都是压着嗓子窃窃私语的，似乎有点难以置信不可捉摸，如果大声重复这些话，那就难以使人忍受——多么矛盾啊！

有人在宣读秘密报告中那些绝望的共产党人从监狱里寄出来的信，是斯大林把他们投入监狱的。人民在极权统治下生活了20年多年！这一切果真是真的吗？不可能这样！斯大林是我们力量的体现者，是力量的象征，是朋友、卫士、远方的父亲、是革命的化身，他无所不知，慈祥而正直；而现在的斯大林，难道是一个暴力狂、迫害狂、偏执狂？难道他嗜好虚荣、个性恶毒，是一个卑鄙的独裁者？不可能！我们站起来去街头漫步。我们仿佛在梦幻中，神容憔悴……

西欧共产党人曾经把斯大林当成革命的象征。现在，一切都动摇了、失去了，他们恍恍惚惚、若有所失。他们低着头，躲避着资产阶级政客们咄咄逼人的攻击。

东欧共产党人的处境更加尴尬。

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贝鲁特曾被邀请参加了2月24日晚上的会议。赫鲁晓夫作完秘密报告后，要贝鲁特表态。

贝鲁特不知所措，无可奈何地说：“我们怀着悲伤的心情得知斯大林做坏事的消息。波兰人民那么感谢斯大林，感谢他的智慧和援助。”

这种在赫鲁晓夫突然袭击下的惊惶失措、无可奈何，是整个共产党国家的普遍情绪。

东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竭力挡住这股冲击波，他们不公开刊登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他们只是改换了几个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街道，撤换了几个特别受牵连干部。

东欧沉默而紧张，因为在那个地区，斯大林式的政权还继续着它的统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与斯大林、斯大林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这种沉默形成对比的是人民的骚乱。人民从西方广播中听到了全部事实真相后，他们愤怒了——西欧共产党人失去的仅仅是理想，东欧人民失去的却是现实、是几代人的代价——

神话被破灭了，

他们向我们大嚷大叫：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咬破手指是不疼的。

人们咬破了手指，

人们感到疼痛。

人们失去了信仰……

它是靠空话过活，

纵然有说教，生活却越来越野蛮。

这首充分表现了人民觉醒的诗，是波兰诗人瓦齐克写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瓦齐克曾经是斯大林主义桂冠诗人。当然，最早的觉醒者，付出的代价总是最大，瓦齐克因为这首诗而被波兰作家协会开除了。

人民愤怒了：他们把斯大林的巨型塑像推倒。斯大林的塑像被人们吐上唾沫，被砸成碎块。人们开始公开讨论斯大林的专制独裁，讨论斯大林主义的全部标志——党内生活泛化；国家政权日益成为奴役社会的力量，政府机构变成恐怖主义的独裁机关。

西欧的共产党低下了头，共产党的东欧却面临着灾难性的风暴。1956年是共产世界的灾年。

1956年，即使顽固的斯大林主义者，也很少有人敢于为斯大林的极权统治辩护。人们为赫鲁晓夫披露出来的个人迷信、专制、政治恐怖所痛苦、愤怒，并且不自觉地把这一切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

在资产阶级看来，赫鲁晓夫是给了社会主义当头一棒的英雄；在执政的共产党人看来，赫鲁晓夫是制造混乱和灾难的祸首；对经历了极权统治的人民来说，赫鲁晓夫无疑是争取法制、民主的先锋战士；对历史来说，赫鲁晓夫是它的胜利宣告人……

然而，他们都没有从赫鲁晓夫的行为中看到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另一面——

资产阶级没有看到，这次揭露给重建社会主义所带来的一线希望；

执政的共产党人没有看到，如果没有这种检讨和揭露，在共产世界潜伏的危机将会加深而造成更加难以控制的局面；

经历了极权统治的人民没有看到，比揭露和打倒斯大林及其在半个世界的追随者更加艰难的，是对体制的批判和改革；

最后，因为取得了胜利而洋洋自得的历史没有想到，赫鲁晓夫的这一举动将在半个世界的范围内发起对历史的又一次挑战——艰难而漫长的改革就要开始了……

当然，这些都是若干年以后才有的认识；1956年，有的只是盲目的欢呼和盲目的消沉。人没有明白，历史也没有明白；那时，很少有人思考过这一问题：产生这一悲剧的原因是什么？这些罪行到底是社会主义犯下的，还是一个蜕变了的政权非社会主义化的结果？

人们没有冷静思考，却匆匆接受了这样的答案——斯大体和苏联的官僚制是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合法继承者；斯大体现象是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注定的结果。

这是资产阶级的答案，他们企图使革命和社会主义威风扫地。

这个答案使许多人对社会主义产生绝望。

在1956年，尽管在共产党内，少数最优秀的人士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已经被斯大

林的政治恐怖和官僚制所埋葬，必须以最彻底的改革精神重建社会主义，但他们面对的是对社会主义抱有怀疑和绝望情绪的人民，以及对斯大林现象仅仅进行个人谴责的上层保守势力……

改革家的困难可想而知。

然而，既然铁幕已经掀开，人们便不可能面对那种触目惊心的罪恶而无动于衷——这就是人之所以是人，人之所以能进步的原动力。

人在与历史惯性的对抗中，尽管并不是每次都以胜利告终，但却从未放弃过斗争。

在这场战斗中，冲在最前面的，成功的希望最小，因为他们必须孤军奋战，必须带着历史对他的束缚去攻打历史……

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失败才有更深的意义和更大的价值；

正因为如此，我们同样把改革家的称号送给那些失败了改革家……



走向绞刑架的改革家——纳吉与匈牙利事件

纳吉：没有人民的行动就没有1956年的改革。

作者：1956年是失败的年月。

纳吉：悲壮的失败。

作者：这是一回事。有人说，人民给您帮了倒忙。

纳吉：对于社会主义，我苦苦思索了一生，却没有在1956年10月短短几天里得到的理解深，我与官僚政治苦苦斗争了一生，却没有在1956年10月最后一周取得的成果大。我为此而感谢人民。

作者：您至今不悔？

纳吉：不，从1949年到1955年，我两次失败，因为我企图靠权力斗争来实现我的改革思想。

作者：1956年您依靠民主力量进行改革，而失败却更加惨重。

纳吉：那是因为在改革的敌人背后，有另一个大国的武装力量，在这个武装力量后面，还有更难跨越的历史障碍。

作者：对了，对了，正是人民的狂热才把您推到了历史所不允许的地步。那一次，您走得太远了，以至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

纳吉：您是指取消一党制？

作者：是的。

纳吉：您是指实行普选？

作者：是的。

纳吉：我为我经有过这些政绩而骄傲。

作者：一位社会主义政治家的的骄傲？

纳吉：社会主义的。难道一个社会主义者竟然害怕让更多的社会阶级和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国家的管理？

作者：人民的参与会造成混乱；无论怎么说，1956年匈牙利流血了。

纳吉：不为民主流血，就会为专制流更多的血！

作者：除此，别无选择？

纳吉：有，再付出两代人的代价！

作者：……（沉默）

—

匈牙利悲剧的13天震撼了历史，分裂了共产世界。流血的双方都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战斗；胜利者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审判，失败者在临刑前呼喊，社会主义万岁。

1956年是共产世界的灾年，重灾区在匈牙利。

1956年10月23日到11月4日，13天时间，匈牙利内政两次受到外国军队的干预；有上百万公民死于动乱；两次撤换和推翻国家首脑。

这13天内，匈牙利宣布过解散共产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宣布过取消一党制；宣布过退出华约组织；宣布过中立。

这13天内，它的一届政府向联合国呼吁，要求给予援助以保卫它的中立；而另一届政府却致电联合国，坚决反对把匈牙利问题提交安理会或联合国大会讨论……

这13天震撼了全世界——联合国成立了匈牙利问题特别委员会；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都发表声明，对这13天进行表态……

一位政治家甚至说过“只要你告诉我对匈牙利事件的态度如何，我就可以判断你是什么样的人。”

这13天震撼了历史，使它无法再以半个世纪形成的惯性力量来主宰这半个世界了。

这13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很简单，学生和工人上街游行，要求一位政治家执政，要求另一位领袖下台；他们要这样的改革，反对那样的体制。这种介入和干预造成了骚动和流血、死亡……

如此而已，尽管严重，但自从有了政治，这种动乱就在所有的国家发生过。

然而，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骚乱？历史会给这13天一个什么样的定性呢？

美国共产党说，匈牙利事件使它“碰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问题”。

面对这个难题，有着共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共产党，却有完全相反的立场和态度

——
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说：匈牙利事件“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民族革命’，而是反革命”；

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铁托说：“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进步的愿望和国家与政治领导机构的活动之间产生了矛盾，最后导致武装斗争的爆发”。

荷兰共产党中央说：“这次事件是一场暴动，一场企图以武力来摧毁和玷污匈牙利人民民主新政权的事件。”

美国共产党说这是“一种争取民主化、争取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和争取在他们同苏联的关系中取得完全的国家主权和平等地位的人民起义”。

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说：“帝国主义者和他们指使下的匈牙利国内外反革命分子……利用人民正当的不满情绪，发动了武装暴乱，企图摧毁匈牙利人民社会主义制度，企图恢复资本主义和法西斯的恐怖统治。”

如果再加上西方国家的宣言和声明，这个复杂的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只能从

许多声明中寻找这样的相同点——这是一场灾难，一个悲剧。

这悲剧的13天，这难以评说的13天是伊姆雷·纳吉执政的。

纳吉于1956年10月23日由人民拥戴上台，成为半年来匈牙利第三位国家领导人。13天后，纳吉和他的政府被推翻；一年后，为了追究他当权13天的责任，他被处以死刑。

看到这儿，或许读者会认为这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复辟事件——社会主义的匈牙利被武装暴动颠覆，后来复辟被粉碎，反革命头子纳吉被处以死刑。

然而，这样理解过于简单——因为纳吉在绞刑架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二

拉科西是斯大林的优秀学生；匈牙利是斯大林牌的社会主义。拉科西也采用了最有效、最省力的统治手段——政治恐怖。

共产党在匈牙利执政的历史并不长，扣除战后头几年与其他政党共同执政的联合政府时期，共产党的匈牙利不过7年历史。但由于匈牙利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最优秀的学生”拉科西·马加什照搬斯大林的统治方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强迫农业集体化，用政治恐怖推行极权统治——把一个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原封不动的搬到匈牙利，7年时间倒是绰绰有余了。

它的灾难性后果是“基本食品和许多日用品凭票供应。经常调整劳动定额意味着降低工资，年年发行和平公债，实际上就是苛捐杂税。1954年职工的实际收入比1949年下降20%。”人民怨声载道，只是迫于政治恐怖才不敢进行反抗。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发动的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然袭击，一下就粉碎了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神话。这在匈牙利引起了巨大震荡——讨论经济政策的错误，揭露政治恐怖的罪行并追究责任。

1956年7月，拉科西被解除第一书记的职务，由他的第一副手格罗接替。

拉科西是1956年第一个被赶下台的领袖，但不是最后一个。

新上任的格罗并没有带来新的施政方针。他不可能与过去决裂。作为拉科西的得力

助手，他同样对过去的政治和经济错误负有责任。所以1956年7月，当那位被称为“匈牙利的斯大林”拉科西下台并于第二天去了莫斯科时，格罗只是以一份拉科西因“患了高血压症，必须离职休养”的公报，就轻松地把拉科西过去对人民的欠债一笔勾销了。

群众的不满情绪迅速增长，尤其是对新任领导迟迟不给恐怖时代的受害者平反反应强烈。

在许多重大冤案中，拉伊克冤案成为全国议论的中心。

拉伊克是前政治局委员、内政部长、外交部长、人民阵线主席。这位1909出生的文学院院长学生，早在30年代初期就从事着党的组织和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他是青年和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因为拉伊克了解他们并同他们有共同语言。40年代起，拉伊克就是匈牙利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8年斯大林与南斯拉夫决裂，于1949年通过共产党情报局批判南斯拉夫并形成决议，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复辟资本主义，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这一事件在共产世界造成危机，使东欧各国内政发生急剧变化。

拉科西利用这一事件在匈牙利掀起清洗铁托分子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镇压运动。拉伊克是这次运动的受害人。他被指控为美国情报机关的代理人、南斯拉夫间谍和特务。这个案件中涉及到的国防军将军、警察部队军官还被安上企图暴动的罪名。

1949年5月，国家保安局对拉伊克的逮捕，意味着匈牙利开始了专制和政治恐怖时代。1949年9月20日，拉伊克被判处死刑，10月被绞死。

拉伊克一案牵扯到8个匈共高级干部，其中5人被判死刑。

紧接着，全国展开了清查“铁托分子”、“拉伊克分子”的大规模清洗运动。被捕被杀者竟有20万人之多。匈牙利进入了历史上的黑暗时期。

斯大林是在十月革命20年后，才把社会主义苏联抛入政治恐怖的深渊，而拉科西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他的血腥暴政。

他真不愧为“斯大林的优秀学生”。

在那个恐怖年代，许多蒙受冤屈的人被打成残废，精神被彻底摧垮。

拉伊克——这位多次蹲过敌人监狱的老共产党员，这位多次领教过警察特务各种审讯、拷打而从未屈服过的老地下工作者，在拉科西的保安局的摧残下，精神完全崩溃了。他站在扩音器面前，毫无表情，嘴里不停地念着别人替他捏造的口供：他是美国特务，是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走狗，他准备搞政变，他要谋杀共产党的领导人……

在1938年的苏联，我们也见过相同的场面：布哈林在法庭上，也承认了他是帝国主义间谍的指控。

到底是什么手段能使共产党的保安人员达到连法西斯暴徒都难以达到的目的——迫使如此优秀的人物就范？

这是一个迷。

看到这些令人尊敬的领导人被剥夺了尊严、信仰，精神被彻底摧垮后，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还能在夜里睡得安稳；没有一个正直的公民还敢说出一个正直的人应该说的话。这正是政治恐怖制造者的目的——恐怖气氛可以使统治者睡得安稳，可以使他为所欲为。

在那个时代，许多人未经法院判决，就被隔离拘留，富裕市民及其家属被迁出首都布达佩斯并没收了他们的住宅和财产。在农村建立了类似黑名单的富农名单。“提高警惕性”成了主要的政治性要求。人民在经常出现的“抓敌人黑手”的威胁下，对统治者的暴虐保持着沉默……

政治恐怖是最有效，最省力的统治手段。

三

平反——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是为了埋葬一个时代。

人民要为拉伊克平反，要为那个时代数十万受害者昭雪，并要求追究政治责任。

在1956年的匈牙利，人民曾经提出要直接责任者以命偿命的口号。

这是匈牙利人的远见，他们并不满足仅仅可以自由呼吸，而是要求向那个时代永远告别。比起一年前苏联人的平反运动，1956年匈牙利人民则有更强的历史批判意识。

如果没有对过去罪恶的声讨和清算，一代人的牺牲便成了一场毫无意义的灾难。

为了拉伊克案件的平反，由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的裴多菲俱乐部召开了两千人大会，声讨拉科西时代的罪恶，敦促格罗检讨并结束靠政治恐怖所维持的专制时代，为民主化进程拉开序幕。

在这次大会上，拉伊克的遗孀、前全国妇联秘书长、律师尤莉奥·拉伊克揭露了她6年监狱生活的非人遭遇，以及拉伊克被处死前所受到的骇人听闻的摧残。她的演说使全国为之震动。

在这种普遍愤怒情绪的迫使下，格罗立即将300名“铁托分子”释放出狱，并正式为拉伊克平反。

但格罗不愿意为拉伊克举行隆重葬礼。他在政治局会上不耐烦地打断关于这项提议的发言，说不知道遗体埋葬在什么地方。

经过一个由受害者家属参加的小组的彻底寻找，终于在通向巴拉顿湖公路旁的一个小树林里发现了拉伊克的遗骸。

党内反对派和拉伊克的遗孀尤莉奥·拉伊克坚持要举行国葬，并要求允许群众参加。最后，匈共中央决定：于1956年10月6日隆重安葬拉伊克·拉斯洛和其他烈士的遗骨。

10月6日是一个划时代的日期，它证明拉科西和他的继任者无法逾越牺牲者的遗骨，它证明历史终将为牺牲者的生命和无边苦难索讨报偿。

受害者的遗体将把不受法律制约的专横阻隔在10月6日，并愤怒地拉开了匈牙利事件的序幕。

10月6日，匈牙利为拉伊克等4名原党的领导人举行国葬。

布达佩斯有30万人排着长队静静地向饰有鲜花的4口棺材致哀。守灵者每隔5分钟换一次。

当轮到政治局委员们守灵时，顿时狂风大作。在这种肃穆悲愤的时刻，即使是坚定的无神论者都会认为，这是亡灵在对黑暗时代参与过非法审讯拉伊克、当今仍留在政治局的人表示愤怒。

人们的注意力落到了这些人身上。

接着是送葬。30万人的悲愤组成了一次无声的反政府示威，30万人的沉寂使空气变得象铅一样沉重。它压迫着几十万颗心脏，只要稍加一点压力，空气会爆炸。人群会爆炸，匈牙利会爆炸。

走在送葬队伍最前面的两个人是，拉伊克夫人和纳吉。

纳吉就是在这种时刻回到人民中来的。

四

伊姆雷·纳吉——这位布哈林的学生，在政治斗争中失落一次，在人民中的威信便增高几分。现在，他既无官衔，又无党籍，但在1956年的匈牙利人眼里，他是一个救星，一位能体察人民痛苦，而又多次为之献身的英雄。

1956年10月6日，数十万匈牙利人把拉伊克的棺材送往墓地。他们用深深的敬意和哀伤埋葬受害者的同时，也用无声的愤怒埋葬了那个时代。

在匈牙利人看来，拉伊克葬礼象征着旧制度的覆灭；同时，布达佩斯人并不仅仅满足于过去的终结；在普遍哀伤、愤怒的情绪中，尚有小心翼翼升起希望——迎接一个新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为了这个希望，几十万人都注视着走在送葬队伍最前列的伊姆雷·纳吉。

纳吉仪表庄重，中等身材，体型肥胖。一副学者式的夹鼻眼镜赋予他一个教授、一个可以信赖的长者形象。

他确实是长者，1956年他刚满60岁；也确实是学者，他是尼古拉·布哈林最勤奋的学生，曾被共产国际委任为“布哈林国际农学院”的研究员。他曾努力地将布哈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尤其是农业经济理论运用到匈牙利的社会实践中去。为此，他在1949年被指责犯有“布哈林倾向的错误”而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职务。

在纳吉身上，很难找到红色官僚常有的咄咄逼人的气势，尽管他的党龄与匈牙利共产党的历史一样长久，他1918年加入共产党，1944年从苏回国后任农业部长、内务部长、国民议会议长，1948年任匈共政治局委员，1953年任共和国总理。

然而此时——1956年10月6日，在匈牙利人心目中，象征着新的希望的纳吉，却是一个没有任何头衔的平民百姓。他在一年前被开除出党。

纳吉政治生涯中的戏剧性变化，几乎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领导人身上都出现过：监禁，平反，再下台，再平反；而且非常相似的是，政治家在权力斗争中失落一次，在人民中的威望使增高几分。

人民总是盼着下了台的领导人重新执政，以中断现行政策。

不同的是纳吉的沉浮最多——三起三落。因此，他的威信最高。人民对他的期望最多。这种期望使他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使他走得比他所愿走的、所能走的都远；最后，如果不是绞刑架的阻挡，他到底会将匈牙利人引向何处，确实难以预料。

我们不能说人民对纳吉的期待是盲目的。

纳吉第一次下台是1949年；他批评了农业集体化的速度和强迫措施。他指出：“强制实行集体化，必然要以灾难而告终。”这无疑是正确的、大快人心的批评。

在共产世界，犯强迫集体化错误和对这个错误的批评，匈牙利并不是第一次——20年前斯大林犯过这个错误，布哈林批评过这个错误；纳吉的批评也不是最后一次批评，以后在波兰、在捷克、在中国都出现过这样的错误和批评。

这是共产党国家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使最伟大的政治家也难免犯错误，但为什么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要在农业集体化问题上，重复这个明显的、被历史和无数灾难证明了的错误？而且所有的结局都一样：失败的永远不是这些理应失败的错误政策，而是中肯的批评和正直的政治家。

这真是社会主义国家难逃的劫难，它造成冤狱，造成恐怖，造成民主空气的窒息。

1953年，斯大林去世，斯大林主义对东欧的控制略有松动。为了对斯大林时期的政策进行检讨，赫鲁晓夫对东欧国家的政策进行了检查、批评，纳吉得到了复出的机会。

1953年6月，莫斯科召见了拉科西和纳吉。

会见时，马林科夫冷淡地问拉科西，“您在贵国担任什么职务？”仿佛他竟然不认识这位有着一个光秃秃的圆脑袋这样明显特征的匈牙利统治者似的。赫鲁晓夫的批评更加尖锐，直截了当：他指责拉科西强迫命令组织合作社造成农业生产停滞不前，指责他违反法制、判刑太重，在党内搞个人崇拜和个人专制。

赫鲁晓夫甚至指着这位匈牙利国家元首的鼻子骂道：“你极大地损害了你的人民！你罪行累累！常此以往，人们将用武力把您赶出这个国家！”

这次召见的结果是拉科西留任总书记，改称第一书记，让出总理职务由纳吉担任。

1953年，纳吉一出任总理，便开始实行改革，他表示要结束警察恐怖，为受害者平反；制定合理的投资政策；少建一些地铁、高炉，多给人民一些食品；更重要的是，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农业经济，纳吉宣布“农民可以自由地在私人耕种和集体耕种之间进行选择，可以退出集体农庄”。

在今天看来，这些改革措施或许并无多少惊人之处，但如果想到在50年代初期，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用宣传、统计数字和政府文件证明农业集体化的优越性时，一位共产党领袖敢于在黑暗和孤独中一语道破这项政策的荒谬以及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这不仅需要魄力和远见，更需象能体察人民疾苦的政治责任。

一个统治者的过失并不在于他有别墅、汽车，而老百姓都几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也不在于他享用美味佳肴，而老百姓连猪肉都吃不上。人民并不要求统治者与他们同甘共苦。尽管有许多美丽的政治童话总是把一些政治家描绘成这样，其实只是一种虚构，一种宣传。人民并不如此苛求。

一个统治者的罪恶在于他无视国家的利益，无视人民的苦难，甚至强迫舆论也象他那样装出似乎一切都平安无事，一切都美好幸福的样子。于是，假话成了司空见惯，真话要以自由为代价。

这是纳吉不同于拉科西之流的主要之处。

1953年，纳吉的改革思想还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他明确提出民主和法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他尖锐地批评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到目前为止的发展是专制独裁性质的。

纳吉说：“政权内部所贯彻的不是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精神，而是少数人独裁的波拿巴主义精神。确立政权目标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而是根据千方百计巩固独裁统治的种种观点。”

纳吉走的太远了，他超越了拉科西，超越了提携他上台的赫鲁晓夫；更主要的是他超越了历史。

超越历史！单就这一条，他的失败也在所难免。

1955年初，拉科西重新大权在握，他解除了纳吉的总理职务。纳吉表示抗议，要求

莫斯科裁决。

这一次，纳吉被苏共抛弃了。

到底是赫鲁晓夫与斯大林主义者的拉锯般的斗争此时正处于劣势，而无暇顾及纳吉，还是因为赫鲁晓夫担心纳吉的改革步子太快会造成混乱；甚至，这仅仅是赫鲁晓夫反复无常的性格使然？这些都是1955年留给我们的一个谜，一个遗憾。

如果没有这次撤换，如果纳吉的改革能稳步持续下去，或许1956年的匈牙利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纳吉的改革很可能会引起某些混乱，甚至造成一些损失，但这只是一个民族复兴所必须经历的痛苦。如果不愿意为民主和改革付出代价，就必然为专制和腐败付出更大的代价，以至矛盾更加尖锐，灾难更加深重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这就是1955年匈牙利给我们的启示。

1955年的反复是一个隐蔽的灾难，受害者是匈牙利民族，而不是纳吉本人。当人民知道了纳吉的改革纲领，当人民已经比1949年更加了解这位政治家并把他当成救星的时候，纳吉第二次下台了，这更加深了人民对他的敬意和期望。

官方越是指责纳吉和他的改革，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越发加深，纳吉在人民中的威信越是提高——

我们赞赏纳吉的改革精神和措施，并不能说明纳吉在1955年的改革措施是无懈可击的、是肯定会在实践中获得人民的支持和成功。

如果他真能有较长的时间执政，他的改革思想未必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但纳吉的下台却使人民对此深信无疑了。

这些，使纳吉在1955年第二次下台后，从人民那里得到了或许超过了 he 应该得到的支持和信任；何况，纳吉在被免除总理职务和撤销他的学术头衔后，苏联和拉科西都要他作自我批评，纳吉拒绝了许多政治家在逆境中常采用的妥协态度。

纳吉重申：把无辜者从监狱里放出来；把土地归还给农民；增加消费品生产的改革措施没有错。为此，他在1955年底被开除出党。这就在政治和人格两个方面都使纳吉在人民心中挺立起来，成为匈牙利民族的英雄和救星。

到这里，一出悲剧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潜伏着深刻危机的历史情势；一位崇高的、能体察人民痛苦而又多次为之献身的殉难者；还有，一个被愤怒和希望鼓动着的民族……

没有哪一个领袖可以引导这种状态下的人民。

这就是匈牙利，这就是1956年10月。

五

人民已进入与历史决战的亢奋状态，他们的第一个战役是攻打斯大林塑像；然而，格罗却把这次行动的几十万人民称为暴徒。

10月6日拉伊克的葬礼就是那样有力地冲击着格罗政权。以至他不得不在10月13日下令逮捕判处了拉伊克死刑的前国防部长、武装警察部队司令法尔卡什·米哈依和他的儿子。

这个作恶多端、身材矮胖、说话结巴的法尔卡什是匈牙利的贝利亚。他在四个月以前的中央全会上已被解除职务。当时，他发言为自己辩护，把执行恐怖政策的罪责推到时代身上。最后，他竟放声痛笑起来。但没有人怜悯他。他被开除党籍，并当场就弯曲着身子离开了会议厅。

10月14日，中央政治局宣布撤消1955年上1月开除纳吉出党的决议。

这些大决人心的决定已经不能安抚民众，反而激起了人民更强烈的希望和参政意识。

拉伊克平反了，直接责任者已逮捕入狱，纳吉恢复了党籍。缺乏政治敏感的格罗便以为该做的都做了，人心已经安定，于是便放心地访问南斯拉夫去了。

格罗太不了解他的人民。政府的让步既为时过晚，又没对匈牙利社会问题有实质性解决。事态急剧发展着。

10月17日匈牙利作家协会通过决议，要求召开党的特别大会以讨论人民的政治要求。

10月22日，裴多菲俱乐部执行局向党中央提出“十点要求”，要求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党的新领导；要求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要求吸收纳吉参加最高领导。

同一天，布达佩斯大学生联席会议提出“16点要求”，要求政治生活民主化，要求撤走驻扎在匈牙利境内的外国军队。

这些团体实际上都把纳吉作为政治领袖了。

10月23日，数千名大学生上街游行，声援波兰的哥穆尔卡。

哥穆尔卡是波兰前领导人，既是主张改革的政治家，又是斯大林路线的受害者，他因不同意农业集体化和亲苏政策而蹲了好几年监狱。几天前，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哥穆尔卡被选举上台执政。

波兰的胜利使匈牙利人受到鼓舞。

游行队伍穿过整个首都街道，他们一边挥动旗帜，一边呼住口号——

“工人学生团结紧，匈牙利人一条心！”

“不再容忍欺骗！公审法尔卡什！”

“错误我们已经厌倦，新政策赶快执行！”

“党要民主化，纳吉要执政！”

中午，布达佩斯广播电台播出了内务部的一条公告，宣布在目前这一时期禁止任何公众集会与示威游行。

这个禁令反而激怒了民众，起先只是站在人行道上向学生游行队伍致敬的工人也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来。游行队伍很快增加到十万人。

下午两点，政府又只好宣布取消游行禁令。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使事态更加严重，布达佩斯人要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了。

傍晚，游行队伍兵分三路——

到国家电台，要求播出他们的政治主张；

到国会大厦，要求与上层对话；

到英雄广场去攻打斯大林塑像。

在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耸立着25米高的斯大林巨型铜像。这座铜像是斯大林的影子，就象格罗是拉科西的影子——斯大林死了，这座铜像还耸立着；拉科西下台了，他的亲密战友还在执政。

格罗是旧时代的证明，这座铜像是专制的象征。

铜像下聚集了一二十万人。人们仰着头，个个磨掌擦拳，几乎进入了与历史决战的亢奋状态。人们拥挤着，亢奋而又茫然，还有几分胆怯。无论怎么讲，人们面对的是一位历史巨人，是一个不久前还让他们诚惶诚恐、心惊胆战的时代。

人们在等待勇气。

终于开来了几辆卡车，那上面有切割机，有粗大的钢丝绳。有人爬上塑像，把钢丝绳套在斯大林的脖子上，有人点燃切割枪在斯大林的靴子旁大干起来。

这是一些工人；只有工人才有这些工具，只有工人才有这种胆量。没有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座极权政治的象征是无法推翻的。

晚上9时半，这座高25米，有好几吨重的庞然大物轰然倒下了。

望着这个倒下的巨人，人群出现了紧张而又不安的沉寂；随后，人们松了口气，欢呼起来，并且立即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了。

在电台大厦，由游行群众派出的20名代表走进电台，要求停止正常节目，广播学生的“16点要求”。

电台未能通过有关撤走苏军和民主选举的条款，谈判破裂，事态更加严重。

晚上8时，电台播放了第一书记格罗的讲话。这个讲话不仅没能制止事态扩大，反而使激愤的群众骚动起来。

格罗是23凌晨才从南斯拉夫访问归来的；当来到车站迎接他的领导人要求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时，格罗目瞪口呆，根本不知道国内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从车站直接驱车到党中央。

会议上，格罗依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啰嗦地介绍访南情况。会场上，总有人进进出出，这些人并不是政治局成员。

格罗的介绍被打断了。开始讨论游行问题。起先通过不准游行，但也不准向游行群众开枪的决议；后来，又因为内务部长宣称，不准开枪便不可能制止游行，于是，又作出准许游行的决定。中间只有两三个小时的间隔。

格罗就是在这种非常情况下出来向人民讲话的。然而他却采用了惯常的口吻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格罗说：“我们希望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资本主义民主。”

这等于把呼喊民主口号的群众划入资产阶级范围，他说：“人民公敌今天的主要目的是要埋葬工人阶级的政权，松懈我党和光荣的苏联党之间的关系。我们谴责那些滥用国家给予工人阶级民主自由权利来制造民族主义示威的人们！”

这完全是一副救世主的腔调！到此时，格罗还以民主自由的恩赐者自居。

还象以往一样，格罗要人民只能把他所恩准的民主用在他允许干的事情上。

格罗的讲话无疑是火上加油。

南共领袖铁托在评论格罗这次讲话时曾说：“他把当时只不过是在举行示威游行的几十万示威者称为‘暴徒’，这样就几乎侮辱了全国人民。想一想他是怎样的一个领导者！”

格罗比不上斯大林的权威和魄力，但他比斯大林的铜像却顽固得多：布达佩斯人在10月23日推倒了那座巨像，格罗却正在这个时候还能用他那粗暴的方式训斥人民。

人民骚动起来，在电台大厦的广场上响起了匈牙利事件的第一枪……

谁也说不清这第一枪是谁先打的——是守卫电台的警卫部队，还是示威群众？

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和关于冲突流血的描写往后放一放。

我们得停一停，先思考一下。在这儿，情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匈牙利流血了；重要的是这许多鲜血将会淹没人民对民主和改革的希望，还是会淹没那个斯大林牌的社会主义？

这才是举世关注，而且至今仍需重新探究的一个难题。

六

几十万民众呼喊纳吉，是在呼喊一个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当人们攻打斯大林塑像、并与格罗的专横对峙的同时，数十万人却聚集在议会广场呼喊他们的政治家——

“我们要纳吉！”

“我们相信纳吉！”

“格罗下台！”

人民在求纳吉出来讲话，纳吉没有出来。因为他没有任何职务。群众等了很长时间，并派出一个又一个代表团请纳吉出来与代表们见面。此时，斯大林塑像已被推倒，那里的群众也来到议会广场。

据当时的官方估计，广场上集聚了30多万人，这将近布达佩斯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几十万民众齐声呼喊一位政治家，那场面真是既壮观又可怕。

一位前农民党的领导人登上阳台，要跟民众讲话。这个党曾是战后匈牙利联合政府中的主要代表。它的纲领是“上帝、祖国、私有财产”。

1947年，这个党被共产党压垮。现在，他们或许以为是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一个争取民众的时机。

但广场上嘘声大作，不让这位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讲话。

可见，即使在10月23日，在极度无组织的自发状态下，匈牙利人还是承认并接受社会主义这个现实。人民呼喊纳吉，是在呼喊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

纳吉终于被他的朋友拉到议会广场。广场上原来呼声震天，纳吉一出现在阳台上，几十万人顿时鸦雀无声。

纳吉神情焦虑，在没有麦克风的情况下作了即席讲话。

他刚喊了一声“同志们！”就被人群打断了。人群里传来有节奏的呼声：“我们不是同志，我们不是同志！”

或许有人会以此作为匈牙利人已经抛弃社会主义的证据，因为这是一个革命的称号。

但如果想一想这个用得最滥的政治称呼早就被歪曲和糟蹋了——就象“社会主义”和“革命”被糟蹋而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了它们的神圣性一样——我们就应该理解人民一时的感情用事；其次，这也是民众的一种反叛姿态，他们希望纳吉能彻底地与他过去的“同志们”决裂。

纳吉咬着胡子，等待着喊声停下来。即使他能理解，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他毕竟有40年运用这个称呼的习惯了。

纳吉要求人民要有耐心，要相信党能把一切安排就绪……

显然，在此时纳吉只能这样讲。他并没有为了增添自己的政治资本，为了给政敌增加压力而去煽动盲目的热情；显然，这样的讲话不能满足焦灼地等待着重大变革的人民。

人民总是性急的，总希望在一夜之间得到一个新的世界。

这次会见就这样结束了，双方都没有给历史留下惊人之笔。

有人泱泱地离开了广场，但更多的人不甘心就此罢休。他们仍然期待着，仍然在广场上游逛，希望还能发生些什么事。

事情发生了。晚上，有人来到议会广场，说是国家保安局的武装人员在电台大厦前枪杀群众。这些人还出示了手中的废子弹壳作为证据。

这个消息将布达佩斯人点燃了，人们迅速涌向电台大厦。

匈牙利事件就在这个时刻，这个地方正式拉开了帷幕。

七

当人民表达自己意志的一切渠道都被堵塞，他们有无权力用暴力去表达自己的意

志？这是一个难题。匈牙利人民这么做了，并且受到了本国军队的支持。

1956年10月23日晚上，在布达佩斯电台大厦前响起了枪声，流出了鲜血。

全世界都在追究：谁开了第一枪？电台警卫、保安部队、还是人民？仿佛这是问题的实质似的。

这不是问题的实质。当国家电台受到袭击的时候，权力机关用武力保卫电台，有什么错？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会这么做的；另一方面，当人民表达自己意志的一切渠道和可能都受到堵塞时，他们为什么不可以用暴力去表现自己的意志？人民又有什么错？何况，倒下去的人民毕竟比保安战士多；何况这些年轻的保安战士也属于人民。

总之，倒下去的是人民，流血的是匈牙利。

当我们从许多回忆和当时的资料中搜寻并描写开始武装冲突的细节时，并不是为了以此来判断是非，而仅仅是叙述事件的经过。

当电台拒绝了播出群众的政治要求，当格罗那种愚蠢的讲话激怒了群众后，人们推倒并焚烧了包括一辆电台录音车在内的几辆汽车，并要冲进电台直接向全国播出人民的政治呼声。

守卫电台的警卫战士端着上了刺刀的枪，阻挡人群。但战士们不得不后退，因为人们用胸膛逼近他们的刺刀。

公平地说，守卫人员并未接到开枪的命令。没有人敢于在数十万人民面前开枪。

群众进逼着，战士步步后退。他们互相大声喊叫，但都听不清对方的声音。一些年轻的战士因为恐惧、紧张而在发抖。这时，从附近的楼顶上射来了子弹，那上面有装备着重机枪的保安部队。

这也不是奉命开枪——没有人有勇气在这个时刻下开枪的命令。这很可能是因为慌乱而失去了控制，很可能是哪位在惊吓中失去理智的保安战士先打了一枪。

混乱发生了，悲剧发生了。

人群在街上奔跑，也有人夺枪还击。正式冲突开始了。

没多久，街上出现了一支陆军摩托车队。这是国防部派来制止骚乱的。

士兵们看到群众被枪杀的场面后，不知如何是好。他们马上被绝望的人群包围了，人民要求士兵把枪给他们，以便对保安部队的残杀进行自卫。

这些士兵大多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子弟，他们没多加考虑就交出了自己的枪，因为他们了解保安部队的残暴，眼前的事实又给他们提供了新证据——火药的烟雾还笼罩在广场的上空。

一位士兵交出了自己的枪，其它人也学着他的样子交出了自己的枪。

陆军部又派出了部队去制止流血事件，结果是士兵们到了现场，不仅没有驱赶群众，反而向保安部队开火，并同群众一起向电台守卫部队发起进攻。

陆军总部束手无策，一位陆军将领竟断言：“派去的部队越多，投向进攻者一边的人也就越多。”

匈牙利濒临内战的深渊。

匈牙利事件是从电台大厦前武装冲突开始的，暴力和流血一开始就是这个事件的主要特征——没有冷静的思考，没有严密的计划。当几十万人拥挤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能指望理智。然而，这股非理性的力量，却比任何理智、谋略更具有威力，它迅速地改变了政治家的命运，改变了匈牙利的命运；也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八

请外国军队来镇压自己的人民是一个错误。一涉及到民族尊严和独立，匈牙利事件变得复杂了。

10月24日凌晨，匈共中央采取了两项非常重大的步骤：解除安德拉什·赫格居什的总理职务，由纳吉接替。格罗留任党第一书记。

另一项重大决定的结果是，一百多辆炮筒很长、车体很大的坦克在24日凌晨开赴布达佩斯的街头。这是约瑟夫·斯大林到的巨型坦克，它们属于苏联坦克后备队，驻扎在布达佩斯西南的巴拉顿湖边，距首都只有一小时的路程。

一小时后，这些坦克在布达佩斯主要建筑物旁、在匈共政治局驻地、在国防部、内务部摆开了阵势。

早上，国家电台公布了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同时宣布两项命令：

一、禁止集会；二、请苏联出兵恢复秩序。

这个政府公报是从国会大厦播出的，那里的一间传达室被当着播音间。广播大楼已被放弃了，人们可以自由出入。昨晚死于动乱的一具具尸体仍然扔在院子里。

这次公报的播出没能制止事态，反而使动乱向全国蔓延。

不错，人民的政治理想实现了一部分——纳吉又一次上台执政，然而这个胜利是被苏联坦克送来的。请苏联出兵，显然是针对着正与政府处于对抗位置的人民的。这无形中使他们为民族命运的奋斗受到玷污而沦为需要镇压的暴徒；更重要的是使他们的民族感情受到伤害。

这个民族几个世纪以来，为了自己的独立，一直在为推翻土耳其人和奥地利人的统治而浴血奋战。他们的民族自尊心是那样的敏感。

现在——1956年10月24日，面对着街头的苏联坦克，愤怒的人民更加愤怒了，盲目的力量更加盲目了，被动乱模糊的目标更加模糊了。匈牙利事件将脱离任何政治家和任何阶级的控制而向前发展。

中午，双方的火力减弱了，布达佩斯一度趋于平静。新任命的政府首脑纳吉要发表首次广播讲话。

人民紧张地等待着。这是匈牙利民族生死攸关的时刻。纳吉面临着一个政治家所能经历的最严重的考验。

纳吉开始讲话了：“布达佩斯市民们！我现在宣布，所有今天14点以前放下武器和停止战斗的人将不以军法论处；”

仅仅是这个开场白，就使人民过于急切的希望受到了伤害。几乎同时，布达佩斯又响起了激战的枪声。

纳吉以后的讲话是在枪声的伴随下传来的。纳吉答应他将尽一切力量实行三年前的政治纲领——尽快使匈牙利人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民主化；同时，他呼吁停止战斗，停止流血。

纳吉的呼吁已经不能平息被死亡、流血和外国坦克所煽起的愤怒和复仇情绪了——

人民要求对拉科西—格罗时代的罪恶进行彻底清算；要求对保安部队的屠杀进行审判并动用军队进行剿灭；人们要知道此时在布达佩斯街头巡逻的苏联坦克到底是谁请来的；更重要的是，在目前的形势下，人民不需要保证、许诺，而需要一位政治家和一个政府采取切切实实的行动。

外国军队到底是谁请来的？这个问题与电台大厦前的第一枪到底是谁放的同样难回答。只是它比前一个问题重要，它使匈牙利事件更加严重，更加复杂了。

许多材料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一致的，有的说是格罗，有的说是赫格居什，还有的说是纳吉。但我们宁愿相信10月24日出现在布达佩斯的苏联军队是格罗请来的，因为他当时担任着第一书记这个最高职务。

铁托曾经为此对格罗进行了直接了当的批评。

铁托说：“军队是格罗请来的，当示威还在进行的时候把苏军请来，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请别国的军队来教训自己国家的人民，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举动结果更进一步激怒了人民，因此发生了自发的暴动。”

人民暴动了，开始是为了民主自由，后来又为了民族独立。与任何民族一样，只要问题一涉及到民族尊严和独立，这个民族的阶级关系便会立即发生急剧的变化。到此时，更难以给匈牙利事件定性了。

各个阶层的人都在行动；因此，各种立场的人都不难为自己对匈牙利事件的定性找到根据。

九

共产党员被杀是事实，杀共产党员的人中有共产党人这也是事实。这两类共产党中，哪一类的政治主张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原则和工人阶级的历史利益呢？

匈牙利没有爆发全面内战，这或许与10月24日的苏军出动有关。然而混乱的政治局面却加剧了：民众与政府的对话基本中断，上层和下层各行其是，双方的相互影响都减弱了……

这几天，我们看到过爬上政府机关大楼摘下红五星——那是革命的象征——的人，这些人，是仇恨革命的反动分子，还是对革命失去了信心的人民？说不清楚。

我们还看到过巨大的、被挖掉了国徽——政权的象征——的国旗。挖掉这个由拉科

西亲自设计的国徽后，那面红白绿的三色旗便可以充当匈牙利任何时代的国旗了。国旗上的这个大窟窿，是妄图复辟的反动派挖的，还是对现政权不满的人民干的？也说不清楚。

在一些地方，保安人员和一些党的干部遭到杀戮，这到底是敌人的阶级报复，还仅仅是人民对一些平时作恶多端的人的惩罚？或许，两种答案都是正确的。

最令人震惊的是暴动者对布达佩斯市委大楼的进攻。

大楼的数十名保安人员和警卫战士在被围困的情况下，与群众发生枪战。后来，由于寡不敌众，无法坚持，于30日下午由市委书记——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麦泽和他的战友打着白旗率领下，战战兢兢地走出了大楼。

走在最前面的麦泽立即被一梭冲锋枪子弹撂倒。其余人几乎刚走出大楼便被击毙，尸体遭到了残忍的蹂躏。

这个事件是所有给匈牙利事件定反革命性质的人必定引用的证据。他们说，匈牙利在杀害共产党人。

这是匈牙利悲剧的一次高潮。因此，我们有必要来看着市委大楼是由什么人，用什么方式攻下来的。

10月30日上午，群众包围了市委大楼。出于对一个暴戾政权的内幕的好奇，许多人要冲进楼里去看看。警卫从楼上向接近大楼的人开枪射击，于是发生了枪战。

被围困在市委大楼的守卫和市委领导在绝望中向国防部求援，但由于驻扎在首都的坦克部队拒绝与人民作战，国防部只好从外省派去三辆坦克。

坦克刚到现场，群众便说服了坦克手，说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是“保安部的人”。坦克兵没有多加考虑便掉转炮塔向大楼轰击，第三炮就打开了缺口。于是出了我们前面描写过的悲惨结局。

这是共产党的军队，我们不能说里面没有共产党员；在以后的战斗中，我们还能从武装组织的组织者和成员中找到共产党员。因此，共产党员被杀是事实，杀共产党员的人中间有共产党员也是事实；就象人民要推翻的拉科西、格罗是共产党人，而他们需要拥戴上台的纳吉也是共产党人一样。我们要探讨的是这两类共产党员中，哪一类的政治主张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原则和工人阶级的历史利益？

当然，如果象西方那样，说匈牙利事件是一场革命，是一次纯粹的人民起义，那是不严谨的。

各阶级的人都在行动，都妄图插手这场开始时纯粹是自发的群众运动。连拉科西这具政治僵尸也不例外。

在莫斯科的拉科西知道了动乱的消息后，以为是他的一个机会，他报告莫斯科说，他要回到匈牙利去帮忙。

赫鲁晓夫的回答是：“您可以回匈牙利去，但那里的老百姓将把您吊死！”

然而，拉科西怀着被希望鼓起的政治热情要求与国内通电话。苏联电话员拒绝给他接通。

马林科夫事后挖苦这位前国家元首的政治冲动说，这表明电话员在政治上比拉科西成熟。

拉科西没能得到行动的机会，但其他的反动阶级确实行动了。

由于动乱期间边境的开放——尤其是西部边境，许多流亡国外的霍尔蒂政权时期的军人、政客潜回匈牙利，企图利用动乱复辟旧的统治。然而，这些右翼法西斯分子只是隐藏在人民之中，不敢公开暴露自己的身份，更不敢喊出他们的政治口号。说这些人能在事态的发展中占据优势，并操纵了几十万参加暴动的人民，是令人怀疑的。

在匈牙利事件中，具有一定权威又公开过反社会主义纲领的，是匈牙利红衣主教明曾蒂。他是10月30日政治犯大赦时被释放的。

这个在解放前被称为“国家第一旗手”的红衣主教，显然怀念着几个世纪以来红衣主教所拥有的不低于国王的政治权力；他显然妄图利用这次机会要把废除了君主制的共和国废除掉。

明曾蒂确实采取了行动。在最混乱的11月3日——也就是苏联第二次出兵的前一天，他曾发表广播讲话：呼吁恢复资本主义，恢复教会的经济、政治权力，号召赶走纳吉政府……

这也证明纳吉没有使他的复辟愿望得到满足。

不过明曾蒂主教的行动也不过是呼喊而已，第二天，他就由他的随从护送到美国大

使馆避难。并且很快就明白了一个主教对国家事务指手划脚的时代是永久地结束了。

所有这些都作为“反革命在匈牙利行动”的证据。

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行动对匈牙利事件产生了直接的、举足轻重影响的证据。

另一个反面的证据，是鼎鼎大名的“裴多菲俱乐部”。

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裴多菲俱乐部在匈牙利事件中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拉科西曾经在下台前夕，称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是“反党反人民的”，说它的成员是“集合在纳吉周围的右派分子”。

在匈牙利事件后，几乎所有将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的人都说，裴多菲俱乐部是资产阶级的文人组织，是反革命的舆论工具，是反革命事件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

实际上，裴多菲俱乐部的领导机构——执行局的20名成员中，有13人是共产党员。其中有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青年联盟的中央书记、宣传部长和布达佩斯青年联盟书记；还有一些科学家、新闻记者、作家和大学生。这个旨在争取民主自由的团体，从1956年3月成立以来，多次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就拉科西的政治路线进行讨论和批判。拉科西的下台，拉伊克的平反，纳吉的上台；尤其是对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思考和批判，对社会主义民主、改革的争取等，裴多菲俱乐部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裴多菲俱乐部，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叫佐尔坦·多哈尼的保安部中校，工人出身，行为粗野。保安部军官身上所有的专横、优越感他身上都有。他说过，一个保安部的下级军官胜过一个警察局长，甚至一个部长。

1956年春天，多哈尼中校和另外几位保安部军官被派到裴多菲俱乐部参加各种集会，并要求他们将那些演讲者的思想言论记录下来以向保安部汇报。

后来，他们参加各种讨论的次数越多，受到他们从未听到的改革思想的影响越大。结果，他和另外被派往裴多菲俱乐部的保安部军官共同写了一份备忘录，表示赞同裴多菲俱乐部的观点，赞同党内改革派的主张。

拉科西为这件事大发雷霆。在拉科西的责令下，保安部要这些人选择：要么撤回签名，要么受到审判。

许多人屈服了，只有佐尔坦·多哈尼拒绝改变自己的立场。他被撤销职务并开除军

籍……

这位中校的下落没有人交待过，他会不会在10月事件中成为一位有军事经验的战斗者呢？

这就是裴多菲俱乐部，这就是裴多菲俱乐部的影响。但必须说明的是，即使裴多菲俱乐部确实对匈牙利事件有过我们说的这些重大影响，也仅仅限于运动的初期。

那么，在10月23日事态扩大之后，除了苏联的坦克之外，到底哪一个人和哪一个组织能具有权威和力量，能在匈牙利历史上写下生死攸关的一页？

这是纳吉和他的新政府——尽管这个答案仅仅是相对而言。

十

该做的，纳吉都做了——十分艰难地做了。他在一周内所做的事甚至比一个幸运的政治家一生所做过的还要多。

历史上很少有哪一位领袖会比纳吉在1956年10月24日后短短几天里所面临的危机更深重，更多——

被仇恨、被希望、被流血、被外国坦克、被无政府状态刺激得狂暴而又茫然的人民；

已经下台而怀着敌意的政敌；

准备上台而偷偷窥视的反对派；

想以武力维持秩序却引起了民族冲突的苏联军队；

妄图复辟旧制度的法西斯右翼分子；

趁机混水摸鱼的流氓、犯罪分子……

这些就是纳吉政府——仓惶中刚刚成立一天的新政权在10月24日所面临的局势。

处理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需要政治家有冷静思索、稳妥处理的时间和机会。政治常常需要耐心、需要退却、需要等待，然后才可能决断、进攻。这些纳吉都没有，

他必须迎上去，没有丝毫思考、迂回的余地——

10月25日，纳吉宣布免除格罗的职务；

10月26日，讨论改组政府；

10月27日，宣布新政府成员名单，非共产党人进入新政府；

10月28日，匈共领导由一个6人主席团接管；同日，纳吉要求与苏军指挥员进行撤军谈判。

10月29日，为恢复布达佩斯的秩序，成立了由军队、警察和暴动者组成的国民警备队；同日，宣布废除一党制，建立多党制政府。

10月30日，宣布多党制政府内阁成员名单，其中共产党（劳动人民党）3人，小农党2人，民族独立党1人，社会民主党1人；同一天，纳吉代表政府促请苏联军队立即开始从布达佩斯撤退；也是这一天，纳吉任命了国防部长、布达佩斯驻军司令。

10月31日，宣布解散匈牙利共产党（劳动人民党）重建新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当然还是共产党）；这一天，纳吉宣布苏军将撤离布达佩斯；宣布取消国家安全局；宣布起事者将编入国家的武装力量组织；宣布提高工资和退休金，调整工资……还是这一天，以纳吉为首的匈牙利政府代表团与以米高扬为首的苏联代表团举行会谈。纳吉提出4项原则：

一、立即撤回苏军；

二、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

三、匈牙利重新确立多党制政权；

四、准备自由选举……

……

从10月25日到10月31日，一周时间，哪一个政治家，哪一届政府处理过如此众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中，哪一条不是涉及到一个民族的命运？不是涉及到半个世界的命运？

我们可以说纳吉的这些措施不全是正确的——哪一个政治家敢说面对如此纷乱严

重的政治局势，可以不犯错误？但如果说纳吉在1956年10月的最后几天是软弱无力、束手无策则不公平！

纳吉都做了——十分艰难地做了。他在这一周内所做的事，甚至比一个幸运的政治家一生所做过的都多。

可是采取了这些重大步骤，取得了这些明显进展后，纳吉就可以松一口气、读者也可以松一口气了吗？

本来是这样的，连苏联都在10月30日发表政府公报说：“纳吉政府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从匈牙利全国各地源源而来的报道表明，工人支持新政府，并赞同它的纲领。”

然而——这是一个该诅咒的然而——历史上常常有许多说不清楚的谜，有许多无法预料的偶然。既然历史一开始就给纳吉和匈牙利安排了一场悲剧，匈牙利人便只好用鲜血来浇灌民主和独立之花；纳吉也只好为他的思想而牺牲他的生命。

谁能逃得过历史的劫难呢？

十一

苏联大军压境，纳吉采取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袖所敢于采取的最重大行动——废除华沙条约，宣布匈牙利中立；同时，纳吉的好几位部长失踪了……

10月的最后几天，尽管动乱尚未平息，尽管还发生了攻占市委大楼的惨案，但有两件事表明，匈牙利局势的好转已经指日可待：

一是民间分散的武装力量正在组织起来，并逐渐控制到以工人阶级为主的人民手中。许多军工厂——尤其是全国最大的“兰帕尔特”军工厂——的工人都武装起来，并用他们自己生产的武器把其他工厂和当地居民也装备起来。

民间武装力量中两支最大的队伍都是由工人组成：一支是由切佩尔岛的青年工人山多尔·安乔尔指挥。他18岁参加匈牙利共产党；另一支由布达佩斯附近的工人蓬格拉兹兄弟领导。他们拥有反坦克武器和十几辆破旧的苏式坦克。

在1956年10月，他们的名字是尽人皆知的。苏联第二次出兵后，山多尔·安乔尔被俘并被判死刑，他临刑前的遗言是：“宁愿死去，也不在耻辱中活着！”蓬格拉兹兄弟则在失败后率领他们的队伍撤到西部边境并超过边界。

军官学校的学生也投入到人民之中。一些陆军兵营打开了武器库向群众分发枪支。由于苏联坦克的出现，人民获得了更多的武器并与警察和部队并肩作战。当然，与苏军的武装冲突也干扰了人民尽快地控制局面、平息动乱。

另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所有的这些民间武装力量都被编入国家的武装力量组织——国民警备队。

10月29日，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联合司令部。国防部高级军官基拉伊·贝拉少将被选为总司令，布达佩斯警察局长山多尔·科帕奇上校被选为第二司令。他们都是匈共的老党员。

大会确立了武装力量的任务——尽快恢复公共秩序！

仅一周时间，匈牙利形势基本明朗，尽管各阶层的人都在行动，“但行动的主力是工人阶级”；尽管有反动分子干扰、有流氓地痞混水摸鱼，但在10月的最后日子里也有过这样的奇迹：在橱窗玻璃被粉碎了的珠宝商店边，有暴动者站岗，谁也不许染指这些贵重物品。

这是1956年10月一个非常辉煌的成绩。在动乱初期的小混乱和苏联第一次出兵引起的大混乱之后，有了这些重大步骤，我们可以指望工人阶级和新政府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匈牙利问题。

纳吉政府加紧了与苏联关于撤军的谈判；苏联政府也于10月30日发表声明：“鉴于苏联军队继续留驻匈牙利可能导致局势更加紧张，苏联政府已经指示自己的军事司令部，一俟匈牙利政府认为必要，即将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

这个声明是值得称道的，是鼓舞人心的。

匈牙利事件时期一直在两国政府之间进行斡旋的米高扬在这个时候，曾对匈牙利新成立的武装力量的负责人说：“我们现在必须离开贵国了，请你们尽力协助纳吉同志。”

同时，米高扬又握着纳吉的手说：“纳吉同志，凡是该拯救的都要拯救！”然后两人拥抱，热泪盈眶。

米高扬把匈牙利的命运交给了匈牙利人，把半个世界的命运交给了这位政治家的这次伟大实验。

这是一个让人落泪的场面。

大家都知道匈牙利人接过的这种嘱托有多么沉重。

纳吉知道自己肩上的历史重负，但他是满怀信心的。

纳吉在此历史关头宣布：“两国的军队领导人将举行会晤，坦克将撤离首都；3个月之内苏军全部撤离匈牙利。我们将举行普选；各民主党派可以提自己的候选人……社会主义成果当然不能倒退；土地、银行、工厂将继续掌握在国家手中。”

与苏军的谈判开始了。匈牙利方面由国防部长马勒特尔为首席代表。谈判先在匈牙利议会大厦，后在苏军总部。马勒特尔每隔半小时向政府汇报一次谈判的细节。

会谈的气氛是令人愉快的。重要问题已经解决，他们进一步协商的只是关于撤军的技术性问题：苏军的告别讲话，向撤退部队献花，战争物资的运输问题……

然而，就在这种喜庆的气氛下，却有消息传来：更多的苏联军队正在向匈牙利挺进。

纳吉召见了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请他就此作出解释。

安德罗波夫说：苏联政府将遵循有关撤军的声明，至于匈牙利政府所观察到的部队动向只是一种撤离的方式。

10月31日，纳吉再次召见安德罗波夫。他说，“军事专家已无可辩驳地证实，新的部队已越过边境，因此，匈牙利直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并立即生效。”

当天下午，安德罗波夫又被请到议会，正式将中立宣布书交给他。

11月1日，纳吉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郑重宣布：阁下：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以它指的外交部长身份荣幸地通知如下：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获得可靠消息：更多的苏联部队正在开进匈牙利来。部长会议主席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召见了苏联驻匈牙利特命全权大使尤·安德罗波夫，并且对更多的苏联部队开进匈牙利提出了他的最强硬的抗议。他要求这些苏联部队立即马上撤退。他通知苏联大使说，匈牙利政府立即废除华沙条约，同时，宣布匈牙利中立。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56年11月1日宣布中立。因此，我请求阁下立刻把匈牙利的中立和4大国保卫这种中立问题，列入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的议程。

历史向纳吉政府和匈牙利民族显露出狰狞的面目。

随着这一令人心惊胆战的凶兆出现的，是一个来自内部的更加凶险和不祥的消息——新政府的部长失踪了。

11月2日，纳吉召见了他的武装力量负责人。纳吉摘下夹鼻眼镜，用深深忧伤的目光注视着他的部下说：“提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们知道内务部长现在何处？”

没有人知道。

纳吉和他的办公室主任交换了一下眼色后继续说，“第一书记卡达尔也同样无从寻找。”

所有的人都被这耸人听闻的消息惊呆了……

十二

1956年11月4日是广播史上的耻辱——政府在电台广播里寻找国防部长以及去苏军总部谈判而失踪了的军事代表团；总理在电台用四种语言向全世界通报外国军队攻进了匈牙利首都；作家在广播中向全世界呼救：“救救我们……”

苏匈两军领导人的谈判还在继续。到11月3日下午，国防部长马勒特尔还电告政府，说谈判仍在进行。而此时，苏联军队有20万人，12个师——其中8个坦克师，正向通往布达佩斯的主要公路上的两个作战地集结。

将近午夜，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伊万·亚历山大·谢洛夫将军带领着几名全副武装的军人，突然出现在特克尔的苏军总指挥部，他们冲进正在进行苏匈会谈的谈判厅。

谢洛夫手握大毛瑟枪，他的随从立即包围了谈判桌。

“你被捕了！”这位苏联将军向东道国的国防部长宣布。

马勒特尔从座位上跳起来，迅速地摸到腰间的手枪。但他马上改变了主意，只是仰天大笑一声：“哈哈！原来如此……”

匈军代表团成员全被解除了武装。苏联人把他们单独囚禁起来，然后用一架小飞机把他们送到一个兵营关押起来。

政府与谈判代表的联系中断了。纳吉政府派出一辆匈牙利军队的坦克，炮塔上挂着一面大白旗，开往苏军司令部，去寻找参加谈判的匈方代表团。

这辆坦克一路上不断地用无线电发回消息：“我们已经到了特克尔……我们停车……有士兵向我们跑来……我们要下车向他们的指挥官报告了……”

守在无线电接收器前的纳吉听到了俄国人的说话声，以后，便什么也听不见了……

人们面面相觑，然后把视线移到他们的总理身上。

纳吉沉默着，没有流露出丝毫惊慌的神情，有的只是疲惫和深深的绝望。

到此时，这位在苏联生活过15年的匈共领导人已经放弃了任何幻想。

苏联军队第二次开进了布达佩斯。这一天是1956年11月4日。

匈牙利人不会忘记11月4日。

11月4日曾经有过美好的希望。这一天是星期日，纳吉政府曾经制定了“星期日行动计划”——要在这一天彻底清查首都，要在这一天实现除士兵和国民警备队外，将不再有任何武装分子。

为了这个计划，国民警备队和80多个大工厂的工人委员会、十多所大学将采取联合行动。

有了这样的行动，匈牙利在分娩的阵痛之后，将开始新的生活；有了这样的行动，布达佩斯街头将不再有动乱，工厂将复工，机关将办公，商店将营业，孩子们将背起书包上学——匈牙利人已经流过血、已经付出过代价了，他们应该得到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

然而，这仅仅是匈牙利人的计划，仅仅是11月4日的理想；现实的11月4日是沉重的。

11月4日凌晨4时，轰鸣的坦克声粉碎了这些理想和计划。

头天晚上，纳吉没有回家，他留在国会大厦，沉着地等待着最后的灾难。这是具有深刻绝望的人所有的那种沉着。

纳吉以极大的权威拒绝下达武装抵抗的命令，他不愿意让匈牙利人无谓的流血。他对要向他汇报工作的战友说，“已经毫无益处，我的朋友，谢谢，谢谢各位。”

他的政府历经了13天艰难困苦的生存后，结束了自己的使命。纳吉能做的只是向全世界宣布死亡前的最后存在。

纳吉尽到了一个国家元首的最后职责。

清晨，纳吉在国会大厦用4种语言向全国、全世界，向人类的未来广播：

“我是匈牙利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伊姆雷·纳吉。苏联军队已于今天早晨开始进攻首都，公然企图推翻匈牙利合法民主政府，我们的军队正在战斗，政府依然存在。我向匈牙利人民和全世界通报这一情况。”

但愿世界上任何一个电台将永不再播放这样的广播，但愿所有国家的人民都不会听到他们的领袖作这样的讲话。

这真是广播史上的耻记和不幸。在纳吉的讲话播出之前，电台一直反复播出一个军人的声音：“国民政府主席纳吉在呼唤国防部长帕尔·马勒特尔、总参谋长伊斯特万·科瓦奇将军以及其他昨天22点去苏军总司令部、但现在还没有回来的代表团成员。他命令他们返回，立即行使他们的责任！”

纳吉的讲话之后，广播里传出来的是匈牙利著名作家哈伊震招人心的呼吁：“我向全世界，向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呼救！请帮助我们吧！”

十三

纳吉的改革——从取消国家保安局到废除一党制，即使是社会主义的，也是1956年的历史所难以接受的社会主义。

苏联的第二次出兵也是应匈牙利政府邀请的。这个政府就是11月4日宣告成立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它的主要成员正是3天前失踪的纳吉政府的部长们。

我们不应该对一个国家的政权更替说三道四，何况这个政权的首脑卡达尔也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受害者，一个在拉科西时代蹲过监狱、服过苦役的政治家。为此，我们必须将1956年留给我们的另一个难题——如何评价匈牙利在半年之内成立的第三届政府——暂时放一放。而回到我们先前的思路：纳吉的改革和失败的经过。

纳吉于11月4日和他的追随者42人躲进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馆，并获得了政治避难权。

纳吉彻底失败了，他的一切都失去了，只剩下失败者自身的检讨和胜利者对他的命运的宣判。

纳吉的改革方式与赫鲁晓夫完全相反。赫鲁晓夫主要致力于经济体制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几乎无建树可言；更重要的区别是赫鲁晓夫的改革是用官僚反对官僚——即用技术官僚取代政治官僚，他没有试图以民主政治（这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去取代官僚政治（这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的异化状态）。这两条是赫鲁晓夫失败的主要原因。

纳吉是在匈牙利面临着深刻政治危机时主持政府工作的，他当然只能从政治体制的改革着手而无暇顾及经济体制改革；第二，纳吉的改革一开始就由人民参与，可以说是政治家与人民携手并进，甚至还可以说是被动于人民的政治热情和政治愿望。

在这主要两点上，纳吉与赫鲁晓夫完全不同，然而他们的结局却是相同的——赫鲁晓夫失败了，纳吉也失败了。

我们绝无责备人民的意思，我们绝不认为政治——尤其是社会主义政治，只是政治家的事；我们绝不相信没有全社会的关切、参与，社会主义的改革就可以成功。

我们要说的是：在1956年，匈牙利人民所爆发出来的更多的是狂热，却很少理智；更多是对过去的仇恨与报复，却很少对未来的思考。它不象10年以后，由捷克斯伐克全民族发起的那场伟大的改革运动。那一次，捷克斯洛伐克人不仅满怀热情，而且还体现出一个民族的智慧和意志，表现出经过几十年痛苦思索的成熟。这些，在1956年的匈牙利人身上是不够的。

这是历史的局限，也是纳吉的不幸，他被人民的狂热推去攻打历史，却没有坚固的后方阵地，没有精心策划的作战部署。他只能前进，只能冲上去……

他取消了国家保安局，他改组了武装力量。这些都没有关系，尽管会发生一些混乱，但人民最终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护社会的安定。

他彻底改组了政府。这是应该的，让那些与人民对立、被人民憎恨的人退下去，让一些人民信任的人站出来。

他直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中立。问题出现了：在那个夸大阶级斗争的年代，

在那个不是朋友便是敌人的口号下，这一举动无疑使纳吉成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成了匈牙利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证据，成了邀请苏联出兵干预的堂而皇之的理由。然而，在今天看来，不入伙、不结盟照样可以干社会主义。道理就这么简单。

纳吉直布了取消一党制。问题严重了，这无疑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取消了社会主义。当时，即使在同情匈牙利事件、赞同纳吉的许多的共产党人中，都认为这是纳吉对反动派的让步，认为纳吉走得太远了。

这个问题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复杂的。今天，只有欧洲共产主义者才承认纳吉在1956年实行的、在多党合作的基础上成立社会主义政府的可能性。我们暂时还说不清楚这个问题。现在能说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从来没有说过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是一党制；我们还能说的是，接任纳吉的匈共领导人卡达尔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说过“如果当时保留了多党制那就好了”。

为什么好？因为取消多党制不仅对反对意见，连不同意见都不能容忍了。党内生活只剩下千篇一律的赞同，这对社会主义政治的毒害可以说是致命的。

纳吉在人民政治热情的驱使下所采取的这些改革措施，到底应该如何评价，也是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我们只能说，即使这些措施是社会主义的，也是1956年的历史所难以接受的社会主义。

我们说这些并不是要证明人民是盲目的，纳吉是清醒的，也并不证明纳吉超越了历史，超越了他的人民。纳吉最后几天所采取的重大行动不能不归之于人民的愿望和敦促。这就是匈牙利人民在短暂的狂热和混乱之后，所作的对未来的思考和选择。

这也是1956年的另一个事实。在这里，我们特别是提一下匈牙利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工人委员会在匈牙利事件中的作用。

十四

几十万人的自发行动难免有狂热、有盲目、有混乱。但人民终于找到了表达自己力量和意志的形式——工人委员会。

我们已经说过，在匈牙利事件中，行动的主力是工人阶级。这种状况即使在11月4日以后的好几个星期中也是这样。

纳吉政府被推翻了，新政权的领导并没有立即回到布达佩斯。这时，在匈牙利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各革命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实际上领导着人民——组织反抗运动，与苏军

进行谈判。11月上旬，中央工人委员会成立，同时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总罢工，直到苏联军队完全撤离为止。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央工人委员会进行了公开的、有效的活动。它直接参与政府的政治事务，并以主人身份跟苏军接触。一些重大会议也通知政府和苏军总司令部的人列席，以向他们宣布表达了工人阶级意志的重大决议。

新成立的工农革命政府曾同意工人委员会和各革命委员会作为政治协商组织，帮助政府工作。

11月23日，不少苏军高级军官被请到中央工人委员会参加会议。这天是匈牙利事件一个月纪念日。

下午4时，中央工人委员会主席山多尔·拉茨突然站起身来向全场宣布：

“从现在开始，一小时内，人们在首都大街上将看不到任何活的灵魂。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纪念我们那些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阵亡的殉难者。我们在座的所有人要静默一分钟。”

这是匈牙利工人阶级的觉悟、尊严和力量的体现，它迫使苏联军官承认了匈牙利工人阶级的权威。

苏联军官也和工人一样站起，唱匈牙利国歌，并同样脱帽向一个月前死于暴乱的牺牲者致哀。

苏联军队承认了工人委员会是真正的工人组织。苏军总指挥部甚至还给工人委员发放了允许携带武器的通行证。

12月初，当在南斯拉夫使馆避难的纳吉走出使馆并被苏军劫持后，中央工人委员会曾指示所有的工厂，在纳吉返回之前实行总罢工。当时，所有的工业部门都停止了生产。连机关、学校、服务行业也关闭了。

要说明的是，这些工人委员会的组成完全是自发的，它的领导成员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在1956年底，工人委员会确实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难道不是10月的成果？不是用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

遗憾的是，这一民主形式只存在了一个多月。

1956年12月6日，中央工人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被请到苏军总部。还是那位逮捕了国防部长的苏联将军谢洛夫宣布了他的命令：“该结束了。你们不要再向我们提出任何过份的要求，也不要无限期地延长罢工。你们应该为我允许你们重新离开这间房子而感到高兴。”

12月8日，政府明令取缔各类工人委员会、革命委员会。

12月9日，中央工人委员会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它的一些由匈牙利所有工厂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领导人也在家中被捕。

工人没有屈服，作为回答，已被取缔的中央工人委员会于12月11日宣布举行全国新的总罢工。

12月中旬，工人、群众在与政府的对抗中发生了武装冲突。这结果是更多的工人领袖遭到逮捕；同时对纳吉的个人命运产生了悲剧性影响。

作为一个新政权，为了尽快恢复秩序，尽快恢复濒临崩溃的经济生活，而对动乱诉诸武力，或许可以理解。但我们不同意说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除此别无选择；而如果要给这种镇压打出捍卫社会主义的幌子，要给工人委员会安上被反革命分子利用、按反革命的指示行动的罪名——这几乎成一切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国家压制民主的通用理由——则让人更难接受了。

南共领导人卡德尔在1956年底就为匈牙利事件中的工人阶级作过辩护。

卡德尔说：“硬说工人阶级在获得自己胜利的11年后，跟着反革命跑了，这难道会使社会主义的良心感到安慰吗？即使我们假定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毕竟还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应该对工人阶级使用大棒呢，还是应该对把工人阶级弄到使它不得不起来反对自己的历史利益这种荒谬地步的政治制度使用大棒。”

为了恢复秩序，为了拯救社会主义而必须诉诸武力——甚至是外国武力。这是匈牙利事件自始至终所遵循的逻辑。可是人们忽视了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恢复的是旧秩序呢？如果挽救的是他们正在批判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呢？那么匈牙利付出的代价就不仅仅是镇压中的流血和死亡了。

这一点不幸被事实证明了。

历史刚跨入1957年，新的政治恐怖又笼罩着布达佩斯。

1957年元月19日，“一夜之间在布达佩斯逮捕了2000多人，其中有著名作家、工人领袖和党内受尊敬的异议人士。”

当天夜里，在福乌察监狱的大院内进行了屠杀。

这次镇压的结果是20万匈牙利人——绝大多数是青年离开了匈牙利，这在人民中造成了“一种恐怖心理，好象虽然没有了拉科西，但新的拉科西时代重新在匈牙利出现”。

这就是匈牙利付出的代价。

假设匈牙利人在1956年作另一种选择：让工人阶级和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政治、运用民主权力呢？很可能他们会犯一些错误——政治家不犯错误吗？——会在初期出现一些混乱，造成一些损失，但我们能不能指望他们迅速成熟并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呢？

谁也不应该作否定的回答——如果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如果他愿意相信一个阶级的力显、一个民族的智慧的话。

如果可以肯定这种回答，那么我们要再一次说：不愿为民主付出代价，便会为专制付出更大的代价。数千人被捕被杀，数十万人逃离祖国，证明了这个真理；纳吉的悲剧结局也证明了这个真理。

十五

纳吉被判处绞刑。当这次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的处决执行时，这位中欧的伟大政治家为所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人留下了一声既痛心又费解的呼声：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11月4日，纳吉和他的41名政府要员及家属，刚躲进南斯拉夫大使馆，苏联的坦克装甲车便包围了使馆大楼。

避难者和大使馆都经历着难以形容的困难。苏联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要他们交出纳吉；大使馆受到机枪射击，有外交官被打死；“难民”的治病、吃饭成了问题。

匈牙利新政府对纳吉的态度比较宽厚和矛盾；有人建议同纳吉谈判，有人则认为不妨让纳吉去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党。

纳吉等人在大使馆内渡过了17天后，由于南斯拉夫的多方调解、谈判，匈牙利政府终于在11月21日致函南斯拉夫政府，表示匈牙利新政权“不想就纳吉和他的集团的成员过

去所做的事实行惩处，”“他们将自行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并自由地返回自己的家……”

南斯拉夫和纳吉都接受了这一条件。

11月22日，也就是在匈牙利政府发出保证的第二天，匈牙利政府派出一辆公共汽车接这些难民回家。车刚开出了大使馆，就被苏联装甲车包围。

苏联军官闯入车内，将两名监督执行这一协议的南斯拉夫外交官拉出车外。

在苏联坦克的监护下，这辆公共汽车开到了苏军总司令部。纳吉和他的朋友拒绝下车，但被强行拉出来。难民中的妇女孩子也遭到同样对待，吓得直叫。

第二天，新闻界发表一条消息说，纳吉和他的朋友“根据自己的要求”去了罗马尼亚共和国。

纳吉被劫持的消息使全国为之震惊，中央工人委员会向全国所有工厂发出号召，实行总罢工，直至纳吉回来；同时，中央工人委员会就纳吉的安全向新政府提出质询。

11月26日，政府通过电台答复：“我们说过，对纳吉和他的朋友们的言行不予法律追究……我们将遵守这一诺言，我们不认为他们的外出是永久性的。”

然而，人民的支持和政府的保证都未能挽救纳吉的命运。

在罗马尼亚，纳吉和他的同志们受到了审讯。他们被要求承认13天的政权是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这是他们返回匈牙利的条件。

纳吉拒绝了这场交易，并断然否认了指责他的任何罪名。

于是一天早晨，这位政府首脑被拷上手铐，带进一架苏联军用飞机。机舱内，他的部长们已经坐在那儿，也戴着手铐。

纳吉的政府就是这样返回了他们的祖国。

对这位有40年党龄的共产党人、这位社会主义政权的最高领导人、这位对现代社会主义进行改革的政治家的审判开始了。

这是一次历史对人的审判。

审判的另一方也是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法庭；审判是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的。

审判一开始，这两个不同的社会主义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

检察长以庄严、冷峻的声音问了第一句话：“职业？”

纳吉站立起来，扶正他的夹鼻眼镜，平静地说：“匈牙利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检察长愣了一下，大厅里一片沉寂。

此时，历史胆怯了，法律也胆怯了。

庭长拉多轻轻地对不知所措的书记员说：“前部长会议主席。”

纳吉立即给予反驳，但声音依然是平静的。

“不，据我所知，我被任命此职是在1956年10月24日。迄今为止，任何合法机构都没有对此任命提出过异议。”

庭长又问：“被告是否认罪？”

纳吉严厉地问答：“不！我无罪！”

审判台上的人又一次陷入短暂的沉默并且低下了头。

纳吉不象失败者，纳吉不是失败者。

为恢复被玷污的社会主义，他走完了艰难的第一步。

纳吉不仅是改革家、是领袖，也是人们的楷模。无论在政治斗争中，还是此刻在胜利者的法庭上，他都能以政治家的魄力和人格力量为他的部下作出榜样。

紧接着是对国防部长帕尔·马勒特尔的审判。

“职业？”

“国民军总监，匈牙利共和国国防部长。”

“前国防部长。”

“不，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从未撤过我的职。”

纳吉证实了这一点。这位年轻的战士与他的年老的总理相视微笑了。

他们相互从对方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气节，还有深深的理解——他们在此刻依然为之奋斗的，当然已不是职权和地位。

这是最后的斗争，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斗争。革命死了，信念长存！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审判的时间并不长，这场喜剧的导演在这位伟大的政治家面前是那样的难以确立自信，以至不得不草草收场。

纳吉被判处绞刑。

纳吉用沉默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当庭长问：“被告伊姆雷·纳吉，您想提出赦免申请吗？”

纳吉只说了一个字：“不！”

他年轻的国防部长帕尔·马勒特尔也作了同样的回答。

生命已经显示过自己的价值，已经辉煌地完成了它的人生旅程。失去它已经没有任何遗憾。

使纳吉遗憾和牵挂的只是社会主义的命运。

1958年6月14日，纳吉在最后一次审判时，留下了他最后的政治遗言。

纳吉说：“我曾两次努力在我国维持社会主义这个词的荣誉，那是1953年和1956年。第一次时，拉科西出来反对我；第二次时，反对我的则是苏联的整个武装力量。在这个由热情和仇恨构成的诉讼中，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愿意奉献它……我相信，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只有一点是违背我的意愿的——将来由杀害我的人来替我平反昭雪。”

两天以后——1958年6月16日，星期一早晨，太阳还没有出来——这一天太阳还会出来吗？！在布达佩斯中央监狱的小拘留所院内，伊姆雷·纳吉总理、他的国防部长帕尔·马勒特尔和记者米克洛什·基迈什被送上了统架。

当这次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的绞刑执行时，当绞索还未最后绞断这被称为社会主义敌人的声音时，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为所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人留下了一声既痛心又费解的呼喊：

“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禁书网制作

翻墙去禁书网www.bannedbook.org可下载更多禁书



毁于领袖权力的波兰改革——哥穆尔卡的悲剧

一

这是一幕悲剧——主人公在前半场是英雄，后半场却成为历史的罪人……

在政治舞台上，我们常常看到许多政治家，出场时是英才，闭幕时是昏庸；前半场是伟人，后半场是罪人；序幕中是高尚，落幕时是腐败……

权力是政治家面前的一个巨大的陷阱，是所有政治伟人都无法逃避的劫难。

铁托说过，对于政治家来说，政治死亡甚至比肉体死亡更可怕。

是的，在政治舞台上，没有比在权力腐蚀下僵化、直至政治生命死亡更深刻的悲剧了……

我们将展现一幕这样的悲剧。

这出悲剧发生在波兰；剧中的主人公是哥穆尔卡——

二

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给波兰带来了骚动和混乱；于是，波兰政府便用坦克和子弹来平息动乱；于是，就有了一个政治伟人的出场……

如果界定一个政治伟人的标准不仅仅是他所代表的国家的大小，而应该是指恢宏的天才、渊博的知识、钢铁般的意志、崇高的信仰以及对民族苦难的深深忧虑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的话，那么在1956年，哥穆尔卡是有资格被确认为政治伟人的。

1956年10月，波共八届二中全会，决定选举波共前领导人哥穆尔卡为党的第一书记

记。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因为哥穆尔卡，于1949年因“右倾民族主义”的罪名而被开除出党，1951年与妻子一起被捕入狱。

此时——1956年10月，他刚刚走出监狱一年多的时间。

波共为什么会作出如此令人惊讶的决定？只要看看1956年的波兰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能理解，哥穆尔卡是被推举出来干什么的？

1956年是共产世界的第一个大灾年——在赫鲁晓夫于2月份抛出了那个著名的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这个世界在震惊的眩晕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骚动和混乱：

——在匈牙利，惩罚旧的罪恶、争取民主开放的运动，已经发展到不仅当局无法控制、而且历史也无法接受的地步。到十月，苏联出兵的威胁已迫在眉睫……

——在波兰，也有同样的危机——来自民众方面的改革要求有力地冲击着旧的政治秩序，其激烈程度已经使旧的统治方式到了无法持续的地步；到了1956年夏天，这场危机终于演变成一场流血的动乱……

1956年6月，波兰西部工业城市波兹南的斯大林机车厂的工人，在要求增加工资、减少税收的经济要求被厂方和地方当局拒绝后，便委派了30名代表前往华沙，直接向机械工业部部长呼吁。

在华沙，工人的要求同样没有得到重视。于是代表们强硬的表示，如果工人提出的这些问题不能在月底前得到解决，工人将举行罢工！

部长的回答更加强硬：“如果你们上街的话，你们将遇到坦克！”

消息传回波兹南，还没有等30名乘火车返回的代表回到波兹南，愤怒的一万六千名工人便放下工作向市中心出发，举行和平示威。

在向市中心的途中，不少群众加入游行队伍，示威者增加到十万人。

开始，示威是有秩序进行的。来到市政府广场，示威群众派出一个代表团要求市政当局接见。

当局拒绝会见。此时，在本来已经愤怒的群众中有了这样的传闻：30名去华沙的代

表已被公安部门逮捕了！

示威群众的情绪开始骚动，一些出过激的口号出现在人群中：

“打倒秘密警察！”

“我们要面包和自由！”

“俄国佬滚回去！”

“释放政治犯！”

纪律失去了，理智失去了。请愿变成了骚乱——一些人袭击了市政府，一些人攻打了监狱……

警察开了枪，工人从民兵武器库夺得武器，将汽车推翻作为街垒与公安人员展开了枪战。

华沙政府派来了坦克和保安部队……

人民波兰第一个流血的悲剧发生了——1956年6月28日，仅仅一天的冲突骚乱，就有54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另有300多人被捕。

波兰工人阶级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领教了来自自己政权的教训……

悲剧发生的当天，政府发表公报说：“敌人的特务分子今天做到了挑起街头的骚动……这次动乱是一次广泛的、精心准备的挑衅和颠覆活动，它的肇事者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

第二天，政府总理发表了强硬的广播讲话：“我们可以明白的告诉每一个胆敢举手反对人民政权的挑拨分子或神经失常的人，他们的手将被砍断。”

尽管有如此残酷的镇压和如此强硬的警告，波兰政府并没有消除社会危机，反而使自己陷入了更深刻的政权危机——对发生这个悲剧的责任追究，使波共上层领导产生了分歧，并迫使它进行检讨、承担责任。

波兰工人阶级是以流血、死亡为代价才迫使波共作出了对领导人的重新选择的。

这次选择的结果是，哥穆尔卡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

三

在两个重量级的政治强人的对抗中，赫鲁晓夫妥协了——弱小的波兰依靠哥穆尔卡的巨大政治魄力，战胜了强大的俄罗斯帝国。

哥穆尔卡在1956年重返政坛，很具有这类国家那种普遍的、很富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当这类国家遇到危机时，党和人民没有去呼唤正在掌权的、因而也肯定是伟大、正确的现领导人，而常常是寄希望于那些因犯了严重错误甚至罪行而被开除或被监禁的前领导人；还有，在这类国家，真正能在政治上建立丰功伟绩的，不是那些长时间控制着政权，因而也肯定是最有权势领导人，而是那些经历过重大挫折、在荣辱、功罪中有过多次沉浮的共产党人。

哥穆尔卡接受了党和人民的重托，决定担负起这付连那些终生以追逐权力为己任的人都不敢承担的历史重负……

对个人的冤屈，他没有过多的计较，只是平静而严肃的问了一句：“你们保证今后不会再把共产党人投入监狱吗？”

哥穆尔卡没有辜负历史的厚望。他的第一个回合，就击败了那个强大邻国的政治强人赫鲁晓夫——

1956年10月19日，波共中央二届八中全会召开，全会提名哥穆尔卡为波共第一书记候选人，同时接受了政治局12名委员、3名候补委员向全会提出的集体辞职。

就在全会准备产生新的政治局时，会议主持人突然宣布了苏联共产党代表团飞抵华沙的消息，建议全会暂时休会，立即组成波共代表团去机场迎接苏共代表团并进行谈判。

苏共代表团是由赫鲁晓夫率领的。这是一个阵容庞大的代表团，它包括了苏联党、政、军各界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华沙条约司令科涅夫元帅、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还有10位陆军上将。

这是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传统——以高层领导的集体力量来形成威慑力。

赫鲁晓夫同时还带来了强烈的愤怒，因为波共竟然没有得到苏联的批准就要对党的最高领导作如此重大的改变；还有，他曾给波共发过一封电报，说他愿意作为一个客人

参加波共八中全会，但被波共拒绝了。

这个庞大的代表团不是波共邀请的，他们只是在启程之后，才致电波兰，说苏共代表团正在飞赴华沙途中。

这些不速之客飞抵华沙时，机场指挥塔还没有接到让这架图-104飞机降落的命令。飞机在华沙上空盘旋了将近一个小时，一直到飞行员声称“油已耗尽”，才被波兰方面允许着陆。

十分暴躁的赫鲁晓夫，本来就窝着一肚子怒火，现在就更加愤怒了。

一走下舷梯，赫鲁晓夫就对前来迎接的波共领导人咆哮起来：

“我们为这个国家流过我们的血，而现在，他们却试图把它出卖给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这办不到，绝对办不到！”

迎接他的波兰人中，有一位对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我提醒你，你是在波兰领土上说话；而且我们比你们流了更多的血！”

赫鲁晓夫直瞪瞪地盯着这个敢于冒犯他的男人，问道：

“他是谁？”

“我是哥穆尔卡，我曾经被你们在监狱里关了三年。”

赫鲁晓夫仍然不愿意和哥穆尔卡说话。又问别人：

“他在这里干什么？”

赫鲁晓夫得到的回答是：“他来这里，是因为我们决定选他为波共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要求将他的代表团直接送到正在召开的波共二届八中全会会场。哥穆尔卡坚决拒绝赫鲁晓夫参加他们的全会。

赫鲁晓夫遇到了一个强硬的对手。

为了使这个波共新领导人就范，赫鲁晓夫一面与波共领导人会谈，企图影响波共全会的组织和政治路线，同时调动了三个纵队的坦克部队向华沙挺进。

哥穆尔卡没有在武力讹诈下退让。他镇定而严厉地告诉赫鲁晓夫：“除非军队马上撤离，否则我们要马上离开这里。我要通过电台向人民讲话，通知他们所面临的局势！”

大学生和工人知道了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预，他们自动地聚集在双方领导人会谈的贝尔凡尔宫外，声援哥穆尔卡及波兰代表团；华沙地区16个大型企业的工人还自动组成民兵队伍，严密监视苏军进入华沙的动向，准备在发生武装干涉时进行抵抗。

赫鲁晓夫妥协了。他看出哥穆尔卡和他身后的波兰民族是有勇气对抗到底的。

哥穆尔卡用不眨眼睛的斗争，赢得了与共产世界最高首脑的对抗。

弱小的波兰依靠哥穆尔卡的巨大政治魄力战胜了强大的俄罗斯帝国。

四

与赫鲁晓夫的较量充分显示了哥穆尔卡的意志力量，而为“波兹南事件”平反则表明：哥穆尔卡确实具有一位政治伟人所应有的社会良心和政治魄力。

自1795年俄国兼并了波兰以后，没有一个俄国皇帝不为波兰问题头疼；而所有俄罗斯帝王又都是用武力来医治这种头疼的。因此，几百年来，俄罗斯帝国一直是压在波兰身上的巨石，而波兰也是俄罗斯帝国的附属国中，最桀骜不驯的一个——每次都得通过武力才能把它拉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

然而这一次，历代沙皇非常成功运用过的手段，在赫鲁晓夫手里失去了作用。所以，我们可以说，哥穆尔卡击败的不仅仅是赫鲁晓夫的武力恫吓，而是俄罗斯帝国几百年来霸权威胁。

苏、波两党的会谈几乎持续了一整夜，第二天，当赫鲁晓夫带着他的代表团离开波兰时，他已经学会非常友好的与哥穆尔卡交谈了。

哥穆尔卡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和毫不动摇的政治信念赢得了赫鲁晓夫的承认和尊重。

哥穆尔卡就是带着这样的胜利和人民对他的支持，回过头来处理棘手的国内问题的。

哥穆尔卡在国内事务中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给1956年6月28日的“波兹南事件”平反。

如果说与赫鲁晓夫的较量充分显示了哥穆尔卡的意志力量的话，为波兹南事件平反则表明，哥穆尔卡确实具有一位政治伟人所应有的社会良心和政治魄力。

在正式当选为第一书记的当天晚上，哥穆尔卡就发表了为波兹南事件平反的著名讲话，他说：

“当波兹南工人走向街头的时候，他们不是反对人民波兰，不是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反对的是那些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广泛滋生并深深触动了他们的邪恶、腐败。他们反对的是对他们的理想——社会主义原则的歪曲……”

在这次全会上，哥穆尔卡还把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官僚主义作为一个政权好坏的标志。

他说：

“……失去了工人阶级的信任就是丧失执行权力的理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治理国家，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坏政府，因为它必然要依靠官僚主义，必然要依靠破坏法制和暴力……要是行使权力的特权和这种受崇拜的权力落到一个心胸狭窄的人手里，落到只会机械地执行命令的人手里，或者落到腐败的野心家的手里，那就更糟了。这些人将会轻率地、然而却是有效地为埋葬社会主义挖掘坟墓。”

在50年代对斯大林模式的政治批判中，有哪一位政治家能具有哥穆尔卡的勇气和深度？甚至在以后的年代、乃至今天，哥穆尔卡对官僚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工人阶级政治权力的呼唤，仍然十分遗憾地具有现实意义。

哥穆尔卡以无与伦比的政治家的魅力，仅仅用两天的时间就征服了整个波兰。他获得了党内和全国人民的巨大支持……

五

哥穆尔卡在50年代所进行的政治改革，会让期盼着社会主义改革的当代人，感到羡慕吗？

苏共代表团离开波兰后，八中全会继续召开。哥穆尔卡发表了一个长达六个半小时的讲话，对原政治体制中的弊端进行了尖锐地批评。他说：我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官僚主义之上的，建筑在违反法制的做法之上，建筑在暴力之上的”；哥穆尔卡指出“民主化道路是建设最好形式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

在这次向全国广播直播的讲话中，哥穆尔卡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改革思想；并在全会以后的政治实践中推行了自己的政治改革——

批判个人崇拜，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核实政治恐怖时代的政治罪恶并给受害者平反昭雪。哥穆尔卡要求“这个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应当最后结束波兰版贝利亚主义在党内、国内的活动……”；

加强了同农民党和民主党的合作，成立了三党中央委员会。哥穆尔卡强调“波兰的政治领导权不是由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共）单独来执行的……”；

哥穆尔卡将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视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保证，他对党严重的脱离劳动人民行了尖锐地批评。他说：

“没有工人阶级的支持，我们每个人事实上除了自己外谁也代表不了。”

因此，哥穆尔卡在此次全会上提出建立“工人委员会”，实行工人自治，以制止企业的官僚主义。哥穆尔卡说：“工人委员会是这样一种机构：工人阶级通过它直接地参加国民经济的管理。”

为“工人委员会”的权限立法：“工人委员会以集体的名义管理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

这些权限包括——

制订企业计划，确定企业发展方向；

监督企业行政领导，对企业活动作出评价；

参与企业分配计划的制定；

规定劳动定额，确定工资等级和企业的奖罚制度；

工人委员会由企业职工直接选举产生……

……

即使在今天，扩大工人阶级在政治、经济事物中的权限，也不失为社会主义改革的

重要问题。

削弱中央集权，扩大国企的自主权是这类改革都走过的路，很少有人非议；但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关问题却被人忽视了：扩大了国企自主权是交给职工，还是仅仅由厂长经理把持？

作为社会主义改革，这本来不是问题，然而遗憾的是，许多改革设计，恰恰忽视了改革的社会主义前提，而将国有企业交给一些官僚——以前是靠作政治思想工作起家的政治官僚；后来是具有理工科学历的技术官僚……其后果在开始的中国和以后的俄国都非常相似的凸现出来——那就是无法无天的腐败和无法无天地对公共财产的掠夺……

哥穆尔卡在50年代的尝试无疑是超前的。

哥穆尔卡的政治体制改革，比较重要的另一笔，是将权力中心从庞大的官僚行政机构，转移到以往被称为“橡皮图章”的议会，使议会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政治上真正得到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地位。

为此哥穆尔卡对国会议员的选举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全国普选，候选人可以超过当选议员的50%，实行差额选举。哥穆尔卡说：“选举应该使人民作出选择而不仅仅是投票。”

1957年初，举行了以各党派为竞选单位的国家第二届议会选举。在这次有一千六百万选民参加的大选中，投票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农民党、民主党和无党派人士在458名国会议员中，获得220个席位，几乎接近半数；统一农民党领袖还被选为议会议长。

将权力重心向议会转移，而议员又通过全民普选产生，这是国家政治权力社会化的重要步骤，因此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说，这种扩大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前提。

六

哥穆尔卡不仅有进行政治改革魄力，还具有深受人民爱戴的人格魅力，波兰人民对领袖的选择是无可挑剔的……

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哥穆尔卡具有特别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同时，他还具有托洛茨基那样的演说天才。波共前领导人、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杨·普塔辛斯基曾经这样描写过哥穆尔卡在政治活动中的魅力：

哥穆尔卡具有清晰地表述思想的天赋，善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打动人们的心弦，唤起人们的理智。我们屏息着呼吸，聚精会神地倾听他的讲话，赞同他的讲话。这时会场出现了一个没有导演的场面，人们自发的欢呼着他的名字：维—斯—瓦—夫！维—斯—瓦—夫！这里没有任何一点制造个人迷信气氛的意图，这是党对自己的领袖尊敬和信任的表现，是党同自己的领袖团结一致的表现……

我们不能把这种描写看作是对领袖人物的溢美之词，因为在作者写下这段文字时，哥穆尔卡早已失去了政治权力，并且已经告别了人世。

当然这只是一个政治家对另一个政治家的评价，是政治家的标准；那么民众的标准呢？

哥穆尔卡对民众也同样具有魅力——他谦虚，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即使已经当上了最高领导人，他还是不愿意要一大堆侍从和仆人。在旅途中，他会在火车上、飞机上突然打开公文包，拿出他的夫人索菲亚给他准备的夹肉面包，把它吃掉……

很少有哪位政治家得到过哥穆尔卡从人民中得到得到的那种真实的衷心爱戴——

1956年底，在华沙的一个最大的广场上，哥穆尔卡以党的领袖身份与首都人民见面，并作了讲话。

讲话结束后，群众不是象以往那样爆出掌声和呼喊口号。几万人的会场一片沉静。

突然间，群众中有一个人放声唱出《祝他长命百岁》……

这是一首波兰民歌，它是在家庭的节日里用来祝福亲人的。

会议组织者紧张起来——为刚才的沉静和现在这首不应该在这种场合唱的歌——组织者是准备以掌声和事先规定好的口号来欢迎新领袖的……

一瞬间，许多声音加入进来，歌声越来越大，几万个声音汇成一片……

人民在告诉哥穆尔卡，他们不单把他看作一个政治家，一个国家领导人，而且还将他看作自己的兄弟、朋友，看作是他们的亲人……

哥穆尔卡先是对这种祝福方式感到意外，紧接着，他深深感动了，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眶……

那一刻，哥穆尔卡能不发出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决心吗？一个政治家难道能忘记这样的时刻吗？

在哥穆尔卡执政的头两年里，他的政绩是令人振奋的——

限制了安全警察的权力；

放宽了书、报检查；停止了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

对天主教采取了温和态度；

对国家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要求在党内建立民主机构；

要求把中央控制的经济体制改变为企业自治；

要求发展一种开放的马克思主义……

哥穆尔卡在1956年所实行的这些社会主义改革，即时在今天看来，也是大胆的、令人羡慕的。

哥穆尔卡所掀起的强劲的改革浪潮，给波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波兰人民把这次改革称为“十月里的春天”。

七

当社会的发展完全依赖于领袖的明智，当制度的运转依赖于领袖的个人权力时，领袖和社会两方面的悲剧就要拉开序幕了……

这是靠领袖的明智和个人力量而取得了巨大社会进步的典范。

然而，这又是一种很难巩固的社会进步；历史最终所记录下来的50年代的波兰改革，是一个悲剧性结局——从某种意义上讲，哥穆尔卡的改革生涯比匈牙利的纳吉更具有悲剧色彩。

哥穆尔卡的改革只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当被他本人释放出来的民主力量，最终危

及到波共的领导地位时，哥穆尔卡动摇了，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待工人委员会的态度——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工人委员会开始与工厂的行政领导、继而与波共和中央行政机关的矛盾便尖锐起来。于是要求限制工人委员会权限的呼声也随之而起。

哥穆尔卡在内外压力下妥协了，对保护工人委员会权益的法律作出重大修改——

将工人委员会改为“工人自治代表会议”，并且由“工人委员会”“工会委员会”和“党组织”的三方代表组成；同时将其的权力局限在“协调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关系”上。

仅仅两年时间，哥穆尔卡曾经积极抵制的官僚主义便在各级政权机构中复活了，国家的政治民主生活又重新趋于凋零。改革停顿下来了，因为哥穆尔卡“害怕党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1958年，官僚主义又重新得到了巩固，一切民主化措施停止了，精神生活重新受到禁锢”（《欧洲共产主义》）。

哥穆尔卡的堕落是全面的——

这位曾经让莫斯科敬畏的波兰领袖说过，为了“维护波兰的民族利益，必要时要不顾苏联的反对”；可后来却把自己的国家用链条牢靠地与他的老大哥拴在一起，而支持来自莫斯科的任何倡议：

——1958年，当匈牙利的改革家纳吉被处以绞刑时，哥穆尔卡按着苏联定下的调子谴责了纳吉的修正主义反革命罪行；

——1968年，哥穆尔卡的政治生命已经衰老，他完全陶醉在自己的权力之中，对此时发生在邻国的“布拉格之春”不仅不能理解，而且不断地在公开的演说中对“布拉格之春”进行恶毒攻击；当然，他反对“布拉格之春”，还因为他个人的专制统治也面临着与捷克斯洛伐克旧政权相同、甚至更深的危机，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改革浪潮正迅速地向他的王国蔓延过来。

在1968年，哥穆尔卡的对民主的仇恨已经到了如此程度，他不断地给勃列日涅夫施加压力，要求对“布拉格之春”进行军事干预。勃列日涅夫敢于冒天下之大不违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和这位老资格的东欧政治家的支持、纵容分不开的。

.....

对哥穆尔卡改革生涯的悲剧性结局，普遍的解释是，在国内受到“左派”，即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在国际上，则是匈牙利事件后，由于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加强，而使整个社

会主义改革事业全面倒退所至……

但我们却宁愿相信，这个悲剧的是产生，在波兰人民方面，是历史局限：在50年代，人民的政治参与，更多的还只是争取领导者的政治许诺，以及寄希望于领导者的善意和明智；波兰人是等了20年后，才认识到，将政治家的承诺和改革中取得的民主权力迅速的法律化，并拼死捍卫这些法律的权威性和一贯性是多么重要！

在哥穆尔卡方面，这个错误却是这类制度的最高领导人必然要走的路——当整个政权的各级官员都对领袖的权力表示出绝对的屈从和绝对的赞美时，他不再可能对自己运用权力的正确性和合法性保持谨慎态度和检讨精神了……

在50年代，哥穆尔卡和波兰人民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一切的进步都是依靠领袖的个人权力取得的。他们没有认识到，政治权力社会化虽然走出第一步，但距能得到宪法的保证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他们没有注意到，在削弱警察力量和官僚主义机构的同时，领袖的个人权力却加强了……

正因为出现了哥穆尔卡这样杰出的政治家，社会在得到了国家的一些政治让步之后，便放弃了对权力的警惕和监督，而把一切都交给了他们所能信任的领袖。

人性中的最大弱点，便是相信别人对自己的肯定评价。登上了权力之巅的哥穆尔卡只可能听到一种声音——颂扬。

哥穆尔卡很快就相信了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因此他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坚持用手中的权力为波兰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作出决定……

哥穆尔卡的政治权力的绝对化，必然使他依赖于照章办事、唯命是从的官僚政治。

绝对的权力对哥穆尔卡的腐蚀是那样的有力、迅速。

八

为了证明权力能使政治家成为伟人，也能使其成为罪人，历史把一个完全相同的“波兹南事件”，放到哥穆尔卡面前——从而给这个已经彻底堕落了的政治伟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哥穆尔卡在“布拉格之春”中所扮演的那个不光彩的角色，还不是这出悲剧的高潮——权力对哥穆尔卡的彻底毁灭是在14年后的1970年。

历史恶作剧似的让已经僵化了的哥穆尔卡重新回到使他成为伟人的那个起点上，而把又一个“波兹南事件”原封不动地放在面前。

历史要用同一件事来证明这两个不同的哥穆尔卡有多么大的差别。

或许，历史已经无需对此时的哥穆尔卡进行考验了，她几乎只是为了证明权力能使政治家成为伟人，也能使其成为罪人；或者，她只是恶作剧式地为哥穆尔卡唱了一首政治死亡的挽歌——

1970年12月13日，波共机关报刊登了部长会议关于改变一系列商品价格的决议。这个决议宣布，将肉和肉制品提高17%，面粉10%，食油33%。

决议还对价格调整作了详细的、理由充分的说明，并宣布对电视机、电冰箱、人造纺织品、食品罐头等商品降价8-40%。

政府是谨慎的。

为了配合这种谨慎，这一天的波共机关报《人民论坛报》报道了拉多姆地区举行“铸造工人节”的庆祝活动，刊登了大会写给哥穆尔卡的效忠信：“书记同志，我们向您作出保证，久经考验的铸造工人将全力以赴地贯彻党和政府提出的纲领。”

非常遗憾的是，政府没能准确的感受的在这种表面的、由大会组织者和新闻部门编撰的豪言壮语背后，所隐藏着的不满和危机。

波兰工人对政府鼓励他们把更多的钱化在降了价的冰箱、电视机上表示不满。他们有一笔帐：他们无需经常买电视机，却要每天买食品。一般工人用在食品上的开支本来就占45%以上；眼前又恰恰是圣诞节前夕——就凭选这么一个时刻调价，就能证明政府对劳动人民的关心是多么虚伪；当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替工人算了另一笔帐：这次涨价，政府将从人民的钱包里拿走二亿多美元……

尽管工人被说服过，说这些钱是用来减轻政府不堪负担的食品津贴的，说这些食品按西方的标准是非常低廉的。

但工人们却认为，这类津贴早就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了，所以他们的劳动收入才比西方工人低得多——政府哪来的补贴钱？再说，既然国家遇到了危机，为什么从来没有向工人阶级报告过？（恰恰相反，他们以往听到的全是辉煌成就）这次要工人作出牺牲，也没有事先跟他们商量一下——工人阶级不是国家的主人吗？

1970年12月14日，星期一，这是宣布决议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在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的一群工人，上午离开了工作单位，来到厂部办公楼前，对商品涨价表示了抗议。

厂方当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满不在乎，因为他们对食品涨价是不负任何责任的。

工人决定向格坦斯克省委进军，他们越出了厂门。罢工者变成了示威者。

示威工人唱起了国际歌和波兰国歌。

唱这样的歌不犯法，他们有权唱。

当示威队伍走到省委大楼时，已经扩大到一万多人。他们高呼口号——

“我们要面包，不要电视机！”

“我们要求增加工资和发表意见的权力！”

……

在这许多痛快的、多少有点儿感情用事的口号中，却有一条表明了工人的谨慎和不祥的预感。这条口号是：

“我们是工人——不是流氓！”

工人们希望得到这个称号应有的地位和尊重。

然而，工人没有得到他们所要求的；甚至没有得到一次那怕是不成功的对话。

他们被警告说：立即离开现场！紧接着，他们面对的是一道由武装警察组成的警戒线。

最初的枪声响起来了……

九

仅仅因为对政府的某项政策表示了不满，就有45名波兰工被坦克和子弹夺去了生命，一千多工人流了鲜血……◆

仅仅为了要求一次直接的对话，六名工人付出了生命，数十名工人流淌了鲜血……

然而，这仅仅是人民波兰“悲剧的一周”的开端……

这是1956年“波兹南事件”的重复。

把两次重复的历史进行一次比较是有益的。这是另一种意义的纪念碑。

为了让政治家能经常到这样的纪念碑前，读一读历史的训戒，我们仍然把这个重演的悲剧详细地描绘出来——

……工人们唱着国际歌，迎着高压水龙的冲击前进着。格坦斯克的12月是滴水成冰的季节。第二道防线是鸣叫着的的警车和数百名头戴钢盔、手提警棍的警察。他们是敢下手的，他们见人就打。工人们冲过去，用赤手空拳和地上捡来的石头进行搏斗。

最后，他们终于遇到了整齐地排列在大街上的坦克车队。

工人仍有勇气迎上去，有勇气向坦克车伸出拳头，高呼道：“我们是工人，不是流氓！”

然而勇气并不是万能的，他们无法将坦克推回去。坦克开过来，他们一边撤退，一边用身体组成一道防线。

这是不堪一击的防线。

坦克不费力地前进，防线溃散了，游行的队伍也将溃散……此时，绝望的工人决定用肉体进行最后的斗争，许多工人横躺在大街上阻挡坦克。

一位工人被坦克压死了。

人群和坦克都愣了一下，都停了下来。忿怒的工人猛砸着那辆坦克，坦克兵几乎被砸碎了。六名工人抬着用波兰国旗盖着的死难者，高唱着国际歌，继续游行。

人们忿怒地高呼：“看看你们干的勾当！！”

愤怒使已经很少的理智和秩序消失得无影无踪，怒火点燃了建筑物，点燃了警车。

有坦克支援的警察和陆军部队与工人发生了激战。开枪的命令下达了。

只有少数士兵使用了武器，他们朝空中开枪……但警察却毫不留情，对准示威者开枪。而示威者中还有许多妇女和儿童。

也有警察被打死，或被砸昏过去，工人用石头和从警察手中夺得的武器进行绝望地反抗。

人疯狂了，坦克也疯狂了，一切都失去了控制……

那六个抬着死难者的工人也遭到了枪击，他们是在《国际歌》歌声中倒下去的……

一辆坦克从一名妇女和她的女儿身上压过去，目睹着这一惨象，一名年轻的陆军士兵哭了……

……

开枪的命令是哥穆尔卡下达的。

人民曾经为得到了这样的领袖而激动得流过眼泪；14年后，他却让人民流出了鲜血

——

1970年12月，在与军警对抗的工潮中，有45名工人被坦克和子弹夺去了生命，一千多工人流了鲜血……

十

工人以为哥穆尔卡会象14年前那样听听他们的意见，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哥穆尔卡以为有权用坦克来教训自己的人民，也犯了一个错误——他为这个错误而永远地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与一个政权的稳定和权威相比，45个工人的死亡是太微不足道的；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民族死于法西斯暴行的人是这个数字的数万倍。

但这是无法类比的——那是战争时代，这是和平时期；那是被异族的征服者所杀，这是人民的国家流了人民的血……

想到这些被称作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是被他们的代理人、公仆杀死的，想到这些赤

手空拳的死难者是被刺刀、步枪和坦克戕害的，想到下令开枪的人是被他们当成亲人、父亲般爱戴的领袖——那么，即便是45这么个小数字，也足以使人颤栗……

哥穆尔卡没有颤栗。他在悲剧发生后，竟然理直气壮地训斥工人阶级。

他说：

“波兰工人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生活得更好，因此他们没有理由不满意……”

正如泰戈尔所说，“权力认为，牺牲者的痛苦是忘恩负义……”

哥穆尔卡的这番话表明，1970年的哥穆尔卡已经不是一个政治家，甚至不是一个血肉之躯，而仅仅是一个权力标志、或者说仅仅是一个权力符号。

哥穆尔卡接着说：

“工人没有经过多少犹豫就罢工上街了，因为这是他们的国家，不言而喻，国家会对他们采取宽容态度……”

显然，工人认为这是“他们的国家”是个错误；以为哥穆尔卡会对他们采取宽容的态度更是一个错误。

哥穆尔卡在用军队教训了犯错误的工人后，还要用法律来惩办工人……

“12月悲剧”之后，哥穆尔卡采取了进一步的镇压措施——“逮捕了罢工委员会全体成员”；“开除造船厂全体工人，并对职工进行甄别”。

这场悲剧该到尾声了——权力对哥穆尔卡的毁灭最后完成了。

这个结局也同1956年完全一样：不到一周的时间，哥穆尔卡就因对“12月悲剧”承担责任而退出了政治舞台。此时，他年仅68岁。

与哥穆尔卡在1956年一上台就谴责他的前任、并为“波兹南事件”平反一样，接替他的盖莱克，在就任第一书记的当天晚上，就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说最近一周发生的悲剧深深地震惊了整个波兰，说这次事件“沉痛地提醒我们一个真理，党必须始终保持同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密切联系，而不能失掉同劳动人民的共同语言……”

这一次，哥穆尔卡的政治生命再没能复活——尽管他还默默无闻地隐居了12年，于

1982年去世——没有人再提起过他，只有历史默默地记住了他在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丑剧中，所扮演的那个不光彩的配角；以及他在1970年波兰的“12月悲剧”中所扮演过的那个罪恶的主角……

禁书网网友制作

翻墙去禁书网 www.bannedbook.org 可下载更多禁书



被霸权扼杀的春天——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一）

一

捷克斯洛伐克因为她的“布拉格之春”而被五个国家的军队占领了。于是全世界的人都问：什么是“布拉格之春”？捷克人在1968年春天到底得罪谁？

1968年是现代史上的“捷克斯洛伐克年”，这个中欧小国以“布拉格之春”而闻名于世，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明星。

然而“布拉格之春”的开端是默默无声的，它没有震惊世界。当时，阿拉伯与以色列的中东冲突刚刚开始，美国人在越南的危机还没有结束；还有，想成为世界革命和造反中心的中国正闹得轰轰烈烈。人们无暇顾及这个仅有1500万人口的内陆小国。

在充满危机和火药味的20世纪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可以算是最安定的国家：没有战争，没有饥荒，没有革命。

熟悉世界史的人也知道，这个小国曾出过一位不安份守己的、敢于造反的宗教改革家胡斯。只是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毕竟不多；再说胡斯早在500年前就被他所要改革的基督教宗教法庭活活烧死了。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几次伟大的、以悲壮结局的著名改革之一。

这个国家真正有名的倒是那位始终笑眯眯的好兵帅克，他幽默、和善又极能忍耐。人们提起捷克斯洛伐克，便会想到这位帅克，想到帅克，便会有一阵善意的嘲笑。

这是一个乐天安命的民族，一个让人放心的民族，因此，当这个民族产生了对20世纪的历史具有深刻影响的“布拉格之春”时，居然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

“布拉格之春”所以闻名世界，不在它的开端，而是它的结尾——悲壮的、震惊世界的结尾。等到全世界开始瞩目这个震惊世界的事件时，她已经终止了，春天早已逝去——

那一刻的时针已经指向1968年8月20日的晚上11点……

这是一个黑暗而不祥的夜晚。

1968年8月20日晚11时，距布拉格市中心仅6公里的鲁津机场，值班人员突然接收到一架刚刚飞临的苏联民航客机发出的信号：由于机器故障，要求允许紧急降落。机场人员准许了这一要求。

客机安全降落后，直接开到机场指挥塔附近。值班人员惊讶地发现，从飞机上下来的不是被事故吓坏了的旅客，而是几十名挥动着手枪的突击队员。

机场指挥塔被占领了。仅过了几分钟，装载着坦克的苏联安东诺夫式巨型运输机群的第一架，在突击队员的指挥下降落了。

巨型运输机以一分钟一架的速度降落，并吐出坦克、大炮、卡车和军需品。

这支空降坦克部队，在苏联驻捷大使馆小车的引导下，以35哩的最高时速冲进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包围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驻地党中央大厦。

此时，已临近午夜，捷共中央主席团正在开会。

占领军冲进捷共党中央大厦，扣押了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捷共第一书记亚·杜布切克，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政府总理切尔尼克也在政府所在地被捕。

一个政权被逮捕了。

72岁的总统斯沃傅达得以幸免，因为他不是主席团成员，未来开会；而且他的职务在捷克斯洛伐克是礼仪性的。

8月21日早晨，当布拉格人走向街头时，这个城市已经掌握在外国军队手里。这种情况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也同样发生，捷克斯洛伐克在没有任何反抗的情况下被全面占领了。

占领军是由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陆军司令巴甫洛夫斯基将军指挥的华约部队的24个师。

它由5个国家的部队组成——16个苏联师，3个波兰师，两个东德师，两个匈牙利师，一个保加利亚师。

捷克在一夜之间出名了。

捷克人以这种悲惨的方式闻名于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620年，她曾以白山战役闻名于欧洲。那次，捷克被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打败，丧失了主权，沦为奥匈帝国的一个省。从那时起，捷克斯洛伐克沉默了300年，一直到1918年才获得独立；

1938年9月，慕尼黑会议，捷克又一次闻名于世。这一次，她成为欧洲大国妥协的牺牲品，被迫屈从于纳粹德国的占领。

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现在，这个饱受欺凌的民族又一次以她的悲惨境遇而引起世界的注目。人们从报纸上、广播里寻找关于捷克的消息，全世界都在问：勃列日涅夫为什么要攻打这个从不攻打别人、从不招惹别人的弱小民族？

这个问题不复杂，人们马上就找到了答案——勃列日涅夫的枪炮是针对着“布拉格之春”的。

于是全世界又开始探问下一个问题：什么是“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人在1968年春天到底干了什么？

二

一个幽灵在共产世界游荡，这个幽灵就是改革。有了改革，捷克斯洛伐克便有了“布拉格之春”。“布拉格之春”是改革的同义词、“布拉格之春”就是改革！

马克思在1848年发表宣言，说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这篇宣言就是《共产党宣言》，这个幽灵就是共产主义。

有了这个幽灵就有了共产党，有了共产党就有了一个由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共产世界。

共产世界是人类理想的结晶，是人间的天堂。当然，也不是没有相反的评价，但那只是敌人的反对；或许颠倒过来说：反对的是敌人。这就够了，仅此一条，便可以使这个世界高枕无忧地存在下去。

然而突然间，一个批评的声音从这个世界的中心克里姆林宫升起，向全世界揭露这个世界曾经有过的令人发指的罪恶。

这真是让这个世界震惊而又茫然失措的事——因为无论怎么论证，也无法象以往多次成功地证明过的那样，证明这一次的致命打击来自敌人，因为此人是这个世界的最高首领。

“敌人才反对，反对的是敌人”这个逻辑杠杆断折了，这个世界失去了支撑点，顷刻之间失去了平衡，倾斜了。

这个人就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这次打击就是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第二十次苏共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实行独裁专制和血腥暴行的控诉。

不再有人相信这个世界是完美无缺的神话了。人们开始追究它的罪恶，思考它的缺陷。

有了这样的思考，人民便不愿意照常生活下去，而统治者也不能照常统治下去。仅仅能让这个世界产生这样的思考和愿望，1956年2月25日便成了一个辉煌的日子。

从那以后，也有一个幽灵在共产世界游荡，这个幽灵就是改革。

有了改革，共产世界便不再安定，人们为思考、寻求一个新的秩序而变得不安份了……

在苏联，赫鲁晓夫为了能实践一下新的统治方式而批判了斯大林，枪毙了贝利亚，清洗了斯大林分子，把共产世界的中心搅得天翻地覆；

在匈牙利，纳吉试图建立一个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权而震惊了全世界，并因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波兰，人们为了结束斯大林时代而将一位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哥穆尔卡拥戴上台。为了这个政治目的，波兰人显示了民众的力量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举足轻重的影响……

共产世界在折腾、在动荡、在流血；然而，这一系列的折腾、动荡、流血并没给这个世界建立起一个新秩序；恰恰相反，赫鲁晓夫因为他的折腾而被赶下台去，纳吉因为他的政治理想而被绞死，而以流血示威才将哥穆尔卡拥戴上台的波兰人民发现：这个人

在14年后竟然下令向同样的示威人民开枪射击……

当然，这些代价并非一无所获，它至少使后来的人认识到，这就是改革——即使是不成熟、不成功的改革。

人们从这些不成功的改革中认识到，要改变这个世界不能靠撤换某一个当权者或改换某一届政府；人们还从这些不成熟的改革中懂得了搞清楚改什么和怎么改？对改革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两个问题。

“布拉格之春”就是在这种思考之后出现的改革，“布拉格之春”就是改革。

“布拉格之春”比上述一系列改革要晚整整10年，捷克人确实是一个能忍耐，能沉得住气的民族，她们的春天来得太晚。然而，正因为如此，她才是幸运的，才能有以前几次改革所没有过的冷静、思考和成熟。

三

诺沃提尼轻松而得意地统治着捷克斯洛伐克——政权是稳固的，社会是安定的。然而，在这种稳定背后，官僚的特权和腐败却无声无息地干着埋葬社会主义的勾当。

在东欧，几乎每一次动乱和造反都是在斯大林式的统治松动时发生的：1953年斯大林去世，有了东德的造反；1956年，斯大林被赫鲁晓夫批判，则有了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这很说明问题：动乱和造反所针对的是什么？

捷克斯洛伐克是平静的，它没有过松动。在那里，一个斯大林式的统治，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还能相安无事地存在10多年；在布拉格有世界上最大的斯大林塑像，在赫拉德强尼城堡（总统府，历代波希米亚国王的王宫）里仍然居住着捷克的斯大林——诺沃提尼。

这位兼任着总统的捷共第一书记，是斯大林的真正崇拜者。他处处模仿斯大林：给自己设计了一套和斯大林一样的元帅服；还有，同样尊严地紧闭着嘴，同样拿着一个斯大林式的大烟斗。

然而，他是位轻量级的政治家。

这位锁匠出身的总统、第一书记，文化素养很低，完全不具备一位政治家应具备的理论修养和政治洞察力，他能占据这样的高位，仅仅因为他是1921年刚刚建党时就参加了捷共的老党员和在长期的行政工作中所练就的政客手腕；更主要的，是靠他在50年代

初的大清洗中的积极和狂热。

政治恐怖是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和支柱。就象斯大林以枪毙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开始，然后将恐怖遍及全国一样，东欧各国也是从党内最高层的清洗开始，以全国性的政治恐怖为最终目的。

没有一个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国家能逃过这种劫难——

匈牙利的拉伊克（匈共书记、内务评长、外交助长。1949年被绞死）；

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保共书记、代总理。1949年被处决）；

阿尔巴尼亚的佐治（阿共领导人、副总理。1949年被处决）；

波兰的哥穆尔卡（波共第一书记、副总理。1951年被捕，判终身监禁。他是被清洗而唯一幸免一死的东欧领导人，并于1956年重新掌权，是一位非常值得研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人物）……

捷克斯洛伐克有过同样的政治恐怖。

它从1950年开始政治清洗，到1952年12月3日以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外交部长克列门蒂斯以及其他9名政府部长被绞死而达到高潮。

诺沃提尼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在这个时间迈出的：他得到了被绞死的斯兰斯基留下的空缺——捷共总书记。

诺沃提尼才疏学浅，但他统治这个国家并不困难，在政治恐怖之后，他可以任意推行各种政策——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而不用担心有人反对；再说，一个庞大而健全的官僚机构已经建立起来，要操纵这个机器只需要权力而不需要能力；还有一点，诺沃提尼对莫斯科唯命是从，真正重大的内外方针当然要由苏联老大哥决定。上至党的主要领导人，下至州的第一书记的任命都得莫斯科批准。尽管这有损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却可以少担责任，少费精力。

诺沃提尼轻松而得意地统治者捷克斯洛伐克，尤其当看到比他更有声望的纳吉因为改革而被绞死，哥穆尔卡为改革穷折腾了一阵又回到老路以后，他更为自个儿的政策稳定性而骄傲了。

诺沃提尼有骄傲的本钱——他的政权是稳固的，他的国家是安定的。

然而，这仅仅是他的个人感觉——一个迟钝的政治家的错误的自我感觉。一个10多年没有被人批评和反对过的官僚统治的后果可想而知。

这个表面上安定的国家，没有游行示威，没有大规模的罢工，没有颠覆政权的反革命活动；所有的舆论工具都宣传着令人放心的内容——党和领袖的英明和取得的伟大成就。

可是在这种稳定和粉饰太平的宣传声中，没有受到反对和威胁的官僚政权的腐败和特权，对公众的掠夺和和损害所造成的灾难却是巨大的。

四

政权蜕化、经济衰退使诺沃提尼面临这样一个两难处境——不改革会失去权力，改革要放开权力。诺沃提尼愿意松开他的手吗？

极端的官僚政治和集权式经济管理，已经使诺沃提尼政权脱离了社会主义目标。20年的极权统治之后，官僚的腐败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围绕在诺沃提尼这位总书记周围的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信徒，而是权力的信徒。在这个权力结构中心，起作用的已经不是能力和党性原则，而是取决于当权者在下面有多少亲信，在上层有多大的靠山。

一位捷共中央书记曾经说：“在60年代诺沃提尼统治时期，真正起作用的重要标准是你是否属于同诺沃提尼打扑克的帮派。州委书记或部长如果同诺沃提尼玩过扑克牌，往往比没有同他玩过牌的捷共中央书记更有权势。”

这些人过着贵族式的腐化豪华生活，他们的月工资可以高到2.5万克朗，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20倍。而工资还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他们的几乎所有开销——香烟、食品、饮料、汽车、别墅、出国旅游都是由国家开销的。

诺沃提尼把他的别墅建在树木葱绿的小山间，里面装着蒸气浴及从西欧进口的高级设备，外面警卫戒备森严，不许老百姓靠近。其他高级官员也有同样的享受，“他们可以免费出国疗养，可以以国家的名誉将贵重的礼品送给外国同事，又以国家的名誉为个人收得同样贵重的礼品。”

这个国家是他们的。路易十四说过的话“朕即国家”，对这些20世纪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仍然适用——尽管宪法上明明写着，这个国家是人民的。

我们怎么能相信这个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怎么能指望这些人代表人民！

腐败和特权所造成的政权危机已经十分深刻，但对于政治感觉迟钝的诺沃提尼来说，算不了什么问题。

诺沃提尼错误地把政策上的让步当作政治胜利。他以为，大清洗中被捕的7万人和被开除出党的15万人已经恢复名誉，他的国家将不再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他的人民应该知足，应该对生活在没有政治恐怖的德政中而对他感恩。

经济衰退才是诺沃提尼感觉到了的致命伤痛。

官僚主义国有化，使捷克这个在战前就是工业发达的国家每况愈下：效率低下，技术落后。1963年工业生产总值下降到-3%，农业生产总值下降到-7.5%，生产性国民收入下降到-2%，整个国民总产值的增长率只有0.5%，几乎等于零。同时，由于忽视农业、轻工业，造成消费品供应不足，并导致通货膨胀。它的灾难性后果是农业生产水平低于战前，工人实际收入下降，人民普遍不满，工厂出现骚动。

在这种形势下，连最不愿意承认问题、最害怕破坏了政策稳定性的诺沃提尼也感到了头疼。他已隐隐约约感到，不实行改革，会失去权力。

然而改革必须放弃一部分权力，这是诺沃提尼最难接受的，于是他采取了这样的策略：抓紧权力，放开经济。

诺沃提尼要实行经济改革了。

五

诺沃提尼将关闭森严的大门启开了一条小缝，他要改革了——他要在不触动官僚政治的前题下解决经济难题。于是，科学家们便避开政治，去进行经济改革设计。

把诺沃提尼在下台前为使他的运转不灵的官僚机器重新运转起来而采取的小修小补也称之为改革，的确不够准确。但考虑到改革这个在当今共产世界运用得最多的词，已经变得如此丰富，就象社会主义这个词在几十年的运用中已经变得那么丰富、多义一样，我们很难对它的概念进行界定。

因此，我们不必如此苛求，我们应该将一切愿意动一动的意图都称为改革：赫鲁晓夫式的、纳吉式的、铁托式的、邓小平式的、戈尔巴乔夫式的——甚至还有我们现在要介绍的诺沃提尼式的改革……

诺沃提尼要实行改革，是因为他是一个实用主义政客，他的考虑简单却实用：把生产力促上去，把经济搞好一点，使人民的不满情绪减少一些；当然，也为了使他的人民过得好一些。

单凭最后一条，我们就不能说诺沃提尼没有一点儿人民性，只是他的人民性既不具有民主主义、更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他的人民性是原始的、粗俗的，并且带着他一贯的家长意味。他为人民界定的美好生活是，不被皮鞭抽打和生存需要的满足。

60年代，诺沃提尼的副手、捷共三套马车之一的科尔特曾以代表团长的身份去过巴黎。那里的百货公司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仔细地下面看到上面。晚上，在大使馆，科尔特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闷酒。突然，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们的人民错过了多少好东西呵，真可怕！难道他们不配享受这些东西吗？”

这也是一种诺沃提尼式的人民性：简单却真诚，原始却有意义。我们应该感谢这种粗俗的人民性，它使共产世界有了许许多多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经济改革。

诺沃提尼要实行经济改革还有另一原因：他是崇拜赫鲁晓夫的——就象他曾经崇拜过斯大林一样。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无论有怎样的想象力，也难以在这两位伟人身上找到共同之处！

诺沃提尼找到了：他们都是共产世界的最高主宰，都是他的直接上司。他必须崇拜，必须照办——

斯大林搞政治恐怖，他也搞政治恐怖；赫鲁晓夫搞平反，他也搞平反；赫鲁晓夫搞经济改革，他也不妨一试……

然而，诺沃提尼是一位慢一拍的政治家，他的照办总是慢一步。这倒不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仿效有所犹豫和思考，而是出于对前一任主子的忠实和崇拜。所以，苏联已经枪毙了贝利亚，诺沃提尼还在继续他的斯大林式的政治恐怖，赫鲁晓夫在1956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平反运动，诺沃提尼却拖到1962年。

赫鲁晓夫1962年下台，他却不会立即转弯，竟给勃列日涅夫拍了一封对赫鲁晓夫下台表示难过和遗憾的电报。这是他一生中许多政治错误中最严重的一次；或许，他1968年3月的下台与此不无关系。

这种慢一拍的官僚惰性，使诺沃提尼在赫鲁晓夫之后还采用了赫鲁晓夫式的改革方式。

诺沃提尼的改革严格地限制在经济领域。

1964年，45岁的希克教授是被选中来拯救濒临崩溃的经济的主要人物。这位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会主席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经济学家。在“布拉格之春”期间，他是改革的主要设计人之一，曾任改革派政府的副总理。苏联出兵后，他流亡国外。

这个人选是无可挑剔的，但他在诺沃提尼的改革中却没有成功，他的作用是在“布拉格之春”期间发挥出来的。这也可以证明，改革的理论并不比改革的勇气和诚意更重要。

希克教授的工作是相当困难的：允许他实行某种程度的改革以改善严重衰退的经济状况，又要求他必须“利用现行制度的优点”，必须强调“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

在这种即要进行经济改革，又不能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有任何触动的两难处境中，经历了两年的犹豫、拖延，希克教授才能于1967年1月将自己起草并由主席团通过的“新经济模式纲领”正式实施。

在诺沃提尼时代，希克教授可以做到的，仅仅是扩大企业权限，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纲领的重点是，“建立市场经济，自发调节供求关系而不是人为地去规定；对工业实行分散管理；对企业实行物质刺激”。

这些措施即便在当时来说，也无多少新意，赫鲁晓夫这么尝试过，而南斯拉夫一直就遵循着这样的经济方针；然而，这些措施在当今的许多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纲领性方针，因此，我们很难说这样的改革是不需要的。问题只在于它的局限性和难实现性。

这次改革失败了。

除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层层阻挠，改革措施大多没能实施外，即使得以实行的部分也适得其反——扩大了权限的企业片面追求利润，盲目生产，使一些获利多的产品大量积压，而某些人民需要的产品却因获利少而减少了；有的企业利用价格下放，趁机哄抬物价，牟取暴利。

劳动群众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得到好处的只是利用权力下放和价格开放的特权者和各类投机者。

新经济措施没能解决因工人劳动积极性不高而造成生产效率低下的这个经济衰退的根本问题。希克教授要求扩大企业领导权力的同时，相应扩大工会权力，实行工人自治

的主张不可能在那些由大小官僚占据着舒服位子的企业里实行。

既得利益阶层当然不会被一个小小的教授的改革主张赶下台去——尽管希克还是一位中央委员，官僚们却没有把他当成自己圈子里的人。这个政治头衔是业余兼职，他只是知识分子，只是一个教授，比起搞政治出身的职业官僚来说，他仍然是异类、是微不足道的。

工厂仍然是老样子：“冷漠的工人不听领班工长，领班工长不理厂长，而厂长则用谎言来欺骗布拉格的部长们。”

这次改革招致了更多的经济困难：物价上涨、食品短缺、工人缺勤严重、生产停滞、政府财政赤字在1967年达到50多亿克朗（约合6亿美元）。

几年的折腾和失败使捷克人明白了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社会主义改革设计不能交给官僚去执行，因为这些人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们的权力和利益。

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管理中渗透了官僚政治，官僚们决不可能根据经济规律和社会利益作出决定，人事关系和政治权力的考虑是压倒一切的。这些政治弊端，当然不是经济改革可以革除的。

希克教授等人终于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经济改革没有政治上的改革配合，就不能发挥作用！”

于是，希克教授等科学家开始将注意力转到政治解决上，呼吁政治改革的迫切性。这种智囊式的呼吁和进谏当然不可能动摇一个经营了数十年的官僚结构。

诺沃提尼既然没有能力迫使他的庞大的官僚机构接受经济改革，又怎么可能迫使他们接受对官僚来说更加致命的政治改革？

在这儿我们又看到了赫鲁晓夫式的悲剧；再说，诺沃提尼本人也绝不会同意政治改革。他之所以让经济学家们试一试，而把关闭森严的大门启开一条小缝，是因为他相信可以不触犯官僚政治而单独解决经济问题。也就是说，经济上某种程度的自由化可以考虑，但政治上的民主化却绝对不行。

经济解决失败了，政治解决的课题肯定会提到日程上来；官方自上而下的改革失败了，自发的、自下而来的改革浪潮必然涌来。

这一切都发生在“布拉格之春”之前，可以说，“布拉格之春”的产生不是因为保守和拒绝改革所致，而是一场不彻底的、失败的改革所引发出来的更深刻的革命。

现在，1967年的春天已经逝去，下一春天还得等待半年，然而这一次，这个善于忍耐的民族，这些等待了几百年的人民不再等待了。

六

人民愤怒了——对那个糟蹋了社会主义，又来糟蹋改革的官僚政治愤怒了。然而捷克人没有感情用事，他们思考着，对改革投入了更多的热情和理智。

从1964年改革开始，捷克斯洛伐克人就焦急而又理智地关注着改革形势。他们愿意将信任交给科学家，让他们有时间精心设计，他们愿意将耐心给予官方，让政府有时间稳步实施。

这绝不是对改革冷淡、超然、漠不关心，而正是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成熟——1956年的匈牙利悲剧记忆犹新，他们不希望狂热、暴力、流血来干扰他们的目标。

捷克人已经没了“一觉醒来，天下大变”的幼稚。那几年，人民关注着、倾听着、思考着……

他们认真地了解希克教授的改革思想，也仔细地阅读科学院28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历史学家和物理学家联合发表的关于改革的意见书《处在十字路口的文明》。

这份报告是在科学院哲学所拉多万·利赫塔博士领导下，对捷克社会各方面的问题进行综合调查研究的结果。

这是对捷克病的一次全面会诊。

科学家带着严肃的思考和权威登上了社会舞台。他们宣称“迄今为止，政治家利用了科学家，而从现在起，科学家将决定政治的步调。党的主要任务之一，将是为科学发展开辟和扫清道路”。

这些，捷克人民都看到了。对人民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人能思考和参与改革，捷克人感到无比振奋。这是他们的幸运和骄傲——10年前的匈牙利不正是缺少这样的文化精英，缺少这样的深思熟虑和精心设计才造成了开始的混乱吗？

然而，要把改革的思考和设计变为实践，把科学家的理想变为政治现实，还得依靠另一部分社会精英——行使政治权力的政治家们。

于是焦灼而又耐心等待的人民又将信任交给了政府。

这一次——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人民失望了。

现在，1967年夏天，捷克斯洛伐克面临的危机已不仅仅限于经济方面。人民在焦急地等待之后，会如何对待政府所给予他们的失望？他们对埋葬了社会主义、又同样埋葬了改革的官僚阶层的愤怒，会将他们引向何处？

尽管没有枪声，没有动乱，也没有上街游行，但在1967年夏天，捷克斯洛伐克的危机是深重的。

对此，诺沃提尼惊慌了，克里姆林宫也惊慌了。他们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中感到了一股潜在的、1956年匈牙利式的危机。

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面临着一次重大的历史选择。

在这次历史关头，捷克人民又一次表现出令人尊敬的克制：他们没有因为失望、不满而铤而走险，没有不负责任、不看目标、不顾后果地凭感情用事——这又是一个与匈牙利事件不一样的地方。

捷克人选择了、行动了。他们的策略是：运用民主力量，对保守的、阻挠改革的官僚施加压力，而把他们的热情、信任和希望交给共产党内进步的一翼、支持他们站出来，将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帜举起来。

此时，后来与“布拉格之春”联系在一起的几位著名改革家还没有为人民所认识和理解。因此，可以说，不是这些政治家造就了“布拉格之春”，而是捷克人民推出了这些改革家，并使他们与“布拉格之春”一起成长、前进，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

人民中蕴藏的，绝不只是狂热和破坏的力量。这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身上得到证明——在理智的驱使下，这个民族爆发出巨大的、但又是冷静而有秩序的力量。

1967年，捷克人民所有的这种力量，连同他们的情绪、意志，就要在作家们的活动中体现出来了——作家将以猛烈的火力展开对旧体制的政治批判……

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不愧为人民的良心，民族的灵魂。

七

作家们带着人民的焦虑和不满去攻打旧的政治体制。他们完成了经济学家未完成的对旧体制的批判，完成了政治理想的设计。

科学家从经济和科技着手去振兴民族，作家们却从政治和社会着眼去思考民族的命运；科学家为确立新的目标而忙于改革设计；作家们则带着人民的不满和焦虑去批判旧的政治体制。

捷克作家是“布拉格之春”中的一支劲旅。他们凭借的与其说是艺术家的才华和文学手段不如说是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在捷克斯洛伐克，很少有专门为消遣、为纯艺术、为自我而写作的作家。“在他们的传统里，政治与文学始终携手并进，所以，捷克的主要文学家大多能跨越写作与政治这条界线。”

尤·伏契克，一位作家会被送上绞架；而即使要上绞架还能写出象《级刑架下的报告》这样的作品，这就证明这个民族的作家具有怎样的政治意识和使命感。

如果以纯文学的观点看，这当然是文学的不幸。但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藐视那些精神贵族的藐视，而肯定地说，这是捷克作家的光荣，是捷克人民的幸运。

捷克作家没有游行示威，没有拿起武器，也没有在地下策划反政府的政变，所以没给我们留下可歌可泣的壮举。然而，他们的斗争是很有效的。

作家们在向诺沃提尼的官僚政治发起全面进攻之前，曾有过一次动员和演习。

1963年4月，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的斯洛伐克作协代表大会上，作家们检讨了他们曾经接受和宣传过斯大林主义的道德问题。他们承认，“我们中每个人的良好声誉都有一个永恒的污点，因为我们都谴责过斯兰斯基、克列门蒂斯”这些专制制度的受害者。

作家诺沃麦斯基在愤怒地对专制表示抗议和控诉的同时，沉痛地检讨了作家被迫充当专制工具的耻辱。

他在发言中说：“我们曾努力说服我们的读者，要他们相信谎言是正确的，我们曾使一代人误入歧途和产生混乱。他们现在正站在这个会议厅的外面，无依无靠，迷糊不

解，不知所措，他们站不稳脚跟。对于这一代，我们必须还给他们自信、信任和真理；但首先我们必须在自己心中找到这些东西。”

作家们找到了。

他们宣布——

作家有权利和义务宣传“正确的观点：即马列主义观点”而不是官方的主观意见；

作家应该“只尊重那些与社会主义道德原则不相冲突的指示”；

他们还宣称，共产党员的觉悟“决不应理解为驯服地服从领导机关的庸俗态度，而应该是从不掺假的马列主义原则出发，对一切事实作出客观的判断”。

作家们找到了“不掺假的马列主义原则”这个思想武器，使诺沃提尼政权特别恼火。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些要用马列主义原则改造共产党的共产党员，而不是要否定共产党的反共人士。这给直接地、公开地镇压带来困难。

诺沃提尼能做的只是指名批评了某些作家，说他们“间接地攻击党的政策”，并警告说，作家们“正在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

这次交锋到此为止。对作家来说，这是一次思想更新，一次行动操练，它使作家们可以在更接近真理和人民的前提下越来越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生活中的一股真正起作用的力量。

决战是在1967年6月27日捷克斯洛伐克第4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开始的。

这次在布拉格举行的会议，有400多名作家出席。党的代表团也相当庞大，它由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负责宣传和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亨德利赫带领。代表团成员包括了教育部长、文化部长和新闻部长。

这个代表团加重了这次会议的政治色彩，再加上强烈的政治情绪和政治性极强的会议议程。这次大会简直不象文学界的一次盛会，倒象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事实上，这次大会的政治影响也不低于一次党代会。

率先打响战斗的是党员作家昆德拉。他选择了自由与专制、人道与非人道的题目。

昆德拉明确地针对群坐在主席台上的文化官员说：

“当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感到不舒服，他们会说：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当然，任何自由都要受到种种限制。但是没有哪一个进步的时代曾经为自己的发展规定过限度……只有在我们这里则不同，把维护禁区看作是比冲破禁区更大的美德。”

昆德拉还对斯大林主义的虚伪性和它的反人道实质作了深刻的思考。他说，他不把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前者并不存在道德问题，它没有人道主义的面具，我们很容易对它加以识别和反对。但斯大林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继承者，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运动的继承者，它保留了这个运动的许多理论、观点和口号。而实际上，“这样一个人道主义运动正在走向相反的歧途，正在摒弃人类的种种美德，正在把爱护人类改变成残害人民，把爱好真理改变为指责真理……”

昆德拉对斯大林主义的虚伪性及反动本质的揭露真是一针见血，其深刻性远远超过了赫鲁晓夫那篇著名的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正因为作家们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人道主义原则给予肯定和呼唤，在后来的“布拉格之春”中，政治家才能勇敢地把人道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目标。

有了昆德拉的发言，所有的与会者都感到一场真正的战斗开始了。他们群情激奋。

接着，一位作家在大会上宣读了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上个月写给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信。

因为作者所具有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这封信未能在莫斯科宣读。捷克作家能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公开这封信，既表明他们的勇气，也表明这场斗争已经深入到什么地带。

索尔仁尼琴的信主要是控诉审查制度的。他说：“审查制度象石头一样压在我国头上，迫使我们的作家服从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吏的胡作非为……”

他也指责苏联作家协会，说“它自己就是最大的毁损者之一，它怯懦地将600名无辜的作家置之不顾，这些作家遭到迫害，结果被放逐、监禁、关进集中营，甚至死亡”。

冲破的禁区越来越多了。反专制，要民主；反斯大林主义，要人道精神；反审查制度，要文化、新闻自由的呼声成了这次大会的主旋律。

官方代表团长曾经几次上台，耐心地劝解作家们，别脱离马列主义世界观，别偏离党的路线。

这种陈词滥调当然不可能改变会议的进程。

于是，捷共代表团团长亨德利赫脱掉外衣，穿着衬衫和背带裤到台上发表了一篇尖锐谴责的讲话，训斥这些越轨、造反的作家。

这种激动的表演同样未能奏效，反而用他自己的形象将诺沃提尼政权的统治人格化、具象化了——那是一个倒运的、被击败的政客，一个既要反扑，又无力自卫的形象。

最后，亨德利赫只能愤怒地拂袖而去。

大会继续进行，并达到高潮——尤其是国家文学奖金获得者、41岁的党员作家卢·瓦丘利克的大会发言。

瓦丘利克以政治权力为题，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弊端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控诉。

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发言。瓦丘利克以一个作家的敏感，将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政治气氛、人际关系、人民的处境、心态都准确地感受到了。他的充满激情的发言既深刻又富有文采。

瓦丘利克一开始就把政治恐怖和专制统治所造成的社会现实描绘出来，并痛心地宣称在这个社会里已经没有什么公民了。

他说：“政府倒下去，公民就重新站起来。反之，在政府长期站立的地方，公民就倒下去。公民是倒在什么地方呢？我不准备讨好敌人，说他们是倒在级刑架上的。只有几十个或几百个公民会有这样的遭遇。但这已经够了，因为这接着就会使全国陷入恐怖之中，使人们回避政治，要求很低，只关心一些细小的日常琐事，使人们越来越依附那些基层的统治者，形成一种新的和不寻常的农奴制。”

瓦丘利克认为，一些平庸无能的人能行使权力，并构成这个社会的权力中心，是因为“当权者喜欢那些内心世界和他们相似的人们”。他说，“得到信任的人是那些俯首贴耳的人，那些不会制造麻烦的人，只要当局不提问题，他们也不会提任何问题的那号人。在选拔各级人才时，被选中的总是些庸才。那些头脑复杂的人，特别是那些品德高尚，成绩卓著，因而成了衡量公共道德的标准的人则从舞台上消失了。”

瓦丘利克尖锐地批判了现存制度对人和人的价值的冷漠：

“20年来。任何一个关心人的问题在我国都没有得到解决：从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起，如住房、学校、生活福利，一直到那些在当今世界不民主的制度下不可能得到满意的更高级的要求为止。例如：人在社会中的充分价值感；政治决定要服从道德伦理准则；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等。”

瓦丘利克强烈地为自由呼吁：“为什么我们不能生活在我们想去的地方？为什么一个裁缝不能到维也纳去住3年？为什么一个画家不能到巴黎去住30年？然后再……作为一个自由的公民，而不是一名囚徒回来呢？”

瓦丘利克批评当局对自由的压制：

“只有在不需要谈论自由的地方，自由才真正存在。人们谈论他们看到的现实，这使当局生气。可是它不去改变客观现实，却想改变人的眼睛。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失去唯一有价值的理想——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公民的理想。”

瓦丘利克认为失去自由的社会，将是失去创造力的社会：

“我站在这儿说话时，并没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自由感，而这个自由感是每个公民都应该有的。我倒是感到我正在胆怯地利用公民和当权者之间的某种休战状态，我感到我正在犯罪……统治集团本身、政府和政府成员，他们自己有公民权力的保证吗？没有这种保障，就不能有任何创举，甚至连一个政策也创造不出来。”

瓦丘利克没有选择恶毒咒骂的字眼，但这篇演说的份量却是显而易见的——深刻，而且有着非常准确的现实针对性。它甚至超过了以往所有的反共人士对这个制度的批判份量。

然而瓦丘利克不是反共人士，他是一位作家，一位人民的代言人。他的力量在于他的背后有整个民族正在悄悄地诉说着同样的话题；他同时也是一位共产党员，他的讲话只是一个共产党员对一个伪社会主义的批判。瓦丘利克的深刻在于他具有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绝不矛盾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这次发言的最后，瓦丘利克严肃地声明了这一立场：

“当我批评当局的时候，我并不是批评社会主义，因为我相信，在我国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并不认为，当前的统治制度就等于社会主义（可是统治当局却总是这么说）。前者的命运并不等于后者的命运。”

要说明的是，瓦丘利克的这篇演说未能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出来。它是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才与读者见面，并成为这个春天的基本纲领之一。它是“民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宣言书，是“人道的社会主义”的雏型。

瓦丘利克因为这次大会发言而被开除出党。这个决定是在3个月后召开的捷共中央九月全会上作出的。

在这次全会上，气急败坏的诺沃提尼，对“传播对社会主义有害的、与共产党格格不入的意见和思想”实行全面反击。

这次全会取消了作家杨·普洛哈磁卡党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因为他在作协代表会议上发出警告：“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作家，还有一个统治者，还有一个读者”就要为民主自由斗争到底。

和瓦丘利克同时被开除出党的还有作家克利马、利姆、姆尼亚奇科；作家昆德拉受到严重警告。

全会还决定将作协的《文学报》划归文化部和新闻部直接领导，该报的19名编辑被开除，成立新时编辑部。减少分配给作协印刷厂的纸张。

这次反动是全面的，连经济改革也要停下来——限制在报上讨论改革，不准希克教授再召集改革委员会会议、不准他公开讲话。

专制又一次占了上风。然而没关系，这些作为日后运动的指导思想已经写在作家大会的决议中了——“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在于，它的纲领能自觉地抵制文明进步的非人道方面，抵制它的非人道主义倾向”。

这是人民的愿望。既然人民的意志已经明确地表达出来，那么顺应这股强大意志力的阶层和个人迟早会汇集起巨大的政治力量。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次小小反复，这点儿黎明前的黑暗是短暂的。对捷克人民来说，重要的是作家们完成了经济学家未完成的对旧体制的批判，完成了政治改革的设计。

现在——1967年冬天就要降临的捷克斯洛伐克，痛苦有过了，成熟的改革思想有过了，不成功的改革实践有过了，摧毁旧体制的壮举有过了，表达整个民族意志的勇气也有过了；现在，改革派共产党人应该登上舞台了。

禁书网网文制作

翻墙去禁书网 www.bannedbook.org 可下载更多禁书

禁書目録



被霸权扼杀的春天——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二）

八

首先站出来的政治家是杜布切克。他准确无误地感觉到了人民的信仰——同人道准则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杜布切克勇敢地把这一信仰写在改革的旗帜上。

捷共党内，进步的一翼就要以改革家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了。

科学家、作家以及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为呼唤春天已经有了那么多的思考、设计和艰难的斗争之后，政治家才出场，这似乎晚了一点，可见“布拉格之春”不是他们组织发动的。

不过这并不重要，当人民的意志已经明确表达出来，当人民的力量已经被某一具体的目标团结和调动起来的时候，能代表这种意志的政治家是杰出的政治家，能顺应这股力量的政治势力会陡然壮大起来；同时，有了优秀政治家的加入，人民的力量会更加凝聚，目标会更加清晰，接近目标的希望会更加增大。这种政治现象在1967年的捷克表现得十分明显。

首先站出来支持改革的政治家是杜布切克。

杜布切克从倾向于进步事业，到完全站到人民行列之中并被改革浪潮推上他事业的巅峰，成为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明星和最高领导人。

“布拉格之春”是和杜布切克的名字分不开的。

1967年，这位年仅46岁的斯洛伐克人，担任者斯洛伐克党的第一书记和捷共主席团成员。他毕业于莫斯科党校，是一位职业政治家。

对一个极权专制制度下的职业政治家，人们很容易将他与关起门来争夺权力的密室政治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对杜布切克是不公平的。

从个人气质上讲，他文静，从不专横地显示自己。他在公众面前讲话时，常常用微笑来掩饰他的紧张和慌乱。这与那类喜欢板着脸显示自己无所不知的官僚有很大区别，公众当然会对他产生亲切感。

在个人品质上，杜布切克“不是权迷心窍的人，也不是想利用权力来谋求个人私利的人”。对这一点，公众当然知之甚少，但人们都知道，杜布切克夫妇和3个孩子一直住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过着很简朴的生活：他自己开车，并且常常到公共游泳池游泳、跳水，到体育馆和老百姓一起看冰球赛……

这些当然不是衡量一个政治家的主要标准，但与诺沃提尼和其他党的高级领导人纸醉金迷的生活却形成鲜明对比。人民是很看重这些品质的。

然而杜布切克远远不是靠这些性格、品质上的小特征就获得全民族的支持而成为一次伟大运动的领袖的。

首先杜布切克是一个有信仰的当权者。他的信仰不是那类外在的、僵硬的——象许多政客常常玩弄的——政治口号，而是一种对人的真诚和人道的信仰。这种信仰与人民内心深处所保留的道德准则是相符的。

人民是敏感的，他们当然会准确无误地觉察到杜布切克的这种信仰，并因此对杜布切克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和信任。

另一方面，“他也相信人民——他是深切地，真诚地相信——而人民也相信他”。

杜布切克对人民既具有信任、真诚，也具有一个政治家的敏感，他准确无误地感觉到人民要求同人道主义相联系的社会主义，而反对同极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

人民的这种愿望和杜布切克的道德、政治信念是不矛盾的，所以，1967年杜布切克作出了与他那文静、温和的性格极不相称的选择——加入民主社会主义行列，与诺沃提尼极权统治进行公开的、面对面的斗争。

杜布切克不具有顽强的性格，也没有控制着党、政、军的最高权力，但因为他是带着对人民的真诚、信任和理解进行战斗的，他很快就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和政治权威。

对抗是在我们前面提到的九月中央全会上开始的，杜布切克对新的文化专制和镇压

浪潮表示反对，他不同意开除作家们。

杜布切克的反对没能改变主席团的决议，但他以一个公开的、积极的反对者出现在党的最高层，其意义是很重大的。

诺沃提尼是害怕政治上的动乱才把改革严格地限制在经济领域，现在，政治危机以无法回避的势头找上门来，扑向诺沃提尼。

九月全会后，杜布切克与诺沃提尼的关系严重恶化，诺沃提尼下令掐断他在布拉格办公处通往党中央的专线电话，甚至还派秘密警察对他进行盯梢。

这位温和的人被激怒了。

10月底，党中央再次举行全会，杜布切克激烈地发言重申他在九月全会上的立场，同时指责诺沃提尼蓄意破坏改革，指责他的独裁专制、压制民主权力；尤其在民族问题上，杜布切克尖锐地批评诺沃提尼干预斯洛伐克事务，损害斯洛伐克的经济。

由于历史原因，由于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地理、经济、文化和人种上的原因，这两个民族的差异是很大的。民族问题——或者说较为落后的斯洛伐克的问题，一直是捷克斯伐克的一个大问题。

诺沃提尼进行了反击，他指名道姓地说杜布切克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说如果杜布切克对中央的民族政策提出异议，那么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经济可以分开，斯洛伐克别再指望得到中央的帮助。这是以民族分裂的罪名威胁杜布切克。

杜布切克没有退让。他说要讨论经济分立，就必须先讨论整个政治制度，必须先讨论政治分权。要分先从上面分起，从党政分起！

问题涉及到了整个政治体制，涉及到诺沃提尼集党、政大权于一身的这个最引人怨的敏感问题。会议失去了控制，这个经营了几十年的政治结构松动了一下。

权力核心的每一个人都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选择。

开始，斯洛伐克的官员站在杜布切克一边，但当矛盾进一步激化，问题进一步扩大到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以及政府机构的权力职能、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等一些更重大的问题时，一些捷克领导人也支持了杜布切克的立场：要求党政分开，要求诺沃提尼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

民主与专制，改革与反改革，真改革和假改革，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场使捷共分裂了，而且优势在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一边。

在这场斗争中，权力第一次失去了它一贯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其说是改革派政治家的胜利，不如说是显示了自己的意志和力量的人民的胜利。

处于波动局面的诺沃提尼采取了拖延战术，他宣布因意见分歧太大，一时无法统一，全会暂时休会到12月继续召开。

诺沃提尼准备丢掉中央委员会这个已经变得不驯服的工具。他还有两张王牌可打——莫斯科的干预，以及用军队来保卫他的权力。

诺沃提尼向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提出要求，请勃列日涅夫尽快到布拉格来进行对他有利的干预；同时，他准备利用军队和保安力量，逮捕改革派领袖。

1967年的严冬降临了。

九

勃列日涅夫干了一件他整个政治生涯中最失策、最令他后悔的事——他把诺沃提尼抛弃了。

改革派共产党人在等待12月的中央全会，诺沃提尼则寄希望于他的苏联老大哥。全会休会后，诺沃提尼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50周年的庆祝活动，更主要的目的当然是去谋求莫斯科的支持。

诺沃提尼11月8日返回布拉格，同一天，勃列日涅夫也秘密到达布拉格。改革派领袖们对苏共总书记的突然来访——而且是同诺沃提尼同时到达感到吃惊。

勃列日涅夫用两天时间同许多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政界领导人谈话，提出许多问题。勃列日涅夫要了解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要知道现在和诺沃提尼对抗的领导人是哪一类人。

勃列日涅夫未能见到杜布切克，因为后者在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勃列日涅夫显然对这位政坛新星很感兴趣，多次问起他。

11月9日晚上，捷共中央主席团设宴招待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默不作声地吃着，宴席进行到中途，他突然站起来宣布：“这是你们的事情，同志们，苏共和苏联不干涉你们的内政。”

勃列日涅夫说完这句话便马上要求派车送他到机场。在返回莫斯科途中，勃列日涅夫还顺便在布拉迪斯拉发停了一下，连夜看望了杜布切克。

勃列日涅夫用不加干预的方式完成了对捷克内政的干预。

勃列日涅夫决定抛弃诺沃提尼，因为诺沃提尼把捷克斯洛伐克搞得一团糟，他看出来诺沃提尼的统治已经不能有效地控制这个国家了；而这个国家的安定对勃列日涅夫的整个东欧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勃列日涅夫非常了解诺沃提尼的无能，并且不喜欢他；还有，他不能忘记3年前，诺沃提尼那封为赫鲁晓夫下台表示遗憾的电报。

然而这位总书记却不了解杜布切克是怎样一位政治家，不了解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已经兴起的改革浪潮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勃列日涅夫干了一件地整个政治生涯中最失策、最让他后悔的事——几个月后，他就为这次错误付出了代价：他不得不率领整个苏共政治局到捷苏边境的小镇切尔纳和强硬的杜布切克谈判。那次，无论他怎样暴跳如雷，也无法让这个年轻人就范；之后，他又不得不采取军事干涉的下策。这次军事行动把他的道义和政治资本都输得精光。

诺沃提尼的一张王牌打出去了，而且又输了。现在，他的得力盟友已经寥寥无几，剩下的只有阴谋和暴力了。即使到了这种时候，诺沃提尼也不准备退出政坛——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必须革命到底，至死不渝。

1967年12月中旬，重要的捷克斯洛伐克部队举行大规模的冬季演习。这是诺沃提尼在演习对布拉格的军事包围，同时使部队处于戒备状态以保卫他。

诺沃提尼制定计划，如果12月16日中央全会可能撤销他的职务，就把军队开进布拉格，逮捕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

参与这个阴谋的有负责捷克斯洛伐克党、政、军保卫工作的党中央第八部部长马穆拉，国防部副部长杨科上将，国防部党组书记谢伊拉少将。

为了这个计划，驻扎在首都附近的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步兵师处于戒备状态，准备随时开进首都；同时，对改革派领袖和进步人士的逮捕证已经准备好，只等马穆拉签字了

——其中有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这样的政治家，也有瓦丘利克那样的作家、知识分子。

这些军事行动被军队的总政治部主任普尔赫利克中将察觉了，而这位将军又是倾向于改革的将领。这个阴谋尚未实行便流产了。

形势变得对诺沃提尼更加不利，但他仍然凭借着几个亲信的支持，在全会上继续斗争。至少在主席团，诺沃提尼的支持者还能占有微弱的多数。

全会继续了3天，均势不能打破，只好又一次休会，准备过完圣诞节再开。

1968年元月2日，捷共具有历史意义的全会继续召开。此时，中央的派别斗争的消息已经传到社会上，公众和新闻舆论开始对政治家施加压力——要求诺沃提尼下台。

被逼急了的诺沃提尼突然把自己装扮成改革和民主的捍卫者，同时准备牺牲他的亲信亨德利赫，让此人为他的错误政策承担责任。

诺沃提尼的挑选非常高明，亨德利赫是60年代诺沃提尼政策的主要制定人，也是这两年为诺沃提尼应付困难局面的关键人物。亨德利赫长期主管着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对新闻、作家和整个文化界作过许多公开的、不得人心的干预，他几乎一直为诺沃提尼充当恶人。

另一方面，诺沃提尼的这种挑选也是要冒风险的——如果他不能把亨德利赫变成一头替罪羊，那他等于砍掉了自己的一只胳膊。

这一次，诺沃提尼又输了，他早已失去了任意主宰他的臣民的龙威。

亨德利赫愤怒地反抗了。

那是在全会期间的一次主席团会议上，诺沃提尼突然将矛头倒向他自己一方，他向亨德利赫发问：“亨德利赫，你知道你女儿在干什么吗？她向《证据》提供了材料！”

《证据》是捷克斯洛伐克流亡分子在巴黎办的杂志。几个月前，31岁的作家贝奈斯因为为《证据》提供材料而被判处7年徒刑。在对贝奈斯的审讯中，发现了亨德利赫的女儿兹杰娜参与了此事。兹杰娜确实将国内的材料秘密地送给了流亡分子办的这份杂志。

在6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许多党的高级领导的儿女都公开或秘密地从事着反专制的民主活动。比如教育部长齐萨博士就是因为其女儿参加了1965年的大学生“反党示威”游

行，而丢掉了部长职务的。

然而现在毕竟不是1965年。

亨德利赫愤怒地顶了回去：“安托宁，你休想把我变成另一个巴拉克，那是决不会得逞的！”

巴拉克是原政治局委员、内务部长，因向诺沃提尼个人权威挑战，1962年竟被安上贪污罪、判处15年徒刑。西方称这次判决“结束了捷共最高层中进步分子的第一次造反”。

亨德利赫的反戈打破了平衡，诺沃提尼的总理列纳尔特也跟着风向的转变而把票投到了杜布切克一边。

1月4日，主席团进行表决，诺沃提尼以4比7的劣势，被迫交出了第一书记的职务。

1月5日，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诺沃提尼辞去第一书记、并由杜布切克继任的消息。

诺沃提尼尽管还保留着总统的职务，但诺沃提尼政权毕竟已经死亡，只等举行一次葬礼了。

此时正值残冬，春天已隐约可见，它一步步逼近残冬，向大地走来了……

十

面对着完全不受官方控制的民主浪潮，杜布切克显示出一个当权者的最大气魄，他说：“让我们不要害怕这个浪潮，让我们从中学习吧！”

捷克人没有因为1月的胜利就狂热地涌上街头，去要求一个全新的天地；也没有把诺沃提尼的下台当作最终的胜利。

捷克斯洛伐克人已经能认识到，灾难并不在于诺沃提尼或少数几个人的阴谋和罪恶，而是一个制度问题。这是捷克人比赫鲁晓夫的高明之处。

捷克人民用审视的目光注视者杜布切克，要他证明他的上台并不是密室政治的一次秘密交易，要他证明这一次的领导人替换，与20年来所有的任何一次领导人的替换的性质是不相同的——那几次，领导人换了，整个官僚机构还继续存在，保安机关和声名狼藉的司法机关依然充当着压制民主的工具。

在杜布切克周围，一些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上的改革派政治家和作家们把人民这种无声的审视变成强大的改革压力，敦促杜布切克拿出更大的勇气。

杜布切克没有让人民失望。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杜布切克的政绩是值得称道的——

为防止改革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干扰——以后的事实证明，杜布切克的顾虑不是多余的——他对邻国进行了访问：1月29日访问苏联；2月4日与匈牙利的卡达尔会晤；2月7日与波兰的哥穆尔卡会谈。

撤消了九月全会对作家们的惩治：给瓦丘利克等入恢复党籍，给昆德拉恢复名誉；《文学报》复刊，改名为《文学通讯》。这个刊物在整个“布拉格之春”期间成了运动的一面旗帜；

让作家们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召开了代表大会并民主选举了新的作协领导。

为50年代大清洗中的政治冤案作出更彻底的平反……

杜布切克上任后，曾阅读了党的档案材料，当他详细地了解了20年来的迫害、暴行和血淋淋的冤案情况后，这位共产党的领袖失声痛哭了，他发誓决不让这样的悲剧在他的国家重演。

对日益活跃的民主气氛，杜布切克不但没有摆出最高统治者的架子给人民规定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相反，他大胆地将民主与人民行使权力等同起来。他说：

“民主不仅是一个人有权利、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人民“对国家大事负有共同的责任并能共同作出决定”。

在1月以后的几次公开场合，杜布切克还谈到“人的自我发挥”，谈到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主张，谈到阶级斗争只是初期的手段，而绝非社会主义的目的。

杜布切克不仅谈论民主、人道，同时还在公众集会上对一些反民主、反人道的机构和个人进行了公开的、指名道姓的批评。紧接着，这些被杜布切克批评过的捷共中央书记、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内务部长和总检察长被撤了职。

杜布切克确实利用他所得到的权力作了一些激动人心的事。然而这毕竟是任何一个新上台统治者都愿意做、也可能做到的。

杜布切克面临的重大考验和选择是——对权力本身将如何处置，尤其是他将如何对待处于统治权力另一端的人民的民主权力？

考验首先来自已经不被政府控制的新闻部门以及被它们所激发出来的民主意识。

1968年初，获得了某种程度自由的报刊电台空前活跃起来。人民从报刊、广播里听到、看到了大胆得难以置信的文章、广播后，政治热情和民主意识空前高涨。编辑部和播音室成了人民心目中的圣殿。人民倾听着、阅读者、思考着，对民主改革表示了令人激动的情感和关注。

对过去的谴责和对新的政治体制的讨论越来越大胆、深入了。这些并没有受到官方的干预；相反，党和国家的一些新领导人也公开地参加这样的讨论——如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姆林纳日。其中，斯姆尔科夫斯基是1968年最受群众爱戴的演说家和改革派首领。

斯姆尔科夫斯基57岁，斑白的头发使他象一位充满智慧的长者，修长的身躯蕴藏着巨大的激情。他是50年代政治恐怖的受害者，坐过8年监狱，不久前平反出任农业部长，“布拉格之春”期间被任命为国民议会主席。他是最坚定的改革家，是杜布切克最亲密的合作者，他把自己的改革思想坚持到苏联出兵之后。

斯姆尔科夫斯基最早是在报纸上撰写文章，呼吁要“坚决纠正和克服对社会主义的歪曲”。他坚持要废除高级干部的终身制“使人们能够光荣地离开和回到高级职务、甚至最高职务”。

在政治生活中，他强调“必须恢复民主精神，必须创造一种自由交换意见和互相争鸣的气氛，让最有价值的先进思想战胜保守落后的思想”。

在以后几个月里，斯姆尔科夫斯基激进的政治主张和改革活动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在许多公众集会上被越来越多的群众所了解和崇拜。

在1968年的头几个月里，官僚机构实际上已停止运转，在政治生活中得到崇拜的，已不再是那些占据着高位、操纵着官僚机器的人，而是那些与人民贴得最近、又能抓住听众注意力的人。

3月下旬，面带笑容、满怀激情的斯姆尔科夫斯基在布拉格市中心的“卢米纳大

厅”向青年党员演讲时，只能容纳3000人的大厅，挤进了6000多人。

斯姆尔科夫斯基的演讲给青年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将他们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对改革进程的思考。

这次进行了6个小时的会议，通过了一项提交国民议会的决议：

- 一、要求诺沃提尼离开总统府；
- 二、正式取消新闻检查制度；
- 三、实行旅行自由；
- 四、实行有效的政治、经济改革；
- 五、对一切事情都应向人民说真话；
- 六、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 七、与苏联建立平等的关系。

这7条很能说明人民的政治觉悟以及人民希望即将来临的春天给他们带来什么。

报纸、刊物、电台空前活跃；人民对改革前景空前关心；人民的意志迅速反映出来，并对政治家的活动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这种政治现象是害怕而加以制止排斥，还是大胆顺应并组织引导这股力量去实现人民的目标？这是区别一个政治家是官僚政客，还是人民领袖的重要标志。

刚上任的杜布切克就面临着这样的考验。

在1968年的头几个月，如果杜布切克停留在对诺沃提尼的胜利上，如果他仍用旧的、已经落在他手里的权力机关实行统治，那么，权力垄断的大门是向他敞开的，这结果是他必然会拒绝将来自人民的政治力量引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而最终与这股力量处于敌对的位置。

这种假设不是没有根据的危言耸听。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次被人民拥戴上台的政治家，尽管在初期也能惩罚旧的罪恶，也能运用从旧统治者手中接过的权力做一些与人民的愿望相符的事，但由于他没有将民主力量直接引入政治事务，而只是为民作主，结果

都没有逃掉被旧的、与人民分离的权力所异化，而最终堕落成一个反人民的统治者。

然而在1968年的布拉格，我们这种不祥的假设没有成为事实。

面对这股强大的、完全不为官方控制的民主浪潮，杜布切克——这位沉默、文静的政治家，证明他确实具有一位领袖的气魄，他说：“让我们不要害怕这个浪潮，让我们从中学学习吧！党应该分析和领导这个浪潮。”

杜布切克对民主力量的爱惜和重视，竟被当时和后来的一些人说成是优柔寡断、不能控制局面。实际上，一个政治家不依靠专制权力实行领导则需要更大的魄力和引导民主力量的政治天才。

杜布切克是“布拉格之春”得以顺利诞生的助产士。这是捷克人民的幸运，也是杜布切党的幸运。在此之前，杜布切克并没有表现出他具有一个杰出领袖的品质——马克思的渊博深刻，列宁抓住历史时机的敏锐和勇气，拿破仑的意志——但因为他作出了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位政治家在人民爆发出智慧和力量的时刻才敢于作出的选择：大胆地投入人民的行列，而不怕被人民的力量所淹没。他才成了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联系这一点，我们便不能接受个人在历史上无所作为的观点——有了杜布切克在1968年头几个月的勇气，姗姗来迟的春天终于降临到布拉格……

十一

权力的交接并不就是时代的交替，如果为诺沃提尼政权举行的葬礼不能同时将旧的统治方式一起埋葬，那么旧的专制迟早会悄悄从后门回来。

诺沃提尼政权的葬礼是1968年3月22日举行的。在此之前，诺沃提尼曾经作过一些精疲力竭、毫无希望的反抗，他甚至到工厂基层去作演说。他以为，靠他的工人出身和“要警惕知识分子专政”的挑拨，就能争得工人阶级的支持。

他要是能早一点明白工人阶级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就好了。

这位早就失尽人心的政治家，这个工人出身而根本没有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总统到这种时候才去接近人民，人们当然会把他跟想吃葡萄的狐狸联系在一起。

幸亏国防部发生了一件事，才使诺沃提尼停止了这场令表演者和观众双方都很难堪的表演。

2月底，在国防部的报纸上，发表了佩比赫少将的文章，第一次公开了去年12月未遂军事政变的丑闻。

文章发表后，政变的两个主谋，国防部党组书记谢伊纳携儿子叛逃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杨科上将自杀身亡。

这样一来，就把诺沃提尼一个人暴露在这件丑闻的中心。

尽管诺沃提尼又采取了牺牲别人、推卸责任的老一套方法——取消了谢伊纳的军衔。

尽管诺沃提尼确实具有一位政治家忍受众人嘲笑和责骂的勇气，尽管要这位职业领袖退出政治舞台确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但在这次突如其来的打击下，他终于顶不住了，于3月22日向国民议会正式提出了辞去总统职务的辞呈。

诺沃提尼搬出了他呆了12年之久的总统府。

新就任的总统是72岁的斯沃傅达。这个名字在捷克语中是“自由”的意思，然而在50年代的大清洗中，他并未保住个人的自由，反而被监禁。

现在，这位面容慈祥的白发老将军真能以他的名字作为一个新时代的象征吗？

人们非常习惯于将一个统治者的下台或一个政权的覆灭说成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沙皇被推翻时，人们庆贺过新时代的到来；1956年，当斯大林被赫鲁晓夫彻底否定后，人们又欢庆过斯大林时代的终结。然而历史曾经多么刻薄地嘲笑这样的欢庆啊。

旧的统治者和旧的政府消失了，可旧的机构、旧的统治方式、旧的思想、旧的秩序，一句话，旧的政治经济体制仍然保留着，它们必然造就出它们以前曾经造就过的那类领袖和政权。这绝不是人的意志力量可以抗拒的。

权力的交接并不能保证时代的交替。捷克斯洛伐克人会不会把他们的政治理想降落在权力交接点上？这是1968年的历史不动声色地注视着。

现在，一些意想不到的政治内幕真相已经透露，诺沃提尼及一些高级官员已经辞职，不寻常的大胆语言已经习以为常，经历了这种激动人心和痛快淋漓的阶段之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无所事事而又若有所失的倦怠，这会不会就是政治狂热换得的结果？捷克斯洛伐克会不会一切又重新开始——老百姓照常上班，照常过日子；官员们照常到各部、各局、各机关办公，行使权力？

如果是这样，捷克斯洛伐克人在1967、1968年的奋斗便与以前许多次失败的改革、革命毫无两样了。

捷克人民没有失败，他们已经接受了哥穆尔卡波兰的教训；在那里，在享受了巨大的热情和民主快慰之后，旧的极权制又悄悄从后门回来。因此，捷克民族必须保持住政治热情和从下面施加压力的民主力量，并使这种力量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制度化、法律化才能最终摧毁旧的制度。

这就是捷克人民在1968年春天对政治改革所寄托的希望。

全民族对当前时刻所寄托的希望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不顾改革派导演的计划自己登上“布拉格之春”的舞台，并且权威地支配着改革的进程。

特别幸运的是，改革派领袖没有萌发过将这股力量赶下台去的念头，而是在这股力量的驱使和支持下，拿出了一個全新的政治改革设计——四月《行动纲领》。

“布拉格之春”，在《行动纲领》的带领下，降临捷克斯洛伐克大地了。

十二

捷共将民主政治作为改革的行动纲领，是因为他们终于懂得：社会主义如果牺牲民主，倒霉的还是社会主义自己。

从题目上看，《行动纲领》就区别于以往那些与政治实践脱节的官样文章。

这份长达60多页的《行动纲领》是杜布切克在2月初提议，由专家们起草完成的。希克教授主要负责经济部分，曾经组织过《十字路口的文明》调查报告的里赫塔博士和后来成为捷共中央书记的姆林纳日着重起草改革的政治部分。

这个纲须在2月底就制定出来，3月上旬，主席团成员分别赴各州县，与地方党组织举行了60多次关于纲领草案的讨论会议。

现在，改革派在中央委员会尚未占据绝对多数，新领导必须从党的中下层领导那里获得支持，以争取在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过。

社会舆论对纲领草案的修改有了很积极的介入，使纲领能更大程度地表达人民的意志。尽管如此，当主席团于4月2日通过并宣布这个非常激进的改革纲领时，还表示“这个

纲领并不是改革的定论”，应该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在经济体制改革部分，除了以前有过的扩大企业权限，加强市场机制之外，最值得一提的是“成立工人委员会，实行工人自治和民主管理”。“企业职工选举产生的职工委员会有权任免企业经理、决定企业方针和计划”。

纲领将扩大的企业自主权直接交给了生产者。

企业自治和工人自治并不是同一概念，只有后者才能真正体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原则。

《行动纲领》的最大成就在于对政治体制作根本性改变。这是与反对党和国家的集权专制和实行政治民主化同时并举的。

纲领首先承认，捷共已从为全体人民服务的政治组织蜕变成凌驾于社会之上、对人民实行统治的特殊利益集团。

为改变这一状况，纲领指出：

“共产党依靠的是人民的自愿支持，它不是靠统治社会来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而是靠忠诚地服务于社会的自由、进步的社会主义发展而赢得它。党的威信不是逼出来的，而必须依靠自己的行动不断赢得。它的路线不能靠命令来贯彻。”

纲领表示，“党的目标不是当社会的‘总管家’，用自己的指令捆住社会的手脚，对生活的每一步都加以限制。”

对于实行镇压职能的保安部门进行整顿和彻底改革，把它们的权力局限在保护国家安全，对付外国敌对活动的范围里。纲领强调，要坚决制止公安机关对公民政治信仰和观点的干预、限制。

纲领指出：

“没有犯罪的每一个公民可以放心地看到，他的政治信念和观点，他的个人信仰和活动不会成为国家安全机关注意的对象。党明确直布，不允许这个机器用来解决内部政治问题和社会主义矛盾。”

以往的专制极权都是以警察统治为手段的。保安部门作为扼杀政治民主的直接工具，对社会的政治恐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纲领的这一条款无疑是一个对民主化进程

的保证。

纲领没有仅仅满足于对政治生活中的集权专制进行批评，它同时把民主政治作为行动纲领的最终目标。它确认了国民议会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唯一的立法机构，而国民议会通过直接普选产生。

纲领将确保公民的权力、自由以及人民能监督政府、参与管理国家，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它指责过去的体制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弄颠倒了，所以不仅妨碍了个人的发展，也阻挠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纲领提出社会主义为人民提供的自由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多，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的公民自由是形式上的就否定自由本身，而应该赋予它实际内容。

对此，纲领对民主、自由作了十分具体的规定：

1，要由法律保证公民有建立自愿组织，兴趣组织和社团的可能性，不要以官僚主义加以限制；

2，公民有讨论和影响国家决策的自由，“不能通过任意解释、依靠权力规定允许他们知道什么和不允许他们知道什么，他们哪些意见可以公开讲，哪些意见不可以公开讲……必须系统地研究舆论，研究的主要结果应公布于众。”

3，实行新闻报道自由，取消新闻检查，“排除实际上存在的事先进行新闻检查的可能性……在报刊中要把国家的官方立场、党的机关报和新闻评论加以区别”。

4. 迁徙自由，“法律要准确地规定行动自由，特别是公民到国外旅游的自由；主要的是公民有权在国外长期或持久居住，不许把人们无根据地置于流亡者的地位。”

《行动纲领》将民主和自由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因为历史早已证明，没有民主自由就无法清除官僚政治，而不清除官僚政治，改革就必定失败。

保守势力习惯将民主、自由划入资产阶级范畴，仿佛民主化、自由化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社会主义是非民主、不自由的。长期以来，这种观点竟常被用来作为捍卫社会主义的武器，真是天大的讽刺。

1968年的捷克改革派共产党人，将政治体制的改革放在改革的首位，又将政治生活民主化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决条件，是他们为20年的专制统治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终于找到了这样一条真理——社会主义如果牺牲民主，倒霉的还是社会主义自己。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前提，社会主义是民主的一种形式。改革派共产党人呼唤民主政治正是为了重建社会主义。所以，纲领称这次伟大的运动为“社会主义事业复兴”运动。

在纲领中到处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奋斗目标：

“新的、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

“具有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

“拥有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

“具有发达文化的社会主义”；

还有更准确的提法：“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

1968年4月1日，杜布切克在中央全会上发言，论述《行动纲领》的思想。他宣称，人是社会主义思想中占中心地位的因素。

杜布切克所说的中心地位，不仅仅指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不仅仅指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爆发出非常大的劳动力、创造力，可以吃很大的苦，耐很大的劳，可以移山，可以填海；而是指社会主义应该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放在中心地位，而民主则是实现这个伟大思想、走向人的解放的第一步。

在这次全会上，捷共的某些领导成员曾担心《行动纲领》的实施会使共产党在民主力量的压力下失去对局势的控制、担心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会危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对这种担忧，杜布切克镇定地表示：“公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关心国家大事”是好事，党必须采取灵活的适应性以便能接近人民。他认为，共产党应该在人民的支持下实行自己的职责，而不是用暴力进行统治。

杜布切克建议：“今后，捷克斯洛伐克的任何组织——不管是军队还是体育组织——都不要再做为共产党服务的顺从的传送带。”

1968年4月5日，经过几天的大会讨论和排除了保守势力千方百计的阻挠之后，捷共中央委员会批准通过了《行动纲领》。

“布拉格之春”全面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它宣告了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20年的斯大林主义统治结束了；同时，新的组织在这个经过了重大手术的国家肌体上生长起来——

4月6日，即中央全会通过《行动纲领》的第二天，列纳尔特总理代表政府向总统斯沃博达提出辞职；

4月8日，改革的倡导者切尔尼克被任命为总理，并着手组建新内阁；

4月18日，改革派政治家、“人民代言人”式的人物斯姆尔科夫斯基被任命为国民议会主席；

4月下旬，切尔尼克在国民议会提出施政纲领：保证贯彻四月《行动纲领》，沿着人道的社会主义路线前进。在新施政纲领中，切尔尼克提出一条原则：“今后政府将主要向国民议会负责，而不是向党负责”；

5月13日，国民议会通过一个法律草案，为所有1948年到1956年非法审讯的牺牲者平反；

5月27日，政府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安全、司法部门侵犯公民权力的“非法行为”，为投诉秘密警察的罪行打开了道路……

5月底，民主化进程达到高潮，从人民中写来的信件和电报雪片般地飞向捷共中央，对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等改革派领袖表示支持，同时要求在即将召开的捷共中央全会上，把阻挠改革的保守派撵走。

当时，党内的改革派与受到苏联支持的保守派已经阵线分明，后者在110人的中央委员会中占有40个名额。

5月29日召开的中央全会，没能实现民众的愿望——彻底清除保守派。因为改革派没能在中央委员会里控制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

当然小小的胜利还是有的，那就是将声名狼藉的诺沃提尼——保守派到此时也愿意牺牲他了——及6名对过去大清洗负有直接责任的官员开除中央委员会，并暂停他们的党籍。

经历了许多苦难和失望之后，捷克斯洛伐克人终于有了成熟的政治设计和成功的行动了。

这一切都是在春天发生的。这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季节。捷克斯洛伐克人在这个辉煌的日子里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他们当然有权利怀着喜悦的心情等待着丰收。

然而，当捷克人民播种希望的时候，有没有人偷偷地埋下了灾难的种子？这是需要等待才能证明的。

捷克人必须等待，就如他们的作家瓦丘利克所说：“刚刚结束的春天一去不复返了，要到冬天，我们才能明白一切。”

美妙的5月就要逝去了，尽管她不一定能将丰收给予这个辛勤耕耘的民族，她——1968年春天依然是辉煌的、美丽动人的……



被霸权扼杀的春天——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三）

十三

捷克斯洛伐克人是伟大的，他们最早赢得了春天；捷克斯洛伐克人是不幸的，她身后站着一个人凶眉怒眼的巨人……

人道、民主意识在摆脱了专制恐怖之后，登上了1968年的政治舞台，并且在整个春天威风凛凛地控制着局势。

可是保守分子和极权专制的拥护者还在整个权力结构中占有许多职位，并得到克里姆林宫的支持。过了5月，这个强有力的对手显示出来的危险越来越明显了。

在5月全会上，尽管改革派得到的胜利是微小的，共产世界的教皇也迅速作出了反应。5月29日，也就是捷共中央全会将诺沃提尼等6名中央委员开除的当天，华约部队总参谋长、苏联将军卡扎科夫率代表团抵达布拉格，宣布华约部队将在捷、波境内进行军事演习；5月31日，布拉格电视台播放了苏军演习部队从乌克兰调往捷克的新闻……

捷克人的政治视线被这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吸引过去。被改革、民主鼓舞起来的喜庆气氛顿时被不祥的预感所取代；另一方面，这次军事行动却鼓舞了中央委员会里以比拉克、英德拉为首的“斯大林主义派”，使他们更为团结和充满信心。

保守派反守为攻，在以后几天的全会上，对杜布切克进行猛烈的攻击。党内的派别斗争明朗化了，反改革的阴谋也公开了。

改革派领袖希望在9月所召开的“十四大”，能够选出一个进步的中央委员会的计划受到挫折。

改革派不能坐等“十四大”的召开，于是也激烈地投入了战斗。

全会闭幕的第二天，杜布切克便来到改革的根据地布尔诺。

在有6000人参加的党员干部大会上，杜布切克对保守派进行了回击。他称保守派是民主化进程的“最大危险”，并且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把这些人都称为“反动派”。

杜布切克的战斗姿态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

改革派的其他领袖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等人也分赴全国各地，到工厂、到基层党组织去宣传改革。

这是一场比推翻诺沃提尼政权更加艰难的战斗。

保守派的首领、斯洛伐克的第一书记比拉克和中央书记英德拉也同样周游各地，发表演说，找支持他们的各级官僚召开秘密会议。保守派还散发数万张不署名的传单，指责改革派“背叛社会主义”，说改革派设计的新社会主义模式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这些传单没有敢直接攻击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等改革派最高领导人，而仅仅点到了新任副总理的希克教授和作家协会新任主席戈尔德斯图克，但它的矛头所指是十分明确的。

按说，改革派占据着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又有全民族的拥护，保守派的这种手段应该说是软弱的反抗、愚蠢的暴露。然而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此时，克里姆林宫已经明白，牺牲诺沃提尼，给最初的改革开放绿灯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它不准备再错下去。

由克里姆林宫指挥的华约国家合唱队首先喊出了对捷克改革的干预。仍在掌权的邻国斯大林主义者东德的乌布利希、波兰的哥穆尔卡公开干预捷克内政，对杜布切克施加压力。因为他们的专制统治正处于危机之处，他们唯恐捷克的民主化运动会蔓延到他们国家。

他们把“布拉格之春”描绘成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和帝国主义的阴谋，说改革派与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西德复仇主义狼狈为奸。

东德和波兰都对布拉格电台进行干扰。东德政府禁止布拉格出版的德语报纸在东德发行。一家东德报纸为了证明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正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竟然报道了“美国兵伪装成拍摄电影《里马根桥》的临时演员，进入捷境”的消息。

波兰在春天发生了要求民主化的学生运动，被哥穆尔卡说成是受了邻国“敌对社会主义的势力”的欺骗和煽动。为此，哥穆尔卡指名批评了捷克的“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波兰还因为捷克报刊上报道了波兰国内动乱的消息，而向捷提出强烈抗议。捷克的外交官庄严地进行了反驳，他说：“捷克斯洛伐克的报刊是自由的，它应该发表什么，不应该发表什么是不能由政府规定的。”

除了舆论和外交的压力，还有赤裸裸的军事威胁和暗示：苏军总政治部主任皮谢夫将军在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上说，“只要有一个捷克政府要求援助，苏联军队随时可以采取行动。”

对这种粗暴的干涉，任何一个民族都可能上街游行，至少也会到这个国家的大使馆门前去扔石头，砸碎几块玻璃。

捷克人却以他们的教养和幽默选择了另一种回答方式。

5月17日，当这位身材矮胖的将军随苏联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布拉格时，代表团刚走下飞机，布拉格电视台的女记者、非常美丽的哈弗利奇娃迎上前去。她绕过代表团团长、苏联国防部长格烈奇科元帅径直走到皮谢夫面前，把话筒举到将军挂满勋章的胸前。

这位漂亮的女记者迷人的一笑，非常有礼貌地问道：“您是否确实曾提议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干涉？”于是所有的电视观众都看到了这样的场面：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这位将军非常艰难地微笑了一下，用俄语说，“这是一件蠢事。”当然，他当时绝无笑的兴致，有的只是难堪和愤怒，但他不敢不笑，不敢不说这句他绝不愿说的话。

政府对这一系列粗暴干预的回击也是冷静的、富有理智的。

5月中旬，由切尔尼克总理和希克副总理主持了一个由东西方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在这次招待会上，切尔尼克重申了新政权的指导原则是“强调公民民主权利和自由”；并宣布正在准备通过一个保障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新法律；同时新的选举法也正在起草。

5月13日，国家电台就国外对捷克民主化运动的攻击进行反驳，它说：“这20年来的实践使我们相信，没有民主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性质越来越清楚了——那是民主与专制的斗争。

5月13日，捷共中央机关据《红色权利报》就民主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意测验。这等于号召全国人民都投入这场斗争、都来回答民主的命运是否决定改革的命运？

以下是这次20个民意测验问题中的核心问题：

当只有共产党一党起领导作用时，你能说这种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

共产党是应该通过努力促进自由的、进步的社会主义发展来实现其领导作用呢，还是应该对社会主义进行统治来实现领导作用？

新的政治制度在作出政治决定的时候，是否应该为社会主义的各集团和各阶层的人们的广泛要求提供自由、民主的讲坛？

捷克斯洛伐克的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不是我国的内政，是不是必须由我国人民的独立意志来决定？

..... 这些问题并不难，它们的答案是明明白白摆在那里的。如果这只是一场关于真理的讨论、只是真理与谬论的较量，问题就简单多了，民主的胜利垂手可得。因为捷克人民已经在专制下付出过代价，已经为民主进行过冷静的思考，已经从改革中尝到失败的教训，他们已经懂得了什么是民主，懂得了民主对社会主义、对改革是生死攸关的。

然而在1968年5月，改革派共产党人和捷克人民面对的，不仅是旧势力的残余，还有苏联的强权。真理即使已被人民所认识所掌握，它能不能获得自己的生存尚是一个令人揪心的难题。

对民主化进程的险恶威胁象恶梦般压在刚刚呼吸过春天芬芳气息的捷克民族身上，刺激着他们刚刚苏醒了的民主人道意识；同时，改革派领袖在强权压力下所采取的不妥协态度，从另一方面鼓舞着捷克人民。

压抑和鼓舞，担忧和希望，对未来的信心和发生悲剧的预感都交织在一起，刺激着这个冷静而成熟的民族，要他们拿出更多的勇气和热情。

十四

《2000字宣言》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渴望政治体制改革心态的写照，它激发出最动人的民主、人道意识，也招致了最险恶的粗暴干预。

不仅有春天的播种，还有夏日更加艰辛的耕种。捷克人拿出了比春天时更多的热情，将支持和信任交给改革派领导人，以敦促改革事业不致在内外的压力下停顿下来。

在这次行动中，率先冲锋的又是科学家和作家们。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不愧为民族的先导。

月初，作协主席戈尔德斯图克和副主席利姆率众前往北部煤炭钢铁中心俄斯特拉发市，作政治性游说访问。那里的一些工人因为没能在前几年的经济改革中受益，使他们成为“改革”的受害者而对当前的改革存有疑虑。保守派曾利用了这一点。

作家们揭露了以往官僚利用手中的持权和改革提供的机会巧取豪夺的事实，讲述了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改革的必要保证；还讲到了平反昭雪，讲到了工人自治对民主进程举足轻重的影响。

作家们的论述引起了工人们的兴趣，他们频频提出问题和作家们讨论，并以热烈的掌声对新的、政治体制改革表示欢迎。

除了演说，更有力的武器当然是作家手中的笔。

在“布拉格之春”期间，许多深刻的改革思想不是出自理论家，而是出于作家笔下。

作协的《文学通讯》上发表的许多文章，成了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布拉格之春”增添了许多绚丽的色彩。其中显著名的是由作家瓦丘利克执笔的《2000字宣言》。

这份宣言发表在1968年6月27日的《文学通讯》上，距他在1967年6月27日的作协会议上发表那篇著名演说整整一年。

在“布拉格之春”期间，除了捷共的《行动纲领》，没有任何文件比瓦丘利克的《2000字宣言》影响更大。

因为这篇宣言，瓦丘利克于1969年被又一次开除出党；因为这份直言，苏联找到了出兵的理由；当然，没有这份直言，苏联也会找到借口。这篇文章对捷克的政治改革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它向人民宣告：在国家的政治事务中，群众是可以作为自由人行动的。

《2000字宣言》作为要求民主、反抗暴政的记录，其形式和内容都给以后的无论是理论家、政治家，还是以艺术为使命的作家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要了解“布拉格之春”，必须了解《2000字宣言》；就如《行动纲领》是改革派共产党人最权威的改革宣言一样，《2000字宣言》是捷克人民渴望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呼声。

宣言对这场改革的命运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个文件。

宣言首先从历史检讨开始：

领导上的错误路线，使党从一个政党和思想上的联盟，变成了一个权力组织，使得它对那些权欲熏心的自私自利者、可耻的胆小鬼和心怀鬼胎的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渗入党内，影响了党的性质和作风。

统治者的主要罪恶和最大骗局是，他们把自己的专横说成是工人阶级的意志。

然而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工人有这种罪过。工人实际上什么事都没有决定过……实际上是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阶层以工人的名义进行统治。这些人实际上占据了被推翻了的阶级的地位，自己成了新的贵族。

宣言指出，改革是共产党拯救自己的最后机会：

我们正处在民族文化的复兴之中。它是在共产党内开始的。当然，需要补充的是，这一过程也是不可能在别的地方开始的。因为整整20年来，只有共产党人能过某种政治生活，只有共产党内的反对派才具有同对手接触的优越性。因此，民主共产党人的首创精神和努力，是偿还整个党由于把非党人士置于不平等地位而对他们欠下的债的唯一办法。因而对共产党无任何感激可言。

削弱了共产党的权威的，并不是人民的批评和反对意见，而是这个制度本身：

经过了20年没有受到任何人反对的统治之后，这个领导显然必定疲沓不堪了。

那个制度的基础和意识形态中所包含的全部缺点，显然已经完全熟透了。因此让我们不要过高地估计作家们和学生们所提出的批评的意义。经济是变革的根源。我国的情况是普遍的贫困和政治制度的彻底崩溃，我们听任某一类政客轻易地牺牲我们的利益，作出不讲原则的事情，因此，不是真理压倒一切，而是别的东西都耗尽，剩下的就只有真理了。没有举国欢庆的理由，只能说有了一线希望。

《2000字宣言》阐明了这样的立场——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性质；改革应争得党内改革派的支持：

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观点：说可以在没有共产党人，甚至在反对他们的情况下进行某种民主复兴。如果这样，既不公平，也不合情理。共产党有很好的组织，必须支持他们

中进步的一翼。他们有经验丰富的干部；归根结底，他们手中握有决定性的杠杆和按钮。公众面前摆着他们的《行动纲领》，这也是第一次解决最大的不平等现象的纲领，任何其他人没有提出任何同样具体的纲领，应该要求他们在每一个县、每一个村镇向公众提出自己的行动纲领。

捷共正在召开他们的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将会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让我们要求它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更好一些。如果共产党现在说它希望依赖于公众对它的信心而不是使用暴力，那就让我们尽可能信任它。

宣言强调，民主不仅是在法律条文上写出权利属于人民，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属于谁？社会的经济命脉是否掌握劳动者手中：

今后民主制度的实际质量，取决于工厂的命运和工厂内部会发生些什么。尽管我们讨论了这么多，经理们还是可以要挟我们。因此必须找到一些好的经理，并且支持他们.....

工人们作为生产者可通过把什么人选入企业管理机构和企业管理委员会来对这场斗争施加影响。他们能为自己作出的最好选择，就是把天然的工人领袖，有才能和廉洁的人作为自己的代表选入工会机构，而不管这些人是否党员。

《2000字宣言》号召人民运用冷静而合法的民主力量，迫使阻挠改革的官僚辞职，但绝不采用暴力，以免造成混乱：

如果目前对中央的政治机器不能有更多的愿望，那就必须在各县、镇取得更大的成就，让我们要求那些滥用权力、掠夺公共财产、行为不正或残暴的人辞职。必须找到迫使他们离职的方法，比如：公开批评，作出决议，游行示威，组织示威性工作队，为他们退休征集筹募捐款，罢工，抵制他们上办公室等等。但我们必须拒绝采用不合法的、无礼的、粗暴的方法，因为有人会利用这些去影响杜布切克.....

宣言请政府放心，当它面对强权的威胁时，它身后有整个民族作为后盾：

最近时期，外国势力干预我们国内的发展的可能性引起了很大的不安。面对着优势力量，我们只能有礼貌地保持坚定态度，而且不去触犯别人。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政府知道，只要它遵照我们的委托办事，我们就支持它，甚至可以拿起武器来。

《2000字宣言》在《文学通讯》上发表后，工会的《劳动报》，青年联盟的《青年战线》以及《农业报》立即转载了。

在瓦丘利克这份宣言上签名的有70人，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社会阶层：艺术家、科学家、体育工作者、教授、工人、工程师、教师、律师、经济学家，甚至还有农庄饲养员和个体农民。

这些签名者中不仅有共产党员，还有几位捷共中央委员。

《2000字宣言》在4家报纸发表以后，在布拉格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大街上都摆上了桌子，征集签名。数以万计的捷克公民在声明上签字，支持这份宣言，支持改革。

宣言打破了僵持，给静静等待的捷克人带来了新的希望和狂热。“布拉格之春”达到了高潮。

同时，宣言的发表也给改革的敌人造就了施展阴谋的机会和借口。蕴酿已久的决战开始了。

十五

为了改革而拒绝人民对改革的支持，政府谴责了《2000字宣言》；然而此时，改革派已无退路只能将改革进行到底！

《2000字宣言》发表后几小时，莫斯科就得到了宣言全文。

克里姆林宫的反应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事实上，真正使莫斯科惊慌失措的，是民主所爆发的力量，而不是“甚至可以拿起武器来”的誓言；因为克里姆林宫有更多的武器和更强大的武力。

当即，勃列日涅夫打电话给杜布切克，抗议这一“反革命”宣言，并要求捷共当局公开谴责这个声明。

也是这一天，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到党中央大厦去，在大门口的台阶上碰见了苏联驻捷大使。

这位以殖民地总督自居的大使板着面孔，一句问好的话也没有就直截了当地问他，准备如何对待《文学通讯》上的这篇文章？

斯姆尔科夫斯基当时还不知道报上发表《2000字宣言》的事，但他不喜欢这种不加掩饰的干预，就冷冰冰地说：“那是作家们的事，他们有权力说受他们的良心所驱使的

话。”于是真是少有的事，一个大使居然向驻在国的首脑发起脾气来！大使指责他说：你们的报纸无权发表反革命号召书！

这位大使同时要斯姆尔科夫斯基解释“甚至可以拿起武器”是什么意思？

斯姆尔科夫斯基从大使的质问中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抑制住个人的忿怒，尽快地了解宣言的内容，并召集议会讨论这件事。

当天下午，捷共主席团召开会议。保守派首先发言，他们说《2000字宣言》是反苏挑衅，说国内正面临着反革命内战的危险，说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就要在捷克重演。

保守派还强烈地谴责杜布切克，指责他听任局势发展到能让这样一个宣言出笼的地步。

在这种内外夹攻的压力下，杜布切克和他的改革派为了改革事业，为了不使局势发展到必须用坦克来解决的地步，竟然“悲哀地同意应该谴责《2000字宣言》”。

几小时后，捷共中央主席团发表特别声明，谴责《2000字宣言》是“对当前整个民主化进程的明显威胁”。

中间派从中立到动摇，保守派从顽抗到全面反攻。英德拉发电报给各州党组织，要他们注意制止“反革命的煽动”；比拉克控制的斯洛伐克中央主席团则发表了一个更加尖锐的谴责声明。

形势变得严峻起来。

为了避免1956年的匈牙利悲剧重演，改革派领袖采取了最大的克制态度，以平息苏联的怒火。

在中央主席团表态之后，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要求切尔尼克总理，让政府出面反对《2000字宣言》的结论。

一直拖到深夜一点，切尔尼克打电话告诉斯姆尔科夫斯基，他“说服不了政府，政府不想表态”。斯姆尔科夫斯基连夜赶到政府驻地。以国民议会主席的身份出席政府会议。他讲述了局势的严峻性，并警告说：“议会明早9点钟或10点等着你们总理的报告，如果你们不表明明确立场，那就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政府将在一个星期以后表态，但这将是另一届政府，而不是你们了。”

28日早晨，总理在国民议会讲话，公布了政府对《200字宣言》的谴责声明。

要改革派领袖、尤其是要斯姆尔科夫斯基这样激进的改革家作出这样痛苦的决定真是令人悲哀。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种战略性撤退：为了改革而暂时拒绝对改革的支持；为了民主而暂时压制民主的呼声。

然而这种妥协真能为改革争得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吗？

这值得怀疑。

1968年夏天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朗：它和12年前匈牙利人所面临过的形势完全一样——要么完全、彻底地停止民主化进程，要么承受外来武力的干涉。

问题在于，在“布拉格之春”以后，即使是改革派领袖也无法改变运动的势头，更不用说使它完全停下来。改革派别无选择，他们只有让民主化运动发展下去，直到苏联出兵为止……



被霸权扼杀的春天——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四）

十六

即使军事干预的危险迫在眉睫，捷共仍然拒绝用旧的官僚主义警察统治来实现政治领导……

当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的攻击跨过国界、扩大到整个东欧和苏联，对改革的围剿才真正开始了。苏共中央机关报《其理报》展开了宣传攻势，说类似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反革命势力”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蔓延；勃列日涅夫和几个东欧国家的领导人，频频展开外交活动，大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强调“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重要性；华约部队7月初，在捷境内和邻国的军事演习搞得热火朝天……

1968年7月8日，勃列日涅夫及东欧4国的首领东德的乌布利希、匈牙利的卡达尔、波兰的哥穆尔卡和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分别电告杜布切克，要他7月1日去华沙参加华约国家最高领导人会议，讨论《2000字宣言》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事业的威胁。

7月9日，捷共中央主席团讨论5国首脑的邀请信。

总理切尔尼克提议，在目前的局势下，党的中央主席团不应该参加共和国领土以外的任何会议。

除了保守派比拉克和科尔德，主席团一致决定，拒绝这一命令式的会议邀请。

7月14日，华约条约最高级会谈，在捷克斯洛伐克缺席的情况下召开。

7月16日，华约会议通过了与会5国给捷克斯洛伐克的联名信。

这封最后通牒式的联名信，公开表示对捷克内政的干预。

联名信说：

我们不能坐视敌对势力把你们的国家推离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引起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危险。这已经不仅仅是你们一国的事情了……

反动势力利用了捷共领导的软弱，滥用了“民主化”的口号蛊惑人心，发动一场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及其忠诚可靠的干部的运动，其目的显然是要取消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反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势力把黑手伸向报刊、广播和电视中去，把它们变成攻击共产党的讲坛……这正是反动派能够利用《2000字直言》的形式向全国发出号召，公开自己的政治纲领的原因。这个声明直言不讳地号召反对共产党和合法政府，煽动罢工和骚乱。

因此我们相信，坚决击退反共势力的进攻，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你们的任务。也是我们的任务。

到此刻，矛盾的焦点已经很清楚：当成千上万的捷克人民参与国家大事、参与改革而打破了封闭式的官僚政治的秩序时，应该如何评价这种不安定的政治局势是将其当成民主力量、民主政治的体现而加以珍惜、引导，还是当成反革命动乱而加以讨伐？

这个矛盾当然不是出自认识上的差距，它深刻地体现了两个彼此对立的社会集团在争取各自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斗争中所具有的完全相反的原则。

捷共中央立即召开了中央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拒绝五国联名信，并拟定了反驳这封指责信的复信。

会议坚定地表示，捷共将继续贯彻自己的方针路线，并表示捷共并不认为国内存在着来信中所说的“反革命危险”。

7月18日，杜布切克向全国人民发表电视讲话，反驳了华沙条约五国来信。他以沉着和自信的语气向人民宣告了中央主席团的复信内容，并告诉人民，复信将提交中央委员会通过。

如果没有整个民族的充分信赖和支持，杜布切克在强大的压力面前是很难有如此的沉着和决断的。

7月19日，捷共召开中央全会，107名中央委员中的87名出席了全会。全体与会者一致通过了中央主席团的复信，并对杜布切克和中央主席团的不妥协立场表示了支持。

在这次全会上，甚至连反对改革的亲莫斯科分子比拉克、英德拉也与其他委员一样投了支持票；或许，反对派只是慑服于此时在全国爆发出来的民主和民族的威力，而不敢将自己置于人民的对立面。

这封语气温和而态度却十分坚定的复信断然拒绝了关于“社会主义受到威胁”和“捷共的政治作用在反动的、反革命势力的压力下趋于衰退”的指责。

捷共中央在复信中自豪地宣称：

我们党新的、民主化的政策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日益提高，绝大多数人民关心国家大事。我们认为，这是当前局势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我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中的绝大多数赞成废除书报检查制度，赞成言论自由。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正在努力证明，它是能够用一种不同于（过去的）声名狼藉的官僚主义警察统治的方法来实现政治领导和管理的。

当捷共和捷克人民用克制和妥协并没有换得对方对捷克内部的改革事业的谅解和尊重后，捷克人民恢复了他们的热情和决心；捷共拿出了更多的勇气和力量。

从复信中摘出的短短几行就可以看出，捷共对于民主政治有了更加直截了当地呼唤，对改革有了比4月《行动纲领》更高的目标；它甚至比某些来自下层的要求民主权力的宣言、声明具有更多的民主意识。

失去了民主自由的人民要求民主权力是正常的，一个在野的政治家或政党高举民主的大旗也不足为奇；而一个仍然执掌着政权的政党，一个正行使着统治权力的官方，能在它的官方文件中如此热诚地呼唤民主，的确是令人激动和尊敬的。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权力，必须将自己的统治权力置于民主力量的监督、制约之下。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她的“布拉格之春”给社会主义事业留下了一个伟大的文件，给社会主义改革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以后几个月的深重危机中，捷共能得到整个民族的巨大支持，其答案就在这里了。

然而另一方面，改革的目标越明确，民主政治显示出来的力量越强大，克里姆林宫

的态度便更加强硬。

对于以官僚、警察、军队统治着本国、也控制着东欧的霸权来说，这同样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它必须扼杀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事业。这是决心已定的事。它的时机已不多了，它的手段除了赤裸裸的暴力，也只剩下谈判桌上的威胁了。

苏联向捷共提出邀请，请捷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去莫斯科、基辅或其他城市与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谈。

捷共非常理智而正确地拒绝了这次邀请。

他们熟悉东欧的历史，他们记得1948年铁托正确地拒绝了斯大林的会谈邀请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同时也记得纳吉的几次失败的、悲剧性的谈判。

谁也不相信参加了这样谈判后，还能带着个人和民族的尊严返回祖国。

最后，谈判地点选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小镇切尔纳。它距苏联只有3公里，是一个很难在地图上找到的小镇。

1968年7月29日，一辆专列从苏联开到切尔纳，载来了苏共11名政治局委员中的9位。克里姆林宫的三驾马车：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总理柯西金、国家元首波相戈尔内都在其中；同时，另一辆专列从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开来，送来了斯沃博达总统和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全部11名成员。

这时，这个只有一个火车小站和2000人口的小镇突然成了世界瞩目的中心。数百名新闻记者跟踪而来，他们预感到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较量就要开始了。

然而，这是一次失败的会议，它留下的只是一些戏剧性场面。

十七

一次就象老百姓在生活中吵架一样的会议，就能将专制和民主调和起来吗？

会谈是由勃列日涅夫怒气冲冲地将一捆剪报扔在谈判桌上开始的。

这捆剪报不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摘录，也不是苏共或捷共的重要文件。剪报是从最近几个月来捷克的报刊上剪下来的，其中当然有刊登了《2000字直言》的报纸。

勃列日涅夫逐一引用这些剪报作为捷共已失去控制、反革命在捷克泛滥的证据。

苏联代表逐个发言，指责捷共领导容忍“背叛社会主义事业”、“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势力泛滥。

杜布切克承担着大部分发言。他温和而耐心地解释，同时也坚定地宣称，捷共在这场改革中的唯一目标是建立真正的、最好的社会主义。

勃列日涅夫却采用了另一种发言方式，他显然是真正动了感情。他以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原则，忿怒地向杜布切克咆哮：“你们的政策居然让所谓‘自由作家’们来发号施令，这简直是发疯！他们是帝国主义爪牙，至少也是在干着帝国主义所希望的事！”勃列日涅夫的粗暴激怒了坐在杜布切克身边的斯沃博达总统。这位72岁的老人气得满脸通红。他说，如果苏联以这种方式谈判，他宁愿辞职！他说，他本来就是一介农夫，他任何时候都可以挂冠归田。

会谈室的温度稍稍降了一点。苏联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那是一份要求捷共“非撤换不可”的人员名单。

名单上有捷克党政负责干部，甚至还有报刊电台的工作人员。这个名单上有250人。

即使要捷共自己开出这种包括基层人员的详细名单也是有困难的，可见苏联对捷克内政的关切和熟悉程度；也可见苏联的情报部门的工作效率。

当然，捷方拒绝接受如此具体的国际援助。

第一次会谈进行到晚上10点也没谈出结果。

第二天的会谈又是以勃列日涅夫拿出一张报纸指责捷共领导开始的。

这是一份刚刚出版的捷共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

昨天的会议，苏方批评过这个报纸的编辑部，在250名非撤换不可的名单中，就有这个编辑部里的编辑。

捷方的代表紧张起来，以为这家报纸的社论或重要文章出了问题，说不定又发表了类似《2000字宣言》的文章。

这几天，国内舆论的焦点都在切尔纳会谈上，人民在报刊上以各咱种方式表示对改

革和改革派领导人的支持，以加强捷共的谈判地位。对此，政治家们深受感动；但是在这种关键时刻应该谨慎，别让对方抓住把柄才是。

然而事情完全不是捷方所担心的那样。勃列日涅夫愤怒的不是社论、不是重要文章、甚至不是它的报道，而是最末一版下角的一则小小的广告。

那是某个基层单位的捷共党支部征聘党支部书记的广告。它要求的条件只是大学毕业的文化程度。

勃列日涅夫大义愤填膺地斥责：“这就是证明捷克整个局势危险的典型事物。从没有被共产党的适当方法进行训练过的普普通通的人中间选用干部，要是搞这种事情，请问，共产主义会搞成啥样子？”勃列日涅夫是正确的，支部书记尽管比总书记小得多，但性质是一样的：都是权力的象征。怎么能将共产党掌握的权力随便交给一个仅仅是有学历的人呢？

捷方不同意勃列日涅夫的指责，他们用了整整两个小时进行争辩。

捷克共产党人也是对的，如果共产党内是民主的，那么书记仅仅是按党的章程和党员意志工作的办事员而不是掌权者；如果权力在全体党员手里，当然可以象征聘一名会计、一位律师那样去聘用一名能干的党务工作者。

会谈中所争论的问题就是这么琐碎和微小，但其反映出来的矛盾却是那么巨大、深刻和难以调和。

捷克人一点儿也不退让，这使苏方的谈判人员既愤怒又诧异，在他们与东欧的外交往来中，还从来没有过如此针锋相对的先例。

他们开始对捷克展开了非常激烈的攻击。乌克兰党中央书记谢列斯特肝火最旺，他攻击捷共搞反革命修正主义，甚至指责捷克人把传单散发到苏联境内，对苏联搞民族分裂。

他的态度完全不象一个大国的领袖人物，倒象一个发脾气的农庄主席在训斥工作中出了差错的农庄庄员。

谢列斯特一坐下，杜布切克马上站起来说：“假如您继续使用那种措词的话，即便继续进行这次会谈也不会有什么意义。”斯姆尔科夫斯基也站起来说：“如果再这样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导人举行会谈，我将不再参加这种有失尊严的侮辱性会谈。”于是捷方全体代表起来离开了会场。

后来，勃列日涅夫带着波德戈尔内、柯西金和谢列斯特登上了杜布切克的卧车。

表示了歉意之后，会谈才重新恢复。

然而矛盾无法调和，勃列日涅夫无法稍微长久一点压制他的怒火。他又发脾气了：他象老百姓骂架那样，骂捷克民族阵线主席克里格尔是“一个肮脏的犹太人！”；又象老百姓在生活中吵完架一样，骂完后，他气冲冲地离开了会谈室。

这一次是杜布切克去看望他。杜布切克离开了勃列日涅夫走后依然吵闹着的会谈室，徒步向苏联的专车走去，并在他的警卫人员惊慌失措地注视下，独自登上了勃列日涅夫的卧车。

这真是一次吵声不断、怒气不息的会谈。原订的宴会和记者招待会都取消了，这就更加深了会谈的神秘性。

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因为这次会谈而引起的紧张心理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

十八

人民愿意用民族的脊梁去分担领袖们的重负；领袖们却宁愿自己默默地承受到底。因为这是一副整个民族也难以承担的历史重担。

在切尔纳会谈之前，捷克人民就被危机感和责任感折磨得焦虑不安了。他们深知捷克民族正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历史关头。他们要求领导人拿出最大的勇气去参加会谈；同时也准备用整个民族脊梁去承受历史的重负。

1968年7月下旬，是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面临着最险恶的危机时刻，也是这个民族显示她的智慧和成熟的伟大时刻。

7月26日，在切尔纳会谈的前3天，《文学通讯》发表了由作家巴维尔·柯霍特执笔的呼吁书。

呼吁书指名道性地写给以杜布切克为首的几位改革家，将人民的信任交给他们，也委托他们在会谈中将捷克人民的意志宣告出来。

呼吁书写道：

同志们：在你们同苏共会谈的前夕，我写这封信给你们……正如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的那样，少数几个人将决定千百万人的命运。情况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想以表示支持的方式对你们有所帮助……

同志们，你们的历史性使命就是要说服苏共领导人，要他们相信，根据我国的利益和全世界进步力量的利益，我国的复兴过程必须进行到底……

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可以用4个词来表示：社会主义、同盟、主权、自由。

请你们用无数的实例来说服对方，向他们表明，现在我们党的威信和社会主义阵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稳固得多，请你们转告对方，我们需要自由、和平……

请你们代表我国人民来说话，在这些日子里人民已不再是一个抽象名词，他们变成了创造历史的力量……

希望你们行动起来，进行解释，但一定要团结一致地捍卫我们已经选择、并且只要一息尚存就坚决走到底的这条道路。我们将每时每刻地关注着你们的工作。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你们的报告。我们时刻想念着你们，希望你时刻想着我们。

呼吁书发表仅仅几个小时，全国就掀起了一个支持呼吁书的签字运动。在布拉格和其它城市的街头都张贴着这份呼吁书，摆在街头的桌子随处可见，人们排着长队，等着在呼吁书上签名。

历史上很少有人能用一篇短文将一个民族的意志、忧虑表达得如此准确；也很少有哪一篇短文能获得如此众多人民的响应。

呼吁书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请为我们写下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命运攸关的一页，请谨慎地写！但要鼓起勇气来写！失去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那是我们的不幸，你们的耻辱。我们信赖你们。

几百万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呼吁书上签了名，有的甚至写下了自己的地址。捷克共产党获得了它成立以来最令人激动的拥护。

人民与领袖如此紧密地拥抱在一起，历史上能有这样业绩的政治家并没有几位。

一个县的代表团曾经带着一本厚厚的签名簿专程赶到切尔纳小镇，要求会见杜布切克。他们带来了全县公民对作家柯霍特呼吁书的签名。

签名的有二万零几十人。他们说，这是全县的公民包括重病住院的病人都签了名，一个也不少。

斯姆尔科夫斯基代表杜布切克接见了这个县的代表团，也代表捷共接受了人民在呼吁书中提出的4项原则：社会主义、同盟、主权和自由。

斯姆尔科夫斯基称这4项原则是“人民的纲领”。

领袖们没有无视人民的纲领和委托，他们带着整个民族的嘱托艰难地在切尔纳进行斗争。

然而历史却未能满足捷克人民的愿望。

经过了4天的艰苦会谈，当精疲力竭的领袖们返回布拉格时，已经是夜晚了。

领袖们没有给人民带回希望，却又不能把令人忧虑的前景披露给忐忑不安的人民。他们要求人民镇定，希望大家回家安心睡觉。

然而布拉格人不能入睡，领导人疲惫不堪的神情加深了他们不祥的预感。

人们聚集在国会广场，不愿散去，他们要知道会谈的真实结果。

群众要求杜布切克出来报告会谈情况。

斯姆尔科夫斯基来到现场，他登上一个阳台，对近万名群众说：“我请求你们让杜布切克同志休息一会儿……他一天只睡3个小时，他的脑子要考虑很多问题。他肩上挑多重的担子，这是别人无法想象的。”于是群众还有许多拥到他身过的记者，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

开头，他坦率地回答了：他理解人民的心情，也深知祖国正面临着历史上最严峻的时刻。

到后来，当问题越来越临近那个险恶的事实时，他难于说下去了，只好停下来。

会场一片期待的沉寂、一片庄严的肃穆。许多人流下了眼泪，感到了自己的存在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斯姆尔科夫斯基懂得这种沉默后会爆发出什么样的力量。他必须抑制这股力量，必须克制自己的热情，必须把苏联人在会谈中的压力隐藏起来。他懂得反苏情绪如果再有几分增长，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向群众保证，领导人绝不会背叛改革事业，改革必将进行下去。

群众固执地要知道会谈细节，甚至直截了当地问：是否存在军事干涉的危险？

斯姆尔科夫斯基断然否定了这个问题，并批评说这种假设是危险的、不负责任的！

这一次，他没有说服人。他的话缺少热情。一颗正直的灵魂是很难将热情给予谎言的，而没有热情便难以打动人心、取信于人。

有了更多的问题，有了更嘈杂的喊声。会见继续了两个多小时，人们仍然不愿意离去。

斯姆尔科夫斯基已经精疲力尽，他鼓起最后的力量喊道：“你们所有的问题我都回答了，你们还要求什么？”于是上万人的声音象一个人那样整齐地在广场上升起：“说实话！说实话！”人民要知道有没有武装干涉的危险？要知道捷克的改革是不是面临着匈牙利人12年前经历过的灾难？是呵，只有在这个问题上，他才没说真话，也不能说真话。

现时，斯姆尔科夫斯基一定懂得什么叫历史重担；此时，他被不堪承受的重负压迫着。他无法将这副担子交出来因为他很清楚，有时候甚至整个民族也难以承受一副历史重担。

捷克斯洛伐克的1968年就正是这样的时刻。

捷共的改革家必须将这一历史重负承担到底……



被霸权扼杀的春天——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五）

十九

克里姆林宫有实力闯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境，却无法超越道义和国际准则的防线。因为它无法扼断这个民族的咽喉，窒息她的声音。

既然改革派领袖承受了这副历史重担，他们就得走向结局。

进入8月，结局已经明朗了：要么停下改革，恢复旧的统治，要么走向悲壮的失败。

既然两种结局都只能是以改革派的失败告终。他们当然宁愿选择后者，这样至少能将“布拉格之春”的精神完整和圆满地保存下来。

8月初，刚刚结束了切尔纳会谈的捷共领导又赴布拉迪斯拉发参加华沙条约6国首脑会议。

此时，双方都对靠会谈解决问题不抱希望了。捷共只是为了把走向结局的过程尽量拉长，同时将他们所应该做的都尽力为之；另一方却是为不可避免的武力解决争取准备的时间。因此，会谈反而顺利了，只用了一天时间便签定一份冗长而空洞的协议。

在隆重的签字仪式上，6国首脑勃列日涅夫、哥穆尔卡、乌布利希、卡达尔、日夫科夫和杜布切克都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同时还为6国的友谊互相拥抱、亲吻。

大家都是轻松的，因为谁也没有把对方的保证当真。

捷克人民也理解这个协议的意义。他们说：“在1938年，我们亲身体会过那种写在纸上、说在嘴上的‘友谊’究竟有多大价值。”几百万国民不安地注视着对方各种微小的动作。每天晚上都有大量的群众聚集在普日科德街一个小公园里，那是布拉格人的政治讲

坛，是人民的街头议会。群众在那里发表即兴演说，辩论问题。他们最关心和谈论最多的话题是那个强大的对手到底有没有勇气跨过道义和世界舆论的防线，来扼杀他们的春天。

历史磨炼了这个民族的预感能力。人民的预感是正确的。

莫斯科有力量跨过捷克的边境，它有不容怀疑的军事优势；但对跨过道义和国际准则的防线，它不是没有过犹豫。

勃列日涅夫之所以敢在最后时刻采取如此胆大妄为的行动，除了赫鲁晓夫12年前在匈牙利的成功引诱着他之外，尚有两个原因：首先他摸准了西方心理上的弱点。他们不相信苏联真会发动一场入侵，因而没有在外交和军事上对勃列日涅夫有过预防和警告。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苏联从捷克保守派那里得到了保证：他们可以在苏联出兵的同时成立一个新政府，并立即发出请求苏联出兵的邀请。

凭借这两个条件，苏联以为可以把12年前在匈牙利演过的戏搬到东欧的任何地区上演，而决不担心失败。

当几次谈判都未能扼杀“布拉格之春”的强大生命，当勃列日涅夫的耐心终于失去之后，苏联军队于1968年8月20日深夜，开始了本文开头已经描写过的那场入侵。

苏联对西方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尖端的雷达系统掩盖下，8月20日深夜的军事行动居然瞒过了毫无精神准备的北约组织。

西方国家得到的第一批消息是入侵两小时候后从布拉格电台播出的报道中得到的。

军事行动成功了，然而在政治上，克里姆林宫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

勃列日涅夫有赫鲁晓夫用过的剧本和导演手法，却未能在布拉格找到赫鲁晓夫在匈牙利找到过的那类优秀演员能向他发出出兵邀请的捷克政治家。

这出戏的第一幕就失败了。

发动军事入侵之前，莫斯科也曾对政治入侵做了周密的规划。然而，这些计划都失败了。

民主政治在与官僚政治的交锋中，显示了它无可比拟的优势。

在苏军入侵的8月20日晚上，捷共中央主席团正在召开会议。中央书记卡什帕尔作了一个非常长的报告，主要是对两次会谈以后的国内形势进行批评，说捷共中央有人违背了会谈协议精神。

这是莫斯科导演计划中的一部分：在卡什帕尔的发言之后，将由比拉克和英德拉提出一个谴责国内反革命势力，要求杜布切克辞职的提议。

保守派知道入侵的具体时间，他们得将这场戏演到那一刻，然后，利用占领的消息通过这个决议，并立即成立新政府。

会议在争论中拖延下去。总理切尔尼克几次离开会场去接电话。23时40分，总理最后一次回到会议室时，他面色惨白地向全体与会者宣告：“那5个国家的军队越过了我们的边境，他们要占领我们的国家。”除了保守派，其他人被这个消息吓得惊慌失措，说不出话来。

然而以后的事态发展却没有如保守派事先预料的那样，主席团会在惊慌和绝望中通过撤销杜布切克领导职务、成立新政府的提议；或是干脆在惊慌和军事威胁下到大使馆避难。因为这一个判断，保守派已派保安人员把守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南斯拉夫驻捷克大使馆。

事态一开始就违背了莫斯科的意愿。杜布切克在一阵忿怒之后，立即镇静下来，并以他的惊人的沉着使整个会场安定下来。

中央主席团作出这样几项紧急决定：任何人不得辞职；所有领导人应坚守岗位；立即起草捷共中央主席团对入侵的抗议声明。

8月21日凌晨2时，捷共在得知入侵消息两个多小时后，中央主席团的告全国人民书在布拉格广播电台播出了。

告全国人民书宣告：5国军队越过了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共和国总统，国民议会主席，政府总理和党中央第一书记对此一无所知”。干涉军“应邀”而来的政治欺骗破产了。

另一方面，军事和暴力的征服仍然成功地按计划进行。凌晨3时，一排伞兵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步枪冲进了政府所在地。那里，从党中央大厦赶来的切尔尼克总理正在他的办公室召开政府部长会议，他要表明捷克斯洛伐克的合法政府仍在行使权力。

政府官员全部被捕，被迫脸朝墙壁站成一排，切尔尼克总理却被押上一辆装甲车带

走了。

凌晨4时半，一队装甲车，一队坦克车和几卡车伞兵在苏联大使馆的小轿车带领下，包围了捷共中央大厦，士兵封锁了这座建筑。一些军官和便衣人员冲进去扣押了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民族阵线主席克里格尔。

军事征服完成了，政治较量开始了。

在政治较量中，节节败退的是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苏联和它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代理人；在这场斗争中，经过了民主洗礼的弱小民族在强权面前所显示的气节和精神力量，足以与数十万军队抗衡。

21日凌晨，入侵士兵在布拉格和其它城市都遇到了群众自发的抵抗。

这使入侵士兵们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因为他们曾被告之，到捷克斯洛伐克去，是要将捷克人民“从反革命手中拯救出来”，他们会受到人民的欢呼。

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人爬上坦克，把汽油倒在破布上点燃后，塞过坦克的排气管。几十辆T-55、T-56在大街上熊熊燃烧，发生爆炸。有的坦克被画上希特勒的符号。

21日清晨，有几十人在这种自发的抵抗中被击毙，几百人负伤。

天亮后，人民含着眼泪服从了政府关于不进行毫无希望的武装抵抗的命令。

但捷克人采取了另外的反抗方式，青年人高举捷克斯洛伐克国旗，挥着死难者的血衣上街游行。他们高呼“杜布切克！杜布切克！”以及“俄国人滚回去！”布拉格人用国旗国徽的图象装饰街道和橱窗，还利用街头宣传手段把布拉格变成了反苏漫画和标语的大海。以至占领军竟下了一道不准在墙上张贴标语漫画和不准举行公共会议的禁令。

布拉格人还发动了一场“街道无名化”的运动，他们将所有的街道牌和门牌号都拆掉或涂上油漆，把路标去掉或掉转方向，许多地方被改成了“杜布切克大街”、“杜布切克广场”。布拉格成了地理上的无名区，占领军的后勤计划搞得一团糟。

尽管这些有限的反抗并不能遏制最后的悲剧结局，却使这个弱小的民族给历史留下了巨大的尊严。

自发反抗的形式是多样的，更有效的攻势是布拉格电台发起的。它表明新闻工具若能真正成为人民的喉舌，将会释放出多么巨大的、令人战栗的威力。

我们从美国《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在1968年8月21日所作的广播记录中看到了这种威力。从凌晨2时起，电台反复播出中央主席团告全国人民书；6时，广播了杜布切克的个人声明。杜布切克从凌晨4时半被扣押到11时被正式宣布被捕，14时押解出党中央大厦，其间还坚持用电话和便条与外界保持联系；6时30分，电台要求人民“保持平静，实行消极抵抗”；7时，苏军进攻布拉格电台，几千名群众奋起保卫电台，用电车、汽车筑成街垒；7时15分，女播音员呼吁：“希望大家保持平静和克制……武装抵抗是行不通的……我们的播音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我们的时间很紧迫……广场前面的群众正用自己的身体阻挡占领军的车辆……”；7时18分，电台又播出了杜布切克的一封信：“我要求大家保持平静。在当前的局势下要保持尊严。”播音员又补充说，“我们也将这样做。”播音员的语调是平静的；7时25分，播音员反复说：“几百名群众正以自己的身体阻止坦克前进。”这时，收音机里能听到枪声和飞机在电台上空低飞过的轰鸣声。播音员一会儿是向保卫电台的群众讲话，一会儿又是向全世界宣告捷克民族正经历着的灾难；7时30分，在缓慢而悲哀的乐曲声中，女播音员说：“当你们听到捷克斯洛伐克国歌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电台的播音就结束了，这就是说，电台被占领了。以后如果电台节目里出现了你们不熟悉的声音，不要相信他们的活！”听到这里，做记录的美国记者和他的捷克女助手热泪潏潏而下……之后，收音机沉默了，接着响起了捷克斯洛伐克国歌。

布拉格电台被占领了。

但仅仅隔了10多分钟，电台又通过郊区的发射台继续播音。8时15分，布拉格电台播出了斯沃博达总统的告全国同胞书；8时20分，播出了科学院对入侵的抗议声明。

之后，布拉格电台又一次沉默，但库拉维亚、俄斯特拉发电台接过了这个任务。

然后是几十个地方电台继续了这场战斗，这样布拉格电台的技术人员就有时间建立地下播出网。仅布拉格，就有十几处秘密播出点。

两天以后，电视台也从秘密地点播出了。他们将几乎所有阶层都有的抗议声明陆续广播出去。

许多转入地下的报纸，如《红色权利报》、《自由言论报》都在工作人员的自发组织下出版了。发送工作由自愿前来的士兵、学生担任。

占领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土，却未能割断这个民族的咽喉，窒息她的声音。这样，当8月21日凌晨，设在东德的华约司令部电台向“捷克斯洛伐克兄弟们”播出，说“你们的阶级兄弟来支持你们了！”说“我们不是来干预你们的内部事务，而是来帮助你们打倒反革命、保卫社会主义事业”时，就显得既滑稽可笑又厚颜无耻了。

捷克斯洛伐克的新闻工作者不愧是人民的喉舌，不论在“布拉格之春”期间，还是被占领的现在都是如此。他们喊出了人民绝不屈服的意志；又有效地组织号召了对占领军的抵抗，长达两个星期之久。

这是一个难以征用的民族。面对着强大的暴力，她的人民敢于抗议，敢于反抗；而她的政治家们却在更加艰难的条件下，组织了更加有效的抵抗。仅用一天时间，就秘密地召开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是政治史上的一次奇迹。

二十

军事上的胜利带给勃列日涅夫的是惨重的政治失败。捷共十四大的召开向他表明， he 可以用刺刀干任何事，就是不能坐在刺刀尖上。

8月21日，也就是在完成了全面占领的当天下午，被克里姆林宫选中的50人在布拉格饭店开会。这里面大多是捷共中央委员，然而，就是将不是中央委员的其他人都算上，这50人也只能占捷共中央委员会的三分之一，不够法定数字。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也没有实现会议目标：产生一个新领导班子领导的工农革命政府，告诉心怀怀疑的全国人民，外国军队是哪位领导人请来的。

没有一个人敢承担邀请外国军队的责任，也没有谁敢站出来充当一个傀儡政府的首脑。最后，只好组成了一个由比拉克、英德拉和科尔德3人组成的临时领导小组。

会后，发表了一个含糊其辞的声明：既要以《行动纲领》为今后的政策基础，又要求人民保持秩序、与占领军合作。

可是当把3人领导小组的决议送到斯沃博达总统那里去批准时，这位身着军装的老将军坚决拒绝参与任何组织新领导班子的事，他向苏联大使宣布：切尔尼克仍然是捷克斯洛伐克合法政府的总理，要实行局势“正常化”，必须首先释放被囚禁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

胜利者陷入了困境，那是被邱吉尔形象化了的困境：“你可以用刺刀干任何事，就是你不能坐在刺刀上面。”

在捷克斯洛伐克，并不是没有占领者12年前在匈牙利找到过的那种人，只是在“布拉

格之春”唤醒的民主力量面前，这种人胆怯了，失去了行动的勇气。

与此同时，在政坛的另一侧，一些优秀的政治家在人民的支持下，迅速地恢复了实际上已经瘫痪了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一支以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名义入侵的军队，将一个共产党的首脑逮捕了，并实际上摧垮了这个党；而一些被安上“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罪名的政治家，却冒着生命危险，去恢复这个共产党的组织，使它能在非常时期恢复自己的威信和对全国人民的领导。

1968年8月22日11时18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在布拉格切卡德工厂礼堂召开。

开始有900多位代表到会，到晚上休会时，夏天选出的“十四大”1543名代表中，已有1192名出席了大会。代表资格是合法的；到会人数也够作出决议所需要的法定人数。

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是由秘密电台在头一天的广播中通知的。大会能在占领军的鼻子下召开，是因为对方不相信“十四大”会在电台公布的时间地点召开，以为这仅仅是声东击西的计谋。

21日晚至22日凌晨，全国各地的数百名“十四大”代表乔装打扮，带着以惊人速度制造的假证件来到布拉格。

早晨，上早班的时候，切卡德工厂门口，几辆救护车送进进出出，把化装成病人、医生、护士、司机的党的领导人拉进厂，另一些代表则化装成赶早班的工人。

会议期间，切卡德厂的工人民兵带着子弹上了膛的冲锋枪、步枪和一门反坦克炮守卫着工厂大门，保卫着党代会。

这次秘密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114人的中央委员会和一个27人的中央主席团。

大会重申了对杜布切克的信任和支持，并将他和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龙、克里格尔再次选入中央主席团。

新当选的中央主席团委员有奥·希克教授，作协主席爱·戈尔德斯图克以及地下电台负责人赫兹拉尔。

在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中，没有一个知名的保守派。

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份告全国同胞书，抗议了5国军队对捷克主权的侵犯，并庄严宣告：“没有任何一个有资格的党或法定的当局曾要求过这种干涉……在此之前，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发生反革命事件，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没有受到威胁。”告同胞书还向占领军发出严重警告：“立即释放被扣押的领导人。”“外国军队撤离我国。”

“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决不会接受一个军事占领当局，也不能容忍一个靠占领军势力扶植起来的伪政权。”告同胞书还向占领军发出了非常强硬的最后通牒：“如果在24小时以内不与我国自由的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开始谈判撤退外国军队的问题，如果不让杜布切克同志及时就此问题向全国讲话，代表大会要求全体劳动人民在8月23日中午12时举行一小时抗议罢工。”捷共“十四大”给人类文明、进步留下了一份意义重大的文件。这份告全国同胞书多少恢复了我们对于历史进步的信心，暴力并没有让苏联得到它在1956年所征服到的东西！

8月21日是克里姆林宫取得一次不小的军事胜利的日子，但正是从那一刻起，勃列日涅夫一定痛苦地发现，这胜利给他带来的灾难并不比给捷克民族带来的少；他一定悲哀地感到自己是历史上最不走运的政治家。在政治史上，难道有过如此惨重的失败吗？没有！

如果要追究政治责任，没有一个政治家在有了这样的失误之后，还可以从事政治！幸亏，勃列日涅夫是在一个无需承担责任的政权里行使权力的。

捷共十四大是共产党组织效率、政治斗争的典范。

代表大会还通过了给杜布切克的致敬信：

杜布切克同志：今天在这里开会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向你致以热烈的、同志般的问候。我们对你为我们党和我们祖国所做的一切工作表示感谢。我们的青年人手持鲜血染红的国旗在布拉格游行，反复高呼“杜布切克、杜布切克”，这充分证明你的名字已经变成了我国主权的象征。我们对非法囚禁你和其他几位同志表示抗议。

代表大会再次将你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我们继续把你当作我们的领导人。我们坚信，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一定会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你也将和我们重新欢聚一堂。

一个党代会向它的领导人致敬并不少见，几乎每一次党代会都会以口头或文字向新领导人表示热爱、忠诚和感谢。然而我们难以判断，在这类致敬中，多少是对领袖的诚挚的爱，多少是对权倾一时的主宰的畏惧和奉承？但我们可以断定，上面这份致敬信

中，有的只是对领袖本身的热爱、信任和尊敬。因为此时，这位47岁的领袖已经完全失去权力，而成为克里姆林宫的一名阶下囚。

二十一

“布拉格之春”逝去了，但她没有死亡，那隐隐闪烁的一点星光里，还珍藏着她美丽的理想和半个世界的希望……

杜布切克的囚徒生活很短暂。21日，他和斯姆尔克夫斯基、切尔尼克、什帕切克被搜过身后，在自动步枪的押送下，坐装甲车到机场，再乘运坦克的运输机和没有座位的军用飞机到了莫斯科。他成了十足的囚犯。

到莫斯科后，他们被允许洗澡、刮脸，还给他们送来了干净的衬衣；更进一步，莫斯科要把他当成一个国家的首脑坐下来谈判。

这种变化的原因是莫斯科没能在布拉格拼凑出一个取而代之的政权；而十四大的召开又重申了全党对杜布切克领导地位的确认。

勃列日涅夫还得用那种恼人的、屡遭失败的谈判来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

在这次所谓的谈判中，杜布切克面对的是一份早已拟好了的，请求苏联出兵的邀请书，而勃列日涅夫面对的是他刚刚从囚室放出来的代表。

这一次，勃列日涅夫绝对主动，他可以随时将谈判代表变成囚徒。杜布切克和他的朋友的处境比当囚徒的前几天更险恶了：历史的重担，民族的重担都压着他们身上。

他们拒绝签字，他们表示：“一千几百万捷克斯洛伐克人与其投降，宁可选择死亡。”然而克里姆林宫并不害怕别人的死亡，他们说：“这对我们算不了什么！在战争期间，我们有比你们全部人口还要多的人死在德国人手里！”克里姆林宫不需要谈判，只要签字。他们说：“你们现在不签，过一个星期再签，一个星期不签，过14天再签。如果过14天还不签，那就过一个月再签。”他们有的是用武力抢占的时间，他们能等待。

历史也等待着。这个民族的凶吉祸福难以预料。

杜布切克和他的战友反抗过：他们不签字，他们可以选择自杀。然而他们无权为整个民族选择死亡。后来，从国内来的代表提醒他们，说国内尸体堆积如山，说他们有责任不惜一切代价结束这种状态，应该让这个弱小的民族生存下去，应该把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流血、死亡减少到最低限度。

他们犹豫了：签，还是不签？

这是比哈姆雷特个人的生死存亡重大得多的选择，这是关于和平与流血、个人与民族、屈辱与尊严的选择。他们问自己，他们相互询问：应该签，还是不应该签？

要是可以选择个人的死亡就好了，要是可以回避这样的选择就好了。然而他们必须选择，必须为整个民族作生死攸关的选择。

人的意志力可以让强权束手无策，但面对历史的劫难，人的意志却常常是那样的软弱无力。与强大的霸权相比，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太弱小了。

他们犹豫了很久很久，还是在协议书上签了字；他们思考了很久很久，还是无法肯定该不该这样做？

一直到1974年，当斯姆尔科夫斯基临近生命终点之际，还在深深的痛苦中继续着这种痛苦的思考：“我做对了，还是出卖了祖国？我不知道……”杜布切克和他的战友被责任心和良心压迫着。

1968年8月27日的黎明尚未到来之际，杜布切克和他的战友带着民族的巨大创伤，回到了黑沉沉的布拉格。

从照片上，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春天的明星们低垂着头。他们是在向父老兄妹深深地低头请罪，他们没有完成民族的嘱托。

19世纪的捷克诗人杨·聂鲁达说过：“只有在人民面前，我们才能低下头来！”

向人民低头，不是羞耻和痛苦的事，那么向历史屈服，向历史低头呢？

8月27日下午5时，布拉洛电台播放了全部的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命运》之后，杜布切克发表了8月21日悲剧以后的第一次广播电视讲话。

他的整个神情是疲惫不堪的，他的讲话断断续续，并且常常停顿下来有时是在痛苦的追忆，有时是极力地克制。

他向人民报告已经有了一个让5国军队分期撤出的协议。他说，为了这个协议，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我们不得不采取若干临时性的特殊措施来限制我们所取得的民主和自由……”杜布切克努力振作起来，他想告诉人民，希望还是有的，春天还会再来。

他说：“我们将坚决地和始终如一地捍卫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政策……”他突然停顿下来，他无法欺骗人民。他被沉重的现实压垮了。

收音机里的声音沉寂下来……而电视机前的人们看到他们的领袖为强忍眼泪而无法讲话……

1分钟，2分钟，3分钟沉寂之后，杜布切克继续演说，“亲爱的听众们，在这临时决定的讲话中，如果时而出现停顿，我请求你们原谅我……”在大街上听广播的人失声痛哭起来……这一刻，领袖和人民的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了……

这次广播电视讲话还没结束，许多电报和信件就寄到电台、电视台。很快就有一句口号在当天和以后的日子里流行开来，那是人民对杜布切克的谅解、安慰和支持：“我们跟你在一起，请跟我们站在一起吧！”“布拉格之春”给政治家留下这个礼物之后，便匆匆从布拉格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当历史艰难地、还没从辉煌而又多灾多难的60年代走出去，终于上了台的保守派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政治清洗。

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等最激进的改革家被开除出党，许多编辑、作家和电视台评论员被放逐到工厂、农场劳动，有的进步人士甚至被逮捕关押。

对杜布切克的迫害要晚一步，他在“布拉格之春”期间迸发出来的伟大力量尚有余威，新的当权者只敢偷偷摸摸地、一点一点地对他进行剥夺：1969年4月，他被撤销第一书记职务；9月，被解除中央主席团职务；年底，被任命为驻土耳其大使，实际上是被放逐到异邦；1970年元月，被停止党籍；5月，被召回国；6月26日被开除出党。

这位18岁就加入共产党的政治家，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30年的党。此时，他年仅48岁，棕色头发过早地变得灰白。他带着顽强的沉默离开了布拉格，到斯洛伐克的一家工厂办公室去工作了……

寒冬降临了，到处都是冷嗖嗖的寒风，仿佛要将漫长的冬日冻结住，要将铺天盖地的绝望冻结住，仿佛寒冬将不再离开布拉格。

然而，只要寒冬不能将一个民族的生命冻结，她们就会迎得另一个春天。对此，历史将作出证明；或许，历史老人的动作过于迟缓，捷克人不愿意等待，他们已经等了300年了，他们要自己作出证明。

回答是由捷克斯洛伐克最优秀的儿子作出的。1969年元月16日，18岁的布拉格学生

杨·帕拉赫在瓦茨拉夫广场中心点火自焚，抗议外国军队入侵，呼唤逝去的春天。

帕拉赫点燃了自己，给冷冰冰的布拉格带来了一丝温暖、一线光明。

就象帕拉赫在遗书中称自己为“火炬一号”一样，在他的照耀下，我们看到了“布拉格之春”的光芒并没有死亡。尽管在历史的苍穹上，她仅仅是一点星光，但她活着，并且至今还闪烁着美丽的光芒。如果我们愿意走近一点，还能发现把她是个庞大的世界，她还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

附录：《与杜布切克对话》

作者：希望谈论“布拉格之春”不会触动您心灵上的创伤。

杜布切克：相反，我感谢人们还记着“布拉格之春”。

作者：“布拉格之春”是社会主义改革道路上一块夺目的里程碑。谁也无权忘记历史。

杜布切克：仅仅是历史！难道春天会永远逝去？

作者：辉煌的历史。

杜布切克：历史只记录死亡了的，可她还活着。

作者：请原谅……她来去匆匆，1968年8月的军事入侵把她杀死了。

杜布切克：她的精神还在，她所产下的希望与民主和人道相结合的社会主义至今还活着。作者：那只是理想，历史要沉重得多。赫鲁晓夫失败了，纳吉失败了，您和您的“布拉格之春”也失败了。难怪有人在问：“有过成功的改革吗？”

杜布切克：也曾有人问过：“有过真正的社会主义吗？”正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举起了“布拉格之春”这面旗帜。

作者：“布拉格之春”也没有给你们送来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

杜布切克：那是因为历史不能不给1968年的苏联一个勃列日涅夫式的政权。

作者：1956年，匈牙利人的改革失败了，我们说这是历史的局限；过了12年，你们还是败于历史的局限。历史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成熟，才能进步？

杜布切克：就在今天。我们不能假设1968年的苏联能有今天这样的政权，但我们可以。假设有了1989年的大动荡，如果“布拉格之春”能重新降临，她肯定可以让社会主义死而再生。

作者：让社会主义的再生，除了勃列日涅夫式的霸权干涉，就不再有别的障碍？

杜布切克：有，那就是官僚政治。但我们在1968年已经证明，它是可以被打败的，用民主政治。

作者：您只谈到了政治，而和改革联系在一起的还有生产力低下、劳动积极性不高以及更让人头疼的国有经济的改造问题……

杜布切克：这些也是政治。

作者：……



来自底层的改革浪潮——瓦文萨与波兰团结工会 (一)

作者：您是作为罢工领袖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因此，您创造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历史现象——历史第一次接受了一个使生产陷入停滞，而不是使其发展的人。

瓦文萨：历史与我何干？我斗争不是为了历史，而是为了人！

作者：无论为了历史还是为了人，都应该发展生产。我同意您说过的话：“用罢工手段是不可能改善经济状况的。”

瓦文萨：是的，罢工是一个最危险的手段，但罢工这个武器必须持有，因为这是工人阶级与政府对话谈判的唯一方式。

作者：对于本来就危机重重的经济，这无疑是不堪负担的。这种谈判方式的成本太昂贵了。

瓦文萨：如果工人阶级的意志得不到反映、利益得不到维护，社会将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

作者：难道双方就不能寻得一种廉价的谈判方式？

瓦文萨：能，那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自治工会。我们罢工是为了建立独立工会，建立独立工会是为了不再用罢工方式去捍卫工人阶级的权益。

作者：您给半个世界出了一大道难题——您的目标无疑会动摇党和国家的绝对领导。

瓦文萨：无须对此加以否认和掩饰。要使工人阶级从“无所能管”的雇佣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就必须有一个持久的、强有力的工会组织来制约国家“无所不

管”的绝对权威。

作者：可是治理的权威从来就是需要的、并且总是由个别人来行使。一个工厂如此，一个党、一个国家亦如此……

瓦文萨：您大概还要说，关键在于要把这个权威交到正直而杰出的领袖手里？

作者：否则怎么办呢？能承认一个好的领袖多少是一个进步，便不该拒绝这样的努力。

瓦文萨：正是开始了对这种“进步”的怀疑，波兰工人阶级才有了对历史的一大步跨越。请看看人民波兰的历史吧——1956年，为了拥戴改革家哥穆尔卡上台，我们有五十三个阶级兄弟付出了生命，三百多人流淌了鲜血；1970年，为了驱赶堕落了哥穆尔卡、寻求一个能稍为民主一点的领袖，我们的兄弟中又有四十五人付出了生命、一千多人流淌了鲜血；因此这一次，我们争取的不再是一个好领袖，而是要使工人阶级在罢工中形成的力量保存下来，并在正常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

作者：工人参与对工厂和国家的管理，可比组织罢工、建立独立的工会更加艰难……

瓦文萨：正因为艰难才更应该让我们实践！

作者：要是社会要为这种实践付出过大的代价呢？

瓦文萨：那也必领付出！否则，半个人类为社会主义已经付出的巨大代价便付之东流。

—

社会主义历史上只有两件事——十月革命和铁托与斯大林决裂，可以与波兰成立团结工会的事相比。

有了列宁，社会主义国家才没有因为先天不足，而死于胚胎——1917年11月7日，她诞生了。

然而，如果列宁能预见到这个历史的早产儿会经历那么多的生存痛苦，他还会用自己的巨大智慧去助产吗？

这些痛苦是惊天动地的：强迫农业集体化，制造仇恨的阶级斗争，血腥的政治恐怖；最后是社会发展的停滞和人的独立意识的泯灭。艰难而又多灾多难的半个世纪逝去了，她——这个人类美好理想的结晶已经遍体鳞伤、面貌全非了。

为了给这个未老先衰的生命医治创伤，注入新的生命和青春活力，在她的艰难的生命历程中，又发生了许多同样惊天动地的历史壮举——

1948年，铁托与斯大林决裂，有了最初的尝试；

1956年，赫鲁晓夫把斯大林送上审判台，而开始了全面宣战；

同一年，纳吉在“匈牙利事件”中，用自己的生命进行了殊死搏斗；

12年后，杜布切克和他的“布拉格之春”，给半个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然而，所有的这些奋斗都失败了，尤其在1968年8月20日，当苏式坦克碾碎了“布拉格之春”中所蕴含的希望之后，半个世界都陷入到铺天盖地的绝望之中——如果连这种和平的、秩序井然的、并且是由共产党人自己领导的改革都徒劳无益，那么还有什么可能使这个日趋衰败的生命获的新生呢？

于是，几乎所有的人都预言，在共产世界不再出现希望，不再会有巨变了。

然而仅仅12年后，这个预言就被历史否定了。

1980年夏天，在波罗的海南岸，发生了社会主义历史上又一次惊天动地的巨变：波兰诞生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独立于共产党的权力中心——团结工会。

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巨变都与一些政治伟人联系着；它们的诞生地也十分高贵：冬宫、克里姆林宫、捷克的总统府、匈牙利的国会大厦。而这一次的巨变却产生于工厂的最基层，它的领导人是一个叫瓦文萨的无名之辈。

瓦文萨的知名度小到如此程度，以至当他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已经给执政的波兰共产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时，波共第一书记盖莱克居然在政治局用疑惑的口吻问：“瓦文萨？这个家伙是什么人？”

当时，即便是无所不知的秘密警察，也只能给他们的领袖提供这样简单的档案材料：瓦文萨，男，37岁，六个孩子的父亲，天主教徒。父亲是木匠，本人小学毕业即当学徒。原为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电工，1976年，因参加工潮，主张成立“自治工会”而被开

除。

尽管这次事件的诞生地和领导人如此卑微、低残，但它对世界的震动却那样巨大

——
欧美一些大报一致将它列在1980年世界十大新闻之首；

美国国际变化研究所所长S·比亚勒教授说这次事件比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的意义要大的多；（S·比亚勒《波兰与苏联的统治》）

匈牙利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赫洛杜什·安德拉什教授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历史上只有两件事——十月革命和苏联与南斯拉夫决裂——堪与波兰成立团结工会的事相比。”（意大利《共和国报》1980年11月13日“安德拉什教授采访记”）

这些评价都是事件发展到无人能忽视它的存在时说的。而在开端，一切都是试探的、战战兢兢的。

波兰工人绝没有上述两次巨变所具有的条件——十月革命具有良好的共产党组织和许多杰出的领袖人物；1948年，铁托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作为后盾。

波兰工人有的只是二十年内经历过的两次大规模逮捕、枪杀的恐怖记忆和一点儿渺茫的希望。

1980年8月，波兰工人从几百人开始，到几千人，几万人，然后与一个具有三十万军队和庞大警察机构的政权对峙了17个日日夜夜，凶吉未卜，前途未卜，他们得有多么坚强的神经才能经住其中的胆怯、危机和悲观。

如果他们失败了，历史的许多悲壮的记录又多了相似的一笔，一切都是重复，一切都是绝望，一切又得重新开始，再等待一次已经重复过多次的、艰难而又令人恐惧的开端。

1980年夏天，波兰工人把这个开端完成了——靠着高度的自我约束能力和两次流血牺牲所换得的经验。

于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终于有了力透纸背的一页。这是全新的一页，她记录着新的经验、新的希望、新的斗争方式、新的目标。

这就够了，结局的成败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波兰工人阶级终于从诉诸统治者善

意和明智的幼稚中成熟起来。

波兰工人阶级终于理解：问题不在于推翻或拥戴哪一个领袖人物，因为换上去的新人最终还是变得跟前任一样腐化；也不为了取得政府的重大让步，因为任何政治许诺和政治让步都可能在工潮平息之后被政治清算所替代。

1980年，波兰工人阶级争取的是要使自己的力量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决定因素，为此，他们把建立一个独立的、能长期参与统治的权力机构作为斗争的主要目标。

有这个目标，政治家便不能毫无担忧地进行统治了；有了这种希望，半个世界便无权忘记波兰工人在1980年8月所作过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历史应该记下1980年8月。

二

事情是由几个青年工人开始的，但在他们身后，有数十万工人的不满和期待，有数十年的屈辱和流血的记忆，还有那位暂时还不出名的莱赫·瓦文萨。

1980年8月14日清晨，波兰最大的海港城市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的三位年轻工人，带着几幅大标语和几百张传单，于上班前一个小时来到车间。

这些标语传单的内容很简单：要求实行物价上涨津贴和增加工资1000兹罗提。没有政治色彩，没有组织名义。但促使这几个年青人行动的背景却十分庞大：当时，全国的许多工厂都发生动乱，尽管许多罢工是零星的、犹豫的，却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星期。

骚乱是从7月1日开始的。那天，政府宣布提高不需要定量供应的“特种商店”的肉类售价40-60%。于是华沙、波兹南、托伦、卢布林相继发生罢工，此伏彼起，时断时续。

在此期间，格坦斯克是平静的。这很奇怪。

格坦斯克是波兰著名的工业区，如果算上它身边的两座姊妹城——格丁尼亚和索波特，这个波罗的海边的三联城有七十万人口。波兰最大的海港和造船厂都在这儿；与这种平静更不相称的还有，格坦斯克是著名的工人运动中心。1970年，正是格坦斯克好斗的造船工人和码头工人将东欧最强硬的政治家哥穆尔卡赶下了台。

但如果我们知道了下面这个事实后，便理解了格坦斯克的平静，并会产生深深的不安和不祥的预感。

1970年12月，在与军警对抗的工潮中，有45名格坦斯克工人被坦克和子弹夺去了生命，有一千多工人流出了鲜血。这些赤手空拳的工人是在和平时期，被他们法律上的代理人、公仆用刺刀、步枪和坦克残害的！这种屠宰式的杀害使人颤栗。它留下的恐怖记忆大约一百年也不会消失。

有了这样的记忆，格坦斯克工人自然会有更多的沉默；同时，既然在沉默中蕴含着这样的记忆，那么格坦斯克在1980年的沉寂中，肯定蕴藏着更深刻的危机。

现在，这三个行动者的年轻人，这三个在童年记忆中刻有十年前那件悲剧痕迹的造船工人，会不会触动那个巨大的伤口，使它重新流出血来？

三名青年工人把标语贴在车间门口和更衣室外，然后向更衣室的工人每人发放一张传单，并且说：“今天全厂罢工。”

传单上并没有写罢工的事，但每个工人都能从蔓延全国的骚乱不安中感到某种渺茫的希望。

已经换好工作服的工人没有立即到工作岗位上去，而是聚在更衣室外的大标语下。他们只有30多人。这些人对三个年轻人的举动是赞许的，只是还不敢用语言表示出来。

工长来了，要工人们去车间干活。有人胆怯了，向车间走去。

三个年青人着急了，高声劝阻，谎称其它几个车间已经停工了。其中一位青年工人还走进车间，为那些胆小的工人关掉机器。

工人犹豫着，工长催促着，三个进行鼓动的工人紧张了。

他们很清楚，如果不能有进一步的行动，如果再有几个人响应工长的号召，不一会儿，这儿就只剩下他们三个被孤立的人。

他们急忙打出一个横幅标语，呼吁大家到别的车间去。直觉告诉他们，必须使这几十名工人走出车间。

他们成功了，三十来名工人跟在他们后面向别的车间走去。

本来就处于期待和半停工状态的工人被这支打着横幅标语的小队伍引了出来。多数人观望着，但也有少数人大胆地加入到这支小队伍里。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那三个打头的年轻人在鼓动了，许多人都在呼喊：“关上机器，跟我们走！”

到哪儿去？去干什么？不知道。这是来不及思考和犹豫的。这一瞬间，队伍里的每个人都清楚，停顿和动摇的后果不堪设想。必须走下去。

这支已经增加到一百多人的队伍，终于与厂长迎面遭遇了。

厂长领着几个人堵在前面。他板着脸，劈头盖面地抛过一句严厉地质问：“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队伍里有人回答：“我们停工了！”

厂长又问：“为了什么？”

这时，队伍里有人喊起来：“我们现在不跟他讲。我们走！”

这是高明的。否则厂长会说：“有问题解决问题，这是干什么！”于是工人们会提出一大难重大的和细小的、能解决的和不能解决的问题；而厂长会说服、解释、许诺，会象一位家长那样用严厉而又不乏爱护的口吻批评工人，于是工人不好意思了，或者害怕了……

他们不能停下来。队伍又向前走，把厂长留在那儿。

队伍已经扩大到一百多人。他们走出厂门，走到二号厂门前。这儿正是十年前那些流过鲜血、付出生命的同伴们出发的地方。

并没有人发令指挥，这几百个人突接沉寂下来，深深地低下头去，向1970年12月的牺牲者默哀一分钟。

在这短暂的一分钟里，那45个牺牲工人的魂灵一定呼天抢地地呼喊着他的忿怒和鼓动。

没有比这更有力的鼓动了。

一分钟后，当这几个百个沉重的头颅扬起来时，他们已不再惊慌和茫然。

他们唱起了波兰国歌：“波兰没有灭亡……”

是的，只要工人阶级还在，波兰就不会灭亡；只要希望还在，波兰就不会灭亡……

几百个大嗓门发出的声音是粗糙的、嘶哑的、不协调的，但歌声所体现的力量和意志却是那样的清晰，这歌声惊动了列宁造船厂，惊动了整个格但斯克；同时，还引来了另一个人——几年前被开除出厂的列宁造船厂电工瓦文萨。

有了瓦文萨的出现，这支刚刚开始的歌终于震撼了全世界。

当这几百人从大门口回来时，他们的决心已定。队伍在停在厂内的一台挖掘机旁停下来。有几个人爬到上面发表演讲，他们呼吁罢工，要求大家团结起来，把信得过的人选出来，成立罢工委员会。

就在这时，总经理格涅赫带着一批人匆匆赶到。工人们让开了一条路，并且伸出手来帮助他登上挖掘机。总经理毕竟是有权威的，人们无法在一个早上就丢掉多年来形成的等级意识。

总经理讲话了：“有什么要求我们可以谈判，但用不着停止工作。大家都回车间去。”

大多数的工人用沉默来回答他的命令，但也有几个工人高喊：“不解决问题就不干活！”

双方都避免用罢工这个词。

总经理的态度缓和下来，耐心地劝说：“干吗要停工？如果谈不成，再停工也行嘛。”

爱喊叫的工人仍然要求先解决了问题，再回车间干活，而真正让总经理吃不住劲的是那一片顽强的沉默。他难以捉摸这沉默中有多少是强硬和对抗，有多少是犹豫和动摇。

就在这时，一个人从总经理身后登上挖掘机，挤到他面前。

“您认识我吗？”挤过来的人问。

总经理看了看对方：一个中年工人，个子很矮。他不认识这个人。他不可能认识几万工人中的每一个，他是通过劳动人事部门管理着工人的。但总经理能从来人身上感到一股力量和威胁。于是他客气而又带着明显暗示的口吻说：“从现在起，我将记住您，请

问……？”

“瓦文萨。”

这个名字他是知道的。总经理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遇上了亡命徒。这是短兵相接的搏斗中最令人生怕的事。

总经理闪出的第一个念头是，不能让这个人 and 眼前的事搅在一起。

“您的情况我知道一些，”总经理说，“我愿意帮助您。您可以在任何时候去找我。”

瓦文萨坚决地拒绝了总经理的好意。他说：“不，我不用求任何人。我是一名造船工人，我在造船厂干了十多年，现在我回来了。我只是为我不能从大门回来感到遗憾，”瓦文萨是从四米高的厂区围墙翻进来的，“这回，我将留下不走了，因为我有职工们的信任！”

工人们用欢呼声证实了瓦文萨的判断。人们心里踏实了，马上安静下来，等待着瓦文萨的演讲。

瓦文萨转向几百名群众，注视着、思考着，最后他只是大声地喊出一句话：

“我宣布实行占领性罢工！”

三

因调整物价而引起罢工不是第一次；工人开出清单要与政府谈判也不是第一次；区别只在于政府第一次发现无法对反叛的工人诉诸武力……

因商品涨价而引起大规模的罢工，在波兰不是第一次。前面提到过的1970年12月悲剧也是由完全一样的原因引起的。这不是光辉历史的再现，而是悲剧的重演。这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恐怖回忆，并对这种失败过的斗争手段表示怀疑。

这里的序幕刚刚拉开，我们就立即发现它与1970年工潮的开端如此惊人的相似——

地点：仍然在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

冲突双方依然是政府和工人；

构成冲突的事件也一样：物价上涨；

大背景也相同：普遍的不满和骚乱；

甚至某些剧中人也一样，比如说瓦文萨……

在政治生活中，人们会指责某些重复的错误、重演的悲剧。但这类指责又常常是无奈何的，政治家有足够的理由采取他认为有益的任何政策，也有足够的力量把历史学家的声带割断——如果历史学家试图证明某项政治错误或罪恶在历史上曾经造成过灾难的话。

然而我们不能不为另一方的重复所担忧——波兰工人准备用罢工来对抗一个强大的政权。

政府可以忘记，因为他们是最最终的胜利者。胜利者当然可以用成功运用过的手段；可是已经失败过的造船工人还会用已经失败过的手段吗？他们也会向市区进军，也会去进行一场用歌声与枪声的对话吗？

这场序幕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悬念。

四

罢工委员会的成立使波兰工人找回了自己的优秀品质——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这一次，造船工人没有走出工厂。除了一些身体不好和神经脆弱的人回家了，罢工工人将列宁造船厂的大门关闭起来，近万名参加罢工的工人留在里面。

开始，罢工工人被兴奋而又茫然的情绪支配着，许多人跑来跑去，吵吵嚷嚷，却不知道应该干什么。

大家最关心的当然是谈判清单：各种各样的要求都提出来了，还不断有人补充新的要求。

到处都在进行各种级别的“谈判”，找厂长谈，找书记谈，甚至揪住班组长不放。只要围住一个多少掌了一点权的人，就有人提意见、提要求，而更多的人却在旁边吹口哨、起哄。

工人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过正常的政治生活了，他们的政治能力已经严重退化。

不过，这种混乱的局面很快就渡过去了，造船厂成立了罢工委员会，瓦文萨当选为主席。

谈判的清单也拟出来了：

一、恢复瓦文萨的公职。

二、每名工人提高工资2000兹罗提，按民警的同等条件提供家庭补贴。

三、保证罢工组织者、领导者的安全。

四、工人有选举自由工会的权利。

五、为1970年12月事件的死难者修建纪念碑。

罢工委员会还担负起全厂的责任：建立了罢工纠察队，以保护工厂的财产，防止发生不负责任的挑衅事件。

罢工委员会宣布：在罢工期间禁止喝酒。

这可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酗酒，即便是对政府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酒，使工人缺勤旷工，造成事故。据说，在波兰医院里，有20%的床位由酗酒者占用着；当然，这并不是民族病，而是时代病——除了干活，生活不再有任何指望，他们为什么不喝呢？

造船厂大门外整天都有一大堆人围着，大多是妇女、孩子。她们送来一包包吃的和换洗衣服，也带来焦急不安的紧张情绪。

带着红袖章的罢工纠察队员很有礼貌地检查送来的食品，防止里面有出于好心送来的白酒。围墙上，每隔几步就坐着二、三名带红袖标的工人。大门口，有工人在打扫废纸和烟头。门前，红白相间的波兰国旗，和白-兰-白的造船厂工人旗在一起飘扬。墙上刷写着大幅标语：

“人民和造船工人在一起，造船工人和人民在一起！”

“给政治犯以自由！”

“请站到我们中间来！”

“你若同我们站在一起，就停止工作吧！”

这一切都是工人自己干出来的，这些罢工的工人并没有停止工作，他们是在干另一种更重要的工作。在这种工作中，充分显示了工人的力量——那是由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凝聚成的；更重要的，还有团结。不仅有全厂的团结，还有整个阶级的团结——8月15日，三联城的另外几家造船厂也加入到罢工工人的行列。

格坦斯克工人没有匆匆忙忙地走上街头，没有象以前几次那样去呼喊口号，去冲击党或政府的机关，去焚烧警车、与警察冲突。他们只是有秩序地占据着工厂。政府如果试图把工人驱逐出厂，那么它就无法象以前那样，将发动暴力的责任推到工人头上而加以镇压了。

这是工人方面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意义重大的胜利——政府除了坐下来与工人进行认真谈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五

这一次，波兰工人没有流血就开始了与政府的对话，并获得了政府的让步。如果不是他们以前也得到过类似的许诺，或许这一次也到此为止了……

波兰工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并非出于政治野心。他们没有去颠覆政权，没有去攻打政府。他们仅仅——说起来真可怜，仅仅想让他们的代理人听听他们的意见，仅仅要求政府帮助解决他们自己无法解决的切身问题。

为了这么点儿可怜的要求，波兰工人用罢工的方式战战兢兢地敲响了社会的警钟。当局终于注意到他们的存在了，愿意来听听他们的声音了。

社会得为这种对话付出上亿兹罗提的代价——这真是成本昂贵的谈判方式。

然而比起1970年，这代价就算不了什么了。至少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生流血和死亡。这或许算得上历史的进步吧？

1970年12月，波兰工人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获得对话的权力的。

那一次，工人也仅仅是要求他们的代理人听听他们的要求，这些要求就更可怜了。下面是列宁造船厂罢工工人在1970年罢工期间写下来的十点要求中的主要几条：

一、取消加班工资所得税。

三、提高工资20%。以适应物价上涨。

五、取消表扬性奖金，将此款用于提高工资。

六、公布总经理的收入。

七、精简行政机构。

八、星期天上班，除工资外，免费提供伙食。

全部是经济方面的，没有一点儿政治色彩——工人要求的只不过是略微改善一些、略微公正一些而已。这些绝不过份的要求所得到的回答是无情的镇压。

现在——1980年8月，波兰工人总算用罢工而不是流血，取得了对话权。

谈判是8月16日在列宁造船厂举行的。

谈判大厅里挤满了旁听的工人，厂广播站广播了谈判实况，所有的扩音喇叭下都聚集着一群人，谈判大楼前的工人就更多了。

工人们知道广播喇叭里是谁在讲话，经理、书记、瓦文萨，还有其他代表的声音他们都听得出来。对每一次发言，工人都要表态，好象他们都是谈判代表——或是鼓掌，或是打口哨、起哄。

经理的讲话被哄的次数最多，工人代表也有被哄的。

恢复瓦文萨工作的协议很快就达成了，关于罢工组织者的安全问题也得到了保证。政府方面发给每个代表和罢工委员会委员一份保证书，保证他们不为8月14日至16日的罢工而受到惩罚。但保证书的下面注了这样一笔，“不受惩罚的保证不包括违反波兰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行为。”

当谈判进行到为1970年12月事件死难者修造纪念碑时，谈判厅内外的人全都激动起来。

世界上很少有那个民族有波兰人经历的苦难深重——她惨遭过十字军的铁蹄蹂躏，经受过瑞典侵略军的暴戾，还有普鲁士的统治，沙俄的践踏；最近的则有斯大林在二次

大战初期与希特勒进行的瓜分波兰的肮脏交易，以及纳粹德国对波兰人的血腥屠杀。仅华沙市，就有80万人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波兰为此建造了许多作为民族苦难见证的纪念碑——著名的、纪念死于二战的人的西盘英雄纪念碑就建造在离列宁造船厂不远的西盘半岛上，还有建造在华沙的无名烈士纪念碑，犹太英雄纪念碑，它铭记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手段最残忍的屠杀……

只有记住这些外族人给波兰造成的苦难，波兰人才能保持住自尊自立的民族意识。这一点，无论对人民还是对政府都是必要的，有益的。

然而现在，工人所要求的，却是要政府为自己所镇压过的人修建纪念碑，这等于要统治者为自己的耻辱和罪行修造一永久的标志。

这是波兰工人阶级的远见。尽管死难者不能再生，尽管1970年悲剧的制造者哥穆尔卡早已因为这次罪行而离开了政治舞台，但必须让他的继任者记住这黑暗的一页。

一个历史罪恶的记录，就是一个沉重的现实警告。对一个行使权力的统治者来说，最沉重、最无情的莫过于历史罪恶的记录。

1970年12月7日，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当天，在代表团全体团员情同下，向犹太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面对着他的国家曾经犯下过的罪行的明证，勃兰特总理默默地肃立着。突然间，成群的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看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场面——这位著名的政治家、这位跟希特勒第三帝国毫无关系的德国现任总理、这位对眼前的历史罪恶并不承担责任的社民党领袖沉重的跪了下去。

在场的人被深深地感动了……

没有人将勃兰特总理的跪拜看成是政治家的某种“姿态”。在场的人都感到了一种道义上难以承受的重负和人类良知的冲击力。

有了这座纪念碑，人类便多了一些良知，少了一些黑暗。

波兰工人正是为了这样的目的而要求修建纪念碑的——他们要统治者承认并永远记住前任的罪恶。

工人自己当然不会忘记。他们修建纪念碑的要求已经提过许多年了，却没有人理睬，反而在他们计划建造纪念碑的地方——就在二号门前面的广场上，12月事件的最初死难者是在那里倒下去的——挖沟、打地基，准备盖一座贸易大楼。工人不答应，填了

这些沟。后来市政府又把这个地方周围墙围起来。总之，当局想弄得工人的纪念碑无地方可建，想让他们忘记。

但波兰工人不会忘记。每一个周年纪念日，工人都要举行祭奠活动，并爬到造船厂最高的烟囱上挂起致哀的旗帜。

修建纪念碑的谈判终于成功了。当局答应在今年12月16日十周年纪念日前建好。当局不能不答应，这不仅是谈判诚意的表示，更是不再对罢工工人采取镇压的表态。

增加工资的谈判艰难一些，但气氛不那么沉重了。经理说，每人增加2000兹罗提会涉及到全国的工资制度，他负不起这个责任。他说可以用涨级的方式作些技术上的处理。

工人拒绝其他方式，要求每个人都一样涨，但同意减到1500兹罗提。

经理又问：“物价补贴也在内？”

“不，每人1500，外加每月的物价补贴。”

经理为难了：“物价上涨引起的补贴问题我决定不了，这不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

“那就让上面派人来，来个能解决问题的人！”瓦文萨不动声色地将了一军。

这一军将得很有力，大厅里和各个喇叭下都响起了掌声。

经理沉默了，最后同意了大家的意见，并当场向工人作了保证。

一位工人代表问坐在经理身旁的党委书记：“书记同志能不能对经理的话作担保？”

书记：“可以，我担保。”

又有代表要求经理将他的保证写到纸面上。这个要求也立即被经理接受了。

每一条谈判都成功了，每一项要求都实现了，挺容易的。这时的时钟指在13点30分上。

工人们一时沉默下来，品咂着这个胜利，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他们几乎是怀着赴汤蹈火的决心采取行动的，一切怎么会如此顺利和简单！

可是顺利不值得庆贺吗？不用赴汤蹈火达到目的不是更应该欢呼吗？

工人们想到的都提了出来，提出来的也都被当局接受了……那么，大家这种若有所失的心理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工人们说不清楚，瓦文萨也说不清楚……

那支书写历史的巨笔在这儿停了下来。

有工人在议论了：

“1970年12月事件之后，他们也作过保证的。”

“经理的保证有什么用？在波兰可没有罢工权！”

“他们可以将经理撤职，那所有的许诺都白搭了。”

……

瓦文萨敏感地抓住了这种情绪——对当局实现诺言的怀疑。难道这就是不能就此罢休的原因？但瓦文萨立即就否定了这个答案。产生那种说不清楚的情绪不在于此；再说，当局的诚意也需要时间证明，谁也不应该要求马上拿到1500兹罗提、要求一夜之间在二号门前矗立起一座纪念碑。

围绕着该不该相信厂方许下的谎言，代表们开始了一场尖锐的讨论。有的表示应该相信，先复工；另一些人表示不相信，却又提不出具体的办法和更多的要求来。

到最后，罢工委员会只好作出暂时结束罢工的决议。

这时是16日14日20分，瓦文萨走到麦克风前，向谈判厅内外的全体罢工工人问道：

“如果我宣布罢工结束，有没有人反对我的意见？听见了吗？结束不结束？”

瓦文萨停下来，等待着大家的决定；大家也沉默下来，等待着瓦文萨的决定。

瓦文萨看没有人反对，又说：“工人代表和罢工委员会认为，我们的要求已经达到。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已经说过，我将最后一个离开造船厂。我宣布，基本问题已经解

决。结束我们斗争的时刻已经来到了。现在，我允许大家在下午6点以前离开工厂！”

总经理格涅赫也站起来，走到麦克风前。这位在谈判桌上作出巨大让步的领导人，没有一点儿失败者的沮丧，他宽容而又不失尊严地对全体经工工人说：“我感谢大家保持了平静，守护了厂里的财产，维护了秩序。我们大家将要精神饱满的在星期一再见。我们将努力把耽误了的生产补回来。”

工人们有礼貌地鼓了掌。他们赢了这一个回合，他们应该有胜利者的大度。

已经有人走出厂门，急于去见已经三天没有见面的亲人。许多不甘心就此罢休的工人却在大厅门口挤成一团。

就在这个时刻，格但斯克其他几个罢工单位的罢工委员会代表来到列宁造船厂——他们有北方造船厂、汽车运输公司、铁路设备修理厂和海洋电机厂……

这些外单位的罢工工人代表听说这边已经达成协议，就冲着瓦文萨喊叫起来：“要是你们把我们扔下，那所有的小厂都会被压垮的！”

瓦文萨明白了：当局之所以让总经理接受所有的条件，正是因为有这许多工厂声援性罢工的支持。如果扔下他们不管，这些弱小者什么也得不到，而且肯定会在事后受到报复。

还有的代表指责列宁造船厂罢工委员会搞的是“为力量最强者争几个钱的罢工”。

瓦文萨犹豫了。但如果撕毁刚才达成的协议，则意味着列宁造船厂已经取得的东西可能丧失。

北方造船厂的工人希望列宁造船厂继续罢工。他们说：“只要召开一次特别的省委会议，把省委第一书记一撤，你们所得到的成果就会告吹！”

“根本用不着撤换任何人，他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是施舍者的权力！”

施舍？瓦文萨恍然大悟，突然解开了半小时前的疑惑——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兑现，即使兑现了，工人所得到的也只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一点儿施舍。工人并没有得到持久的保证——那是必须由工人自己的权力才能保持的。

瓦文萨惭愧了。

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他都不愿担起他在1980年8月16日事实上已经作出的妥协。

当然，现在不是后悔的时候，甚至也不是慢慢思考的时候。首先要尽一切力量挽回，使这个险些地停顿了的开端继续下去。

这时是15时，更多的人在向厂外走去，罢工纠出队也不知道该不该阻挡，而厂广播站已经关掉了……

瓦文萨还来得及将这支书写历史的巨笔重新挥舞起来吗？

禁书网网友制作

翻墙去禁书网www.bannedbook.org可下载更多禁书



来自底层的改革浪潮——瓦文萨与波兰团结工会 (二)

六

历史的巨变常常是存在于稍纵即逝的瞬间。瓦文萨果断地抓住了这一瞬间，于是历史感到了一阵阵分娩的疼痛。

瓦文萨在8月16日下午那一瞬间的醒悟，是波兰工人阶级具有历史意义的觉醒。为此，他们付出了近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和两次大规模的流血。

人民波兰新的一页应该是从1980年8月16日开始的。

从这一天起，向当局要求善意和施舍的请愿，将让位于建立自己的权力中心。有了这个新的目标，波兰工人将会经历更加险恶的历史进程。这一点很快就会得到证实。

然而这毕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有了8月16日，波兰将有一个新的工人阶级；有了8月16日，波兰将不再回到1980年8月以前的那种状态。

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几次重大转折都是在一瞬间完成的：1917年11月8日，列宁在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布：“现在，我们就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于是，一个人类的新纪元开始了；1948年9月，铁托承受着巨大的历史压力，对斯大林和共产党情报局的指责和胁迫，坚定地回答说“不！”，于是，铁板一块的斯大林帝国有了第一条裂缝。

现在，1980年8月16日下午3时，如果瓦文萨再有几分钟的犹豫，如果他再一次召集起全体罢工委员，讨论要不要结束罢工，那么，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三个重大的转折或许又要等一个或好几个十年。

瓦文萨以他的敏捷、果敢，要抓住正在消失的历史时机。

瓦文萨没有跟罢工委员和工人代表商量，便突然对他身边的工人宣布：“我们继续占领性罢工！我们必须一块儿坚持到底，必须团结一致，否则我们会失掉一切！”

就是这个突然的决定，就是这几句简单的话，使社会主义历史翻到新的一页。

拥护这决定的工人欢呼起来。但欢呼声远没有前几天和刚才谈判的时候热烈。一些人在犹豫，一些人胆怯了……

瓦文萨和几位坚定的组织者分别领人向一号门和三号门走去，许多工人正从这两个门往外走。

工纠队要将大门关上，被瓦文萨制止了。

瓦文萨说：“我们不能把人硬扣下来，谁身体不好，感到吃不消就让他们回家，到明天或星期一再来。我留在这儿。我已经说过，我最后一个离厂。谁愿意罢工，谁愿意干到底，谁就留下！”

许多人响应了瓦文萨，另一些人还是要出去。把这些人放走后，大门重新关上了。

罢工有希望继续进行了。但心神不定和担惊受怕的情绪随处可见，三天三夜的神经紧张开始显露出来。同时，列宁造船厂越来越成为格但斯克各界人士注目的中心。各阶层和各种政治观点的人开始涌向列宁造船厂，使形势变得复杂、气氛更加紧张了……

基层教区的神父来了。

神父向罢工工人祝福之后，宣布：星期日的弥撒将于明天上午9时在二号门前举行；神父还说，大家呆在这儿并没有罪，他明天来工厂做弥撒也没有罪。

在波兰，百分之六十的人信奉天主教，教会一直充当着精神领袖的角色。教会的间接支持显然是一剂镇定剂。

一些传单和地下出版物也在这个下午出现在列宁造船厂。出版物不够分，便有人出来高声朗读。传单中有去年成立的地下组织“青年波兰运动”散发出来的。

广播站，有青年工人在宣读这个地下组织的传单：“我们的目的是在我国保卫人权，保卫民族大家庭的利益，保卫波兰文化免遭控制、没落和苏化……我国人民没有真正独立，他们处在一个极权主义的共产党的无能的统治之下。”

工人们感到惊愕！即使最激烈的工人语言也无法与其相比——这个宣言不仅针对当局，而且是针对着整个制度的。

有的青年工人在为这个大胆得叫人心跳的宣言喝彩，而一位老工人却流下泪来。打动他的不一定是这个宣言的具体内容，他准是感到自己正在过着一个重大的节日——已经久违了的政治生活终于恢复了；或许，他还害怕：结果会怎么样呢？

当然，这些——教会也好，少数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活动也好，都不是眼前发生的事的最本质的东西，否则，我们便无理由将8月事件当作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

教会及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在波兰一直是与执政当局抗衡的力量。然而，教会无论如何不能成为二十世纪政治斗争的主力；而少数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是很容易用威胁、镇压、收买等手段控制住的。

对工人的挑战却难以应付——在一个所谓的工人国家中，用大规模的镇压对付大规模的工人运动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现在，事态就正是朝着当局难以对付的方向发展着——越来越多的罢工工厂代表，乘坐着汽车，艰难地穿过列宁造船厂门外的人群开进厂门。

这是一个新的开端。开端总是艰难而又让人茫然。列宁造船厂似乎又回到了14日刚刚开始罢工时的局面——

各式各样的要求中，谁也说不清什么是最重要的，各种观点的人都有，但谁也不能得到绝对多数的赞同。

到17时，这种既振奋又茫然，既欢欣又胆怯的气氛被一个清晰的声音打破了。这个声音来自工人内部，来自反对瓦文萨的一方。

厂广播站传出了一位列宁造船厂罢工委员的讲话：

“……我们的要求已被接受了。这当然不是经理一个人接受的，这是上头同意的。上头同意了我们的要求，难道这一切我们都要失掉吗？如果我们撕毁了刚刚达成的协议，到下午6时，瓦文萨就不再是造船厂的工人了。你们知道警察和保安机关会对他采取什么行动。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因为我们撕毁了协议。

“在下午6时以前，我们必须离厂。难道你们愿意流血吗？难道你们愿意10年前的12月悲剧重演吗？我们并没有承担联合罢工的义务，我们必须出去。到下午6时，警察和保安

人员就要进厂了。你们知道这里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我不是吓唬你们，我和你们在一起，但是我们必须离开！”

混乱出现了，下午6时军警要进厂的消息使惊恐不安的情绪弥漫开来。大门外，许多带着孩子的妇女呼喊着她们的亲人，许多动摇了的人要求开门放他们出去。

瓦文萨和几个外厂罢工代表匆匆赶到广播站。

瓦文萨讲话了：

“我是罢工委员会主席，是我说了算！我已经宣布了罢工，现在罢工继续进行！”

广播里又传来了外厂代表的讲话：

“我是炼油厂罢工委员会的代表。从早上起，炼油厂就罢工了。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你们也应该和我们站在一起。”

“我是‘巴黎公社’造船厂的代表。我们从昨天起罢工了。现在仍在进行占领性罢工。我们没有谈判。我们支持你们的罢工，但我们大家必须站在一起！”

瓦文萨又一次呼吁：“你们愿意保卫我们的事业吗？”

“愿意！”一些听广播的工人发出了响应。

“你们愿意干到底，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吗？”

“愿意！”回答的人更多了。

情绪暂时稳定一些了。但随着下午6时的临近，不安的情绪不断增长。

对工人阶级来说，胆怯是可耻的，但他们无法不恐惧。那位呼吁大家离厂的罢工委员说得对，那些人什么都做得出来的。这些精疲力尽的罢工工人中，许多是1970年12月事件的参加者、目击者，他们不会忘记，无法忘记——

波兰工人是有过勇气的，1970年12月，他们唱着国际歌，迎着高压水龙、迎着头戴钢盔、手提警棍的警察走了过去；他们曾经有勇气向坦克车伸出拳头，高呼道：“我们是工人，不是流氓！”他们曾经有勇气用肉体组成防线，向前进的坦克进行绝望的斗争；他

们曾经有勇气抬着被坦克压死的同伴在刺刀和坦克前面缓缓步行，高唱着国际歌、高声地呼喊：“看看你们干的勾当！”

但那一次——1970年12月，波兰工人的勇气只是加速了悲剧的结局——镇压者疯狂了，坦克也疯狂了，一切都失去了控制……连抬着死难者的工人也遭到了枪击，他们在《国际歌》歌声中倒了下去；坦克甚至从一个妇女和她的女儿身上碾压了过去，面对这一惨象，连奉命镇压的陆军士兵都哭了……

……

波兰能忘记吗？波兰工人能忘记吗？忘记这一切将是可耻的！

然而，不抹去这样的记忆，人怎么能有勇气作人？！

正是看到了，记住了，工人们才胆怯，才恐惧地躲避下午6时的期限。

6点就要来临。大门外的人匆匆散去，准备逃离的人越来越多了。

暴力是最有效的统治手段，它给与人的记忆要比法律条文深刻得多。许多统治者喜欢用暴力而不愿用法律进行统治的道理也在于此；统治者不惜让他的臣民流血，要的正是这样的记忆——记住，我们不害怕流血！

幸亏，人民对这种记忆还有另一种解释——记住，决不让它重演！这也是瓦文萨的解释。正是因为铭记着那样的场面，他才选择了现在的人生道路。

现在，这位为人的权利和自由进行过殊死斗争的人，当然不会在这个沉重的记忆面前退却。

瓦文萨赶到大门口。有人往大门上放了一架梯子，瓦文萨爬上去，站在上面，用嘶哑的声音说：“我们必须战斗到底，必须用坚定和顽强坚持下去！”

他没有更多的道理可说，也没有更多的精力能说，他已经整整三天没有休息过了。他用仅有的力量带领大家唱起了《国际歌》，他要说的都在这首歌里了：他们创造了世界，他们是世界的主人。宽松和镇压，榨取和施舍，这种没完没了的循环必须打断，他们要行使自己的权利！！

工人们理解了瓦文萨这些朦朦胧胧的思想。激动人心的歌声使工人们团结起来，坚定起来。他们又唱波兰国歌，然后是响彻全厂的口号声：

“上帝保佑波兰！”

“波兰万岁！”

“造船工人万岁！”

几个大门口终于安定下来，大家秩序井然地等待着6点钟的到来。

历史终于艰难地渡过了16日的下午6点。没有军警开进来。

或许这仅仅是一个恐吓；或许，在这场勇气对勇气的较量中，波兰工人战胜了。

6时刚过，广播里播出了罢工委员会的一个公报：当局改变了决定，或者是推迟了时间。过一会又有另一个公报：总经理格涅赫乘摩托艇逃跑了。

工人松了口气。7时正，电视新闻播出了“格但斯克造船厂已经达成协议，星期一将开始正常工作”的新闻报道。

这是很滑稽的。于是扩音器与工人有了这样的对话：

“这是真的吗？”

“不是。”

“电视播音员是不是在说谎？”

“是！”

“大家同不同意让西方的记者以我们的名义发出真实的消息？”

“同意！”

工人们开心地笑了。

现在就笑，还早了一点，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开端不会如此轻松的。

夜降临了，这儿是平静的，外界仿佛成了另一个世界。当局将会用什么样的对策？

明天将会怎样？

这是难以想象的。工人们各想各的办法找地方睡觉——更衣室、车间的角落、木板上……

夜深了，许多人却无法入睡，他们想到了家，想到了亲人。

“又不是战争年代，却有家不能回！这是什么世道？”他们想，感到挺心酸的。

然而此时，工人中的另一些人却根本没有睡觉，他们在开会。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一次会议——它有21个罢工单位的代表参加。它所讨论的已不是一个工厂的问题，而是几十个工厂、甚至是整个波兰工人阶级的问题。没有人知道这次会议会提出什么样的共同要求，也没有人能预测这些即将产生的决议会对波兰造成什么样的震荡！

历史感到了一阵阵分娩的疼痛。

七

充分显示波兰工人阶级成熟和社会责任感的21项要求诞生了。不记住这21项要求，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无权说他理解了这半个世界；忽视这21项要求，共产世界的任何一位领袖都无权说他是无产阶级政治家。

1980年8月和1970年12月的另一个较大的区别是平静。在平静中隐藏的结局比明晃晃的警棍、枪支更让人揪心。

8月17日早晨，大街上冷清清的，只有两人一组的警察在巡逻。他们没带武器，没带警棍。他们礼貌而安祥地走过，不阻拦任何车辆，也不查问任何人的证件。

上午9时，列宁造船厂的二号门前的广场上，逐渐聚集了许多工人家属。这些人也是安祥的。她们中有不少是穿着丧服的妇女。

二号大门上耸立着一个巨大的樟木十字架，上面挂着红白两色的花圈。十字架旁边挂着现任罗马教皇——波兰籍的约翰·保罗的巨幅画像。

许多罢工工人从厂里走来，但仅仅到大门前为止，那儿有一个临时搭成的祭坛。工人和他们的亲属分别站在祭坛两侧。

弥撒开始了。神父在布道词中谈到人和劳动，谈到人的尊严和劳动的尊严。

神父深深地打动了工人的心，引起强烈的共鸣。教会确实选了一个好时机。

波兰教全多年来，成功地利用了波兰人民对共产党的威信及统治权利失去信心的危机，迅速在波兰社会建立起精神权威。去年夏天，罗马教皇保罗二世访问他的祖国时，引起的崇拜，将人民与政府间的鸿沟掘得更深了。

这一次，教会又赶在政府前边，占了上风。

神父那安详、缓慢的声音使疲惫而衰弱的心灵得到了滋补。他的题目选得真好！他讲劳动的尊严，使罢工工人对自己实际上所处的卑下、屈辱的社会地位有了更加强烈的感触。

连宗教思想都能肯定劳动的价值和尊严，为什么一个以劳动人民代理人自居的政权，一个名义上属于工人的政党却可以那么粗暴地忽视这个阶级的利益和意志？

神父讲到人的尊严，那是包含在人生来是自由的、人生来是平等的这些古老而浅显的道理中。罢工工人要求的最终就是这些！

这种领悟非常重要，它减轻了工人的犯罪感，而增添了一些崇高感和力量感——尽管二十世纪的工人阶级居然要由宗教思想来证明他们的存在和价值，确实令人可悲。

弥撒是在“上帝保佑波兰”和“耶稣呵，人民向您恳求”的呼吁中结束的。可见目的是波兰和人民，而不是上帝。

弥撒结束后，十几名穿着蓝色工作服的造船工人，抬起了巨大的十字架，缓缓地走向广场。人群有秩序地让出一条道来。

十字架在广场旁的一块草地上立了起来，1970年12月，三名造船工人最先在这儿倒下去的。

一位工人庄严地说：“它将立在这儿。让我们记住十二月的牺牲者。”

一片肃穆——神父默默地向十字架洒了圣水；孩子们默默地将鲜花高高地堆在十字架前；青年们默默地举起了点燃的蜡烛和火炬；老人们默默地流淌着眼泪……

沉默中响起了几声轻微的呜咽和抽泣，那是从穿丧职的妇女发出来的，很轻微，她们抑制着，努力将自己的悲哀和生命融化到这片巨大的沉默之中……

沉默是被一声雷鸣般的吼声打破的。它不是来自悲剧的记忆，也不是来自教会和上帝。它来自工人阶级。这个阶级在近半个世纪的沉默和呻吟之后，终于响起了一声震馆世界的吼声！

当教会显示了它的力量之后，罢工工人终于听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感到了另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这是他们自己的力量——是从他们灵魂深处爆发出来的力量。

中午，从列宁造船厂向罢工工人，向格但斯克，向波兰，向全世界发布了第一号公报。公报是以“沿海地区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

公报说：“根据沿海地区各罢工工厂企业达成的协议，厂际罢工委员会已于8月16日深夜成立，会址设在格但斯克造船厂，列宁造船厂罢工委员会主席瓦文萨当选为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

这次从头天深夜开始的会议，还没有来得及将工人阶级的全面要求及行动步骤规划出来。但看看这个公报的主要几条就知道，波兰工人阶级在几十年的渺茫、徘徊之后，终于找到了能撬动这半个世界的历史杠杆。

公报宣布：“现决定继续罢工直到职工的要求得到实现为止。厂际罢工委员会授权同中央进行谈判。只有厂际罢工委员会才能宣布结束罢工。罢工结束后，委员会亦不解散，它将监督要求的执行情况并筹组自由工会。”

波兰工人阶级有了这个威严的宣告之后，既没有忙于进一步宣传、解释，也不急于了解当局的反应。他们是沉着的，因为他们已经找回了自己的力量和尊严，他们不再根据别人的脸色来确定自己乞求的数量。他们要告诉世界：“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能转动一切齿轮！”

厂际罢工委员会从容不迫、却又不失时机的在几小时后，接着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

一旦工人阶级从颤颤惊惊的乞讨者的屈辱中解脱出来，他们就不再只看到一点儿可怜的、眼前的物质利益。在这次继续到深夜的会议上，波兰工人第一次显示了他们作为国家主人的责任感，他们将波兰存在的问题都考虑到了——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他们讨论的是整个国家的危机，讨论了社会各阶层参加社会改革的重要性和可能性。

临近午夜，代表们终于拿出了共产世界里最能体现工人阶级政治觉悟和阶级远见的纲领。

这就是著名的21项要求。

不记住这21项要求，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无权说他理解了这半个世界；忽视这21项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一位领袖都无权说他是无产阶级政治家。

以下是21项要求全文：

1，根据波兰人民共和国批准的国际劳工组织和有关自由工会的第87号公约，同意建立独立于党和雇主的自由工会。

2，保证罢工权利和罢工者及罢工支持者的安全。

3，遵守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所保证的言论自由，对独立的出版社不采取镇压措施，允许各种信仰的代表使用群众性传播工具。

4，恢复下列人员原有权利：

1970年和1976年罢工后被解雇的人员；

因政见问题而被开除学籍的大学生；

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对埃德蒙德·扎德罗任斯基、杨·科兹沃夫斯基和马雷·科兹沃夫斯基的迫害；

停止因政见问题而实行的迫害。

5，通过群众性传播工具发表厂际罢工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公布其要求。

6，采取以下实际行动以引导国家摆脱危机状态：

向公众发表关于社会经济形势的充分消息；

让社会各界、各阶层参加改革方案的讨论。

7，全体罢工参加者在罢工期间的工资按休假办法发给并从工会中央理事会基金中支

付。

8，提高每个职工的基本工资每月2000兹罗提，作为对迄今为止物价上涨的补贴。

9，保证工资随物价上涨、币值下跌而自动相应增加。

10，实现国内市场食品的充分供应，出口仅限于多余部分。

11，取消议价和所谓内部出口商店中的外汇销售。

12，实行按业务能力而不以党派隶属选拔领导干部的原则。采取如下措施取消民警、保安机关和党的机关的特权：

统一家庭补贴标准；

取消特殊销售。

13，实行肉类和肉制品票证即食品券制（直到市场形势得以控制时为止）。

14，将妇女退休年龄降至50岁，男子降到55岁或者不论年龄而以妇女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工作满30年，男子满35年为标准。

15，将按旧工资标准计算的抚恤金和退休金统一到目前支付的水平。

16，改善卫生保健工作条件以保证劳动者有充分的医疗护理。

17，保证劳动妇女的孩子在托儿所和幼儿园有相应的名额。

18，实行三年制带薪产假。

19，缩短等待住房时间。

20，出差补贴由40兹罗提增至100兹罗提并增加夫妻两地分居补贴。

21，实行所有星期六为公休日制。对于不能间断工作的职工和四班制职工所缺的星期六公休日应以增加休假天数或用其他代薪休息日予以补偿。

厂际罢工委员会1980年8月18日

“21项要求”定稿并经全体委员通过，已经是18日凌晨了。罢工进入第五天。

与三天前罢工工人在谈判清单上列出的五项要求相比，我们很难相信这21项要求是同一个阶级在几乎同一时刻提出来的！

但这是事实。

从21项要求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工人阶级。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他们。团结和觉醒使波兰工人阶级在一两天内解脱了在几十年的屈辱中形成的那具异化了的躯壳。

巨人苏醒了……

八

政府可以不怕动乱，不怕流血，却不能不怕以异乎寻常的理智呼吁着秩序和社会责任感的工人阶级……

波兰是一个出巨人的民族。五百年前，波兰的一位巨人曾经动摇了长达千年的宗教统治，给黑暗的中世纪带来一丝光明，因为他定住了太阳，转动了地球！他就是哥白尼。

今天，这位刚刚醒来的巨人也将象哥白尼一样，要把颠倒了的主从关系颠倒过来，使自己成为世界的中心。

遗憾的是，行使权力的最高当局并没有很快地察觉这次在瞬间完成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蜕变。一个长期不被反对和警告的政权，已经迟钝到近乎于麻木。

回答这位刚刚苏醒的巨人的吼声的，是飞机的轰鸣声。

从清晨开始，造船厂上空就一直有飞机盘旋，撒下了要求工人复工的传单：

“工人们！你们不要卷入旷日持久的罢工。你们要考虑考虑，这种罢工是在为什么人效劳？”

传单中还有总经理格涅赫的呼吁书，重申原来的所有提案都得到了解决，每个职工都得到了增加工资1500兹罗提的成果。

工人领袖们是沉着的，根本不理睬这老一套的威胁和安抚手段。他们从容不迫地采取行动：早晨，向全体罢工工人宣告21项要求，并派人向格但斯克省省长呈交21项要求的清单。

要求加入罢工行列的单位更多了，为此，制定了参加厂际罢工委员会的登记原则：

- 1，只有参加罢工的工厂才能登记；
- 2，申请登记的工厂必须派出两名代表；
- 3，对21项共同要求表示赞同；
- 4，厂际罢工委员会所属各厂罢工委员会可以随时就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报酬同各厂领导进行谈判。但这类谈判的结果对决定何时结束罢工没有影响；
- 5，只有厂际罢工委员会才有权同中央进行谈判并决定罢工或复工。

上午，登记单位达到60多家。三联城的私营出租小汽车司机联合会也来登记参加罢工，尽管罢工会给他们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他们还每天派出4—5辆小汽车供厂际罢工委员会使用，并捐出二万兹罗提作为罢工经费。

为罢工和为修建1970年12月事件纪念碑的社会捐款越来越多了，广播里不断在报告捐款单位和数目。

到傍晚，罢工登记号已增加到156家。比这种数量增加令人振奋的是，罢工工人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支持——

作家莱赫·邦德科夫斯基和化学家伊切赫·格鲁谢茨基博士分别带着格但斯克地区文学艺术界和科技界的声援信件走进造船厂，并出人意料地留了下来，加入了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

他们之后，是三十名格但斯克工学院的教授报名参加了联合罢工委员会……

社会各阶层都把视线集中到工人阶级身上，并逐步承认工人阶级是代表社会的主要力量。

罢工工人很快就证实了社会各界的信赖并显示了他们的力量和社会责任感。

厂际罢工委员会作出决定——为了保障人民的生活，医疗部门、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以及生产食品的企业部门要保持正常生产；

对社会财产，罢工委员会也表现出主人翁的对任感——罢工纠查队负责公共财产的保护，钢厂的罢工工人必须保证炼钢炉不灭，以避免造成损失……

一切都是全新的：组织、宣传，他们必须使目标明确，秩序井然，必须使整个工人阶级在整体目标下团结一致并获得更多的社会阶层的支持和参与。

这些工人阶级能做到——

他们印刷传单。条件很差，纸张欠缺，他们用广播车向社会呼吁，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宣传手段。除了传单，还能印制篇幅较大的情况通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尽管这种宣传手段是粗陋的，与政府所具有的80年代水准的宣传工具相比太原始、太可怜，但至少世界不再只听到那种千篇一律的声音了；至少这儿发生的事不会任凭一些人解释成“少数流氓煽动闹事”或“反社会主义势力在制造动乱和反对国家利益”了。

现在，工人阶级要说出他们罢工的真正动机。1980年8月19日，波兰工人镇定地向最高当局发出了呼吁：

“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我们是我国劳动群众第一个真正的、自由的代表。我们肩负着整个社会的重大责任，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成立独立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和雇主之外的自由工会。

“因为只有那时才能保护职工的权利和利益。在我们赢得自由工会之前，保卫我们利益的唯一方式只有罢工，然而这对社会来说，是一种代价最高的谈判方式。

“成立自由工会的第一步是通过当局派遣代表到格但斯克造船厂来，并与之进行谈判。从而取得中央当局对厂际罢工委员会的正式承认。

“我们期待中央当局的代表的到来。拖延一天，将是当局不愿意承认波兰劳动人民有权选派自己真正代表的证据。我们谨以我们所代表的职工的名义声明：我们将渴望尽快复工——然而作为有充分权利的公民、作为工厂的真正的共同主人而复工。每拖延一天，对于我们由于领导的过错而危机重重的经济来说，就是上亿兹罗提的损失。我们的人数正在与日俱增。拖延所付出的社会代价的大小将完全取决于当局。我们再一次向当局呼吁：要审慎，要有负责精神！”（[波]沃·盖乌任斯基《波兰团结工会成立记》）

尽管纸张很差，印刷质量也不好，但全世界都听到了波兰工人富有责任感的呼吁

——因为几乎所有的外国驻波兰新闻机构，此时都赶到了格但斯克：美联社、路透社、共同社、法新社、还有新华社……他们用各种文字将波兰工人阶级的呼吁传到世界各地。

以往，这样的呼吁是由政府发出来的。

以往，工人只要离开劳动岗位便会受到警告：不准制造混乱，不准破坏纪律和秩序；甚至不惜以武力使工人恢复秩序。

现在，当波兰工人阶级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理智和秩序时，当局才感到到这种高度的纪律性和社会责任感，远远比示威口号和因愤怒而挥动的拳头可怕！

波兰政府陷入到更加痛苦的困境之中。

九

在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援助声中，政府只好打破痛苦的沉默，极不情愿地采用了政治解决……

波兰工人阶级的宣言震撼了全世界。各国大小报纸都以头版头条的位置报道了这次来势凶猛的事件。

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却保持着沉默——这在西方是审慎的沉默；在苏联、东欧却是一种痛苦的沉默。

罗马教会也开始采取严格的克制态度——从开始的支持变得审慎的观望了。教会担心事态进一步扩大会引起更大的社会对抗；或许，教会是不愿意波兰在共产党和教会两大势力之外又产生第三个权力中心。

世界上最大的军事集团“华沙条约”，紧张地注视着波兰局势的发展；另一方的“北约”又十分严厉地注视着“华约”。

与这种沉默和紧张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世界各国的工会组织，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毫无保留地支持波兰工人阶级。

在九十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代表着大约七千万名工人的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于8月18日发表声明，敦促波兰政府不要忽视罢工工人的要求。

由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西班牙全国工人委员会也于同日发表声明，“无条件地支持波兰工人的斗争”。

西德最大的冶金工会，8月19日发表公报：“波兰罢工工人可以指望得到它的声援和支持——包括提供物质上的支持。”

8月20日，美国最大的劳工组织“劳联——产联”，发表了一项由34名执行委员签署的声明：“强烈支持波兰工人正义和英勇的斗争。我们要求美国政府要让波兰当局知道，它对这个国家事态发展表示关切，以及坚决反对对波兰工人实行任何压迫手段的态度。”

现在该轮到波兰政府表态了。

波兰政府不能不表态，它的内政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它自己怎么能回避？但问题是，从这个党三十多年的执政历史中，根本找不出解决眼前危机的经验。

波兰有过的几次危机都是由人民的忿怒和动乱造成的。尽管政府对这类动乱表现出极大的警惕性，甚至夸大地宣称已经危及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而事实上，一个控制着庞大国家机器的政党并不害怕这样的动乱，因为它可以用武力轻而易举地镇压而不必担心失败。

当然，武力会造成流血和死亡，但统治者不害怕流血——严格地说的不害怕流人民的血。这类动乱无论如何发展，也不会让他们流血的。

政府无法回避，又不能对秩序井然的、呼吁着理智和责任感的工人诉诸武力，剩下的只有政治解决了。

当局也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政治解决。

以往的政治解决都是镇压之后的安抚，动荡之后的改组，是内部的调整，是权力的重新分配。

这一类的政治解决得有一个前提——首先需要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向某个不得人心的最高领导发动进攻，需要人民不惜以流血为代价去声援另一位政治家；还有，更重要的还得有一个领袖人物出来承担责任，充当替罪羊。

这些条件在现时的波兰都不具备——

波兰工人阶级这一次并不反对谁或支持谁，或者说他们不愿意再为政治家的权力斗

争付出代价了。他们在1956年曾经为把哥穆尔卡拥戴上台而流过鲜血；1970年正是这位哥穆尔卡下令开枪镇压他们。那一次，他们又以流血为代价把哥穆尔卡赶下台去而换取了与新领导的坦诚对话；然而，那一次人民与新领袖的蜜月仍然是短暂的。

因此这一次，他们不再为此付出代价了。

在政府方面，也缺少一个政治解决的条件——此时还没有一个可以承担责任的领导人。

按这类国家的惯例，一个领袖必须下了台，才能由他承担责任，而不是因承担责任而下台。

这是一次不准备承担责任，追究责任的政治解决。无论由什么样的政治家来完成这个任务，都只能是虚伪的、做作的。

第一个被挑选出来承担这个倒霉差事的人选是副总理塔德乌什·佩卡。

1980年8月19日，佩卡副总理终于以政府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公开了自己的活动。其实，这位副总理五天前就飞抵沿海地区了，他公开出场是因为罢工工人定出原则：跟他们谈判的至少得是一位副总理。

中央对佩卡副总理的沿海之行也定了一个十分坚定的原则——只同各厂的罢工委员会谈判，而决不跟厂际罢工委员会接触。

政府拒绝承认厂际罢工委员会，说明他们对工人联合起来的意义确实有一种非常清醒的认识。然而它对此时已经有250家工厂参加的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存在置若罔闻，则表明了它无视现实的鸵鸟精神。

现在，厂际罢工委员会不仅领导着这场罢工，并且实际上在管理着城市、领导着城市的公共经济、交通、供应工作——格但斯克的电力、自来水、煤气、卫生部门都是在厂际罢工委员会的组织下继续工作的；甚至按瓦文萨的提议，还组织了罢工工人去帮助郊区农民的秋收。

佩卡副总理选择了格但斯克港务局和船舶修配厂。

谈判是在格但斯克省政府纹章大厅举行的。

船舶修配厂的工人代表、厂长、厂党委书记参加了谈判。

会谈一开始，便由佩卡副总理带头作自我介绍：他是副总理，跟第一书记盖莱克共事二十多年，他俩是最亲密的私人朋友，他是第一书记家的常客；他还是一位教授，曾经写过一本经济改革方面的书。他说，“就象匈牙利那样的经济改革，只不过还要好得多。你们看到这本书吗？呵，没有，你们不可能看到，因为只发行了1200册。”

于是副总理埋怨道，波兰就是这样，那些乱七八糟、不三不四的书可以大量发行，而好书却发行不上去。

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重要的是他这次来格但斯克，是因为他喜欢格但斯克。他为这里发生了罢工感到痛心。他希望能迅速解决问题，在问题解决之前，需要他呆多久就呆多久，那怕呆到年底，呆到明年。

副总理特别强调，他这次来，有政府、政治局和盖莱克同志本人授予的解决问题的全权。因此，他“有充分的资格进行谈判并作出决定”。

工人代表也都作了自我介绍。这些年轻人并不轻信，他们都说得简单、迟疑。他们表示不打算谈政治而只需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副总理报有气派地说：“那就把你们的要求都提出来吧。”

代表们却沉默了。过了好一会，一位工人代表递给佩卡一份厂际罢工委员会起草的21项要求全文。

副总理看了看，简单地谈了自己对这21项要求的看法，表示所有各项都是可解决的。

对第一项成立独立工会，他这样表态：工会工作做的不好，大家有意见，是应该改造。他说，“罢工委员会在罢工结束后，将继续活动，也可以选进现有的工会里去。”

这真是叫人哭笑不得的建议。

接下去，副总理又提出一些具体的问题跟代表们商量：是实行三年制产假好呢，还是多建些托儿所好？他谈这个问题时，一点儿也没有副总理的架子，到真象一位写过书的经济学教授。

他说：“我们要算一算那种做法经济一些，我们就决定采用那种。”

佩卡的谈话是坦率的、干脆的、毫无官腔的。和女工代表谈到女工工作条件时，他甚至幽默地把女工代表称为“大婶们”。

副总理谦和、随便和幽默风趣的个人魅力将许多人迷住了。到晚上九时，又有好几家小厂的罢工委员会的代表参加进来。佩卡仍无倦意，精神抖擞地回答问题、解决问题——

住房紧张吗？他知道的，格但斯克有12万人在等待住房。

“没问题”，他说，“我们给你们建两个房屋工厂。一个是普通的，生产水泥预制板，第二个是法国进口的，生产独户房子，非常漂亮的小房子。这对你们够可以的了吧？”

肉食供应紧张吗？这他也知道。

“没什么”，副总理说，“已经决定进口六万吨肉。问题解决了。”

“这肉什么时候来，副总理先生？”一位女工代表问。

“什么时候？等一等，我们问问部长。呵，不错，从欧州经济共同体进口，两个星期之后就到货，如果从阿根廷进口，要用三个星期。”

有代表对书报检查制度提出批评。

这个问题难一点，副总理的回答略长一些。他说书报检查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这方面的放任。他又忍不住对他那本非常好的书只印了1200本表示了忿忿不平。

他认为问题在于记者们不好，“是他们掩饰缺点，是他们在报刊上把一切都写得那么圆满。他们经常在报纸上把盖莱克同志和膘肥肉壮的奶牛照在一起，他们对什么都一律赞扬。可是黄油没有还是没有，尽管记者们说，‘我们这儿牛奶满成河，’但我们仍然不得不进口黄油……”

“我抗议，副总理同志！”

佩卡非常遗憾地中断了他与人民共义愤的珍贵时刻，不无不平地问：

“您是什么人？”

“我姓加卢斯，是《沿海之声报》记者。副总理同志，我们只能发表你们允许发表的

东西。”

副总理确实是一位好好先生，他马上附和道：“您说得对，这是我们共同的过错。不过加卢斯同志，您好像很疲倦。您的脸色很难看，您应该去睡一觉。”

“谢谢，我能坚持。”

副总理又称赞了记者同志的工作热情，并且向工人推荐：

“怎么样，卢斯加同志可以参加罢工委员会吧？”

佩卡又继续讲下去，粮神饱满、情绪良好，一直讲到20日的清晨5时。他对什么都一口应承。

工人所提出的，副总理所应承的大多是眼前的、物质的要求。

只要工人阶级不作为一个社会整体出现，只要参加谈判的工厂个体只着眼于本单位的具体问题，他们也只能提出这一类的要求。这确实证明了当局不跟厂际罢工委员会谈判的决策之英明。

工人代表将这一大堆具体的、已经被副总理承诺了的要求归纳成12条，并决定形成谈判协议。

如果佩卡副总理的这次谈判成功了，紧接着便会有一系列的跟各个工厂的个别谈判，那么，所谓的政治解决便会成为各个击破的政治瓦解。

庆幸的是佩卡没有成功。

上午九时，当12点内容的协议文本写好，需要双方签字时，佩卡突然要求在后面再加上一条：“本协议将呈部长会议批准。”

工人代表大吃一惊，质问副总理：不是说过他自己有充分的权力签字吗？

佩卡诚恳地要求大家能理解，他上面还有政府。还有政治局，他不能绕过这些权力机构。但他保证说，二个小时之后，华沙便会作出肯定的答复。

谈判协议立即送到了首都。

华沙的答复很快就下来了，尽管不是副总理所说的二个小时，而是五个小时，但就这类国家来说，已经是了不起的行政效率了。

然而遗憾的是，政府只同意了12点协议中不太重要的三点：

关于建造房屋工厂；

关于进口肉食以及罢工委员会；

罢工结束后仍能参与工厂工会委员会的活动。

对一些关键性的要求，回答是模棱两可的。

下午五时，工人代表又回到谈判大厅，副总理显然受到了很大的精神挫折。虽然他又打起精神，重新许诺说，一切都会顺利解决，但工人代表却以抗议、挖苦和不友好的喊叫一次又一次地打断他的讲话。

会谈最终是在愤怒的气氛中收场的。

第二天，佩卡被召回毕沙。接替他的是另一位副总理雅盖尔斯基。

临上飞机前，佩卡副总理含着眼泪，痛心地说，他是怀着最良好的意图和工人谈判的，他希望多许一些愿，先结束罢工，然后再慢慢地实现这些诺言。难呵，他没有成功。

佩卡失败了，也宣告了那种家长式的统治方式的失败；佩卡哭了，这让人感到是一个衰败的政权在哭泣。

这次谈判的失败对工人阶级来说，却是一件幸事，使他们不再想去尝试已经被多次证明过的、失败的手段。

副总理佩卡被召回华沙的当天，三个满脸通红，惶惑不安的小伙子来到列宁造船厂，找到了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瓦文萨。

“我们受我们厂的职工委托，叫我们先到这儿来，”他们小心谨慎地试探道，“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之后，可能我们的整个代表团都要来。”

他们被重新接纳了，尽管有讥讽，却是欢乐的、善意的。当这两个厂的代表团进来

时，列宁造船厂响起了前所未有的欢呼声。之后，扩音器里传出了主席团的一个简短公报：船舶修配厂和北方修造厂跟我们在一起，分裂消除了。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增补了两名新成员——船舶修造厂和北方修造厂的代表。

此时，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已经增加304个厂家。

一场势均力敌的决战，已经不可避免……

禁书网网友制作

翻墙去禁书网 www.bannedbook.org 可下载更多禁书



来自底层的改革浪潮——瓦文萨与波兰团结工会 (三)

十

工人出身的盖莱克曾经给波兰带来过巨大的希望他曾经勇敢的为12月悲剧承担责任，并且有过与工人的真诚对话。

波兰的危机明明已经到了政府诺不付出代价就难以解决的地步，当局居然还用佩卡式的解决方式去胡弄工人阶级，这不能不说是盖莱克政权的可悲之处。

但如果我们因此就下结论，说盖莱克是完全站在工人对立面的领导，说他从来就是一个不愿体察民情的官僚，则有失公允。

要是有可能将波兰统治者当局的个别人作一次近距离的观察，就会发现，这些造成过许多社会灾难的波共领导人，并不象历史上许多专制暴君那样专权：暴戾、残酷；恰恰相反，波兰近几十年出过好几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们身上有许多专制国家的统治者所没有过的民主倾向。

从贝鲁特、奥哈布、哥穆尔卡到盖莱克，全是地地道道的工人出身。

57岁的现任第一书记盖莱克，出身于一个矿工家庭。童年时，父亲因事故死于矿井。他与母亲流落法国，13岁开始下井挖煤。这个流落异邦的小矿工，下井干活时因个子矮小，手提的矿灯拖在地上，他只好把矿灯提手弄得短些。

盖莱克了解工人的悲惨处境，而且确实是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投身革命的。

盖莱克还是共产世界唯一一个在西欧侨居了二十二年之久的国家领导人。那就是说，他是在比东方民主得多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这很重要，人们评价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民族的行为时，常常夸大文化心理的因素，盖莱克的全部经历证明，政治

或制度对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1970年底，黑暗的12月大屠杀刚刚过去，巨大的社会动乱所造成的政治危机，使盖莱克取代了哥穆尔卡，成为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盖莱克的上台执政，曾经使波兰人感到巨大希望就如他的前任哥穆尔卡在1956年被人民拥戴上台时，曾给人民带来过振奋一样。

我们不能说盖莱克只是扮演了哥穆尔卡在1956年扮演过的角色，不能说他只是把哥穆尔卡演过的戏又演了一遍；更不能说他一开始就在演戏、欺骗人民。

不，无论1956年的哥穆尔卡，还是1970年的盖莱克都曾经是真诚的。

1970年12月20日，盖莱克接任波共第一书记的当天晚上就向全国人民发表了广播电视讲话，说最近一周发生的悲剧深深地震惊了整个社会，说这次事件“沉痛地提醒我们一个真理，党必须始终保持同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密切联系，而不能失去同劳动人民的共同语言。”为了找回已经失去的同人民的联系和共同语言，盖莱克作出了七十年代共产世界的一个重大决定。

1971年1月24日，也就是盖莱克接任第一书记仅仅一个月，一架专机从华沙飞往沿海工业城什切青市。飞机上有盖莱克，有总理、副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

飞机起飞时，这些几乎包括了全部政府班子的乘客们并没有任何既定的方针政策，他们到工厂去，是为了解实际情况，为了听听刚刚在动乱中流过血的工人阶级的声音；他们诚心诚意地希望找到导致这场流血悲剧的根源之所在。

在什切青市，他们同造船工人会见，讨论持续了九个钟头。

领袖和工人诚恳地交谈，倾诉自己的疑问和希望，相互寻找支持和信任。厂里的广播站转播了会见的全部过程，成万名造船工人和城市居民拥在扩音喇叭前，倾听他们的代表和领袖的对话。

这是一次心对心的对话没有演说，没有官腔，没有决议，没有秘密，没有躲躲闪闪、虚虚实实的政客辞令。

盖莱克一行又从什切青直接到了格坦斯克。这次会谈继续了8个小时。

瓦文萨也参加了这次会见。

二十多位工人在对话中讲了话。这些发言对盖莱克的震动很大。

瓦文萨也讲了话。

盖莱克不认识瓦文萨，也没有通过这次对话与瓦文萨相识，但这位工人的讲话内容曾经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瓦文萨说：“二十五年来，我们原本指望干得越快，我们获得劳动果实的日子就越早，结果我们失望了。如果有必要的活，即使每天只有一碗菜汤喝，我们也准备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进行劳动；但我们希望得到保证，那就是这碗菜汤的分配将是公平合理的。”盖莱克的讲话很简单，一点没有领袖人物所有的威严和无所不知的自信。他请求大家原谅，他来这里只是要告诉大家，他的处境有多困难。他说：“你们把我也当作人吧也要象帮助人那样来帮助我吧！……怎么样你们肯帮助吗？”盖莱克发的话音刚落，他面前就响起了一片整齐的回答“我们帮忙！”这个回答很快就成为1971年波兰最流行的口号。

在会谈中，工人们曾当着政府领导的面，用一分钟默哀悼念一个月前死于政府镇压的死难工人，盖莱克和他的同志们以沉默向工人们的悲痛表示了深深的理解、羞耻和自责；或许，双方在这一分钟沉默里所有的沟通，超过了八、九个小时的语言交流。

当盖莱克离开造船厂时，工人用掌声欢送他。当时，工人充满了新的希望；盖莱克也怀着巨大的决心决不再无视工人阶级的存在和意志，一定要象对待成熟的、有充分权利的公民那样对待工人阶级！

这次沿海之行，对盖莱克来说，是一次痛苦而苦涩的公民教育课。

正是这次坦诚的对话，缓和了波兰的紧张局势，并开始了人民和领袖之间的蜜月。

十一

制度比领袖更有力量，那些妄图靠个人权力进行改革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倒是他们自己先被制度所改革。

从沿海地区返回几天之后，波关召开了八中全会，对十二月事件进行评价并追究责任。

在这次全会上，盖莱克发表了纲领性讲话，他认为十二月事件的起因是党的领导没有与工人进行诚挚的对话，悲剧首先在于没有采取有效的政治措施来消除紧张。

盖莱克首先谴责了在12月悲剧中使用暴力镇压人民。

他说：“用武力来解决与工人阶级的冲突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这只能造成流血、造成人民政权与人民之间的鸿沟。”全会公布了前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于12月15日指示格坦斯克实行紧急状态、并命令民警有权在自卫和反击进攻者的情况下使用武器的经过。

这次全会作出决定：哥穆尔卡“在领导党的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削弱了党和社会的联系，使经济发展中的差错增加，最终引起公开的政治危机，而在危机的过程中又采用了不正确的方法……中央委员会决定暂停哥穆尔卡同志的中央委员权利。”同时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中央书记雅什楚克、克利什科等人。他们是领导国民经济、内务、组织工作的政治局委员。

盖莱克对这些经常受到人民信任和尊敬的政治家不得不带着个人悲剧离开政治舞台，表示了深深的同情。但他认为必须这样做，这不仅仅是为了对过去的清算，而是对未来的考虑，以“保证领导方法不出偏差，保证不出现独断专横的倾向。”盖莱克的愿望是符合人民心愿的，而他采取的行动也是积极的、及时的、有魄力的。

然而，盖莱克与人民的蜜月是短暂的。我们从十年后的波兰社会现实已经看到了，那种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曾经给波兰带来过巨大痛苦的政治、经济危机又在盖莱克时代明显地显露出来。

盖莱克和他的前任一样失败了。因为他在经济上仅仅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而且把生产力低下仅仅当成纯经济问题。

盖莱克提出高速度、高消费、高积累的三高政策，而没有全面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将中央控制的经济权归还给社会，使劳动者能因经济上的自立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人。

盖莱克的盲目的高速度经济政策引起了投资过热、外债骤增、比例失调、物价上涨等一系列危机。

政治上的改革更被忽视，盖莱克仍然采用了那种苍白无力的惩罚人、撤换人的老一套方式。这种短期有效的头疼治头、脚疼治脚的政治手段，丝毫没有触及造成波兰危机的根源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

盖莱克不可能靠个人权力、靠制度自我更新的幻想去改变这个制度的内部结构；相反，倒是这位优秀的政治家很快就被这个制度所改造了。

这位工人出身的领袖，这位很具民主作风的工人运动活动家仅仅三、四年之后，就变得“拒谏饰非、个人专断，听不进批评意见”了。（[波]米。弗。拉科夫斯基《十二月转折》。）

制度比领袖更有力量，那些妄图靠个人权力进行改革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倒是他们自己先被制度所改造。算上盖莱克，这个斯大林模式的政权已经糟蹋了四位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了而且越往后来，完成这种改变的时间越短。仅凭能把好人变坏这一点，我们就有理由说，这种政权形式是要不得的，必须彻底改革。

现在，尽管盖莱克还没有把哥穆尔卡曾经走过的道路重复完，但我们已经看到他正面临着哥穆尔卡执政的最后时刻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对危机完全相同的评价。

我们难以判断的只是，盖莱克会不会无视历史的进步，而在最后时刻采取哥穆尔卡的方式，用暴力去对付工人阶级？

1976年，盖莱克曾经在这个历史进步的分界线上犹豫过……

1976年6月24日，盖莱政权的总理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肉食、黄油、食糖涨价；同时还宣布，给予劳动人民以全部等价的现金补偿。

总理的电视讲话之后，首先在拉多姆地区，工人离开工厂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动乱发生了。

这是盖莱克执政以来遇到的第一次危机，但与1970年事件的起因却完全一样。一个政治家应该有这样的记忆！

抗议和罢工在十多个省蔓延、局部地区还发生了街头冲突。

这次，盖莱克发表了强硬的、哥穆尔卡式的讲话。

他宣布：“我们不允许国内落后人物、冒险分子和教唆分子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大多数人……”盖莱克将华沙和什切青的警察部队紧急调到出事地点。

波兰面临着继1956年，1970年的大规模流血之后的又一次严峻时刻。

这次事件最终没有能避免流血。但要说明的是，只有两位工人死亡；而且是由于某些部门的粗暴行为造成的。这一点必须强调，正是盖莱克的努力，才避免了1970年悲剧

的重演。

他用警察驱逐游行队伍，却决不允许开枪，并且很快就撤销了涨价的决定。这可以算成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吧。

在宣布涨价24小时之后，总理又重新出现在电视荧屏上，他灰溜溜地、垂头丧气地向整个波兰宣布“撤回关于改变价格的政府草案。”盖莱克成功地将问题压了下去，而不是成功地解决了问题。他甚至已经没有五年前那种解决危机的耐心和诚意了。他完全忘记了他在五年前所有过的誓言，用诚挚的对话解决与工人的矛盾和冲突。

政治家对什么事能保持记忆？

看来，对领袖人物的选择，应该把记忆力放在第一位。

那一次，盖莱克采取了对专制者说，最省力、最有效的解决方式严厉的制裁。

拉多姆事件之后，六百六十名工人遭到拘捕和审判，九百三十名工人被解雇。

仅用了五年时间，制度就完成了对一个领袖人物的塑造。

现在，1980年8月，人民波兰出现的危机是它历史上几次危机的重复，而处理危机的政治家又是由制度从同一个模子里组造出来的，那么，盖莱克会不会又一次采用他在1976年所成功地运用过的手段；甚至更退一步，去采用哥穆尔卡在1970年所用过的极端手段？

我们有理由这样担心，因为1980年的盖莱克与1970年的盖莱克已判若两人；我们倒是从他的前任哥穆尔卡身上找到了眼前的盖莱克……

十二

工人等待着政府承认厂际罢工委员会；政府等待着工人放弃联合行动；知识分子说，谁试图采用暴力，历史是不会原谅他的……

三百多家工厂的工人联合成一个整体，有组织的、秩序井然地占领着工厂，政府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对十多万工人实行有效的镇压。

罢工工人不上街游行，不感情用事，甚至也不急于实现他们提出的政治、经济要求。他们只要求政府首先承认他们。

工人已经等待了八天八夜，这是一种意志力的较量。

处理格坦斯克工潮危机的政府委员会新主席雅盖尔斯基副总理已经接替了佩卡副总理，但他仍不跟厂际罢工委员会接触。

新任政府委员会仍然无视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存在”，不承认它是全权的谈判对手。政府委员会只是试图让一些小厂厂长、书记和厂工会代表组成“三人小组”直接与政府谈判。

如果当局连事实上已经存在、并且仅仅是一个临时的罢工领导机构厂际罢工委员会都不愿承认，那么更不可能接受建立独立工会的要求，而这是工人21项要求的第一条。

随着事态的发展，工人们越来越理解这一条要求的重要意义。他们决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犹豫让步。

为了重申这一点，304名厂际罢工委员会成员发表了联合声明：“没有独立工会，其它各条将来都会成为泡影。在波兰人民共和国短暂的历史上，这种事发生过不止一次。官方工会过去和现在不仅没有保卫我们的权力和利益，而且在对待罢工的正义行动上，他们表现出来的敌对态度比党政机关有过之而无不及。”罢工工人对官方工会的评价并不过份。波兰工人的问题已经严重到如此地步，官方的工会对此毫无承担责任的检讨精神；相反，它的中央理事会主席什德拉克，居然跑到格坦斯克召集工会委员会代表会议，宣布工会中央理事会“不交出权力”，也不跟厂际罢工委员会“分享权力”。

在官僚看来，工会的职位只是权力和权力所带来的利益！

当然，什德拉克的幼稚做法失败了，因为厂际罢工委员会对他进行了轻而易举地反击数百名厂际罢工委员会成员在主席团仅有的两部电话机前排成队，轮流使用电话向本厂职工吩咐：“不跟什德拉克进行任何谈判。这是破坏罢工的行为。”结果，这位官方工会的最高领导人只召集到14名工厂工会代表，来参加他的格坦斯克省工会积极分子会议。

这位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又赶到什切青，尽管他把目标盯在一些小厂的工会理事会，他的分裂企图也未能得逞。

罢工工人等待着，他们必须保持团结有共同的更求并以一个整体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总算作到了；另一方面，罢工工人要坚持下去，还得保持秩序，避免因急躁和愤怒而感情用事。

现在，害怕产生社会动乱的反而是工人方面。

罢工工人保持了秩序和平静。在这方面，瓦文萨坚定、果断和自信的个性起了作用，罢工纠察队的严明纪律也起了作用。

三联城是平静的，没有破坏，没有动乱，甚至没有醉鬼；连以往滋事很多的咖啡馆、舞厅、剧场也平安无事，因为去的人寥寥无几。民警只记录了偶尔出现的流氓行为和偷窃。但连民警都承认，这类事件比平时少多了。

罢工工人面临的更大难题是组织城市生活。在全面罢工的状态下，这是很困难的。这他们也作到了。可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可以使工人阶级学会一切。

这些工作是由瓦文萨直接负责的。他既要使罢工坚持下去，又要让三联城人民的生活不受到影响。他必须决定哪些行业应该罢工，哪些部门却必须承受更多的工作任务。

瓦文萨的工作方式是极其干脆的，有的问题他当即作出决定；有的当场由主席团集体决定商业运输罢工了，但食品送货照常：面包运；糕点不运。

火柴厂请示该不该罢工？

“不，这是人民需要的，应该生产火柴！”“谢谢，我们将生产火柴。”农业合作社代表团来了。

“现在是秋收，我们该不该工作？”“当然应该！！”瓦文萨还组织罢工工人去帮助秋收。

警察阻拦了给居民分送食品和煤的汽车，怎么办？

“让司机在汽车前窗玻璃上写上”居民生活必需品：肉、粮食、煤！”“要是警察还是不让怎么办？”“避免冲突。警察要取下罢工标志，就让他们取下来，往前开一百米再挂上！”“没有汽油了！”“用广播向社会呼吁捐献汽油！向省长告急，告诉他，居民总得吃饭！给我们燃料！”水果加工厂代表团来问：“我们要不要继续工作？如果不工作水果要烂了，如果工作，我们需要煤、糖、酒精。”“你们工作吧，不能造成损失。问题我们马上解决。”托伦发生了火车事故，急需血液！

厂际罢工委员会发表公报呼吁献血。炼油厂，造船厂有一百名工人去了献血站……

工人以难以置信的效率解决着一个又一个难题。看来对社会的管理并不是政治家的专利。

谁说工人阶级不会运用民主权利、不能充当社会的主人？

当然，工人阶级能在这种非常时期使三联城的人民过上正常生活，是因为罢工工人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精神和物质支持。

1980年夏天，格坦斯克的工人阶级并不是孤独无助的。

这么大规模的运动不能没有经费。这很快就解决了。仅列宁造船厂三号大门一处，五天里就从本市居民处得到16万兹罗提捐款。一个退伍军人组织，还派了代表团来到格坦斯克，要把给罢工工人的捐款亲手交给瓦文萨。

除了钱，还有许多饱含情感色彩的礼品：一位农民送来40公斤西红柿和10公斤苹果；一位年轻的姑娘送来了一束鲜花。姑娘直接走进主席团会议宣讲台，说：“这是教师们送给造船工人的花，祝大家坚持下去。”三联城联合医院的护士小姐们送来一封信，说她们全体护士和卫生员的心是同罢工工人在一起的。但她们不能参加罢工，因为病人的利益是最高目标，她们这样宣过誓。但她们在信里鼓励说：“祝你们坚持下去！”两位非常害羞的女士走进造船厂，站到麦克风前说，她们是从西里西亚来的。西里西亚可是出好样儿的矿工的地方，那里的工人最富有斗争精神。造船工人欢呼起来。

两位女士羞得满脸通红，很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她俩是来格坦斯克度假的，她们只能代表自己。但她们一定要把格坦斯克造船工人英勇斗争的真实情况带回西里西亚去！

“工人的西里西亚万岁！”大厅里响起了口号声。

“西里西亚人同你们在一起，”两位西里西亚女士流下泪来，“全世界都在谈论你们，你们不要屈服！”除了物质的、情感的、更有力的支持还来自知识阶层的精神支持许多知识分子团体公开发表声明，支持罢工工人。

波兰作家协会格坦斯克分会发表声明，呼吁“平静、秩序、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武力、不以武力相威胁。”作家们在支持成立独立工会的同时，呼吁当局尽快同厂际罢工委员会进行谈判，说这是“尊重罢工工人团结的道义价值”的表现。

8月21日，由64名知名知识分子签名的呼吁书传到格坦斯克，这些知识分子敦促政府尽快承认厂际罢工委员会。

他们旗帜鲜明地宣称：“……今天，波兰工人以其政治上的成熟和果敢为争取自己的权利，也为我们大家争取更美好、更相称的生活在进行斗争。全体进步知识分子是站在

工人一边的。”这些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精英一开始就点明了当前这场危机的性质。这等于警告当局别以流氓滋事或反革命动乱为借口镇压工人。

呼吁书写道：“……我们呼吁政府和罢工工人能选择一条谈判的道路，妥协的道路。任何人都不能采取任何不法行为或暴力，也不能尝试动用武力。十年前的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我们民族的最高利益要求新建立的政府委员会立即同厂际罢工委员会举行谈判……”知识分子诚恳而公正地对双方进行了审慎地劝告：“要摆脱今天的危机，就要求抛弃动辄把一切要求政治改革的行动看成是违背国家利益、威胁国家制度的那一套呆板公式；同样也要求公众在争取自己权利和更好的生活条件的正义斗争持温和态度。”最后，这64名知名人士以历史的名义，严厉地警告那些胆敢在波兰民族生死悠关的严峻时刻采用非理智、非民主手段的人。

呼吁书警告道：“如果有人试图不通过协商的道路而采用什么别的解决方法，历史是不会原谅他们。我们呼吁审慎和多思……”这份呼吁书的内容立即就被政府方面知道了，并且很快就传遍了全国。

为了表明对罢工工人的支持，呼吁书的64名签名人委派《联系》月刊主编，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和盖雷梅克教授亲临列宁造船厂，向厂际罢工委员会递交这份呼吁书。

瓦文萨接见了两位知识分子。

瓦文萨问：“你们还能给我们什么具体帮助呢？我们在许多问题上需要帮助。”是的，从战斗的罢工阶段到谈判的准备、再到即将来临的谈判阶段，工人会面临一个新的战场，这将需要更多的智慧和知识。这些仅仅靠勇气和纪律是无法完成的。

理解了瓦文萨的困难，盖雷梅克教授提出了成立专家委员会的建议。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瓦文萨采纳了，并委托马佐维耶茨基主编组建专家委员会的班子。在以后的斗争中，这个由18名专家学者组成的“专家委员会”使波兰工人有了更加深思熟虑的斗争策略。

现在，艰难的占领性罢工已经进行到第九天，罢工工人已经不再为能否坚持下去表示怀疑了。他们保持了团结、纪律；他们不仅有了政治上的成熟，还丰富了政治上的智慧。

在前两天，当瓦文萨被记者问到“如果你这次输了呢？”时，他还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他说：“那也会留下觉悟和组织。”而现在，瓦文萨已经有了必胜的信心。

他说：“1970年我输了；1976年，我输了百分之五十，当时，倘若拉多姆再坚持一天，我们就赢了；现在，我有百分之百赢的希望！”带着这样的信心，厂际罢工委员会从容不迫地向政府当局提出了最后一份敦促谈判的通报“……厂际罢工委员会代表所有的罢工工厂再一次呼吁当局举行谈判只有诚心诚意的、民主的对话才能结束罢工……罢工是不会破坏波兰民族的团结，不会有损于波兰国家。如果当局希望证实这一点，那就请他们到罢工人员这里来。”在这里，工人阶级反而比政治家显得成熟、大度。

这真是一个怪现象：一个掀起了动乱的、还未被官方承认的工人组织，居然比一个肩负着社会秩序的政权更迫切地呼吁社会生活的正常化，表现出更多的理智和责任感。

政治上的较量还没有开始，波兰工人阶级已经在道义上获得了胜利，世界上有哪一个政权有眼前的盖莱克政府的处境窘迫？

盖莱克是一个不走运的政治家他遇上了不呼喊口号，不挥动拳头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盖莱克政权终于度过了难以选择的困境它的前景再明确不过了那就是与工人举行判，并且承担责任。

无论这场即将开始的历史谈判判结局如何，波兰工人阶级已经赢得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十三

谁也不指望靠几个小时的会谈去消除半个世纪形成的隔阂和怨恨，意义只在于政府终于和工人坐到一起了。

罢工斗争的僵持阶段在8月22日结束的。

白天，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瓦文萨用电话跟政府委员会主席雅盖尔斯基取得联系。政府方面提出先派三名代表进行一次非正式的秘密接触。工人一方接受了这个建议。

副总理接见了三位代表，接受了他们递交的厂际罢工委员会要求进行谈判的呼吁书。

双方商定：于8月23日下午2时，由格坦斯克省省长来造船厂跟厂际罢工委员会举行初步谈判，制定谈判方案。正式谈判于23日晚八时举行。

尽管工人领袖们已经断定，政府除了妥协、谈判已别无选择，但听到这个消息后仍

然禁不住欢呼雀跃、热泪盈眶。

为期待这一天，他们绷紧神经度过了九天九夜；而这是波兰工人阶级整整30年的期盼！

工人并不是为可以松弛一下而欢呼，相反，他们都感到就要来临的这个时刻的严肃性和神圣性，从这一刻起，他们将负起更重大的社会责任。

这种责任感在第二天出版的第一期《团结报》上充分表达出来了这份报纸刊登了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全体成员的姓名和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结社和罢工权利的公约。

23日下午二点的预备会议按时举行了。

格坦斯克省长耶日·科沃杰伊斯基教授是第一个走进列宁造船厂跟厂际罢工委员会接触的官方人士。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尽管这一进步是被迫的、晚了许久的，但在整个东欧，仍是率先走出的一步政府对一个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表示了无可奈何的承认，并被迫与他们进行一次平等伙伴式的对话。

罢工工人兴高采烈地在谈判大厅为晚上的谈判作准备：摆桌子、放椅子。这是他们的节日。为了铭记住这一历史时刻，工人们在谈判桌上放满了各种廉价的磁带录音机。

人们早早地就等待着，对此，他们的首领既高兴又担心。于是，瓦文萨象宣布纪律似地作出警告：“谁的神经不健全，就别参加。我们必须表示出我们的坚决态度，但得有礼貌！”其实瓦文萨自己就不是一位绅士。前天，他跟记者谈到斗争性时，他说自己喜欢激烈的斗争，而且如果需要，他会“变成一个缺乏教养的、蛮横无礼的人。”工人没有为瓦文萨的训诫生气。对的，他们要当主人，首先就应该学会一个主人所有的自尊自重。

大伙用欢快的掌声表示了他们的理解。

“鼓掌为时尚早！”瓦文萨继续说，“只有主席团成员参加谈判。谈判内容由广播站转播。过后，你们再告诉我们，我们什么作得不好，什么做得好。你们将做出决定，我们只是谈判。”掌声更热烈了。

政府委员会于八点整乘坐一辆大轿车到达列宁造船厂。

进了厂门，他们受到了礼貌却又十分冷淡的迎接。

沉静是由随后跟来的喧闹的、抢镜头的摄影记者和电视摄像师打破的。

谈判一开始，雅盖尔斯基副总理便表示了对谈判对手的充分尊重和自己的谈判诚意。

应该说，这位副总理是诚恳的。他的个性和谈判方式都与前任政府委员会主席佩卡副总理形成强烈反差。

然而雅盖尔斯基的诚恳并未表现在他能诚恳地解决问题，而是诚恳地表示他无力解决许多关键问题。

谈到21点要求的第一条工人成立独立工会的要求时，他承认“这对于劳动人民，对于国家的今天、明天和将来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他又说，“我作为政府的代表触及到了一个不在政府管辖范围之内的问题，”因为政府“不能给工会规定章程，也不能规定它的活动方式……”关于21条要求的第二条中的罢工权利，副总理表示，这很难在当前的条件下作出决定。他说这个问题不仅对波兰，而且对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很重大的难题。因此现在不宜就这个问题公开讨论并征求公众意见……

副总理的谈话立刻被厂际经工委主席团成员维希涅克斯基打断了。

维希涅克斯基说：“用不着去寻求什么'公众意见'，我们这儿代表着382家工厂的职工。我们就是公众意见！”雅盖尔斯基无法再谈下去，否则，他要么激怒舆论，要么就得牺牲他的诚意。

不过他表示：“罢工者和罢工支持者的安全是可以保证的，只要他们不触犯波兰法律诸如盗窃、破坏财产，使用暴力……”副总理的话立刻在整个造船厂引起了一片口哨声和不满的喧嚷声。

尽管如此，谈判还是有礼貌和有秩序地继续下去。这次谈判原本就没有要达成全面协议的目标。要先确定的只是双方各自介绍一下对21项要求的观点，所以会谈时间只限定为两个小时。

谁能指望用二个小时去解决半个世纪的问题？

谈判继续进行，当双方谈到第五条，“通过群众性传播工具发表厂际罢工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公布其要求”时，会谈陷入僵局。原因是到目前为止，格坦斯克同全国的电话联系仍被封锁，罢工工人的真实情况无法向全社会报告；相反，官方的宣传工具一直没有

停止对罢工进行歪曲报道。

瓦文萨问到：“副总理是否看过《人民论坛报》对我们都写了些什么？”雅盖尔斯基：“我没来得及看。”瓦文萨：“可我来不及看。他们污蔑我们！”工人要求，在提供群众性的传播工具之前，首先修复格但斯克与全国各地的电话联系。

省长科沃杰伊斯基回答说：“同什切青可以恢复通话，但跟华沙的联系得由中央决定。”“如果在这里不能谈论中央决定的事，”瓦文萨质问道，“那我想问一句，我们是在同政府委员会谈判，还是在同地方委员会谈判？”副总理只得承认，这个问担应该由他来解决。

瓦文萨继续说：“我们必须把消息告诉全社会，让整个波兰都知道我们这儿发生的事。”这是让工人方面产生怨恨的话题。

主席团激进的成员格维亚兹达说：“我们把取消电话封锁看成是诚意的表现。我感到震惊的是，当局至今没有解决这个并不难解决的问题。在这种形式下，我们不能进行谈判！”雅盖尔斯基：“我们得中断谈判吗？我想，我们是带着诚意来的。我请你们给我一点时间，一个机会……”瓦文萨：“什么期限？”“明天。”“好，一整天。”第一次谈判就这样结束了。双方都不愿作过多地接触而使矛盾深化。经过了几十年的隔阂和怨恨，要坐到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双方一致同意暂时取消原订于第二天进行的第二次谈判；正好，副总理已接到紧急通知，要他赶回华沙参加波共的四中全会。

格但斯克工人阶级以非常稳妥而成功的一次行动，给波兰带来带来巨大的希望当天夜里，什切青市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代表团赶到格但斯克，它带来什切青地区82家工厂职工的委托。两个厂际罢工委员会将采取联合行动。

这次会晤的第一条决议是：只有实现独立自主工会的要求，才能在整个沿海地区终止罢工。

从格但斯克到什切青，只有六、六百公里的距离，但对波兰这个仅有31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来说，这七百公里构成了她的生命线这是她的全部海岸线，最发达的工业区都集中在沿海地区。

波兰工人的阵地扩大了。

当双方进行试探性地交锋之后，工人没有为初战告捷而盲目欢呼，他们得利用休战

的时机，坚固前沿阵地。

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邀请专家组的成员来列宁造船厂会晤，就许多重大问题请专家们进行历史的比较和理论的验证。这些专家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论家、报刊主编；甚至还有天主教知识分子俱乐部主任。

这些硕士、博士、科学院院士风尘仆仆地从华沙赶来。

工人阶级将自己最重要的事情托付给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专家们也毫无保留地、负责任的谈出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供主席团作重大决定时参考；当工人作出决定后，专家们又帮助使这些决议的思路更清楚，最后还要对某些条文格式和谈判词令进行语言加工。

主席团要作出的决定很多有的并不紧迫却具有深远意义：为1970年牺牲的造船工人修建纪念碑。主席团批准了造船厂设计师皮涅特鲁什卡工程师的纪念碑设计方案，并决定纪念碑在三个月内建造好，以在今年12月16日的周年纪念日揭幕；他们得保持着与副总理雅盖尔斯基的联系，他仍在华沙。这也是很艰难的事，因为通讯联系的封锁还没有解除；每个厂际罢工委员会的成员都得时时与各自的工厂保持联系，随时将主席团的决定告诉那些因谈判停顿而焦急、困惑的罢工工人；主席团还决定主席团成员包括主席瓦文萨必须睡觉，至少连续睡够五小时……

十四

全世界的媒体都走进造船厂后，终于促成了波兰的新闻工作者不愿继续当喉舌的叛波兰终于知道了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和21条要求的存在……

最让主席团忙于应付的是记者们。

在列宁造船厂的波兰记者有五十多位，而外国记者超过这个数字的两倍。

美国三家最大的电视公司ABC，CBC和NBC都派来了记者；还有合众社，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德新社。新华社的记者也到了格坦斯克，但只在造船厂大门外呆了几天。他们谢绝了进入造船厂的邀请，说：“谢谢，就这样也已经一切知道了，我不想干预波兰的内部事务。”全世界的大报，《纽约时报》、《明星周刊》、《世界周报》、《新闻周刊》、《人道报》、《费加罗报》、《巴西日报》等也都有采访记者进入造船厂。

可以想象，这一百多名记者多日聚在一起会有怎样一番热闹景象！现在，双方的休

战、沉默又加倍地刺激了记者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每个记者都力图从寂静中挖出些能震撼世界的消息，他们在全体会议大厅和主席团会议室之间来回游逛，有机会就拉住主席团成员发问：“还恢复谈判吗？”、“什么时候恢复？”瓦文萨更是记者们紧追不舍的对象；当然，他总是撵走他们。他最忙，确实抽不出时间。有时候记者们也能在瓦文萨走路或吃饭的时候有所收获。尽管瓦文萨以他特有的干脆，回答得非常简短，甚至对问题本身进行了否定，但瓦文萨的活仍然被电波传送到全世界。

通过这些答记者问，这位十天前还没有工作的失业工人终于被世界所了解了问：“成立独立工会将会有什么样的历史后果？”瓦文萨：“历史与我有何相干！我感兴趣的是我的21项要求。现在要实现的只是第一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项要求建立我们的工会。我斗争不是为了历史，而是为了人！”问：“有人在谈到目前的事件时，想用欧洲共产主义去解释……”瓦文萨：“胡说八道。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问：“您认为独立工会是什么？”瓦文萨：“是一种反抗的武器，我们希望劳动者能干预那些同他们有关的决定。

问：“您知道西方国家的工会是怎样进行斗争的？”瓦文萨：“我们的条件与他们完全不同，无论是西方的工会，还是波兰以前的工会对我们都不合适。”问：“你们如此为之奋斗的是不是活生生的政治？”瓦文萨：“不，不是政治，这是21项要求。”问：“您从哪儿学来的这种工作经验？”瓦文萨：“1970年流的鲜血教会了我。”问：“您读过工会方面的书吗？”瓦文萨：“读过一些意大利和法国的有关著作，但最好的老师是生活。”问：“您对波兰的前途有何理想？”瓦文萨：“日本的经济，瑞典的政治。”问：“您是天主教徒，信教对你意味着什么？”瓦文萨：“作天主教徒就是作人。”问：“假如您有机会同西方劳动者交谈，您首先向他们谈些什么？”瓦文萨：“我说，应该真心实意、坚定不移地相信人是有尊严的。必须捍卫自己的尊严。工人团结起来要达到的目的也不过就是这个。”问：“您觉得从8月份以来，您有变化吗？”瓦文萨：“我从前是人，现在仍然是人。我还是我，我没有变，我很容易冲动，这使人嫌恶，但我充满继续斗争，永不退让的决心。”……

瓦文萨走了，去处理那许多未来的和眼前的问题；还得执行主席团的规定，睡够五个小时。于是记者们游逛起来，争吵起来，并且互相交换一些“绝对可靠”的消息：“政府方面并没有排除在最后时刻采取武力解决的可能性”；“苏联方面已经向第一书记盖莱克发出了警告”；“盖莱克将提出辞职”……

或许，这些新闻的布散布是一种烟幕，是同行间进行新闻争夺时发出的干挠波。记者们真正关心的是事件的内幕和事态发展的预测。

除了瓦文萨这个目标，让记者们感兴趣的，还有造船厂一间陈设船只模型的房间，主席团在那儿设了一个新闻处。越来越多的记者集中到那里，将主席团成员邦德科夫斯基团团围住。

邦德科夫斯基是主席团的新闻发言人。

这位新闻发言人的新闻公报非常简单：与政府委员会的谈判日期仍未确定，因为格坦斯克与全国的电讯联系仍然不通。

记者们的怨恨具体化了，尤其是波兰记者，他们不象外国记者，即使在通讯封锁的情况下也总能千方百计地把搞到的新闻传递出去。

波兰记者对官方封锁通讯使他们的消息不能及时发出表示焦虑，而对许多虚假的、歪曲的报道却大量充斥报刊表示愤慨。于是，波兰记者聚在新闻处，召开国内记者会议，对上述两个问题表示抗议。

这次会议有点儿象乱糟糟的群众大会，任何一个问题都有太多的方案：连这份抗议交给谁，都是一个扯不清的问题是交给波兰记者协会，还是党中央新闻部，还是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

在签名问题上的犹豫就更多了，该不该签？敢不敢签？一位记者签上了名又划掉了，然后又签上，并表示了歉意。

这场良心与忠诚的喜剧演了很久，直到他们被工人撵出新闻处，因为那里要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波兰记者们只好搬到室外一棵大树下继续签名。

这份抗议声明终于有了36名记者的签名。声明被送到波共中央新闻部、波兰记协、政府委员会和厂际罢工委员会，并在当天晚上就被“自由欧州”电台报道了。

抗议声明的全文是：“我们，此时正在格坦斯克地区的波兰新闻记者，我们声明，迄今为止发表的许多消息，不符合这里发生的事件的实际。

目前的电讯封锁以及缺乏公布介绍真实情况的材料，使我们感到痛心，并使我们不能忠实地履行新闻工作者的职责。

我们认为，充分地向社会报道有关国内发生的一切，只能有助于冲突性局势的解决，并在将来促进社会的发展。”

尽管记者们的行动是迟迟疑疑的，但意义重大。。继学者、教授们的积极介入之后，新闻工作者的反叛使格坦斯克的政治氛围更加炽热了。

这些记者大多来自首都新闻部门，人们一直怀着敬畏心理把他们称为官方的喉舌。

这次小小的、异乎寻常的造反给了当地新闻极大的勇气：当地电台一次又一次地播送着厂际罢工委员会和政府委员会第一次谈判的实况；格坦斯克《海岸晚报》第一个发表了格坦斯克存在着一个厂际罢工委员会以及它所提出的21项要求的消息。

面对这样的政治气氛，最高决策机构和最高领导人难道还可以不把格坦斯克危机作为共和国的第一件大事，而不作最高层的表态吗？

全波兰、乃至全世界都注视着、等待着波兰共产党的进一步表态……

禁书网网志制作

翻墙去禁书网www.bannedbook.org可下载更多禁书



来自底层的改革浪潮——瓦文萨与波兰团结工会 (四)

十五

工人阶级的成熟阻止了盖莱克来一次彻底的、哥穆尔卡式的堕落，这段重复的历史才避免了那个悲剧性的结尾。

政府在十天的痛苦的沉默之后，终于有了最高层次的表态。

8月24日晚上，波兰国家电视台播出专题新闻：党内第二号人物、现任总理52岁的爱德华·巴比乌赫辞职；同时宣布，将巴比乌赫和另外三名负责宣传和经济的政府领导人开除出政治局。

1970年，在把哥穆尔卡搞下台的斗争中，巴比乌赫是盖莱克的坚定盟友，可见，盖莱克为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在电视台公布了中央全会的决定后，盖莱克向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

这次讲话是十分温和的，盖莱克首先承认，人民不满是因为党的“工作方法存在着毛病和缺点，”他保证政府将“对经济实行重大改革”，并“削减巨大的投资计划”，以缓和因野心勃勃的高速度计划带来的物价上涨。

对于当前的罢工浪潮，盖莱克承认工人的反对意见是合理的，答应“要仔细地倾听公众的呼声。”并保证即使“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们也要尽力通过讨论和对话，通过妥协和协商来寻求问题的解决。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应该承认，这次讲话是温和而诚恳的。然而比起我们所了解的盖莱克，比起我们在前面所听到过的他在1970年底的讲话，这次讲话温和却过于空洞，有一点自责，却又不痒不疼。

盖莱克的倒退是历史的重复，但他毕竟没有堕落到哥穆尔卡的地步用暴力对待示威

群众。这算是历史的进步吧。

然而，如果历史的进步仅仅表现在统治者的一点无可奈何的自责上，那这个进步是可怜的。下面的比较使我们看到，历史的进步远非这一点儿。

这个进步来自波兰人民的政治觉悟：1956年，波兰人民对哥穆尔卡的许诺抱着绝对的信任，把他当成救世主和万能主宰，而将一切都交给了他。

1970年底，尽管盖莱克做得不比1956年的哥穆尔卡少，但他只得到了人民的一半信任。波兰工人带着一半希望，一半怀疑质问他：“有什么把握十年后不再谈论改革的需要呢？”在1970年的格坦斯克对话时，一位钢铁工人的精彩发言，表明了波兰工人在这14年中的进步。

这是那位工人的讲话：“信任中断了，今后任何一位波兰领导人也不会有哥穆尔卡1956年享有的那种信任了。新领导目前只在一点上得了分，即它拯救人民免于内战，免于兄弟间的相互屠杀。但在其他问题上，人们还在等待。改善物质条件虽然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但终究不是最迫切的。主要的问题是，要重视社会，倾听群众的呼声，遵守民主的基本原则，以及无情地根除那些身居委职而好耍手腕的人，不学无术的人和暴虐无羁的人。”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波兰工人阶级跨越了对政治家的盲目信任，不再将一切都交给政治家去办，而是开始了对政治弊端的思考尽管这种思考的结论还只是要求政治家能永远倾听人民的呼声。

现在，1980年8月，尽管盖莱克这位仍然控制着政权的最高领导人，这位仍然控制着军队和警察的政治家面对着反叛的工人，准备用妥协的方法来解决危机，这在整个人民东欧的历史上，已经是了不起的让步了，但波兰工人却没有表示出丝毫的妥协和信任。

波兰工人终于从诉诸统治者善意的幻想和寄希望于好政治家的希望中醒悟过来。

在这种不妥协、不信任中，工人的民主意识觉醒了，他们终于找到了用自己的阶级意志和力量去取代对政治家的依赖。

波兰工人阶级建立了一个新的希望。

在盖莱克对十多万罢工工人作出广泛让步的当天晚上，美联社记者找到了瓦文萨，向他提出问题：既然政府已经作了重大改组、并同意工人以民主投票方式选举工会领导人，主席团是否将接受政府的妥协？

尽管联合罢工委员会主席团的许多成员表示，应该研究一下盖莱克的讲话，然后再

表态，心直口快的瓦文萨还是对美联社记者的问题做出作出回答：“不，只有建立自由工会，我们才能得到幸福，我们才能取得胜利。政府欺骗不了我们，我们决不给它欺骗我们的机会。”这种脱口而出的、似乎很不成熟的表态，表明了波兰工人阶级的成熟这是用近三十年的苦难和两次大规模流血换来的。

瓦文萨说：“工人要求成为工厂和国家的真正主人，我们决定用罢工来争取这一点。所以，就是解决了其他二十项而第一项不解决，那也解决不了问题！”自从1944年波兰工人阶级将他们的权力交给波共之后，他们使死守住一个信条好的当权者是保证工人阶级利益的根本；几十年来，他们始终在反对坏的当权人和寻求好的政治家的斗争中付出惨重的代价。只有到了1980年，波兰工人才第一次理解建立和保持自己力量的重要性。

因此，即使盖莱克政权被迫牺牲了它的总理，波兰工人也拒绝接受这种老一套的、替罪羊式的解决方式。他们冷静而顽强地坚持他们已经寻得的目标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独立于政府的权力中心。

十六

罢工工人拒绝以改进了的旧工会来取代建立工会，让副总理无可奈何；而工人对国家危机根源的深刻认识，则让这位政治家深感震动！

政府与厂际罢工委员会的第二次谈判于8月26日举行。

政府方面仍由第一副总理雅盖尔斯基负责，谈判地点仍在列宁造船厂。

有了政府的改组，有了盖莱克的妥协性讲话，政府委员会希望它与工人的谈判要容易一些也就是说，政府希望它的让步能换得工人的让步。

瓦文萨的首次发言就使政府的希望破灭了。因为在最重要、最难达成协议的自治工会问题上，工人方面没有丝毫的退让。

瓦文萨说：“从第一次谈判以来，已经过去了很重要的三天。我们希望在这期间发生的新情况，能使我们的讨论变得容易些。罢工要求中提出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会问题。我们要一个自由、独立、真正自治的工会。”瓦文萨还非常有礼貌的重申了工人方面的谈判诚意。

瓦文萨说：“副总理先生应该相信，我们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想破坏生产资料公有制原则，我们把工厂看作是波兰人民的财产，但我们要求成为工厂和国家的真正主人，现在我们决定用罢工来要求这一点。我们的谈判将很困难，我们大家都必须有

极大的耐心和良好的愿望。”只有坚定的内心信念和必胜的信心，才能使工人方面具有如此的沉着、理智和礼貌。

就个人素质论，对方的首席代表雅盖尔斯基有瓦文萨无法比拟的优势；：雅盖尔斯基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在知识、教养、思想水平方面，他都是出类拔萃的；他的外交、谈判才能则更是瓦文萨这样一个工人出身的人所无法相比。雅盖尔斯基在世界上各式各样的谈判厅进行过许多次极其困难的经济、政治谈判；而他的谈判对手也是一些世界级的政治家总理、部长、党的领导人。

但此刻，这位政治家却没有瓦文萨所有的自信。

谈判一开始，雅盖尔斯基就向瓦文萨提出一个个人要求：“主席先生，我提一个建议，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整个时间被电视摄像机拍摄的经历，我们是不是将它关了，它是不需要的。”副总理的请求得到了一半满足，决定对谈判的开头20分钟作电视报道，然后就请电视记者退场。

副总理要求回避电视记者，倒不是他要躲避新闻监督而在谈判桌上耍弄手腕。

这一次，雅盖尔斯基是拿出了比跟外国政治家谈判时更多的诚意和严肃态度的。但他毕竟是一位东欧政治家，他的国内政治生活从来就是跟密室政治联系在一起的。

他首先声明，最近几天曾经流传的一些指责罢工工人的传单，但他对这些传单一无所知。

接着，副总理对双方能又一次严肃地讨论波兰的重大问题表示满意，他重申了他的谈判诚意。

雅盖尔斯基说：“三天前，我们开始谈判，现在我又来到这里，就象我三天前说的那样，为的是和你们一起解决令人焦急的问题。”副总理本着先解决能够解决的问题的精神，宣布了政府为改善市场供应，进口肉食的決定，并对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提高抚恤金数目，增加托儿所，幼儿园以及缩短等待住房时间等问题作了详细解释，表示接受工人要求。

瓦文萨却要求从第一项要求开始讨论。

瓦文萨说：“我们不能放弃第一项要求。所以如果解决其它二十项，而第一项不解决，那就解决不了问题！”雅盖尔斯基回答：“提出这些能够解决的问题，并规定解决的日期和办法，是为了表明政府对工人关心问题的态度。这是我的责任。”

假如我不表态，你们会问我，您来干什么？现在请允许我谈谈第一项，也就是您当作最基本的那一项。“”不仅是我，是全体工人阶级。“瓦文萨强调说。

雅盖尔斯基就罢工工人成立独立工会的要求，向对方传达了刚刚开过的四中全会的精神。他说，中央认为，“工会活动的革新是很重要、很迫切的任务。”中央已批准“在凡是职工们要求改造工会领导机构的工厂里，立即进行新的选举。”谈到格坦斯克，副总理的个人意见是，“在最近几天或最近几周里，在三联城地区进行选举。选举应该是民主的、秘密进行的。如果最近工厂中自发产生的代表的威信是持久的，那么他们一定会被选进工会的领导机构。”发言中，副总理多次提到：为了让工会起到它本来就应该起到的作用，必须革新工会。

瓦文萨对雅盖尔斯基的讲话，进行了根本性的否定：“副总理先生还是在谈健全或是改进工会，而我们指的不是改进，而是要成立新的工会。看来我们之间的分歧很大。”雅盖尔斯基：“主席先生，这是符合谈判情况的。我们介绍自己的观点，你们也介绍自己的观点。”瓦文萨：“副总理先生，我们仍然要求明确回答，到底是自由工会还是改进旧工会。我们必须得到明确的答复：自由的，还是旧的？”雅盖尔斯基终于明白他的困难出自什么地方了工人对自己的目的明确而果断，他们面对面地跟你交锋，不让步，没有政治家的外交辞令，没有知识分子的权衡、妥协和患得患失的犹豫。

雅盖尔斯基只好后退一步：“主席先生，我不事先决定任何问题。但我希望先生们能在较小的范围内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这样有利于双方更详细地听取对方的意见，因此我建议双方各推出三个人，去详细研究这个问题。”副总理的建议立即被工人方面否决了。那是主席团成员莱赫。索别谢克不留情面的驳斥索别谢克：“我不想使任何人生气，可我认为这是一个误会。我们要求自由工会，而副总理先生却要求革新旧工会。这是在耍花枪！我很抱歉用了这么一个字眼。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三人小组，对这些要求我们不会让步！”雅盖尔斯基再一次退让：“先生，我想告诉您，我根本没有坚持什么旧工会，我只说，一定要革新工会活动。”一位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说，如果把革新旧工会和建立新工会分别作为两件事来讨论，那么工人方面会“高兴地欢迎在旧工会中进行变革的设想。当我们建立起我们的工会时，我们还得和原来的工会系密合作。我们不能想象，有两个或更多工会并存而可以不彼此合作，因为这是违背劳动人民利益的。如果我们成立的工会得到社会的信任，那我们就相信旧工会将不得不进行改革。那时候任何工会都不能脱离劳动人民，因为那时会员可以自由流动。”这位工人的发言与官方工会主席什德拉克“决不放弃权力”、“不与任何人分享权力”的表态形成鲜明对比。可见，工会组织对那些工会官员只意味着权力、利益，而不是履行保障工人利益的责任。

在成立新工会还是革新旧工会的辩论之后，瓦文萨提出，为了彼此的了解，工人方面将推出三位代表重点发言，详细地谈出工人的观点和要求。他建议政府方面耐心地听

一听。

三位代表的发言对波兰的危机和国家的命运作了总体的透视。

第一位讲话的是安杰伊·格维亚兹达。

他说：“我们是处在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会见的。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场危机呢？多少年来，评价地方当局和各个部门是看他们生产了多少吨钢，多少吨煤，多少米电线。从来没有人从工人生活怎样，教师生活怎样这方面来评价他们的工作。工会的基本目的是保护劳动人民，但工会根本不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相反，他们帮厂领导的忙，他们吃惊地听着各个车间的悄悄话，随时准备和行政领导一起来反对劳动人民的利益……”

“从1956年的重大危机之后，波兰又发生了1970年，1976年和现在1980年的三次危机，而每次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些危机的发生都是因为劳动人民对事态的发展不能施加影响。现在，我们在解决危机，希望能从根本上讨论问题，希望我们不致于过两个礼拜又被迫罢工；”沿海地区的人民已经证明自己是明智、平静和成熟的，所以单单用经济让步，提高工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副总理先生，不久以前50格罗兹一个的小面包比拳头还大，现在90格罗兹一个的面包可以捏在手心……”

“应该建立新工会，但我个人反对解散旧工会，因为这不符合宪法；”新工会要活动，要接近自己的会员就得有自己的出版社，就出版自己的刊物，就得让这些刊物写真话，不管这些真话让领导听起来是否舒服。利用报纸耍手腕当然也能成功，但只能成功一时，然后就是愤慨、骚动不断增涨起来，又爆发另一次事件。我们想在这些错误还没有酿成几乎要搞国内革命的时候就指出来。只有让人讲话，而且不去事先肯定它是否正确的时候，才有讨论可言。我们期等着政府的宣言和诺言，保证新成立的工会在登记方面将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主席团成员、建筑工人代表维希涅夫斯基，对波兰经济危机的根源作了一针见血的揭露：”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是在作经济问题的决定，特别是在作分配问题的决定时，没有考虑到劳动人民的利益。目前波兰生产的财富中，只有76%是供人民消费用的产品，其它的财富几乎全被工业吞吃了。工业在没有社会监督的情况下在那里自己为自己进行生产。不切实际的、由上面抛出来的计划指标订得太高太大，然后在每个五年计划的中期就往下调整。已经开工的基建项目还没有完成就停在工地上。最近6个月中因为能源缺乏而造成的停工，据统计局的报告增长了56%……”

“天天在干活的人的意见必须确实受到认真对待……经营管理不善比罢工的损失多得多。”维希涅夫还谈到了新旧工会问题。他说：“我们单位的四百名工人在得知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什德拉克的讲话内容之后，作出了慎重的、深思熟虑的决定：退出了现在的工会。我们不想破坏法制，我们没有权力解散它，所以我们退出。”

我们要建立自由工会是为了挽救我们的祖国，这是我们的义务，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我们都是波兰人，劳动人民有这个权力。“最后发言的正是刚才毫不客气地驳斥过副总理、说他在耍花枪的那位索别谢克。

索别谢克是一位钳工。他针对着副总理在发言中宣称他仅仅是作为沿海地区问题委员会到这里来的，因此他不能对全国的问题表态的说法，表示了抗议。

索别谢克说：“我对副总理先生的讲话表示不安，似乎工会问题只涉到三联社。

你发表这样的意见可能导致全波兰的罢工。必须向全社会解释我们的要求，说明这里发生的事，要让全波兰都对这些要求诚实地发表意见……我还想解释一下，每一个波兰人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位或那位先生在工会里担任什么职务。我们并不想争权夺利，只是希望很好地履行职责，成为一个健康的机体。要允许批评，尽管批评有时正确，有时也许不正确……“三位工人代表的发言对副总理的震动很大，使他从被迫让步到自愿地接受这些全新的生活感受。

事后，雅盖尔斯基在一次电视讲话中承认，工人给他“上了一堂关于波兰，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课，一堂真理之课，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痛苦的一课。”这种痛苦是由铭心的自责和被剥光了的羞耻组成的。

重要的第二轮谈判结束了，工人以坚定和果敢赢得了第二个回合；同时，副总理雅盖尔斯基也因为丢弃了第一次谈判时所采用的僵硬的、不让步态度而赢得了工人方面的赞赏。

然而正因为如此，他的处境变得更加难堪。

雅盖尔斯基匆匆接替了前政府委员会主席佩卡的工作赶到沿海地区来时，对沿海形势的评价与中央是一致的。他当时认为，建立自由工会的要求并不是工人阶级真实愿望的反映，而是企图动摇波兰国家制度的反社会主义力量强加给工人阶级的；行前，他还得到情报说，一些持不同政见组织社会自卫委员会，保卫工人委员会近来一直在对罢工事件施加影响。

近几天事态的发展，尤其是第二轮谈判，使副总理对自己的、同时也是中央的认识的正确性动摇了。他的工人对手在谈判中所流露出来的强烈信念不建立工人的真正的代表机构独立工会，政治、经济改革就不可能成功！有力地冲击着他的信念，使他隐隐感

到工人阶级要求新工会，可能对国家、对党都有好处。

然而问题是，雅盖尔斯基毕竟是政府的代言人，他只能说中央许可他说的话。

他的手脚是被捆住的，王牌在华沙。

这就是他的痛苦、矛盾之所在。他是党的干部，党的原则是他视为生命一样重要的东西迄今为止，中央对成立自治工会的态度是：革新工会行；在官方工会之外建立新工会不行！

雅盖尔斯基凭着一位老练的政治家的直觉就可以断定：如果说行这个共产党国家从未经历过的全新事物，很可能导致一场天翻地覆的政治震荡；如果说不行那就有面临一场全民性灾难的危险。而且，更让雅盖尔斯基心惊胆战的是，他已经从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意志中感觉到了，他和他的政府最终必须对波兰工人阶级说行或者不行，除此，别无选择……

雅盖尔斯基在第二次谈判之后，将连夜飞回华沙，在政治局，他必须心平气和地说出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愿意说出的这种个人感受。

十七

格坦斯克被焦急的等等熬煎村，华沙被痛苦的选择煎熬着。波兰在等特作出决定的一刻……

如果说历史正经历着分娩的阵痛，那么政府却被哈姆雷特式的难题折磨着行，还是不行？这是与“生存，还是死亡？”同样艰难的选择。

8月最后几天的波兰是在异乎痛苦和焦虑中度过的。这种情绪从华沙传到格坦斯克，使政府委员会陷入十分难堪和茫然失措之中。

雅盖尔斯基26日会谈后的当晚便飞回华沙，但他未能将王牌带回来。

28日，双方又进行了第三轮会谈，终因未能在建立独立工会问题上达成协议。

于是瓦文萨宣布：“既然政府委员会不能讨论第一项要求，谈判不用举行了。”29日，因为同样的原因，政府委员会发表了一个简单的公报，说因“还没有准备好对第一项的讨论，取消原定在今天的会谈。”华沙被选择的痛苦熬煎着，格坦斯克被焦急的等待熬煎着。

政府委员会的专家组被工人的谈判搞得精疲力竭，不知所措，他们甚至不能理解这儿发生的事到底是什么意义，而他们扮演的到底是什么角色？一些颇有成就的政治家、社会学家突然感到必须重新学习。

重新学习并不太难，难于适应的是来自上面的痉挛式的摇摆。

一位专家说：“我都要发疯了，每隔半个小时换一个决定。”雅盖尔斯基和格坦斯克省的领导人，已经开始理解局势，理解了解决这种局势的条件。但他们无法让华沙理解，于是他们频频地往返于华沙和格坦斯克之间。

这不是美差。他们在华沙有过许多很不愉快的谈话和政治局、尤其是和盖莱克。

混乱还来自工人和政府之外的第三者、第四者波兰大主教，维辛斯基红衣主教发表电视讲话，呼吁工人要理智、克制和勤勉的劳动。他说：“旷日持久的罢工以及可能引起的动乱或自相残杀都是违背社会利益的。”他强调，“工厂必须开工。”

这位波兰教会中德高望重的老人、人民精神上的父亲顷刻之间便在人民中失去了威信，电视讲话还没有完，工人便对他发出劲簿的挖苦；罢工工人甚至在造船厂大门上的圣母像下贴上标语：“圣母玛丽亚罢工了！”一位神父故意用崇敬的口吻说：“主教是一位伟大的人，他当然不会反对人民的利益。主要是盖莱克向大主教下跪，要他发表他现在发表这种讲话。”神父巧妙地暗示主教的讲话是出自政府授意。

也有从下层发出来的干扰那是一些与外国人做生意的自由职业者，其中最多是外汇套购者。他们经曾联合敦促港口工人停止罢工，“因为没有船来就没有买卖。”

当然，这些混乱并没有影响到工人阶级对整个局势的控制。

1980年8月的波兰动乱能保持这样的局面，除了工人自身的成熟，还有另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因素此时，大学生正在放暑假。

尽管我们可以肯定，如果大学生加入到这事件中来，会毫无保留地支持工人阶级；尽管我们也承认，在以前、甚至以后的任何动乱中，大学生总能站在进步力量一方，总能在正义与邪恶的挑战中走在战斗队伍的最前列。但这一次，在工人与政府坚定而又艰难的漫长对峙中，大学生没有介入，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件幸运的事。

大学生也是知识分子，但他们又明显地与许多此刻正在格坦斯克与工人并肩战斗的知识分子不一样。这些年老的或年轻的知识分子自愿来支持工人阶级，或许他们的长远

目标与工人阶级不尽相同，但眼前的目标是一致的以理智和秩序，使罢工取得胜利。

开始，许多知识分子是带着智慧上的优越感到工人中来的。他们带来各式各样的政治理论社会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的；也带来各式各样的政治模式美国式的，日本式的，瑞典式的。他们对自己的理论充满自信，自以他们的理论是工人阶级所必需而又欠缺的。

然而当他们在罢工者中间呆了一段时间后，便惊讶地发现，仅仅几天的政治生活，就使工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刻变化，工人不仅有令人敬佩的勇气他们为全民的利益冒着很大的危险，一步不小心、一次不理智的决定都会使这种冒险变成毁灭性的灾难还有为实现自己目标的冷静和决心，以及拯救民族的使命感、责任感。

从来以民族灵魂自居的知识分子，第一次理解了那句陈旧的、但已被糟踏了的口号工人阶级是社会的先进力量。

一位从华沙来的学者谈到到造船厂后的感觉时说：“好象被猛击了一掌。”一些善于演说的思想家，野心勃勃地赶到造船厂，想以自己的深刻见解去宣传、鼓动工人，但他们很快就沉默下来，更多地只是倾听和思考。

著名的讽刺作家杨·格沃瓦茨基，到造船厂后，突然一改他那诙谐和尖刻的语气，而开始用严肃、认真的口吻说话，甚至还有点儿慷慨激昂。

波兰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合作，谱写出一曲动人的乐章。

有一次，在工人们以暴风雨般的热烈欢呼庆贺他们的胜时，已经退出了会议大厅的瓦文萨又返回来。他重新站到扩音器前，对向他欢呼的工人说：“我失礼了，我还没有感谢我们的专家。他们为我们出的主意很好，请他们继续帮助我们。”说完，他念了专家组的名单。然后，又请专家组组长马佐维耶茨基主编讲话。

在热烈的掌声、欢呼声中，马佐维耶茨基只说了一句话：“我感谢你们，我们学到了很多。”瓦文萨和马佐维耶茨基对对方的感谢是由衷之言。知识分子感谢工人阶级是因为他们确实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们懂得了尊严、真理、公正、自由对工人阶级和对于知识分子同样重要；懂得了“如果不同代表真正社会力量的工人团结起来，要解决知识分子生活中和国家的重大问题是不可能的。”工人阶级向知识分子致谢，是因为专家们帮助他们对社会有了更全面的理解，比起过去仅仅从一个工厂的观察范围中所能看到的要更全面；在行使管理职能时，工人阶级已能考虑到整个波兰。

现在，厂际罢工委员会要处理的事越来越多，因此成立了许多下设机构：外语翻

译、新闻发布、内部治安，还有运输、联络、财务、供应、宣传印刷等部门。

厂际罢工委员会必须安排城市人民的生活，必须同各地的工人阶级取得联系，必须给好几百名记者提供新闻，让全世界都铭记住1980年8月的波兰工人阶级；同时，也得让罢工工人知道，全世界的进步力量是跟他们站在一起的。

宣传部门在造船厂二号大门不远处的玻璃橱窗里张贴着几十张世界各国的报刊剪报，并用波兰文注明标题和出处。格坦斯克工人在全世界各种报纸上，都被登在第一版。

这种支持还来自国外的各种代表团。他们带来物资，带来捐款，还带来亲吻、拥抱和火辣辣的演说。

在全体会议大厅，每天都有许多演说、宣言一类的活动挪威的青年工会代表团来了，这些波罗的海彼岸的年轻人无比激动，说在这儿、在格坦斯克学到了许多东西，说回去以后一定要说服老工人领袖支持波兰工人阶级；法国劳工大会中央的代表带来了11000法朗的捐款。并用火热的语言传达了塞纳河畔工人的支持。

瓦文萨表示了感谢之后，在热情的冲动之下，邀请这位法国工人代表为主席团荣誉成员。全体工人都为无产阶级的世界性联合发出了热烈的掌声。这是激动人心的场面。

瓦文萨本来就是满怀激情的人，而且毕竟才三十多岁。此刻他激动地说：“不久之后，格坦斯克将成为战斗的工会运动的世界中心。”这句话显然是过头了，于是大厅里响起了开心的、善意的嘲笑。有人喊着瓦文萨的爱称说，“莱谢克，盐搁多了！”这就是格坦斯克工人阶级的普遍情绪。

现在，担惊受怕的情绪没有了，不能坚持下去而妥协的可能也没有了；相反，过于激进和好斗的情绪在厂际罢工委员会代表和全体罢工工人中是比较强烈的。

已经有800多名代表的全体会议，不断地向18人的主席团施加压力，不让他们向政府作那怕是最小的让步。

这种激进情绪的蔓延有可能使波兰泛滥许多由不切实际的、或完全是地方性的要求引起的罢工。这类罢工可能有背于工人阶级提出的21项要求，有背于波兰的整体利益。

有人在利用这种情绪，企图掀起更大的动乱以破坏工人与政府的谈判有人在散发旅美波兰侨民联合会的传单，说谈判是骗局、是叛卖，并呼吁全体会议抵制协商；还有人溜进造船厂，偷偷组织小型的抗议集会，说瓦文萨作风不民主，说主席团向政府妥协、

让步……当然，这些煽风点火的人被纠察队的小伙子们撵走了。

瓦文萨确实有把盐搁多了的时候，但他毕竟是经过血的洗礼的工人斗士，毕竟是一位能考虑到工人阶级和波兰的整体利益的工人领袖。他懂得，在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必须使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必须使罢工有秩序、有目标地进行。

8月28日，当第三次谈判中断之后，瓦文萨站在二号大门顶上，向急于要对政府采取更激烈对抗的工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使波兰陷入恐怖是不应该的，因为最终是人民流血；使波兰陷入瘫痪也不好，人民必须有食品吃。如果三、四天之后还没有结果，我们那时再让罢工扩大！”这位37岁的工人受到了“斯托拉特，斯托拉特！”的欢呼声。这是《祝您长命百岁》中的歌词，是向亲人和长者祝福时唱的。1956年，人民对哥穆尔卡唱过这首歌，现在他们终于将这种祝福用在他们自己人身上了。

瓦文萨就是工人阶级。他此刻的演说观点正是由主席团决定的。主席团还决定内瓦文萨作一次类似的电视讲话，重申21项要求，同时呼吁工人不要随意停工，扩大罢工浪潮，以免国家陷入混乱。

工人方面的建议被政府拒绝了。政府不希望罢工工人在电视上宣传21项要求；再说，政府也不愿意让人民产生这样的印象，仿佛瓦文萨和厂际罢工委员会决定着全国的罢工进程。于是厂际罢工委员会只好以呼吁书的形式，向全国人民表达了他们的立场。

工人阶级事实上正在干着本该由政府干的事情。那么现在，8月的最后两天，政府在于什么？

不安和困惑的人民把视线转向政府的喉舌电台、电视台。希望能得到答案。

然而，喉舌已经没有以往的响亮和自信，倒象一个病人的呓语：虚弱的、前言不搭后语的。

先是波兰广播电台发表新闻公报，说政府与工人的协议已经签定，罢工已告结束，后来又作了间接的更正；更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电视新闻里。

29日19时30分，国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里出现了一群哭哭啼啼的妇女，向节目主持人诉说罢工给她们的生活带来的许多苦恼。此刻，一位群众递给主持人一张纸条。主持人一愣，犹豫了几秒钟后，还是读了。于是全波兰都听到了与上述控诉罢工的调子截然相反的宣告：“莱盖尔斯基五金工厂宣布进行24小时警告性罢工，呼吁双方迅速在格坦斯克达成协议，如果造船工人的正当要求不能得到满足，莱盖尔斯基工厂准备再次罢工！”人们的疑惑更深了：电视台出了什么事？政治局出了什么事？只有一点是清楚的作

出决定的一刻就要来临了。

果然，在这个奇怪的新闻之后仅一个小时29日20时30分，厂际罢工委员会得到了来自华沙的可靠消息：“明天一切都将圆满解决！”

十八

近代史上，战果最辉煌的这次罢工就要结束了，罢工工人会想些什么呢？

瓦文萨说：我们想的是家庭的共同事业，这个家庭叫波兰。

政府终于作出了痛苦的决定。

这种即使是一个正常头脑的老百姓也不难作出的明智选择把自治权归还给工人，为什么竟让这些出类拔萃的政治决策人如此犹豫？

障碍不在于判断的失误。在一个一切都靠权力维持的制度里，政治家和他们整个阶层的持权和优惠漂亮的住房、小汽车、女秘书都得靠权力维持。所以，放权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他们决不出此下策。

格坦斯克工人阶级迫使政府当局为人民和波兰的利益，忍痛交出了他们手中相当一部分权力。

8月30日上午，在造船厂，雅盖尔斯基副总理终于代表政府对罢工工人21项要求的第一项“建立独立于党和雇主的自由工会”进行了签字

在签定协议时，雅盖尔斯基发表演说：“我们象波兰人同波兰人谈话那样进行了对话，没有输家、没有赢家，没有战败者，也没有战胜者……”然而胜负却十分分明：波兰工人取得了一个历史性胜利，而政府损失惨重。

在1980年8月30日之前，这个政府、甚至这一类政府虽然也有过失败和让步，但只是经济上、人事上，最多也只是政治上的，但它从未在制度上作过那怕最微小的让步，从来没有在它对社会的全面主宰方面有丝毫退让和松动。

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一条是“无所不管的国家与无所不管的党结合在一起，而无所不管的党又同无所不管的领袖结合在一起。”（托洛茨基语）它产生了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具有无限权力的专政。现在，波兰政府承认了工人成立独立工会的要求，就等于从无所不管的权限内放弃了对工人阶级的绝对主宰。

在现代社会，失去对工人阶级的绝对主宰，无疑便失去了对大半个社会的控制。

可以说，仅是对第一项要求的承认，波兰政府在这次让步中就输掉了它的一大半家当。

21项要求中的第一项“成立独立工会”和第二项“保证罢工者及罢工支持者的罢工权力和安全”是8月30日草签的。

31日，谈判双方就其余19项要求继续协商。

谈判是顺利的，只是第四项，关于“释放所有政治犯，停止因政见问题进行的迫害”，受到了一些阻力。

问题是由瓦文萨提出来的：“我们要求停止逮捕‘保卫工人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帮助过我们，属于罢工支持者。”“保卫工人委员会”是华沙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于1976年成立的，它的纲领是加强社会的防卫能力，“发展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共同行动”。它的领导人岸龙是原华沙大学经济学讲师。他因在一封长达九十页的《致党的公开信》中抨击“中央政治官僚集团日益腐败、官僚化和庸碌无能”而被开除出党，成为波兰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

“保卫工人委员会”在前几年，曾经帮助过因组织罢工而被解雇的瓦文萨。现在，库龙仍在监狱里。

瓦文萨强调说，“这并不是一个‘保卫工人委员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的问题，我们保护的是人，而不是这样或那样的组织。”主席团成员安·格维亚兹达对这个问题表示了道义上的责任：“如果我们看着他们坐牢而不予过问，那永远是我们的一个耻辱。副总理先生，如果政府有诚意的话，为什么现在还在继续抓人，我这儿有一份名单。这些人好心好意地帮助过工人，原先把他们释放了，现在他们又被逮捕了。请谈谈这个问题。”雅盖尔斯基作了诚恳的保证：“我发表下列简短的声名：第一，我想重申在我们协议中所表明的，参加罢工或支持罢工将不会受到惩罚，除非触犯了刑法；第二，我想声明，检察机关将作出决定，在明天即9月1日12时以前，释放由它所扣押的人员并释放格担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提交的名单中的人员。”就要成立的独立工会已经在发挥它的威力了。这是政治史上从无有过的奇迹，工人仅仅用谈判，就迫使政府释放了它的政敌第二天，库龙和另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有了这样的理智和诚意，21项要求的其余部分很快就达成协议。双方商定，协议将于16时签字，并在电视新闻中宣布罢工结束。

签字仪式是在会议大厅的主席台上进行的。

主席台安放着列宁纪念像、波兰国徽、国旗；还有基督殉难的十字架和1970年殉难工人纪念碑模型。

政府委员会的4名成员和厂际罢工委员会18名主席团成员，依次在协议书上签字。

这是令人激动和庄严的时刻，为了寻得这一刻，波兰工人阶级经历了几十年的屈辱和愚弄，经历了可怕的和平时期的流血和死亡；为了迎得这一刻，20万罢工大军，纪律严明地抵制了威胁和利诱，坚持了整整17个昼夜这是浓缩了工人阶级几十年所有希望和绝望、狂热和沮丧、焦虑和快慰的17个日日夜夜。

这是神圣得令人压抑的一刻，是屏住呼吸唯恐失去的一刻。

会场内外一片沉寂，只有在双方交换文件后，当瓦文萨用抖抖索索的手将这份著名的格坦斯克协议小心地放入他那破旧的文件夹时，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才迸发出来……

这时的时钟指在16时56分1980年8月31日16时56分……

现代史上，战果最辉煌的一次罢工就要结束了，人们除了欢呼之外，有没有充满困惑和思考？这是难以判断的。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会引起许多充满敬意的铭记它是值得铭记的。

最后一刻是由瓦文萨宣布的。

瓦文萨首先表示了一个胜利者对对手的敬意和期望。他对雅盖尔斯基和他所代表的政府说：“我想再一次感谢副总理先生和一切不允许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力量。

我们没有使用武力，而是通过会谈和说服的途径，结束了我们的争论。我们的行动表明，波兰人只要他们愿意，总是能够互相谅解的。我们将记住这一点。我希望，那些签定的东西，将能得到准确、完全的遵守。我相信，这对大家有好处。“接着，瓦文萨将视线转向摄像机、转向全波兰，他说：“亲爱的人们！9月1日，我们将恢复工作。我们大家知道，这一天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在这一天会想些什么想的是祖国，想的是民族事业，想的是家庭的共同利益，这个家庭叫做波兰……”

“我们的新工会从明天开始生存。让我们关心她，使她永远是独立的，永远是自治

的。我们以波兰人对待波兰人的方式通过会谈和谈判这个唯一的途径达成协议，期间作过一些小小的让步，这从来都是应该的。我们现在明白，我们必须一起把颠倒了的一切颠倒过来。首先我们必须感觉到我们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我们将怀着这样的感情来进行工作为我们大家，为国家利益，为波兰进行工作。

现在，我宣布，罢工结束！“会场里、会场外全体起立，工人们满怀激情地高唱国歌；或许，此刻全波兰都在高唱国歌。

瓦文萨流泪了，工人流泪了，几个主席团成员跑出摄像机的镜头之外，跑到小房间里把自己关起来，哭了……

波兰工人阶级终于登上了波兰的政治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们将担负更加沉重的历史重担，面临比争取独立工会更加艰巨的历史使命与执政党合作共同承担起波兰的命运。

问题是，执政党不可能心甘情愿与瓦文萨和他的团结工会在国家事物中平分秋色，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波兰工人阶级与波共必将在一个全新的战场上，用双方都陌生的方式继续进行较量！

或许，这才是这部壮丽的史诗更精彩的部分……



来自底层的改革浪潮——瓦文萨与波兰团结工会 (五)

十九

盖莱克因妥协而受到制度的惩罚，成为人民波兰第三个为制度承担责任的领袖；然而，新上台的卡尼亚就能赢得这场从未见识过的战争吗？

波兰工人阶级是以三十多年的苦难和两次大规模的流血为代价，才丢掉了由上面来倡导社会主义民主的幻想而认识到改革的决定性动力必须来自社会全体。

1980年8月，经历了十七个绷紧神经的昼夜，挺过了充满恐怖、焦虑和随时都可能失败的十七个日日夜夜，进行了无数次既尊严又理智的谈判之后，波兰工人阶级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全新的时代。1980年8月31日，波兰政府终于对工人阶级作出让步，在格坦斯克签署了同意工人“建立独立于党和雇主的自治工会”的协议。

波兰工人取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胜利；更重要的是现在工人手中握有保持住这个胜利的武器——一个持久存在的威慑力量，而不会象1956年和1971年那两次，用流血赢得的让步很快就化为乌有。

在波兰共产党一方，格坦斯克协议的签定，意味着它作出了一个无可奈何但又是伟大的历史性妥协。她率先在整个共产世界作出榜样：从法律上允许一个强大的党外反对派存在。

然而问题是，如果波兰共产党能长久地容忍在它身边有一个人数更多的、真正独立的工会存在，那就意味着放弃了在波兰的绝对统治。这是这个制度所不能容忍的——至少它不能长久地接受这次妥协。

有了这一点，我们就敢断定：格坦斯克协议的签订绝非工人阶级与国家对抗的结束，恰恰相反，这两种力量将在一个全新的战场上用双方都陌生的方式进行较量。

东欧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战争。

历史刚刚将炎热而又多事的八月送走，充满着迷一样的九月就降临了。于是全世界的政治视线仍然不能离开波兰这个舞台，这幕伟大而悲壮的历史剧还要演下去。

第二幕是由制度对领袖人物的惩罚开始的。

即使盖莱克是奋斗到最后一刻才被迫对格坦斯克工人作出让步，他也立即受到了制度的惩罚。

作为这个制度的最高维护者，盖莱克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渎职罪。在他以前，领袖的渎职行为只限于政治、经济策略上的失误所造成的政治动乱或经济危机，这些危机最多使这个制度不能十分正常地运行而已。可这一次的伤害是致命的，它危及到这个制度的存在。

格坦斯克协议签定后的第五天，盖莱克就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

1980年9月5日，在突然召开的波共六中全会上，盖莱克被解除了第一书记的职务。

制度将这位在西方的文化、政治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很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政治家，改造成一个专制制度的代理人，然后又毫不留情地将他的政治生命扼杀。

盖莱克是人民波兰历史上第三个落到这种下场的领袖。

在波共的四任领导人中，除了贝鲁特是死在领导岗位上外，其余的都没能体面地离开政治舞台。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制度要它的代理人作出这么多牺牲、需要这么多的殉难者！

这是这个制度给另一方造成的劫难。

1971年初，在刚刚上台的盖莱克与人民的岁月中，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愿望：他要尽力解决波兰的危机，等把国家搞好了，他就引退。他要开这个自动退职的先河。然而十年后的今天，他被新闻界描写成一个“自始至终抓住权力不放”的专权者而被可耻地赶下台去。

从1970年8月到1980年9月，盖莱克把哥穆尔卡式的悲剧从头演到尾，连

结局都是雷同的他们俩都是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政治局解除职务的，理由都同样是"出于健康原因"；他俩也都是在医院里得知对他们政治生命的死刑判决的.....

然而这些相似仅仅到此为止。当这位白头发的前矿工被赶下台之后，我们在波兰看到了与以往领袖更替完全不同的反应。

这不是偶然的，它或许能证明那个"领袖便是祖国"的时代终于不可挽回的结束了 1956年的哥穆尔卡和1970年的盖莱克取代了他们的前任，登上了权力阶梯的最高一级时，整个新闻界都在"向新领袖表示敬意"而呐喊。下了台的统治者还来不及摘下王冠，整个波兰便已经呼喊起来"老国王死了，新国王万岁！"尽管老国王还可能活十年或者更久。

然而这一次，波兰人民对这种在以往看来几乎是改朝换代的领袖下台，表示出惊人的淡漠。

在53岁的卡尼亚接替盖莱克的当天，一位美联社记者在华沙街头问一位卖报的妇女，对党中央的改组有什么想法时，这位显然不会有很高文化素养的波兰妇女回答："人事变动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卡尼亚只不过是另一个官僚而已。"这位平民妇女一语道出了波兰人民的成熟推翻领袖，改换政府是无法打碎官僚政治的，之后肯定又会产生一个新的官僚政体，而且它一定比原来的更糟。

在上层，我们也同样看到了时代的变化。新上台的领导人已无力扮演那种万能的救世主了。以往，新领袖会向人民强调危机当然是前任造成的危机但总能对克服危机表现出政治家的自信，同时会用雄心勃勃的计划去鼓舞人民。

这一次，人民听到新领导的第一次讲话，却是他对领袖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否定。

9月5日，突然被任命为第一书记的卡尼亚在没有来得及准备讲话稿的情况下。发表了他当选后的第一次讲话。

卡尼亚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人民波兰、党会面临象今天这样如此错综复杂的问题；更没有想到你们所赋予的、责任如此重大的职务会落对我的肩上。

中央委员会一致选举我为第一书记使我为之震动。有一些发言里说我应该成为党的领袖。不，同志们职务不能把人造成领袖，再说，我也不敢肯定，我们党是否就需要领袖....."并不是个人品质的谦和，或者是资历浅薄才使这位新领袖的第一次演讲如此欠缺力度。53岁的卡尼亚曾经领导过很有权力的党中央行政部，并且从1971年起，他就担任着负责警察、军队和公安的中央书记。

真正的原因在于，卡尼亚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政治家，他能清醒地认识到：只要工人的强大组织存在着，领袖和他所代表的政权，便无法扮演那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伟人形象。

新任第一书记卡尼亚并没有至高无上、君临一切的感觉；相反，他一登上历史舞台，便看到一个高大的对手虎视眈眈地站在他的对面那正是早他5天登上台来的波兰工人阶级。

卡尼亚产生了任何一个领袖在此刻都不会有的那种苦涩感，于是他说了上面那一段话；同时，卡尼亚还感到，必须对这位强大的对手表示善意。于是他又说："我主张真正更新工会，以使它成为工人利益和完全自治的有效捍卫者，成为行政的伙伴。"卡尼亚慷慨地把自己的权力交出一部分，愿意与这个对手共同统治波兰。

然而，即使在此刻，卡尼亚也十分明白，双方不会成为真正的伙伴。自己被送上台来。正是要与这个强大的对手进行角斗；同样明白的是，他和这个对手根本不是同一个量级。

卡尼亚必须进行角斗即使必败无疑，也得向前出击，他得为这个制度赢用重新培养一个重量级斗士的时间.....

二十

面对着突然变得和善世界美国总统里根接见了瓦文萨的父亲；政府给了他一套住房从来没有害怕过失败的瓦文萨反倒表现出对胜利的畏惧.....

强大的波兰工人阶级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但远没有在这个舞台上站稳。对面，是一个五天前还握有对她实行生杀予夺大权的对手。尽管对方被迫同意她站到台上来，但远非心甘情愿。对方肯定随时都想将它排挤下去。

这是一场艰难的战斗。

整个东欧都不能给波兰工人阶级提供这方面的蓝图。波兰工人阶级必须与这个随时都想把她赶下台去的对手合作，而不是把对手彻底打垮尽管要把这个目前颇为虚弱的对手赶下台去并不困难。

从这个意义讲，波兰工人阶级同样面临着一个全新的、伟大的历史性妥协：她必须放弃政治斗争的传统目标夺取政权，甚至放弃使现政权陷入崩溃的任何过激行为；同

时，它还得放弃建立自己的政党的长远目标，而只以能够对各级政权进行监督，对政策的制定进行干预、参与为满足。

这就是即将成立的独立工会和瓦文萨所面临的艰难的历史使命。这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课题。

现在，瓦文萨已经堂而皇之地坐在格隆德瓦尔大街103号的一间房子办公了，即将诞生的独立工会总部将设在这里。

瓦文萨仍然穿着那件皱巴巴的褐色外套，8月的胜利似乎并没有把他变得尊贵，用他的话来说“我还是我。”但实际上，这位一个月前的失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和人生道路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9月1日，美国总统竞选人里根在美国会见了瓦文萨的父亲。瓦文萨双亲是1973年到美国去探亲的，他母亲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后，他的当木匠的老父亲便留在美国的瓦文萨家族那里。

里根对老瓦文萨的会见，标志着瓦文萨已成为世界级的工人运动活动家。这无疑是瓦文萨个人生活的新起点。

在此之前，瓦文萨已经四年没有固定工作，只是靠做临时工和朋友接济维持家庭生活。四年来，他四处奔走寻找工作都是徒劳。

瓦文萨说：“不管在那个工厂，只要人事科长看了我的劳动手册，刚才还空着的位置马上就没有了。”现在这个使他饱受凌辱的世界突然在他面前变得和善、谦卑了。

最早的青睐是从政府方面传过来的。

瓦文萨被告之，由于他将是全国最大的工会领导人，他有权获用按这个国家等级折算标准，相当于一个部长的优厚待遇也就是说，他有权拥有汽车、别墅和高薪。

瓦文萨非常坦率地拒绝了政府的厚意。他说他的新工会将是非官方、非政治性的“纯社会组织”。还有，红衣主教维辛斯基则干脆建议他“接受官方工会的领导职务。”他当然也拒绝了。

瓦文萨个人生活的变化是他的八口之家得到了一套客114平方米楼房套间。对一个波兰工人来说，这算得上豪华的住宅了。但这并不是一场交易，连外国记者都对此评论说，瓦文萨毫无羞愧地接受了这个明显带有政治含义的礼物，说明他心中没有鬼。

瓦文萨首先要适应的是自己心理上的变化这位靠着果敢和自信，靠着工人对他的神秘莫测的信任使波兰、东欧以及那类有着与波兰相同危机的国家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的工人斗士，居然在初次胜利后表示出胆怯。

9月1日，也就是罢工斗争胜利后的第二天，一位美国电视台记者向瓦文萨："在反对波兰执政党的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您从来没有害怕过遭受失败吗？"瓦文萨回答："不，没害怕过失败。"停顿了一下，他又补充了一句："但是，我倒害怕过我们会胜利。"这句话显示出瓦文萨具有惊人的现实感。8月的胜利带给瓦文萨的将是全新的、更加重要、更加艰难的工作。他肯定已经意识到，靠盲目的自信和蛮勇是无法承担这副更加沉重的历史重负的。

9月对瓦文萨来说，是一个更加伟大而陌生的开端，他得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是什么样的新工会工作。他如何才能使工人在8月的斗争中所获得的权力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这当然是一道极大的难题。因为从来没有独立工会在一个一党制的共产党国家活动的经验。

为了解开这道难题，瓦文萨辞掉了他在列宁造船厂刚刚恢复不久的公职。面对着这项陌生而艰巨的工作，这位以自信和勇气著称的工人领袖，对自己的能力有了较为保守的重新估计：瓦文萨首先宣布，他的新工会应该局限在格坦斯克，最多也只局限在沿海地区。

他说："我在这里有很多工作要做，我顾不上波兰其它地方了。"然而，就如任何一位被人民选中的政治家一样，一旦登上历史舞台，便会被历史的潮流所左右尽管这些政治家常常因为能驱使和决定多数人的行动、命运，而误以为自己在决定着历史的进程无论他是不是真正具备和他的位置相称的能力，他都必须干下去；无论结局是成功还是失败，他必须走下去！

1980年的波兰既然选中了瓦文萨，他就不得不干历史注定了要由他来干的事情。

就在瓦文萨表示自己的自信和能力只能承担格坦斯克地区的新工会工作几天之后，华沙以及西里西亚等地新成立的独立工会，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派代表去格坦斯克向瓦文萨取经。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工会代表聚集在格坦斯克，并且否定了瓦文萨的意见而提出

筹建波兰统一的独立自主工会。

9月17日。来自波兰各地的独立工会代表在格坦斯克会晤。会议产生了成立一个全国性独立工会的提案，总部将设在格坦斯克。

这次会议有250名代表参加，他们代表着31个城市的数十万工人。在闭幕会上，瓦文萨向全波兰宣告："我们建立了一个象中央权力机关的组织，我们现在已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每一届政府都必须认真对待。谁都不该对我们的组织制造困难。"显示了力量之后，工人阶级又表示了对波兰命运的责任。

会议的最后决议说："自由工会感到，它们应该为目前的经济形势分担责任，我们希望对战胜当前的危机有所帮助。但是这一切只有当局不设置障碍才可能实现。"五天后，全国36个独立工会再一次在格坦斯克聚会，通过了独立自主工会的章程，并且用瓦文萨的一句口头禅"注意团结"，作为新工会的名称。

团结工会诞生了。独立自主工会获得这个名称之后，她的形式和宗旨也就变得明晰了她应该是波兰工人力量和团结的象征。

这时，报名参加的所属工会已拥有300多万会员。

团结工会的全国性机构是全国协商委员会，下面设有主席团、以及社会工会事务中心、出版宣传等办事机构。

全国协商委员会是决策机构，瓦文萨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

这一切都是在不声不响的平静中完成的。

波兰很少有过如此的平静，历史很少有过能在如此平静中获得巨大进步的时机。

为了抓住这个时机，波兰各阶层都在行动：先是教师们成立了独立工会，接着是波兰人民军的文职人员于9月17日也决定成立独立工会，以代表军中文职人员的利益。

为了不放过这个历史时机，连最喜欢大喊大叫、惊天动地的大学生都开始默默地、迅速地干起扎扎实实的实事来自波兰各地的大学生代表，9月27日在格坦斯克聚会，决定按照瓦文萨的独立工会的方式，成立独立学联，以与官方的"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分庭抗礼。

"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是波兰唯一的、官办的学生组织，波兰48万大学生中，7

0%以上属于它。

8月是激烈的，9月是平静的；8月是艰难的，9月是辉煌的。到9月底，当团结工会全国协商委员会向华沙地方法院呈递批准章程的注册申请时，它已经拥有500万会员了。

9月在政府方面也是平静的。它并没有表现过反悔的举动，也没有对迅猛蔓延全国的独立自主运动进行干扰或发出威胁的警告。

如果政府方面的平静是由深刻的反省、检讨以及伟大的历史性妥协构成的，那么，我们将为波兰感到高兴；但我们又会对历史的进程如此顺利而表示怀疑那么，这平静到底是惊魂未定时的养息，还是一时无法找到对策的惆怅？

9月就要默默地逝去，政府克制地行使着它那已被大大削弱了的权力，而工人在迅速建立全国性统一行动指挥机构的同时，仍在默默地尽自己的职责劳动。

打破平衡的，是在9月29日，团结工会的发言人宣布：将于10月3日在波兰全国举行一小时警告性罢工，以抗议政府没有实现增加工资和让团结工会使用宣传工具的诺言。

发言人说，警告性罢工将在10月3日到底下午2时至3时举行，罢工只限于1500工人以上的工厂。小企业是否要以罢工进行声援由他们自己决定。

这次罢工的宣布是克制的、有理智的，同时也给了政府留有挽回的余地：工会表示，如果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能在全电视上露面，表示将履行上月为结束罢工答应的一切条件，并让新工会使用宣传机器，工会将取消罢工。

团结工会第一次显示了她的力量。这是充满理智和节制的力量，它不是咄咄逼人的一个小时的罢工毕竟算不了什么；何况还给政府留有4天处理危机的时间……

9月终于平安地度过去了。一进入10月，我们就发现，9月的平静原来蕴藏着更大的风暴。

对抗开始了：10月3日，一小时警告性罢工按计划、有秩序地举行了。

独立工会重申要求办一份与官方工会报纸《劳动之声报》具有同样规格的全国性日报，要求使用官方出版社、以及要求地区和全国电视台、广播电台为独立工会提供广播电视时段。

罢工是在"波兰的未来掌握在工人手中"的口号声中结束的。

瓦文萨对这次罢工表示满意，他说："我们表现出我们懂得如何发动罢工，如何结束罢工.....这就是我们所需要达到的目标。"10月4日，新任波共第一书记卡尼亚在中央全会上严厉地谴责了这次罢工。

10月6日，团结工会却以更加严厉的口气反驳了卡尼亚的谴责。工人方面说："如果卡尼亚不理解这次罢工的理由，那么他必须做的事，就是到我们这里来看看。我们要求他本周就来。"同时，团结工会还要求卡尼亚在电视上公开解释对一小时警告性罢工的批评态度。

团结工会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和尊严，她能以数百万工人的名义向最高领导人发出命令，而不再害怕某一个领袖或某一个政党对她的行为进行指手划脚地干预了.....

然而，这支实际上存在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却不能顺利地得到法律的承认。

10月5日，华沙地方法院审查了团结工会申报注册的文件后，提出了三点意见，拒绝给团结工会登记。

这三条意见是：1、在团结工会的章程中没有提到党的领导。

2、章程规定工会可以到波兰各地广泛展开活动，而8月的格坦斯克协议则明确规定只在所属地区展开活动。

3、章程规定，不准许政治组织的负责人在团结工会中担任较高一级的职务。法院认为，这项规定违反人权。

政府想通过法律手段，使新工会在通过章程时被束缚住。

团结工会于10月7日驳斥了华沙法院对工会章程提出的反对意见，同时致信政府当局，对法院的反对意见表示惊讶，对可能由此引起新的对抗表示了担忧。

面对着数百万工人的强硬立场，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克制态度。10月14日，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布翁斯基打电话给未得到法律承认的团结工会，约见主席团全体成员。

团结工会则表示，无论主席团是否去参加这次会晤，都不会向政府当局让步，不会

改写工会章程。

瓦文萨说："团结工会已有600万会员，不管有没有法律承认，都会进行活动。"10月24日，华沙法院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决定给团结工会登记注册，但却擅自给团结工会提交的章程增添了一条关于承认共产党领导作用的条款。

华沙法院对工会章程的改动，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团结工会忿怒地拒绝接受法院对工会章程的批准。瓦文萨在当天晚上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瓦文萨谴责道，法院在最后一分钟对章程作单方面的修改"是违反我们意志的，是没有得到我们同意的。我们认为，这个事实是令人厌恶的。"瓦文萨向新闻界宣布：团结工会将就华沙法院科希切尔尼亚克法官的裁决，向波兰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这次围绕着是否承认共产党领导的争执经历了半个月。此期间，还未从8月失败中缓过劲来的政府当局，采取了痛苦的退却，希望双方能寻得妥协的解决方法。

在此同时，以政府总理平科夫斯基为首的政府代表团和以瓦文萨为首的40人工会代表团于10月31日举行会谈，作出实际上承认团结工会的姿态。

政府对工会提出的许多要求作了肯定的答复基本上同意团结工会出版一份周报；准备向团结工会提供电视播出时段，下令发还几周前被华沙机场海关警察扣留的西方工会送给团结工会的印刷设备；甚至还同意了工人有权决定提薪如何分配的要求.....

独立工会存在的意义已经显露出来了它使政府有了一种新的行政方式：政府在作任何决定时，不得不考虑到身边这位并不温顺的伙伴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团结工会的确不是温顺的，即使政府有了这样的耐心，有了这许多让步，她还是不愿意接受一种隶属关系而要求平等伙伴式的地位.....

二十一

波兰政府和最高法院选择了妥协。历史应该记住这些作出过伟大历史性妥协的政治家。如果没有妥协，世界便只会有战争而不会有政治。

11月初，政府当局无法回避的对团结工会能否真正独立，作出法律上的最终判决时，全波兰都屏住呼吸、注视着团结工会的诞生，将是历史的顺产，还是一次更大规模的社会对抗？

人们的紧张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团结工会中的激进分子早在10月24日华沙法院裁决下来的当天，就要求总罢工；瓦文萨虽然坚持要慎重考虑，但也明确表示过，如果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那么团结工会将于11月12日，也就是国庆日的第二天举行全国性的总罢工。

这又是一次只要具有常人头脑就不难作出的选择除了妥协，政府别无选择，最高法院别无选择但问题是，在人类政治史上，不是有过许多连常人头脑也不会作出的愚蠢的政治判断和政治决策吗？因此，波兰仍然紧张地等待着11月10日最高法院的开庭，紧张地等待着可能使双方难以避免的摊牌。

这次开庭进行了三个半小时，最高法院终于作出了被西方记者称之为"出人意料之外"的裁决支持了团结工会对华沙法院强行修改工会章程提出的上诉。

波兰政府又一次以它无可奈何的历史性妥协，为共产世界的独立工会运动树立了一个里程碑。

最高法院休庭后，瓦文萨和团结工会其他领导人从法院走出来时，耐心而平静地在法庭外面等了三个多小时的大批群众，对他们长时间地欢呼。

瓦文萨用扩音喇叭对群众说："最高法院今天干了一件漂亮事。我们没有改变章程中的一个标点符号，更没有删去其中的一个字。"瓦文萨同时对大批守候在这里的记者宣布，团结工会取消了举行全国性罢工的计划。

瓦文萨强调了团结工会这次重大胜利的意义，但他又说："谁也没有失败。"是的，政府作出了妥协，支持了工人的上诉；而工会也作出了妥协，同意将华沙法院增加的那一条款放到工会章程的附件中。

波兰当局和瓦文萨都无需对这样的妥协惭愧妥协是政治艺术中最必要、最伟大的技巧.....没有这个技巧，世界便只会有战争而不会有政治。

因此，历史不仅应该记住英勇卓绝的斗争，也应该记住作出过伟大历史性妥协的政治家这在8月是盖莱克，在11月则是卡尼亚和瓦文萨.....

尽管双方的强硬派都认为自己一方向对方屈膝让步，但波兰毕竟获得了一个不小的历史进步。这在人与历史的搏斗中无疑是一个巨大胜利。

政府方面没有庆祝这个胜利，可见政府中强硬派具有的实力；工人方面的强硬派从这个妥协中感到了投降的耻辱，他们扬言要于11月12日举行罢工。

然而就工会一方论，瓦文萨毕竟比卡尼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所以冒冒失失的工人激进分子没能将他们的过激行为付诸实践。

当天晚上，在华沙的一家最大的剧院里，团结工会以一场座无虚席的义演音乐会来庆祝自己的胜利。

当瓦文萨以快捷的步伐走进拥挤的剧场时，受到了狂热的欢呼。这位一米六零的小个子男人，以他那简洁、快速的语言和富有煽动性的激情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人们想到充满着胜利的喜悦和希望的列宁时代，想到了同样是矮个子、同样具有奔放热情的列宁……或许，有人会对这样的联想表示抗议。

是的，瓦文萨不能与列宁相提并论。列宁是革命的化身，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受敬仰的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人物；还有他那渊博的学识和巨大的思想力量……这些都不是瓦文萨可以比拟的。

然而此刻，人们明明感到了一股巨大历史冲击力，明明感到了一位史诗中的民族英雄凸现在眼前。

是的，是的，这感觉是正确的，这是可以比拟的两个历史瞬间那一次，列宁作为人民的代理人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刻，登上舞台的是人民自己；那一次，列宁被认为是民族的英雄、人类的英雄；这一刻，波兰也寻得了自己的民族英雄这位民族英雄就是工人阶级。

庆祝仪式的高潮是舞台上的一位演员演唱一首振奋人心的爱国歌曲《让波兰重新成为波兰》。

女演员动情了，毫无掩饰的流着眼泪。突然，的哽噎住，唱不下去了。她害羞了，用她双手掩住满是泪水的面孔……一个观众站了起来，接着唱下去……

观众一个接一个地站立起来，加入到这个没有任何人号召、指挥的合唱中来……

人们歌唱着，泪流满面，他们终于找回了失落许久的波兰，终于找回了失落许久的自己。从此，波兰将重新成为波兰，人民将重新成为人民……

团结工会认为"彻底的职工自治"才是社会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认为工人阶级只有首先控制了生产，才能最终成为社会的主人。

团结工会提出了六十年前就有过的旧话题.....

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决战，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妥协，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进步都十分成功的完成了。波兰该松一口气，波兰人该去恢复最终能使他们进步的社会生产了。这不仅是党和政府的意见，也是团结工会领导人和人民的意见。

瓦文萨在最高法院判决下来的当天，就向全体波兰工人阶级呼吁："我们的要求已经全邻得到了满足，波兰工人现在必须回去工作。"社会最终得靠生产维持，工人最终得干活。工人在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获得了应有的政治权力之后，他们最终还是得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劳动，这与几个月前是没有差异的。

难怪一些看透了政治的虚无主义者会说，"闹腾什么？工人到什么时候还不是干活！"然而，1980年11月，当波兰工人阶级经历了这次历史性震荡重新回到生产岗位后，他们有了一种全新的体验原来使他们对工作产生厌恶和负担的并不是劳动本身，而是无权的卑微和令人忿慨的不公正。他们并不嫌弃劳动，并不想让厂长来替代他们工作，他们厌弃的只是那种与己无关的强制性劳动。现在，不公正和邪恶并没有因独立工会的成立而立即消失，但工人们惊讶地发现，以前那些令他们忿怒的不公正开始变得躲闪闪，而不象以往那样肆无忌惮了。

工人们感到了自己的力量和尊严，感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人的存在他们可以思考怎样使不公和腐败少一点，可以对其进行抗议和纠正了。波兰工人阶级有了干预的欲望，也有了干预的可能他们现在有一个强大的，随时可以动用的常规力量团结工会；他们不再为临时集合这种力量而遭受另一种常规力量的镇压了。

波兰工人阶级能有这种新的感受，我们才可以说，团结工会的意义不仅仅是她取代了官方工会，不仅仅是瓦文萨取代了官方工会主席克鲁契克，不仅仅是一批不再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取代另一些寄生在工人阶级身上的工会官员。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前几天，政府和团结工会就共产党在工会中的作用的较量会那样顽强？这种语意上的争议，在局外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却将决定团结工会会不会变成另一个官方工会。

团结工会仅仅是工人阶级参与国家治理的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参与。团结工会对国家事务的干预可能获得什么样的成就？政府当局对它勉强承认的行政伙伴的干预，到底能容忍到什么程度？

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全新的历史课题。

双方都带着各自的全新战略目标开始了第二个回合的战斗。

对共产党国家的人民来说，参与政治并不是陌生的概念。几十年来，党和政府经常发出号召，要人民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然而以往所谓参与政治，只意味着参加到政府一边模范地执行政府的各项政策法规；意味着站在党的一边参加共产党，成为党的一名战士！

现在，波兰工人必须将无条件拥护，变成共同承担国家命运的政治参与。

另外，就要行使政治权利的波兰工人还面临着另一难题：几十年来，工人阶级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他们的政治能力已经萎缩，他们能担起这副新的历史重担吗？

波兰工人阶级必须学会承担国家责任，必须为自己的历史利益创造时机。

工人阶级在六十年前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而半个世界至今还在吞食的苦果，正是六十年前的那次巨大时机的流失所至那就是俄国工人阶级在生产上和政治上当家作主的机会……

二十年代初，以全俄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亚·施略普尼柯夫和苏共杰出的女革命家亚·米·柯伦泰为首的"工人反对派"，在联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重申了联共党纲中关于"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集中到自己手中。"的工人自治原则。

为此，"工人反对派"提出"把国家工会化"；"工人阶级的最高形式不是党，而是工会"；"我们要消灭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国家经济部门中的官僚主义"；他们反对"一长制"和"党在政治上的最高权力"，认为这是苏埃维政权开始蜕化变质的主要原因。

工人反对派的立场遭到了列宁的坚决抵制。

列宁正是"一长制"的提倡者，他的观点是，"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怎样才能保证意志有最严格的统一呢？这就只有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盟友托洛茨基则更加激进。

托洛茨基提出"劳动军事化"的口号，说劳动"对全国来说是义务性的，对每个工人来

说是强制性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工人反对派"却坚持工会对工厂和国家的管理权力，他们认为集体管理是"无产阶级的、有别于所有其他社会阶级的、特殊的、独树一帜的标志。它是最民主的组织原则。"柯伦泰对"一长制"的反驳更为尖锐。

她说："如果不相信工人集体的创造能力"，那就必然"鼓吹这样一种幼稚可笑信念，即可以通过官僚主义方法实现共产主义。"奥新斯基则在报上撰文，发出了在今天看来绝非危言耸听的预言性警告："我们赞成凭工人自己的阶级创造力来建设无产阶级社会，而不是凭借'工业巨头'的旨意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以信赖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和积极性的阶级能动性为出发点。假如无产阶级本身都不知道怎样为社会主义劳动创造必要的先决条件，那末，就没有任何人能为无产阶级作到这点。任何人不能强迫无产阶级这样作。如果对工人举起大棒，那么，这根大棒不去提在另一个社会势力手中.....就是握在苏维埃政权的手中.....到那时，苏维埃政权就将把自己毁掉，而不成其为无产阶级专政了。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必须由无产阶级自己去创建，否则，就根本创建不起来；某种别的东西合被创建起来，那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在这场关于集体管理还是"一长制"，工会管理还是国家管理的争论中，几乎"所有的工会代表都倾向于集体管理，而所有我党领袖都反对这一点，因为他们都喜欢从国家体制的角度来评价一切事务。"1920年元月，列宁与托洛茨基联合起来，极力要求参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党员接受"一长制"和"劳动军事化"的建议，但在60多名党员代表中，只两人支持他们。

"列宁在过去从来没有遭到过这样断然的拒绝。"在这场党的领袖与工会的领袖的分歧中，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与它自己的政党之间的第一次对抗。

党战胜了工人阶级。联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工人反对派"被宣布为非法组。

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绝没有任何谴责的意味。即使在60年前那场争论的结论已经十分明显的今天在国家资本主义不能带来社会主义，而只会使社会主义政权蜕化、被冷酷的官僚主义权力取代的警告已越来越被历史证明的今天，我们也无权说谁比列宁更聪明更伟大。任何这样的比较都是愚蠢的、狂妄的。历史比任何优秀的历史学家所能理解的都更复杂，也比任何杰出的领袖更有力量。

我们展现出无产阶级在60年前往有过的这次机会，是要为历史不允许这个时机成熟而表示遗憾，同时也为人与历史的必然失败的对抗表示敬意。

六十年过去了，但它在历史巨册上却只是薄薄的一页，所以，我们至今仍难判断，工人阶级掌握自己命运的历史时机是否已经成熟？

然而，这无关要紧，我们至少可以做做六十年前人们做过的事，至少应该比六十年前有更多的勇气和更深的认识。即使我们又失败了，也会留下更多的经验和更壮观的创

举，但如果我们错过了历史时机，却只会留下耻辱。

因此，无论历史的时机是否成熟，波兰工人阶级都必须做下去象他们的前辈所做过的那样。

新成立的团结工会一开始就表明她的存在是任何政治反对派所无法取代的，他所显示的威力是任何空洞的思想力量所无法替代的。

有了自己常设组织的波兰工人阶级，可以迅速对违背他们意志和利益的事作出反应，即使这些事件是微小的、还没有造成灾难性后果。

11月14日，在波兰南部的琴斯托霍瓦省，省长给工厂经理下令阻挠新工会的活动撕掉工人张贴的布告，不准新工会使用厂里的广播和印刷设备立即受到团结工会的强烈抗议。

团结工会琴斯托霍瓦省的负责人与省委书记谈判，对省长使用紧急状态这个词表示抗议，并要求撤换省长。

省当局不得不重视来自工人方面的抗议。

在格坦斯克，卫生、文教系统的团结工会会员进行了静坐罢工罢教，要求提高工资和从国家预算中拨更多的钱用于文教事业。

这个地区的团结工会敦促省政府尽快就教师和医务人员提出的要求举行谈判，否则，工会将号召学生举行同情罢课。

团结工会的警告是很具有权威的。11月14日，波共第一书记要求会见瓦文萨，讨论格坦斯克的知识分子问题以及波兰的社会、经济形势等问题。

或许，在这次会谈中，瓦文萨并不能拿出比政府智囊人物更深刻的见解和更有效的对策。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在于，政府终于懂得在处理任何社会问题时，应该先征求一下人民的意见；这次会晤还表明，团结工会已被承认为共产世界中唯一一个国家里的一支强大的独立力量。

我们强调这次会晤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并不是以往没有过最高领导人和基层人士的接触；相反，这类国家比西方有更多的领导人接见某位工人或某位农民的新闻报导。但这类接见多是一种姿态。我们常常从空洞而虚伪的关切中感到了居高临下的气势和巨大的等级差别。

以往的这类会见，在劳动者方面是由于他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领袖的颂扬、敬意和忠诚；在领袖方面，则是出于对政治忠诚者的嘉奖。

11月14日卡尼亚对瓦文萨的会见则是平等的。事后，瓦文萨称这次会谈是“坦率的、无话不说的。”他说：“我觉得，我们已经互相谅解了。”谅解是一回事，消除社会危机又是另一回事。如果国家与社会的对话不是中断了几十年后才开始，那么这次领袖与人民所达成的谅解或许能为波兰带来安定的政治局面和经济发展的时机。

几十年遗留下来的问题太多了，既然人民参与政治无法避免，那么暴露这些问题同样无法避免。无论卡尼亚和瓦文萨能有多么真诚的和解愿望，工人参与的结果不可能是和解和安定，而是迅速使被掩盖、被粉饰着的矛盾、危机暴露了出来。

暴露出来的危机必然加深双方的对抗.....

禁书网网志制作

翻墙去禁书网www.bannedbook.org可下载更多禁书



来自底层的改革浪潮——瓦文萨与波兰团结工会 (六)

二十三

工人阶级与政府的对抗开始涉及到这个制度最本质的方面团结工会要求就警察对社会权利的肆意侵犯进行调查，并从根本上予以铲除。

在降低物价、改善生活、工人自治、退出华沙条约以及新工会直接使用宣传工具等重大决策上，团结工会的观点与政府当局的观点相去甚远。政府的让步很有限，只同意团结工会每星期六利用国家电台作一个小时的播出，介绍一周中工会活动情况。

为了迫使政府接受来自工人方面的要求，团结工会采取了强硬态度。局势再度紧张。

11月22日，团结工会华沙分会宣布，准备在华沙举行总罢工，以抗议警察当局在头一天对团结工会华沙总部的搜捕。

21日的被捕是由十几名秘密警察采取的突然行动。

警察搜走了政府在10月底发出的一份关于如何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绝密文件，并抓走了与此文件泄密有关的工会工作人员和一名政府印刷厂工人。

11月27日，政府作出让步，释放了21日逮捕的两名工人。团结工会作出相应回答推迟了在华沙举行总罢工的计划。但华沙钢厂的一万多工人的罢工却未复工。

团结工会没有因警方放人而罢休。为了彻底制止警察力量对社会权利的肆意侵犯，团结工会就这次搜捕事件向当局提出立即进行谈判的要求，并拟定出谈判的内容：1、释放所谓的反社会主义分子；2、成立一个议会委员会，研究警察局、保安机关和检察当局的法制观念以及它们滥用权力的行为，以保卫社会的权利；3、审查负责镇压19

70年和1976年工人示威的那些人，并公布党中央有关1970年波罗的海地区骚乱的文件；4、为了同国家严峻的经济形势相适应，应该限制内务部的预算。

团结工会华沙分会就这些要求到政府所在地与雅盖尔斯基副总理谈判。

工会发言人说："一旦双方就这些问题的举行谈判达成协议，团结工会将下令华沙钢厂的一万多名工人复工，并撤销在华沙全市现在仍然有效的总罢工戒严令。"工人与政府的对抗越来越涉及到这个制度最本质的方面，并且也越来越多地得到其他阶层的理解和支持。

工会提出要求的当天，华沙大学的学生便挂着国旗和横幅在校园里开始了静坐示威，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并支持团结工会的要求。

团结工会的要求的确是触及到了这个政权的基础。这个名义上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民主国家早已堕落为以警察力量为主要统治手段的警察国家。没有警察的暴力，它肯定无法度过任何一次社会危机。

警察是解决危机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但是，当人民面对着拿着警棍枪支的警察力量时，当那些"公仆"躲在警察的保护力量后面安逸地享受着他们的特权利益时，人民与当局之间的鸿沟被警棍掘得更深了。不再有人相信这是"人民的警察"、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国家"了！

如果没有这种信任，用警棍压制着的危机便永远不会根除。

政府当然不会以它生死悠关的存亡作让步，而工人又不再接受以往那类欺骗式的、或是不痒不疼的让步。双方的分歧很难弥合。

八十年代的第一个冬天就要过去，波兰仍看不到和平昌盛的希望罢工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社会动荡频繁，经济陷入严重混乱。

如果为了眼前的安定，团结工会应尽力采取克制和温和的态度，如果为了长远的繁荣，工会则应该对危机的本质方面进行揭露、并迫使政府作出重大让步以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

团结工会选择了后者。

具有远见的波兰工人阶级没有为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为此，团结工会承受了"罢工和对抗将使波兰问题复杂化"，以及把"波兰推向经济灾难的边缘"的罪名和指责，

无私地在敦促政府进行根本性政治改革的斗争中，放弃了一些切身的眼前利益。

1 1月27日，瓦文萨向华沙钢厂的罢工工人发表讲话，呼吁工人不要过高地提一些物质方面的新要求，不要仅仅盯住眼前的物资利益。

团结工会沉着地在政治上、在似乎与工人阶级无关、却具有长远意义的问题上采取了坚定的措施。

1 2月10日，团结工会宣布，成立一个以瓦文萨为首的“保卫政治犯特别委员会”，以制止当局继续对那些表示不同政见的人采取镇压行动。这次声明还提到目前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四名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字，表示支持他们的事业，要求政府释放他们。声明驳斥了政府方面关于罢工引起经济危机和持不同政见的活动造成了政治动乱的指责声明说：“正是国家的政策才造成了目前的政治经济局面。”团结工会的这一系列政治措施，无疑使政治上的反对派向合法存在走出关键一步，这无疑是对绝对政治权力的一个有力挑战。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

团结工会以更加成熟的姿态，加紧了政治攻势。

1 2月16日，50万格坦斯克居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各阶层人士在格坦斯克集会，举行1970年事件被害工人纪念碑揭幕仪式。

仪式开始之前，各工厂的汽笛响彻了整个格坦斯克，停在港口的各国船只鸣笛响应，教堂敲响了钟声。到处都是佩戴着团结工会徽章的工人。拥有900万会员的团结工会组织了这次空前盛大的集会。这个占全国职工总数55%的自治组织，以无人可以抗拒的权威向历史罪恶进行清算，并表明她对国家事务已有着绝对权威的发言权。

对历史罪恶的清算是对现实统治的严厉警告，使之不敢再继续以往的镇压政策。

国务委员会主席雅布翁茨基代表波共和波兰政府，红衣主教马哈尔斯基和主教团秘书达布罗斯基主教代表天主教会，参加了这次夜晚举行的灯火通明的仪式。

波兰三支最强大的力量相聚在同一个讲坛上，在波兰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标志着当局与人民之间合作的时代开始了。比起朝野之间势不两立的对抗，这种和平共处更具有进步意义。

瓦文萨发表了呼吁实现社会安宁和全国和睦的演说。

瓦文萨说：“我呼吁你们保持和平、秩序和尽自己的责任……波兰尤其需要国内和

平、需要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信任。"瓦文萨的这次被官方称之为最温和、最和解的讲话，获得了数十万群众的雷鸣般掌声，因为没有人认为瓦文萨的温和是一次妥协；相反，人们都感觉到，波兰人民已经可以在国家的重大事务中和平而有秩序地表态、进行举足轻重的干预，而不会因此付出惨重代价了。

当然，这次纪念活动的和平结束，并不意味着波兰危机的了结。但至少显示了波兰人民的力量、成熟，以及当局的妥协。这一点立即就为全世界所关注。

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就12月16日格坦斯克的这次集会发表了新闻公报。

国务院发言人特拉特纳说："波兰工人庄严而有秩序地进行纪念活动证明，波兰人只要得到机会，就能够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和平地解决国内问题。"工人阶级敢于对决策当局的失误进行公开抨击和对抗是一个进步，而一个反对派可以合法存在、和平地进行干预则显示了更大的历史进步。如果波兰当局能够接受来自人民的监督，能够使这个强大的反对派合法化，使它的政治干预法律化、秩序化，那么，波兰将在东欧为社会主义民主创立一个最佳形式。

这种自下而上的人民监督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原则，它显然比那种两党或多党制的监督更加有效。

多党制下，政治监督是由一小批职业政客组成的政党去实现的。这种形式下，很难避免社会利益不会在政治收买或政治交易中被出卖。但人民是无法收买的，或者说，能收买全体人民的政权，意味着它已成为人民的代理人。

遗憾的是，1980年的波共政权，并无接受这个历史进步的真诚，它无意让这种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合法化、永久化，有的只是被迫的妥协和权宜之计的退让……

二十四

制度从六神无主的眩晕中清醒过来后，立即停止了痛苦的退却并挑选了一位大将衔的职业军人作为代理人。现在，它强硬起来：团结工会可以合法存在，却不可以合法地行使权力。

团结工会成立后的短短的几个月中，政府的让步是可观的释放了政治犯，默认了工人阶级对国家事务的干预，以表示对工会权威的敬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降低物价、提高工资，以表示愿意为人民的利益而放弃部分特权利益；签定了关于每周五日工作制及工会可以利用舆论工具的协议，以表示承认工会是它的平等的行政伙伴……

但所有这些仅仅是一种表示诚意的姿态，当局没有在制度上作任何实质性让步；相反，随着妥协而来的是咄咄逼人的警告和伺机反击的准备。

1 1月15日，波兰军报《自由战士报》发表了题为“教唆者”的评论，说“反共犯们将千方百计地向工会运动渗透……波兰所有敌视社会主义的集团都对新工会的出现寄予很大希望，想利用它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1 1月29日，波兰军报发表评论：“那些力量，不管它们以何种名义，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它们不仅向法律和正义感挑战，而且向波兰的社会主义秩序挑战。”这篇评论还直接了当地警告团结工会“不要在独立道路上走得太远”……

1 1月25日，波共机关报《人民论坛报》发表社论强调，改革的速度和范围必须由共产党来决定，说“改革必须带有共产党的性质，否则一概不行。”《人民论坛报》的社论写道：“党不仅有责任，而且在道义上、政治上有权利在今天大声疾呼：混乱得够了，不安定得够了。”1 2月8日，《自由战士报》的调子更加强硬，它强调军队是“人民进行统治的最重要的一环，因此军队将以充分的责任感来看待我们国家的命运。”这家军报还说，“波兰军队是国家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决不会对涉及到我国人民的生活，对国家操心的事和问题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1 9 8 0年终于艰难地度过去了。双方都没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熟悉历史所赋与自己的新角色既没能熟悉共同行使权力所需要的忍让和默契，也没能掌握在这个新战场上操戈对抗所需要的新战术。

历史一进入1 9 8 1年，双方就很快熟悉并进入自己的角色首先是团结工会终于明白，即使有了合法存在的权力，她也别指望当局会自愿将属于工人阶级的权力归还给自己。温和、和解，只能换得徒具虚名的存在。当局只允许自己“合法”存在，却不允许她“合法”地行使权力；在政府方面，束手无策地放弃一个又一个阵地的痛苦阶段总算度过去了，它终于从六神无主的眩晕中苏醒过来。这几个月对它是痛苦的，却也是必要的。它喘过气来了。

1 9 8 1年2月2日，卡尼亚在波共“九大”筹委会上说，“团结工会顾问及其部分领导人，正试图把团结工会变成政治反对派，企图在波兰建立双政权。这是不允许的。”卡尼亚一语道破了当局同意工人阶级参与国家事务的虚伪本质。它给团结工会分派的角色依然是非政治性的。政治依然是波共的专利，权力依然是统治当局的专利。

卡尼亚的这次突然强硬起来的讲话还表明，这位妥协时期的过渡人物的使命已快完成，他希望丢掉那个软弱而可怜的角色，使自己更象一位共产党的领袖。

只要一登上权力阶梯的最顶端，只要尝受了最高权力的滋味，谁也不愿意作一个过渡人物，不愿意仅仅是一名在强大的领袖人物出现之前的王位看守者。

卡尼亚的愿望并非不现实。在共产党的执政史上，确实有过许多次这样的实例：由于权力斗争的双方难以妥协，而常常扶上去一个平庸而无实力的折衷人物，可是集权的制度却常常把这位过渡人物从平庸变得专横，从无实力变得强大，最终他反而能将扶他上台的实力派逐个驱出政治舞台。当然，要完成这个过程怎么也需要三、五年时间的苦心经营。

然而问题是，现在的波兰决没有这三、五年的空闲坐等一个羽翼未丰的雏鸟慢慢长大，险恶的形势迫使它立即进行新的挑选。

在卡尼亚讲话之后一周，波关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解除了平科夫斯基的总理职务，由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接任。

单就选择一位大将军衔的职业军人担任政府总理，我们便能预料卡尼亚会有什么样的命运，波兰的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二十五

新政府强硬起来，非政治解决的阴影笼罩着波兰。然而瓦文萨没有退让，他说，如果真是那样，我将奔赴第一线去打坦克……

雅鲁泽尔斯基于1981年2月11日被任命为政府总理，12日就在组成的新政府发表了果断、强硬的施政纲领。这位57岁的军人总理一上台就被当作党的救星而被接受了。

雅鲁泽尔斯基没有辜负制度的青睐。他一上任就把视线从政治转向军事，从国内转向国际。

3月22日，雅各泽尔斯基专程赶到西里西亚观看华约组织的军事演习，并会见了华约总司令库利科夫元帅和捷克、民主德国的国防部长；5月30日，雅鲁泽尔斯基再次会见了华约总司令库利科夫

在国内政治危机极为严重的时刻，一位政治领导人频繁地进行军事和外交上的活动，不能不让人们对非政治解决的可能性产生担忧，尤其在此之前，外来的和军事的干预已经明显地让人感到过忧虑。

既然1980年的“波兰之夏”是制度的危机，那么，作出反应的就不仅仅是波兰，整个制度都会对这次从未有过的失败采取积极的统一行动。

从去年年底开始，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就对波兰团结工会的活动表示了严重的关注和焦虑，并出现了与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相同的征兆：苏联军队大量集结在与波兰毗邻的捷克北部边境；苏联要求波兰允许四个师的华约军队通过波兰调往东德；苏联、东德、捷克的后备役军人被重召服役；捷克警方在年底把包括前党的首脑杜布切克在内的六名持不同政见者拘留了两个小时，警告他们在今后几周内不得公开发表讲话。

12月中旬，苏共国际部副部长扎格拉金在罗马会见梵蒂冈官员时说，如果罗马天主教能设法缓和波兰的罢工运动，苏联将不会采取类似1968年对“布拉格之春”所采取过的行动。

苏联的这些行动和暗示引起西方的不安。西方新闻界甚至认为：解决波兰的劳工危机，“除了把坦克发动起来外，别无其他选择”。北约军事委员会也证实，“苏联人只要几个小时，而不是几天，当然更不是几个星期，就能攻进波兰。苏联人已处于待命状态，他们确实能够采取行动。”当然，在1980年前后，波兰所面临的外来干涉的危险与1956年的匈牙利和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相比，毕竟要小得多。在这方面，一个强大的、沉着的工人组织起了很大作用。

在被问及这个问题时，瓦文萨不排除这种可能。

他说：“谁想试，就让他试试吧！我们没有妨碍任何人。因为我们主张社会主义。”他不愿多谈，认为“老谈这个问题不好。”但瓦文萨坚定地表示：“如果出现外国干预的话，我将奔赴第一线去打坦克。”至少在1980年初，波兰政府能指望的还只能是兄弟党的政治援助。在政治方面，勃列日涅夫的援助同样是慷慨和毫无顾忌的。他公开对波兰内政进行旗帜鲜明的表态。1981年5月22日，塔斯社发表社论，说团结工会的活动表明，“波兰修正主义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势力想使波共具有社会民主党的倾向。他们正向波共进攻。”在苏联强大政治攻势的支援下，雅鲁泽尔斯基靠着强大的国内外军事力量作为后盾，与他的对手先作政治上的较量。

新政府与团结工会的第一次对抗发生了。

3月下旬，在彼得哥什省，团结工会成员与地方政府发生冲突并遭到了警方殴打。事后，省政府和司法部门明显袒护警方，因而激怒了工人。团结工会下令全国，于3月27日凌晨举行一次全国性的四小时警告性罢工。

双方在这次对抗中所采取的强硬态度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

经过艰难的五轮谈判，政府被迫作出较大让步：撤换了事件的当事人彼得哥什省省长、副省长和检察长的职务。团结工会也作了相应的让步：撤换了彼得哥什省分会的两

名激进分子。

公平地说，新政府的严厉也表现在对自己内部的处置上。新政府在对团结工会采取反参与的对抗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使波兰走出危机的积极措施。

党风不正，政府腐败是造成人民强烈不满的主要原因。新政府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对上层领导人利用职权谋私，贪污腐化进行了严厉制裁。

至1981年6月止，波兰政府确认了对近5000人的指控："中央监委处理了25名中央领导人，其中15人被开除出党，包括前总理雅罗谢维奇、前计委主席弗热什奇克等。

在被确认的受指控者中，有3名中央书记，包括原第一书记益莱克；7名省委书记，7名副总理，74名部长、副部长或相当于部级的干部，51名省长和副省长。另外，在100多起重大的贪污案中，涉及领导干部达800多人。"这真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想一想，产生如此大规模腐败的，是一个仅有三千余万人口的国家政府。

要走出危机，必须揭露造成危机的特权与腐败；然而，有了这样的暴露，当局怎么可能恢复社会的信任？怎么可能找回它曾有过的黄金时代绝对信任，绝对的权威和绝对的控制。

要恢复权威必须惩治腐败，而暴露腐败却又无可挽回地使那个永远正确、伟大的神话破灭而加深其危机。

这就是新政府所面临的两难处境。

危机从社会蔓延到党内。对旧的思想路线和统治方式提出根本怀疑的呼声在党内变得强烈起来。

波共党内出现了规模庞大的"横向结构"运动，以打破以往那种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纵向结构。各单位党组织彼此进行思想交流、讨论，并成立了许多政治色彩极浓的派别团体，如"论坛"、"讨论俱乐部"、"协调委员会"、"党代表筹备小组".....

到1981年3月，横向运动发展到高潮，波共在全国有了1500多个这类自发组织。

1981年4月，全国19个省和地区的600多名党员云集托伦，举行协商论坛会议。

这就是著名的"托伦论坛"。这次自发的政治盛会上，发出了要求党内民主和实行更大改革的强烈呼声，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波共确实陷入了内外交困的重重危机之中。

然而，换一个角度，我们却可以说，波共有了近二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希望腐败的暴露使其不再能危害社会，并有了彻底医治的可能；全党对党的命运的关切和干预，带来了上下齐心协力重塑党的形象、重建党的权威的可能。

波共面临着一次空前的危机，也存在着一次空前的希望、一次重大的选择。如果波共有勇气首先在党内实行民主，那么社会主义民主必将在下一步提上日程。

然而遗憾的是，波共没有抓住这个时机。它把对前领导人的惩罚依然当作替罪羊式的解决手段，它最多只作到头疼治头，脚疼抬脚的治疗，而没有从铲除腐败的根源着手对制度作出重大改革。它既不愿将权力归还给社会，也不愿让全体党员来参与执政。所谓共产党执政其实只是政治局专政。那种党代表工人阶级，中央委员会代表全党，政治局代表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制，仍然被政治局那十几个人当作社会主义民主的唯一形式而不愿放弃。

波共拒绝了这次危机中所蕴含的希望，因此，它从这场危机中得到的便只是灾难了。波共因缺少选择的勇气和诚意，而让一次巨大的历史时机流失了。

波共经历着战后从未有过的生存危机"1980年7月1日至1981年6月15日，入党三万八千六百人，退党三十万八千六百人.....在交出党证的人中，工人占百分之七十二左右。"波兰当局且战且退，但决不作实质性让步。

波共在四月底又作了一次重大的政治改组：解除了前总理平科夫斯基及其它几位对危机承担责任的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几乎同时，政府又发出杀气腾腾的威胁说："团结工会威胁着波兰"，"波兰政府已经仁至义尽，我们的盟国已经忍无可忍了。"到了7月，动乱又有所增涨，抗议食品缺乏和物价上涨的集会游行、罢工陆续发生。在华沙等城市还出现了大规模的车队游行示威和"妇女进军"运动。

8月4日，政府成立了"反危机行动指挥部"和"反投机倒把特别委员会"。前一个机构显然是针对来自人民的抗议和动乱的；后者却是表示对内部整顿的决心。前者是进攻，后者是让步。

团结工会则表示坚决支持群众的集会游行，并宣布8月5日在华沙举行两小时的警

告性罢工，以示声援。

这是雅鲁泽尔斯基的新政府与团结工会的第二次全国性的重大对抗。

罢工之后，双方于8月6日举行会谈。由于工会方面不再满足于就事论事的谈判方式，他们提出了涉及到制度方面的、因而也是当局不可能接受的要求工会与政府分享舆论工具；彻底的工人自治；由全民参加政治经济改革……

谈判破裂。

双方越来越成为势不两立的对抗力量。合作的可能更加渺茫……

二十六

在有26个外国工会代表团列席参加的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诞生了共产世界第一个由社会而不是由政府，由人民而不是由执政党所制定的改革计划。

团结工会已经在庆祝自己的一周岁生日，却还没有在波兰的社会生活中发挥巨大作用，比如象一个公开的、合法的反对党。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比喻。团结工会的作用应远远大于一个反对党，她能以一千万人的智慧和意志去帮助当局制定政策，并以全体人民的直接感受而不是通过一小批政客代他们去判断去验证政策的正确性或纠正其偏差。

团结工会至今没能成为政府的行政伙伴，她仅仅为了自己的合法存在就得竭尽全力进行抗争。但波兰工人阶级不能妥协，否则波兰所获得的历史进步便徒具虚名。

在政府方面却相反，如果它不妥协，便只能将带来重重危机的统治方式保持下去。

在1981年，历史需要工人阶级具有坚定的抗争精神，这团结工会具备了；同时，历史也要求另一方的政府拿出伟大的妥协精神，才能完满的完成这次历史进步。

非常遗憾，很少有人愿意当妥协的伟人。在两军对垒的严峻时刻，哪一方不为自己挑选一位强硬、果断、具有攻击性的将领呢？

雅鲁泽尔斯基无疑是具有魄力的首领。波共能选择这位充满意志力量的人物无疑表明了它的远见。这也无可指责。

该指责的只是历史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时机，却未能造就一位能以伟大的妥协精神去把握这个时机的政治家。

我们为历史遗憾，为最后决战的序幕将要拉开遗憾……

团结工会已经明确意识到，要改变波兰的传统政治结构，必须首先实现这样两个目标：第一、要干预政府的决策、行政，就必须打破官方对新闻宣传机构的垄断。只有掌握了非官方的舆论手段，才能帮助人民了解和判断国家政策的正误、利害，并迅速将人民的反应传递出去；第二、实行名符其实的“工人自治”。这是团结工会在争取工人阶级领导权的斗争中采取的非常重大的步骤。

在反对将国家下放的企业主权交给工人的论点中，认为工人素质太差、以及高度现代化的生产无法由集体意志进行管理的论点颇有市场。这些论点有意无意地混淆了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两种管理职能，工人阶级可能不懂经济，不懂技术、管理，但他们懂得生产是否发展了，他们懂得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是否得到了维护。他们可以以此为依据去挑选有能力的技术、管理人才，去行使自然属性的管理职能，而将诸如投资、分配、制定制度、任免厂长经理等社会属性的管理职能牢牢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

工人阶级如果不能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如果不能将工厂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便不可能成为国家的主人，而只能是一种新的雇佣奴隶。

到8月份，有了自己强大组织的波兰工人阶级，在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方面，有了十分成熟的战略思想。团结工会旗帜鲜明地向当局提出了两项要求：1、要有由工会直接控制的宣传工具，而不是使用官方的宣传工具；2、工会有任免企业领导人的权力。

波兰工人阶级发起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强攻。

这次进攻立即遭到了波共的坚决抵抗。

9月初，波共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拒绝了团结工会关于“工人拥有对工厂的全部控制权，包括对任命企业经理的控制权”。波共表示，不反对工人参与工厂管理，但希望通过上级对企业领导人的任命来保持中央对企业的控制。

波共同时作出了不同意团结工会控制宣传机构的决议，而只在“原则上不反对团结工会使用（官方）新闻工具。”在这次全会上，卡尼亚承认波兰面临着严峻的历史关头，但又表示波共有力量担负起“历史性的责任”，为此，卡尼亚发表了迄今为止最强硬的讲话。

他说：波共“不会放弃保卫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任何手段。”卡尼亚的危机感是准确的。

如果团结工会的上述两点要求成为波兰政治生活中的现实，那么肯定会危及波兰现存的社会主义的存在。这无须怀疑。有疑义的是，这个被危及的社会主义与团结工会所要争取的社会主义，哪一个更具有社会主义实质？

几乎在卡尼亚的宣言同时，瓦文萨也作了同样强硬的表态。他宣布，团结工会将以“一切可能的手段”争取有权利用国家控制的宣传工具，以及坚持实现自治的目标。

紧接着9月3日结束的波共九届三中全会，团结工会于9月5日在格坦斯克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本身，就能证明团结工会确实已成为波兰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但不是最大的军事力量。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次在格但斯克郊区庞大的奥利维亚体育中心召开的大会，对波兰的政治意义明显超过了波共的党代会。

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有八百九十二名工人代表，有二十六个东方和西方的外国工会代表团，有罗马天主教牧师，有库龙等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有数十个国家的新闻记者，还有自愿来列席旁听的成千上万人民群众。

大会是以瓦文萨充满自信的开幕词开始的。

瓦文萨说：“团结工会今天存在，今后仍将存在，不管什么人喜欢它与不喜欢它。我们将一道创建我们所理想的波兰。”然后，瓦文萨拍着手与全体代表一起高唱波兰国歌。

大会开始后，出现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插曲：瓦文萨宣布，不准波兰国家电台和电视台在会场转播实况。因为在事先的谈判中，团结工会提出，电台、电视台对团结工会代表大会的报道，工会应有编辑权，而官方拒绝了工会的要求。

当瓦文萨说了“我们决定，不让电台、电视台报道这次代表大会”后，全体代表站起身来，用鼓掌和挥手来欢呼这个胜利。

这个决定维护了工人的尊严，同时将最令人痛恨的电台、电视台送上了耻辱的审判台而让人感到痛快。

在官方的各种宣传手段中，被官方控制最严的是广播电视，因此它们几乎只报道粉饰官方的消息，并且绝对的只按官方口径而无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

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由工会委员会书记采林斯基作团结工会

一年来的总结报告。

报告首先分析了波兰形势，认为"一场革命正在波兰展开，团结工会是它的推动力"；报告公开赞扬了波兰天主教会和持不同政见运动，说他们"多年来一直是工人利益的公开维护者"；谈到政府当局，工人方面仍希望能与之"达成协议和进行对话"并认为"政府当局同社会之间达成谅解是完全可能的。"；报告肯定地说，事实已证明政府没有能力领导波兰摆脱危机，说政府之所以寻求团结工会的合作，"只是为了让工会对自己不能发挥任何影响的各种决定负责。"采林斯基在报告中严厉地谴责了政府中的某些保守势力，说他们企图恢复1980年8月之前的制度。他说"这些集团企图消灭团结工会，甚至不惜走上背叛民族的道路。"这是明确地指出波共可能谋求苏联帮助他们巩固政权。

采林斯基还驳斥了政府方面关于团结工会的行动损害民族利益的指责。

他说："团结工会的爱国精神不需要别人来教。"这句话引起了与会者雷鸣般的掌声。

这掌声表明波兰工人阶级已经能毫不费力地将爱国与爱某一个政权区分开了。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全国委员会，瓦文萨依然任委员会主席。

代表大会通过了长达40余页的《纲领决议》纲领主张实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明确提出要改变现行体制。纲领重新阐述了独立工会的性质、宗旨、策略，规定团结工会将拥有自己的大学、出版社、报刊、通讯社、电台等宣传机构。

纲领提出通过"职工自治"，实现工人对工厂的占有，通过"区域自治"加强社会对中央集权的抗衡。

纲领还呼吁在全国实行"自由选举"，并估计已有950万会员的团结工会能在选举中取得议会的多数。

《纲领决议》是一份非常完整、详细的改革蓝图。评价这份完全由工人阶级设计的改革蓝图是困难的，预计它在改革实践中的结果则更不容易。我们只能说，这是共产世界第一份由社会、而不是由国家，由人民、而不是由执政党所制定的改革计划。它不仅与刚结束的波共"九大"提出的改革纲领针锋相对，甚至与五十年代以来的铁托式的，赫鲁晓夫式的，纳吉式的，杜布切克式的，邓小平式的改革纲领相佐。

上述任何一次改革都是由执政的共产党制定，并自上而下地由共产党组织逐级下达、实施。它的实质是由共产党来限制和改造共产党。所以，它在削弱党的某些机构和权力的同时，却又必然加强党的某些机构和权限。因此，每次这一类的改革，都要喊出

诸如"加强党的领导"的口号。这样一来，虽然能增强党的改革力量，却也使应在改革中削弱的党对社会的无所不在的主宰保存下来。

团结工会的《纲领决议》本身就来自社会基层，它的目标是以社会力量来限制和改造党和国家政权，它的实施必然是削弱而不是增强党的力量。

共产世界还没有过这样的改革实践，很难说它就能获得以往那些改革所没能获得的成功。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改革设计一拿出来，就会遭到执政党的全力反击。

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政府与社会的最后决战拉开了序幕。波兰的局势急转直下。双方都紧张地等待着最后摊牌.....

二十七

波共亮出了底牌罢免了不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卡尼亚；提出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的议案；发出了严厉警告：政府将不惜运用一切手段来镇压政治疯子.....

最先亮出底牌的是波共。

9月16日，波共政治局针对着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声明，指责团结工会从事与工会事务毫无关系的活动。

波共这个15人的最高权力机构说："建立一个新型的自治工会的做法没有成功，而建立一个公开改变政治体制为目标的反对派政治组织的做法倒取得胜利了。"妄图"改变政治体制"，是这类政权下最严重的罪名。成立了这一条罪名就足以将任何政敌置于死地。否认掉这个罪名便可以使自己的政治行为争得相当的合法性。因此，我们常常能听到对这种罪名的极力解辩和否认，却很少听到"为什么不能改变体制？"的思考和质问！

没有体制的改变，谈何改革？

波共为团结工会罗织了这一条罪状后，便发出了咄咄逼人的质问："我党一再警告团结工会要提防存在于其队伍中的那些破坏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为什么代表大会还要这样做？

"波共指的是团结工会发表了持不同政见组织"社会自卫委员会"领导人库龙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库龙要求成立一个救国委员会。他认为共产党已经瘫痪，不起作用了。他主张由共产党、天主教会和团结工会组成一个全国统一战线，在全国大选之前临时掌权。

波共对团结工会接受并发表这样的讲话十分恼火。它宣称，将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来阻止任何夺取或分享波共领导权的尝试。

波共政治局的声明说："国家将根据局势采取必要的手段来保卫自己。局势越来越危险，反革命的威胁也越来越大。"声明最后说："对政治疯子实行镇压是符合国家的利益，符合一个独立波兰的利益。"两天之后，波兰部长会议召开紧急会议并发表了《致城乡劳动者的呼吁》。呼吁书指责了团结工会接管国家政权的政治野心。

呼吁书说："团结工会领导人逐渐接管政权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这已不是什么设想，不是一种遮遮掩掩的意图，而是行动了。"呼吁书向950万团结工会会员呼吁："现在是与这条路线彻底脱离关系的最后时刻了。"9月18日发表的这份政府声明还宣称，政府同意波共政治局对波兰局势的估计，因此，"必要时，政府将不惜运用国家权力范围内的一切手段。"一个强有力的首领不仅有强硬的姿态，还有果敢的行动。当局的行动是积极的，强硬的。

在政府发出严厉警告的同时，兼任着国防部长的政府总理雅鲁泽尔斯基颁布命令军队中，即将完成两年任期的军人的服役期延长两个月；同时，向包括华沙在内的全国两千多个乡村和城镇派驻了军人行动小组。

10月16日，波共九届四中全会召开。一系列强硬措施得到了这次全会的认可。强硬派在全会上表扬了军队在保卫波兰社会主义制度的战斗中所起的伟大作用，而对"中央领导不力"以及对团结工会表示"退让和软弱"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在这次全会上，强硬派的中央委员格杜瓦发言，提出了在全国宣布紧急状态的提案："反社会主义势力正在进行公开的夺权斗争，如果我们要对反社会主义势力作斗争，党就立即发动攻势。党不要再忍耐下去了，不要再谦卑了。"在是否实行紧急状态的表决中，反对这项提案的人以微弱的多数否决了这项提案，但拒绝支持这个提案的第一书记卡尼亚，却因此受到更多的指责而不得不在这次全会上递交了辞去第一书记职务的辞呈。

强硬派最终占了上风。全会通过了禁止罢工的决议，任命了雅鲁泽尔斯基为党的第一书记。这位军队和政府的最高首脑，终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卡尼亚为制度造就一个重量级的斗士赢得了一年时间。他完成了历史的使命，他必

然要退出历史舞台。

不愿意用武力解决工人问题的卡尼亚下台，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世界舆论普遍对主要代表波兰军队，而不代表波兰共产党的雅鲁泽尔斯基接替卡尼亚表示不安。

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说："卡尼亚曾以和平方式使波兰的紧张局势得以缓和。新领导只要继续实行这种政策，只要谈判还在进行，就有希望实现公平合理的解决。"西方外交家对雅鲁泽尔斯基是否能继续用谈判而不是用武力解决波兰面临的危机则表示出审慎的观望态度。

他们等待着雅鲁泽尔斯基说明他的政策。

西方新闻界的预测要悲观一些。

《华尔街日报》10月19日分析说，"挑选雅鲁泽尔斯基作为卡尼亚的继任人表明，波兰共产党不愿意彻底进行波兰的社会和政治变革。"西方分析家还认为，强硬派在党和政府的改组中占据优势"可能会大大毒化工会和政府之间会谈的气氛。"对波共改组表示更大关注的当然是波兰工人阶级。应法国五个工会邀请，正在巴黎访问的瓦文萨得知卡尼亚下台的消息后，立即与格坦斯克通了长途电话，同团结工会总部进行了紧急磋商。

瓦文萨拒绝了新闻界的采访，他的发言人说，"在得知更多的情况之前"将不可能对党的改组发表任何意见。

但瓦文萨表示："我们在新政府和团结工会的关系上很镇静。"波共终于从痛苦的退让中停顿下来，并怒气十足的准备反击。

反击是从内部的清洗开始的开除了在团结工会中担任最高职务的波共党员博·利斯的党籍；解除波共记者协会主席拉特科夫斯基的中央委员，并开除党籍"因为他贬低了反社会主义威胁的严重性以及没有尽到一个共产党记者应尽的义务"；中央全会还作出决议："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团结工会会员的情况再也不可能存在了".在九百五十万团结工会会员中，有大约一百万波共党员。政治局要求这一百万党员以退出团结工会来宣布他们对党的忠诚。

这项号召发出的当天，政治局委员中唯一的一位团结工会会员格日布宣布退出团结工会，并说她"发现过去参加了一个反对派组织。"在由二百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有四十人参加了团结工会。他们大多数是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当天，有十多人宣布退出团结工会。其余二十多人也面临着非此即彼的选择。

或许他们面临的选择还要严峻。因为已经有消息传出来，正在考虑对大约三百名波共党员的逮捕，这些党员是团结工会中的激进会员或激进的支持者……

10月充满着火药味，还能隐隐闻得血腥气。

团结工会作出的最初反应是镇静而克制的。

当记者问瓦文萨对当局宣布禁止罢工有何反应时，他说：“我们可以寻求其它的抗议方式。我们希望在制造乱子的情况下给予政府帮助。”瓦文萨同时表示，工会愿意坐下来同政府讨论问题，“愿意做到通情达理，我们不要求不可能做到的事情。”10月下旬，团结工会作出暂时推迟使用罢工手段的决定，但采取了更具有深远意义的行动：向政府发出呼吁，要求立即成立团结工会和政府联合委员会，来处理波兰当前的危机。

团结工会缓和了形式上的对抗，却加强了政治上的攻势。当局不可能作出更具实质性的让步。于是，工人阶级只好又一次被迫操起同时也损害自己利益的斗争武器罢工。

10月下旬，一万二千多名纺织工人宣布罢工，他们占领了华沙地区纺织厂以抗议官方的经济政策。

10月27日，瓦文萨来到华沙南的纺织城齐尔拉多夫，同罢工工人在一起。他宣布，团结工会将于28日举行一次全国性的一小时罢工来支持纺织工人的这次罢工。

在这次集会上，瓦文萨谴责了政府当局再三拒绝工人阶级的参政要求。他说：“如果政府不愿意同团结工会合作，那么，团结工会已经再三讲过，它愿意自己来管事。”10月28日，波兰各城市都贴满了罢工标语，上面画着有冠的鹰。波兰国徽上面的鹰是无冠的。波兰工人给这个政权标志上增添一项王冠无疑是要将人民的权威强加给当局。

中午，拥有近千万会员的团结工会的一小时罢工鸣笛开始。

当天，波共机关报《人民论坛报》，发出了带有悲怆意味的呼吁：“愿我们的祖国不再发生罢工了，罢工并不反映工人的利益。”这确实是一个悲剧：工人阶级在有了自己的政权三十多年之后，居然以反对自己历史利益的方式向自己的政权作斗争。

一小时罢工结束不久，雅鲁泽尔斯基便立即在刚刚开始第九届五中全会的开幕式上作出反应。

雅鲁泽尔斯基说，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政府不容忍进一步的罢工行动。他称这次罢

工为"社会主义波兰的敌人已经公开摊牌了。"最后决战不可避免。

1 1 月，波兰召开六中全会，重申党和政府将采取一切拥有的手段来维护现行制度。

全会作出决议："有必要授予政府一切必要的权力，以便有效地制止破坏国家及其经济，威胁国家和社会治安的破坏行动。"进入 1 2 月，波兰局势急转直下。双方都放弃了妥协的希望。

月初，政府出动军警强行解散了正在罢课的消防军官学校，并要求国务委员会授予采取非常措施的权力。

团结工会终于对政府越来越强硬的方针采取了全面对抗的策略。

1 2 月 3 日，团结工会主席团在拉多姆举行会议，谴责政府当局"选择了暴力的道路。

"瓦文萨在会上表示，既然对抗不可避免，团结工会将不会在这场对抗中退缩。会议决定 1 2 月 1 7 日举行全国总罢工和总示威。

在这次会议上，针对着政府最终采取武力解决的可能性，一些领导人提出建立工人武装的提案，同时提出了接管地方政府和建立临时政府的主张。

拉多姆会议的录音为警方所获，并通过电台公布于众。

官方的报纸强烈地抨击这次会议。

"团结工会要全面夺取政权"成了波兰舆论的焦点。

团结工会中的激进派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即使对人民来说，这个新课题也令人感到意外而陷入艰难的思考之中。

这是非常严肃、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感情用事，那我们必须对现代工人运动中出现的这个课题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我们决不能因为团结工会是工人的真正代表，而为其能最终掌握政权欢呼。我们不应该忘记，1 9 4 4 年，波共确实是以人民的真正代表而夺取政权的。我们得承认，那时，它有为人民的纲领，也确实有为人民的真挚愿望；而且它的领导人大多都是从人民

中来的。

波共的悲剧不在它没有好的愿望，没有优秀的领袖，而在于那日益壮大的不受任何反对和制约的统治权力。如果团结工会以推翻政府、夺取政权为目标，它同样不能保证不会变成另一个唯一的执政党，瓦文萨不会变成另一个哥穆尔卡或盖莱克。

这是一个危险的目标。它会使波兰失去刚刚找到的平衡权力的杠杆。如果团结工会有力量来实现这个目标，波兰的这场工人运动便失去了任何进步意义，而只是近几十年来那种毫无意义的撤换人、改换政府班子的重演。

波兰工人阶级应该认识到，历史也同样要求它作出伟大的妥协那就是放弃传统的、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斗争方式而只以能够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限制为满足。

这种目标似乎低了一点，但它却能净化权力，能变权力为责任，能使一个坏政治家不敢干坏事、不能干坏事，能改变那种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和堕落……

在团结工会内部，这个激进的提案受到了抵制。因为一些温和而具有远见的工人领袖反对这个提案，主席团不得不进行投票表决。

遗憾的是这次详细的夺权方案被通过了。

瓦文萨持中立态度。

当这项由持不同政见者岸龙制定并得到许多激进的工会领导人支持的方案进行表决时，瓦文萨既不赞同也没反对。投票时，他只是默默地、一股劲地往烟斗里装烟。在他的沉静中隐藏着巨大的内心激动和紧张的思想。

幸亏团结工会没能实现激进派的危险目标既然政府不同意团结工会与它分享权力，当然更不会同意让其取而代之。

政府的态度越来越强硬，波兰各地都有军警活动。政府对团结工会要于12月7日举行全国总罢工发出警告：如果团结工会不顾官方严禁罢工的禁令，将受到“十分严厉”的惩处。

团结工会没有退让，积极地实行拉多姆会议决议，并于12月12日在格但斯克召开主席团会议，正式向波兰政府提出，要求就“是否信任共产党政府”、“是否希望成立一个临时政府”进行公民投票。

团结工会宣布，如果政府不答应这项要求，团结工会将于1982年1月15日单方面组织公民投票。

团结工会触到政府的致命弱点，双方进入到你死和活的肉搏阶段。团结工会发出的这个公告，无疑是一份现政权的死刑判决书。当局会束手待毙吗？

12月12日显然是一个最后时刻.....

禁书网网友制作

翻墙去禁书网www.bannedbook.org可下载更多禁书

